内部文稿

目录

[内部文稿 1](#_Toc5526)

[目录 1](#_Toc25775)

[文化与宪政 3](#_Toc8469)

[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 从文化与社会生活形式的相互关系看东西方近现代社会体制的历史型构与演化路径之差异 3](#_Toc5957)

[中西文化对比，该走出简化陷阱了 28](#_Toc31037)

[法律传统——个体与社群之间 33](#_Toc29095)

[中西基本问题之共同性、问题解决方案的多样性与此多样性背后的基本功能的一致性 38](#_Toc10662)

[土地法律制度 39](#_Toc26979)

[我国的土地法律制度要从根本上改变 39](#_Toc20649)

[让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67](#_Toc20049)

[城市土地从来私有至今私有 70](#_Toc1565)

[我对土地制度改革有信心 74](#_Toc10971)

[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应当实事求是! 78](#_Toc31981)

[立法制度问题改也难 80](#_Toc6083)

[对《框架》的几点意见 84](#_Toc24140)

[研究土地法律制度原则要采用《物权法》通用的大陆法系的概念 85](#_Toc9989)

[土地法律制度改革的重点：一是赋予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平等的产权，二是改土地计划配置制度为市场配置制度 87](#_Toc5009)

[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 90](#_Toc26298)

[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纪要 90](#_Toc7177)

[理论创新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97](#_Toc17452)

[历史实践可以检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 109](#_Toc13887)

[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转变 113](#_Toc6272)

[神经元经济学 深刻认识人类行为的科学 123](#_Toc8323)

[演化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 130](#_Toc13205)

[暴力要素及相关均衡 135](#_Toc4798)

[经济学的转型 144](#_Toc7955)

[我反对思想市场 150](#_Toc25558)

[数学如何改变经济学 152](#_Toc25277)

[从中国事实到普遍理论 155](#_Toc7973)

[创新型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是建立主体意识 158](#_Toc7299)

[构建理论创新的交易平台 160](#_Toc13020)

[经济学创新中的几对关系 161](#_Toc4579)

[经济学是经验科学，不是伦理学 165](#_Toc26184)

[理解国有经济：产业控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170](#_Toc19868)

[基于复杂性科学家族企业跨学科研究 172](#_Toc32582)

[移动互联网与我们的生活 176](#_Toc13254)

[盛洪：支付宝不仅有技术意义，更有制度意义 176](#_Toc30839)

[刘业进：余额宝是企业家精神的产物 178](#_Toc1989)

[未来乡村建设的图景：一个逆「城镇化」的过程 179](#_Toc30188)

[城市发展与制度创新 181](#_Toc31408)

[从PPP与资金效率提高看其关联的混合所有制创新 181](#_Toc21608)

[公共政策的定量评价 187](#_Toc20008)

[地区发展战略的价值选择——以喀什、阳城和前海为例 190](#_Toc20322)

[中国PPP存在的问题与新一轮PPP的发展方向 195](#_Toc14003)

[为竞争而垄断：以综合管沟为核心的公用事业投资运营监管模式——青岛高新区的研究案例 198](#_Toc23665)

[盛洪：空间经济学和城市规划 203](#_Toc16915)

[乌克兰民主转型 213](#_Toc3788)

[乌克兰：民主对民族的困境 213](#_Toc26931)

[乌克兰政治危机和民主转型的思考 216](#_Toc11258)

[乌克兰启示录：转型难在哪里? 221](#_Toc29342)

[政治道德和民主共识是转型成功的重要因素 224](#_Toc8947)

[乌克兰：成熟的宪政民主文化尚未自我生成 228](#_Toc12709)

[观察乌克兰，要关注软性影响因素 230](#_Toc24883)

# 文化与宪政

## 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 从文化与社会生活形式的相互关系看东西方近现代社会体制的历史型构与演化路径之差异

**韦森**\*

**[[1]](#footnote-0)**

**【内容提要】** 基于当代政治哲学和社会学中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两分法，本文探究了东西方社会制序（institutions）[[2]](#footnote-1) 在近、现代的不同型构和演变路径。本文发现，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和法治社会有其个人主义文化根源，而传统中国社会和东亚诸社会中的（家族）社群主义，可能是东方社会在近代未能自发型构出一个法理社会的主要文化原因。本文亦发现，民主化的社会机制和刚性的专有产权结构同为一个良序市场秩序的先决条件。中国未来社会的制度化进程，将会进一步引致学术界从对传统中国文化资源的反思中来审视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产权结构和民主机制建设问题。

**【关键词】** 制序（生活形式），个人主义， 社群主义，文化拟子，民主机制

“一串串的连续性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理解相隔久远的祖先，但是，在这些连续性旁边，当我们企图以其道德和精神的维度理解人类主体时，却存在令人困惑的差别。”

—— Charles Taylor (1989, p. 113 )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市场经济秩序的迅速扩展和工业和科技革命的强大推动下率先进入了现代社会。与西方世界相比，有着数千年传统文明的中国近代和现代在科技革命、经济发展、市场扩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大大滞后了。在现代化的四个基本组成部分 —— 即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价值多元化和社会人道化—— 型构和演化路径上，中国在近代、现代和当代与西方国家也迥异斐然。这些事实促使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以及国外汉学家们不断反思传统中国文化精神，并从“五四”以来曾对中西文化的品格及其差异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比较，以致使在这方面的出版物和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在本文中，笔者仅从文化与制序（即维特根斯坦哲学话语中的“生活形式”）的相互关系，对东西方社会体制的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型构与演化路径，谈一点个人的粗浅看法。

从文化与社会生活形式的相互关联和作用的视角来考察东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品格，我们会发现，西方文化——无论是英美文化，还是直接承传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精神的欧洲大陆诸国的文化——可以被归结为一种个人主义（individualist）文化，而中国文化以及受儒家文化精神濡染的东亚诸社会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t）文化。[[3]](#footnote-2) 因此，要在相互比较中对东西方社会体制在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历史型构和演变路径有一较切近的领悟，看来还有必要从东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这一品格差异入手。

**一、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个人主义文化根源**

这里，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西方文化与欧美近现代社会体制演化变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进行这一探讨之前，我们这里首先指出，文化与广义的社会制序（social institutions）——即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在社会过程中基本上是同构的：文化是生活形式的镜像，而习俗、惯例、制度等等种种社会生活形式则是文化在现实社会过程中在其形式上的固化、凝化、外化和体现。从欧美的社会历史演化行程来看，两希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以旧约与新约《圣经》为“范型”（archetype）的以色列教和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在欧洲社会历史上与政治、法律、经济和其它社会体制同构在一起一同承传和涵衍到近代。到了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左右，表面上看来已交汇在一起但实质上却泾渭分明的“两希文化”（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在精神上为神本主义，而古希腊罗马文化在精神上为人本主义）分别在欧洲近代的两大社会运动中得到了重塑和再生。这就是直接承传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欧洲人本主义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重塑，而直接承传了以色列教尤其是基督教宗教精神而内涵在欧洲社会中神本主义则在差不多同时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洗礼。尽管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分别是在西方文化中两个精神底蕴维度上或者说两大潜流中发生的，并分别重塑了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西方传统文化的这两个精神基体（matrix），但西方文化的这两大精神传统在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中再造和重塑的方向上却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均指向从欧洲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廷的政教合一的“神圣天蓬”（sacred canopy）下获得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从而使两希文化原型中就分别潜含着的个人主义文化拟子真正昭显和光大出来。[[4]](#footnote-3)

十五世纪左右在欧洲发生的这种文化精神上两大历史运动对西方近代社会体制的演化和变迁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对欧洲近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型构和扩展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和诺思（Douglass North，1981）在西欧现代化的发生原因上有着不同的见解。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理路，西欧近代的工业技术的创新引致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生产方式的变化又自然导致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制度安排的改变。按照马克思的见解，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安排（生产关系）的整体改变又可以视作为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经济基础的改变又必然导致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的改变。在欧洲近现代社会经济体系内部变迁的动力和路径问题上，诺思形成了一个与马克思几乎完全相反的观点。照诺思看来，近代欧洲历史上以明晰和充分地界定产权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制度安排的型构，为西欧社会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激励。因此，照诺思看来，“制度创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才是西方近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技术突飞猛进乃至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参North, 1981; North & Thomas, 1973）。尽管马克思与诺思在西方近现代社会历史中生产技术与制度安排的相互关系在其现代化进程的决定作用上持相反的见解（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诺思认为制度安排的创新激励了工业技术的创新），但他们在文化与社会制度的相互关系上却有一个共识。按诺思的话来说，以界定产权为特征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变迁“创造了非人格化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并打破了旧的意识形态”（见North, 1981, 中译本，页190-191）。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经济基础”的变迁引致了“上层建筑”的改变和重塑。由此看来，马克思和诺思均认为，在欧洲近现代历史上，制度变迁促使或牵动了人们的文化观念的变化。

应该看到，由于文化濡化的机制过程在起作用，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体系内部，文化演化**往往**滞后于制度变迁，或者说制度变迁往往引致人们文化观念的改变。由此来看，马克思和诺思的上述观点在逻辑上与我们上述理论推理是一致的。然而，一些令人非常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具有明晰产权结构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在十五世纪左右先从荷兰接踵是英国型构出来的？为什么这种现代市场经济的“人之合作的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哈耶克语）没有从世界的其它地方自发型构出来和扩展开来？这种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在欧洲最早型构的内在社会动力机制是怎样的？这种内在于市场形成与扩展之中的刚性私有财产结构的型构以及维系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框架的成型有没有文化上的原因？

在回答这些问题上，美国经济学家米尔格罗姆、诺思和温格斯特（Paul Milgrom, 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1990）曾以中世纪荷兰早期“基尔特商人”（guild merchants）的“行会秩序”（fraternal orders）的自发型构为例，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路给出了一些博弈论的解释。毫无疑问，米尔格罗姆、诺思和温格斯特严密的博弈分析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荷兰和英国早期商法体系和司法机构的历史型构过程的内在动力机制。即使他们的基于现代经济学理性经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假定的经济学逻辑推理没问题，但仍有一个问题他们将无法回答，那就是，如果习俗、惯例和制度等等社会生活形式的型构原因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有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一个维度，他们的分析结果应该是适应于具有任何文化背景的任何社会中。因此，尽管他们以荷兰“基尔特”商人行会早期商业法规和司法程序的型构为其理论分析的历史解释对象，他们实际上并没回答出为什么现代市场经济秩序最早先在十三到十五世纪从荷兰和英格兰生发出来然后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这样一个问题。除了米尔格罗姆、诺思和温格斯特的理论分析外，同样执教于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格雷夫（Avner Greif）在近些年来所拓辟出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istorical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探究理路中，也试图从“文化信念”（cultural beliefs）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关系中给出了一个颇有说服力（因而颇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界所瞩目）的解释。在199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制度与国际贸易：商业革命的教训”、1994年发表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社会的历史和理论的反思”和其它文著中，格雷夫（Greif, 1992, 1993, 1994）提出了他的历史比较博弈分析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格雷夫以十一至十二世纪地中海地区两大“贸易社会”即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商人群体为历史范型，并运用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分析了其内部的文化信念之差异对社会经济组织的型构以及伴随着伴随着社会组织型构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固化，商业组织内部的信息传递和协调，以及集体惩戒机制形成和作用，以及合约实施机制的演化（即今天经济学界所理解的制度化和制度变迁）过程。而格雷夫从文化信念对社会组织以及制度安排的型构与变迁影响的分析视角，对十一和十二世纪以个人主义文化为基因的热那亚商业群体内部经济组织和制度安排型构的博弈分析，恰似映照出了近现代欧洲近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型构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历史文化原因；而他对同一时期马格里布商人社会内部的商业活动所导致的经济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解释，又恰似折射出以儒家伦理为文化精神主脉的东亚诸社会在近现代无力开拓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原因。由于笔者在最近撰写的一本《经济学与伦理学》（韦森，2002a）的小册子中和《世界经济》杂志2002年第10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韦森，2002b），已对格雷夫教授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进行了较详尽的介绍和评述，这里我们就不再展开讨论他的工作和分析理路。

事实上，最早探寻西方市场经济秩序型构和西方世界兴起之文化原因的，并不是经济学家格雷夫。在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1978, 1987）就试图探究英国近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形成和扩展的文化原因了。在1978年出版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和1987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两部著作中，麦克法兰提出了与大多数学者尤其是大多数社会学家们不同的观点。之前，研究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学者一般认为，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主义社会体制是欧洲现代化进程的结果。但麦克法兰的研究却发现，早在中世纪，就可以从英格兰的个体性生产方式中发现个人主义（如“个人自治”和“个性解放”）的文化特征。由此，麦克法兰主张，与其说个人主义是欧洲现代化的结果，不如说它是欧洲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L. Berger, 1991, 参中译本，页70）也赞同这一点，他说：“个人自治的根源存在于西方文化之中，它要比现代资本主义早得多”。[[5]](#footnote-4)

笔者认为，尽管“个人主义”这个词在十九世纪初才出现，但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文化“谜拟子”（mimeme——我们这里可以把它理解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名词来称谓的一个文化“拟子”的“自为态”，或者说“拟子”的“原初态”），在欧洲历史上的产生和存在甚至比麦克法兰、伯杰和其他论者所认为的中世纪还要早。因为，从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两希文化来说，且不说以人本主义为主要精神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本身一开始就潜含着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个人自主和“自我独立”这些后来被称之为“个人主义”文化拟子蔟之类东西，即使以神本主义为灵魂的古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也一开始就潜含着类似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谜拟子”。按照《圣经·旧约》与《圣经·新约》的记载和“话语”（discourse），以色列人信仰他们的全能上帝的经历，就突出表现出了独立的个人以一定的方式与上帝的沟通与交往。从《旧约》对亚当、亚伯拉罕、雅各（据圣经记载曾与上帝摔过跤）、摩西、约书亚、大卫王、所罗门王到约伯、以赛亚等旧约时期的先知们的记载，从《新约》对耶稣的事迹的记载到圣徒彼得、约翰和保罗等经历的记述中，都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和基督徒笃信有一个万能的主（Lord），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主及其意志（圣灵）沟通和“对话”。因此，以色列教和基督教（这里指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各派在内的广义的“基督教”）信仰本身就意味着每个人在主面前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格”（an independent personage），而不是象儒家的教诲中那样每个人都是处于一个群体关系中“共同人格”（a corporate personage）。由此来看，西方文化从其两个源头上来看一开始就含有个人主义的“谜拟子”。[[6]](#footnote-5) 只是经过欧洲近代历史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洗礼，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个人主义才真正昭显出来，或者个人主义的文化“谜拟子”在十九世纪以后才变成了一种“拟子”（这即是说，从Joseph de Maistre开始才有了一个“个人主义”的名词来指称这一“现实对象性”）。

如果把上面我们对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个人主义的认识放在文化演化与近现代欧美社会体制的演化变迁的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中来考察，我们似可以认同麦克法兰和伯杰的观点，即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的拟子是欧美现代化市场经济（即笔者所理解的“宪制化经济”或言“制度化经济”—— 英文为“constitutionalized economies”）的一个先决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因此，依照麦克法兰和伯杰对欧洲历史演变过程的理论解释，这里出现了与马克思、诺思和大多数社会学家的见解相迥异的一幅新理论图景：欧洲诸社会在近代从习俗和惯例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即哈耶克所理解的“人之合作的扩展秩序”）、腾尼斯（Ferdnand Tönnis, 1991）所理解的“法理社会”（Gesellschaft）和笔者所说的“制度化经济”的过渡，有其文化起因。而麦克法兰和伯杰的这一理论判断，恰似又被格雷夫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成型的“比较历史制度分析”所解释、所佐证。

我们之所以认同麦克法兰、伯杰等学者所持的欧洲中世纪基本上已成型并昭显出来的个性自由、个人自主是滕尼斯所理解的“法理社会”、哈耶克所理解的“人之合作的扩展秩序”和我们所理解的“制度化经济”的先决条件之一这一洞识，是因为，从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视角来看，只有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获得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从而个人有了“自主权利”，才能进行独立的市场交换（包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自由劳动者的劳动力出卖），也才能生发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Henry S. Maine, 1874, p. 165）所说的“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均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也内涵着这样一种意思。

沿着梅因的这一思路，我们会发现，随着西方传统文化中个人主义“谜拟子”经由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洗礼的“外显”所带来的人本身的个人自主、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为欧洲近现代历史中在社会生活形式的层面上人际间广泛的契约关系造就了社会条件。由于广泛的契约关系明确界定了人们在交换与社会博弈中的权利与义务，这也就向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制度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也进而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扩展酿就了社会条件。因为，尽管在习俗经济（customary economies）和惯例经济（conventional economies —— 如欧洲中世纪的庄园经济和中国沿存数千年“礼俗经济”）中也有市场交换，但这些经济形态中人们的交换多是“亲临的”（用哈耶克的说法是“face to face”的交换，用诺思的说法交换是“personal”），市场交换的“半径”也很小。这即是说，习俗和惯例经济中有限的市场交换基本上是本地的（local），且多半发生在族内人、亲朋、邻里和熟人网络中间。在这种交往半径很短的地方性交换中，个人信誉、熟人关系、亲朋网络、私人友谊以及个人关系的知识和经验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秩序中，人与人的关系抽象化了，交换变得“非亲临”的了，用诺思（North, 1987）话说，市场交换变成“impersonal”（非个人化）的了，市场交换的半径也随之扩大了。跨地区、城市、社会和国家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和贸易也变得普遍起来。因此，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经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洗礼而在近代欧洲社会中的重塑、昭显和外化，引致了人际间交往和交换中的契约关系的普遍化，也导致在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型构与扩展同一过程中社会成员主要依靠产权和契约关系来调整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动。[[7]](#footnote-6) 这无疑促进了正式法律制度型构与发展，其中包括以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torts）为主体的英国普通法体系的形成，以及欧洲大陆制定法传统中的民法、商法等法律、法规体系制订和完善。从这个视角来看，西方文化中固有的个人主义的文化拟子，[[8]](#footnote-7) 尤其是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洗礼而得以弘扬的个人自主、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是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制序化，尤其是从习俗和惯例的规则向法律制度的过渡，从而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内在力量。也正是在这一市场运行的制度化过程中，市场的范围扩大了，人际关系“抽象化”了，从而市场交换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从“亲临的”的交换向“非亲临的”的交换的过渡。当然，我们这样来看在欧洲近现代历史中文化演变与社会体制演化变迁的关系，决非是主张一种文化决定论。这至多只是表明，在欧洲近现代的市场经济秩序形成与演化变迁的过程中，两希文化的传统精神遗产资源（尤其是其中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谜拟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维。这至少也在某种程度上或在某些方面修正了马克思和诺思的“经济（基础）决定论”。

这里必须指出，正如“个人主义”一词的发明者Joseph de Maistre（1821）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的那样，启蒙运动以及宗教改革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个人主义的张扬，使得个人“自私自利”的追求大行其道，从而个人主义在“本质上是所有共同体的死敌”。然而，尽管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的张扬一开始就受到一些社会活动家、道德哲学家和宗教界人士的抨击，但在近现代西欧和北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自主、个人自由、个性解放和个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张扬追求，在西方社会中已逐渐变成了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一种“文化信念”，以致于在当代经济学的理论中它已变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信条，并实际上使理性经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成了所有当代经济学理论建构的第一块基石。[[9]](#footnote-8) 事实上，也正是在西方现代文化氛围中对人们个人利益追求的这种社会认可和张扬，才使得现实中各个经济人各自利益追求得到相互牵制。并且，只有通过这种人们之间追求个人利益的互动和相互牵制，方能导致在西方文化中与个人主义相关的文化拟子在社会成员的“共享意义”（shared meanings）上得以广泛复制和传播。[[10]](#footnote-9) 如上所说，没有这种在经济与文化互动中个人主义文化拟子的复制和传播，也就不可能在近现代社会中型构出人际间的普遍正式契约关系，从而也不可能型构出正式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也就不可能有哈耶克（1988）所说的人之合作的扩展秩序的自发型构与扩展。由此看来，只有在西方社会中源远流长的个人主义文化氛围中，我们才能确当理解当代欧美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体制。具体说来，只有那种由波普（Popper, 1962, pp. 173-176）所认为的“抽象社会”（abstract society）是由已经个体化且富有各自自主独立性的“人格”（personage）所构成时，才会生发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西方社会中的民主体制以及作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保障机制的私有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才能有哈耶克（1973）和美国法学家伯尔曼（Harold J. Berman, 1983, p. 215）所理解的“法治国”（Rechtsstaat），才有美国法理学家Lon L. Fuller（1954, pp.477-478）所理解的那种“eunomy”（这个英文词源自希腊文的eunomia，其含义意为“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秩序”）。由此可以说，西方现代的法理社会、哈耶克所理解的人之合作的扩展秩序，Lon L. Fuler所理解的“eunomy”，以及笔者所理解的西方当代的“制度化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均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个人主义“模板”（即文化拟子）上生发和涵衍出来的。[[11]](#footnote-10)

**二、（家族）社群主义文化拟子可能是数千年传统中国**

**礼俗社会“制序内卷”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从文化拟子与社会生活形式的相互作用视角对西方文化传统与欧美近现代社会体制演化和变迁过程有了上述认识后，让我们再回过头来反思一下在数千年传统文化的巨大变迁张力中传统中国社会的内部制序几乎在同一个层面上“自我复制”即“内卷”（involution）的社会机理。

与西方文化传统中与个人主义有关的“个人自主”、“个人独立”、“个性解放”以及“对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追求”等类似“拟子模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儒、释、道三教交融并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传统中国文化中，深含着“自我克制”、“自我拟制”、“自我舍弃”（self-abnegation）、“自我消解”（self-effacement）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性”（spirituality）。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视角来看待传统中国文化，西方许多当代汉学家认为，“中国人简直是‘无我’（selfless）”（Hall & Ames, 1988, p. 23）。他们还认为，与中国精神资源中这种源远流长的“无我”意识相联系的是中国人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克己”即“自我舍弃”。汉学家孟旦（Donald J. Munro, 1979, p. 40）曾说：“无我……是中国最古老的价值之一。它以各种形式存在于道家和佛学尤其是儒学之中。无我的人总是愿意把他们自身的利益或他所属的某个小群体（如一个村庄）的利益服从于更大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孟旦的这一见解，看来是非常到位的。[[12]](#footnote-11) 因为，即使从我们这些“身在庐山（中国文化）中”人来看，传统中国文化中这种“无我”、“克己”、“自我舍弃”、“自我牺牲”和“自我拟制”等文化拟子在古代、近代甚至于当代社会中已经普遍化了，[[13]](#footnote-12) 以致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和海内外华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文化信念中基本内容，甚至构成了中国和世界各地华人社会历史承传的一个主要民族“品格”。这以致于使西方一位学者R. Randle Edwards（1986）把它认作为中国人（华人）的“齐一性”(Chinese homogeneity)。Edwards（1986，p. 44）还把中国人的这一齐一性与中国社会制序内部结构的式样的关系联系起来。他说：“大部分中国人都将社会视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和无残缺之网。网上之线必定都具有一定的长度、直径和连贯性，必定都按照预先约定的形式相互配合……。希望在于每一个个人将像一个齿轮那样，在总是有效率的社会机器上恰当地发挥作用”。当然，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汉学家所发现的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中的“无我”而进而认为儒家哲学中没有“自我”意识。但是，正如杜维明教授（Tu, 1985, 参中译本，页10-11）所发现的那样，尽管在儒家哲学中有“自我”，但“儒家的自我必须有他人的参与”，因之，“儒家的自我在诸种社会角色所构成的等级结构背景中不可避免地会淹没于集体之中了”。由此，杜维明教授（Tu, 1986, 参中译本页22-23）认为，儒家的自我，“不是孤立的和封闭的个体，而是人类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可达到的一种可分享的**共同性**”（着重体为引者所加）。他还接着指出：“正是这种对尘世中的**共同性**的意识，使得三教（这里指儒、释、道——引者注）一致致力于铲除所谓‘个人主义’的悖谬”。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著名当代伦理学家万俊人（2001，页155）教授从东西方伦理观的比较中，也得出与西方当代汉学家和杜维明教授相类似的洞识。他说：“我们不能说儒家伦理中缺乏明确‘个人’（person）概念，但我们可以从各种相关文献或文本中见出，儒家伦理中缺乏像亚里士多德乃至西方伦理中那种作为独立实体存在的‘个体’(individual)概念”。[[14]](#footnote-13)

从这些当代汉学家、当代儒家和当代伦理学家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反思出，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社群以及东亚诸社会中的社群主义经济制序，与传统儒家学说（拟子库）中的这种“无我”和“克己”的“精神性”有着源远流长和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正是传统儒家文化中的这种“无我”和“克己”的精神性拟子的广泛传播和复制，使得处在中国和东亚诸社会中每一个人从某种程度上丧失了独立的个人“人格”，从而变成了社会制序网络结构上的一个“纽结”。所以，在中国人和有着共同儒家文化精神资源的东亚诸社会中，社会制序已把人的“人格”甚至“人性”内涵于其中，从而变成了这些社会中注重人事关系、人人互相**牵制**（不是像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中每个人在对各自利益的“张扬”追求中由于利益的冲突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制约）的制序网络基体（institutional matrix）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5]](#footnote-14) 在传统中国社会，这种制序基体就是以礼为主要规制机制的君、臣、父、子式的宗法社会构造安排（configuration）。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精神则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伪个人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国家主义”的文化拟子相互融合和相互强化，从而涵衍出了靠思想教育、政治宣传、意识形态的力量和以德治国为施政导向的行政控制经济的科层式的（hierarchical）社会结构。[[16]](#footnote-15) 另外，由于“儒家传统不仅是传统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语，转引自马涛，2000，页125），儒家的这一精神也在塑造历史和近现代的日本、朝鲜、新加坡和越南的社会制序方面，有着文化拟子模板式的作用。1991年新加坡国会通过的《共同价值白皮书》中所提到五种核心价值的前两个“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转引自马涛，2000，页122），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传统儒家的“克己”和“无我”的社群主义文化精神。在当代西风东盛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韩国仍保持了一个以家长制为主要特征且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以及日本强烈的团队本位主义企业精神和以“亲子关系”和“上下关系”为纽带的社群式社会制序构造，均可以从儒家传统的这种内在精神性中找到其历史渊源。[[17]](#footnote-16)

由此看来，在儒家传统的内在精神中，就同时具有着个人层面上的“无我”、“克己”和社会层面上的“礼治”和“德治”的两个文化面相。历代中国统治者也由此相信，只要通过各级官员的“正己”“修身”，就可达至“礼治”和“德治”从而实现一种和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序。[[18]](#footnote-17) 在传统中国相对封闭的社会体系中，儒家的这种道德自律（为仁由己）文化拟子在文化濡化机制中复制传播和“依礼而治”和“以德为政”统治者的施政导向不但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社会现实中是基本上同一个社会机制过程。放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来看，这种文化濡化与社会制序自我维系的同构也就构成了中国的“政教合一”传统。[[19]](#footnote-18) 反过来说，在传统中国的这种以礼治家、治国、治政、治社会、治天下的“政教合一”的传统中，[[20]](#footnote-19) 文化与社会制序是交融在一起的。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教合一”的传统中，文化和制序“绞合”在一起，[[21]](#footnote-20) 并互相强化。一方面，每个被传统文化濡化了人通过“克己复礼”“内圣外王”而达至一种符合“礼俗”的和谐秩序；另一方面，从整个社会来看，经由“礼化”、“依礼而治”（rule by rites）而试图臻于“礼治”(rule of rites )的社会机制过程又反过来把人们的行为甚至思想程式化，从而使这种程式化的礼仪秩序（即李泽厚所理解的“礼制”）变成了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一种“文化记存”。作为一种社会秩序、一种政治体制、一种“文化记存”，传统中国社会的“礼”[[22]](#footnote-21) 承载和涵衍着前人在文化传统中“注入”和积累的意义，并作为“社会性道德”（即伦理）的载体，经由文化濡化的社会机制过程将每个成员“制序化”了，使每个成员成为这种“礼”的网络基体（matrix of rites）中的一个“制序化的角色”（institutionalized personage）。正如郝大维和安乐哲（Hall & Ames, 1988, pp. 271-272）所指出的那样，“礼既保存了，又传播和传递了文化的意义。由于这个原因，实行和体现礼的传统不仅把一个人社会化（即我们所理解的“制序化”——引者注），使他成为一个社群的成员，还进一步使此人适应文化（也即是我们所理解的被文化所“濡化”——引者注）。礼将一套共同的价值灌输给特殊的个人，给他提供一种机会，以有助于保存和加强社群的方式来整合”。这种以礼来维系和支撑的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社群，也就是杜维明（Tu, 1976, pp. 52）教授所非常恰当地形容的儒家的“信用社群”(fiduciary community)。反过来说，“礼”本身就构成了这种“儒家信用社群”的基础和维系其运作的纽带。[[23]](#footnote-22)

从这种意义来理解传统中国社会制序和传统文化中所共有的“礼”，我们一方面可以把“礼”视作为一套习俗秩序、一套亚于正式法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规则，又可以把它和“仁”一起 [[24]](#footnote-23) 视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轴心”。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礼”作为维系家庭、族群、社群、乡里以及整个社会政治机制运作的一种规范（norm）体系，是文化与制序的“交汇处”和“结合体”，以致于我们既把“礼”视作为浸透着和汇积了传统文化的社会制序，又可把它视作为制序化了的文化，或者说成了文化的制序化（即文化在社会制序上的对象化）。这种传统中国社会中文化濡化和制序化的同构，使得社会内部的制序变迁有着巨大的张力（strains），以致于整个中国社会在漫漫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基本上在一种“礼俗社会”的层面上内卷（自我保持和自我复制），从而无力开拓出滕尼斯所理解的“法理社会”和哈耶克所理解的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基本范型的“人之合作的扩展秩序”来。

由于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文化与社会制序在“礼”契合点上互相绞合，并相互维系和相互强化，这就导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在传统文化濡化机制中保持了相似行为模式和品格。在中国这一“中央王国”的地域上，社会制序安排在一两千年的时间长河里基本上在同一个层面上的内卷而没有多少演化，这可能是基本原因。黑格尔所说的“中国人无历史”，也大致就是这个意思。从这种视角来看，传统中国文化经由“无我”、“克己”这种中国人的“划一性”而对制序发生的影响和作用，要比西方文化在近现代时期通过社会构造对制序的影响要直接得多，也强大得多。

从传统中国社会中“礼”与“法”的关系来看，在文化濡化和制序化同构的社会机制和社会过程中，以“礼制”为特征的非正式制序对人们行为的约束要远远大于正式的法律规则的约束。笔者（韦森，2001）曾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第七章中指出，由于传统中国文化主流意识中“天人合一”的人文哲学思想本身就潜含着“法律本身是对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的破坏”的意思，在传统中国文化精神中有一种抵制从“礼”这种惯例的规则向正式法律制度过渡与转化的内在力量。这就导致在传统中国的礼俗社会中，只有非常有限法律，且司法程序也很不完善。即使有法律（并且主要是刑法，而几乎没有民法），中华帝国法律的主要功能也只是维护道德秩序和自然礼仪秩序的一种补救手段。在传统中国社会，由于一方面有非常完善的“礼制”而另一方面只有有限的法律和非常不完善的法律体系，县衙和刑部在司法过程中，“除了引圣人语录、道德故事外，古人断案更大量地使用义、理、天理、人情一类的字眼”（梁治平，1997，页293）。这也导致了中国历代法律的泛伦理化和传统中国社会制序的礼教化[[25]](#footnote-24)（参韦森，2001，页275-289）。这显然又是传统中国的礼俗社会不能自发地型构出规制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的文化原因。

如果我们把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正心修身、克己复礼、内圣外王即从个人的自我克制、“自我舍弃”（self-abnegation）和“自我消解”（self-effacement）向外扩展而形成一种人际间的“礼俗秩序”的导向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观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二者在型塑和影响社会制序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在西方社会，个人主义文化观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私人与公共领域的范围，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地位，权利与义务的性质，国家权利的认可，以及正义的含义及其在社会构成中作用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而展开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传统中国和东亚诸社会中的社群主义文化观，则主要关注人际和谐、群体关系、情理统一、教育感化以及社会理想，关注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和谐与完善，关注以礼和仁（德）型塑和构筑和谐的社会秩序，以及关注通过“正名”对各个社会角色、身份进行规定和调整等等。[[26]](#footnote-25) 因之，原本出自古代中国社会习俗的礼，经儒家圣贤的肯定、弘扬、理论化和系统化而变成了一种自我繁衍和自我复制能力甚强的“文化拟子”。自汉代“废除百家、独遵儒术”之后，由儒家圣贤所理论化的“礼”的拟子，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首肯和弘传，普遍渗透到传统中国社会里的“家规”、“族训”、“乡约”、“里范”和“朝纲”之中，[[27]](#footnote-26) 指导和调规着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也融入法律体系（主要是刑法）和司法过程之中。因此，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中国文化自身濡化和播化了礼的“拟子”，而礼作为规制和调节传统中国社会人际间经济、政治关系和社会交往甚至司法过程的方式和手段，又承载、保存和维系了传统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型塑了维系了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序结构，从精神上规定了并支撑着传统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秩序。传统中国文化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制序在“礼”上的“切合”和“契合”，使郝大维和安乐哲（Hall & Ames，pp. 269-270）把礼理解为传统中国“文化表达自身的语言”，一种“构造社群、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的和重要的社会机制”。我觉得，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礼是以儒家学说和圣人箴规为“心魂”(spirit)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对象化”（embodiment），因而礼也构成了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序的基体。用英文来说，“The institutional matrix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consists of rites and ritual practices”。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出于和基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儒家的正心修身、克己复礼、内圣外王即从自我舍弃、克制、消解向外扩展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的文化导向，数千年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般向往一种和谐的社群秩序。[[28]](#footnote-27) 也正是由于这一文化精神，历朝历代中国百姓们甚至知识份子总是期盼着明君贤相的出现，并期望这些明君贤相和社会上层人士在循礼而治的社会活动中来完善自身，并进而教化世人。传统中国社会民众中普遍存在的这种心理和心态，就为历代统治者以德为政、依礼而治 [[29]](#footnote-28) 的施政导向和在“宏观整体上”的一种“有机”社会结构的自我排序（self-ordering）造就了社会基础。从“微观”（即个人道德修养的层面）上来看，传统文化中又有自我舍弃和消解并拟制自己个人利益追求的自我约束（self-constraints）导向。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这种宏观上的社会的“自我排序”又与微观上个人的内在“自我约束”互相强化，并且在某些程度上二者是同构的。这也就导致中华帝国没有向一种制度化社会（a constitutionalized society）过渡的内在冲动。这两方面加起来，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近代中国一方面无力自我生发和型构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则没有转变为一个法治国的原因和机理了。

最后要指出的是，数千年来，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和谐的理想社会，与青年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及晚年马克思（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参Marx, 1890, 参中译本，页95）所想象的“自由人联合体”，是非常接近的。正如西方一位学者René David在谈到实在法与传统和当代中国社会时所言：“马列主义哲学包含一些与这种传统（中国）哲学相符的东西。实在法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不曾显得是一个良序社会的必要条件，甚至也不是正常条件。相反，实在法乃是社会欠完美的表征，而且它与高压统治这些观念之间还存在某种联系。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预言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很相近的”（转引自Tigar & Levy, 1977, 中译本，页269）。[[30]](#footnote-29) 从René David的这段话中，我们能进一步醒悟到，1949年以来中国所进行数十年“行政控制经济”（an administrative controlled economy）的巨大社会工程实验，是有着传统中国文化原因的。换句话说，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序，仍然是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性的“拟子模板”上生发出来的一种实体。革命、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和二十余年的经济改革，也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31]](#footnote-30) 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郝大维和安乐哲（Hall & Ames, 1999, p. 234）最近指出：“当今中国是一个礼仪社会，在社会主义下也仍然是如此。……中国当代社会秩序是由传统所保留的圣贤模样而设定的。活在中国社会，作为人，不是天赐给他们的特权，也不是种族所包含的遗传，而是进行礼仪而后得来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郝大维和安乐哲的这一判断，与美国另一位著名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对儒家学说当代中国社会中命运的判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他那本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中，列文森（Levenson，参中译本，页374）说：“虽然共产党的中国仍然保留了孔子和传统价值，但他们只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与列文森的这一判断相似，当代儒家杜维明教授也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已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脉。譬如，早在1989年，杜维明（1997，页57-58）教授就惊呼道：“事实上，西方价值现代文明的价值已经根深蒂固地成为我们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的——引者加）的传统。而在我们这个新的文化传统的氛围里面，要想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非常困难，我常常说一种‘遥远的回响’，听不到它的声音，看不到它的菁华，因为日常的价值标准全是西方的。……所以西方文明已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跟传统文化已有很大断裂”。[[32]](#footnote-31) 很显然，如果杜维明教授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台湾、香港、新加坡尤其是其他海外华人社会而言，也许大概是如此；如果是指中国大陆社会，看来我们还要与郝大维和安乐哲的上述判断结合起来看，才能始梳理出个头绪。

**三、从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文化差异的视角看**

**未来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总结到，文化与制序，密不可分。文化为制序提供“拟子模板”；制序又承载和保存着文化。文化与制序间的互动和相互作用，就构成了社会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不但在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中是如此，在中国和东亚诸社会社群主义的文化传统中更是如此。

以上我们对人类历史上文化与制序的互动和相互作用的分析和比较，似乎达至不了“经济决定论”。同样，我们至此的理论分析，既证明不了、也证否不了“文化决定论”。人类诸社会发展的历史和路径，多种多样，纷纭陆离，其原因也复杂多变，似乎是“不可言说”（这里借用维特根斯坦一语，见Wittgenstein, 1921）。然而，不管文化与制序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作用是怎样的，也不管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多么复杂，但至少我们目前可以断定二者之间存在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因此，社会制序的理论分析，忽视不得、也忽视不了文化与制序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否则的话，要么导致理论理性分析的“独断论”（这里借康德一词），要么是一个“思想的懒汉”或“理论探索之艰难”面前的“逃兵”。

在从文化与制序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视角来比较和分析西方和传统中国的制序化和制序变迁路径时，我们当然应该自我有意识地避免“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中心论”[[33]](#footnote-32) 的悖谬，换句话说，我们应尽量有意识地避免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和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序。然而，尽管我们不能用“优”与“劣”、“先进”与“落后”这些简单的字眼来评判传统西方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以及西方的社会制序与中国和东亚诸国的社会制序，但我们却可以评价不同的文化和制序安排在近代、现代和当代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近代以来，与西方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确曾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国民生活水准提高等方面均落后了。当代中国也在与西方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水平的巨大反差中开启了并将继续走着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些应是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一项共识。另外，一个毋可置否的事实是，二十余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不仅从许多方面以至社会结构的根基层面重塑了社会制序，也在很大程度上和许多方面重塑和改造了中国文化。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体制转型、制序变迁和文化演化，又在三者的互动中引致和激励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和经济增长的速率，均是惊人的。然而，当代中国社会制序变迁过程演化至此，似乎更加呼唤中国学界思考未来中国制序变迁的路径及其走向。反思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和中国以及东亚诸社会的社群主义文化及其差异，对把握未来中国制序变迁的走向意味着什么？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Parsons, 1971）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提出，个人主义与现代性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沿着帕森斯的这一分析理路，西方也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内部所潜涵的种种力量，在所有社会的所有情况下都必定会涵衍个人主义的兴起和以社群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的瓦解（Jack Donnelly, 1985, pp. 82-83）。如果用这一见解来判断未来中国制序变迁的走向，这里自然也会出现一系列同样的问题：是否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制度化进程必然导致个人主义的张扬？随着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拟子或拟子簇向当代中国社会的注入和播化，是否在中国社会内部必然导个人主义文化拟子的广泛复制、繁衍从而最后彻底取代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社群主义文化拟子而居支配地位？是否未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然意味着经由传统中国文化涵衍而来的社群主义经济秩序的嬗变和瓦解？在中国加入WTO而加速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大趋势中，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的“建设”，是否在未来中国社会体系内部必定会有一个以“个人自由”和“个人自主”为特征的人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型塑？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曾认为，“成为人就是成为个人”（Becoming human is becoming individual），实际上内涵着这种意思。基于格尔兹的这一洞识，李泽厚（2000，页2）先生最近似乎也对上述诸种问题给出了一个肯定的回答。另从费孝通（1947，页69－75）先生在“血缘与地缘”一文中所提出的市场关系意味着人际关系的“陌生”和“疏离”，因而市场交换可能会撕裂建立在血缘和熟人关系上的“乡土社会”的理论洞识，我们似乎也可以得出相似的判断。但杜维明教授却最近却似乎给出了一个相反的答案。鉴于儒家东亚的实际发展经验，他提出，“基于一种不断扩展的关系网络的社群主义，与现代性同样是相容的，假如不是更好地相容的话”（见Tu, 2001，页212）。与杜维明教授的这一判断相佐，著名美国汉学家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似乎也对未来中国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的兴起和社群主义的瓦解的判断持怀疑。他（de Bary, 1988, p. 119）说：“假如我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新的中国‘资本主义’也将会符合传统，即它将比典型的西方型的资本主义更少个人主义，或至少个人的作用是放在家庭生活与价值的构架中来看待的”。

具体到当代中国社会，未来社会制序变迁走向中社群主义文化拟子和个人主义文化拟子的命运如何？目前似难以判断，也难能回答。但这里至少有一点也许比较清楚，那就是，中国未来必定沿着从习俗经济（初民共同体）、惯例经济（礼俗社会）向制度化经济（法理社会）这一人类社会制序历史发展的一般行程而步履维艰地慢慢走向“法治国”（即Lon L. Fuller所说的“eunomy”）。[[34]](#footnote-33) 在这一过程中，由数千年来传统文化濡化机制和数十年来行政控制经济社会工程实验中的意识形态灌输机制所共同型塑的体现在当代中国人的行为、习惯、习俗、思想、言语和交往中的文化观念，将会逐渐发生变化，并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出现某种程度的“失范”（anomie）[[35]](#footnote-34)。随着中国加入WTO而来的当代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无疑也将会加快人们文化观念变化的速率。因此，在当代网络经济、信息经济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大趋势中，再谈“纯”中国文化，已似乎变得不太可能。即使可能，也将没有多少意义了。另外，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序已超越政府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 —— 诺思语）的“意向指导”而在潜移默化地演变着。汇有数千年的传统文化资源，数十年行政控制经济的意识形态，以及二十余年经济改革中蕴生的市场观念的当代中国文化，也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元文化的相互播化、冲突和交融的历史大背景中迅速演化着。在当今中国内部文化和制序相互作用的机制安排中，传统中国文化的濡化机制在型塑人们行为模式和生发现实制序变迁之张力方面的作用正在衰弱，而外来文化的播化功能似在增强。随着可口可乐化、麦当劳化以及国际上趋于规范化的工商惯例、市场交往方式、贸易形式、资本流动渠道，以及企业文化和管理理念的传入，中国社会内部制序变迁的速率正在加快，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也在向一种似乎正在世界范围型构的“普世文化”和“普世伦理”接近，并且毫无疑问也会向这一“普世文化”和“普世伦理”的型构贡献自己的精神资源（即从中国文化“拟子库”中向这一过程“注入”和“发散”“拟子”，用杜维明（Tu, 2001，页109）教授的话来说，向这一过程提供“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信息”）。由此看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改革踟躇不前时中国学界较普遍怀有的对传统文化会拖拽市场经济型构和发育进程的担心，似乎已变成了昨天的事。

然而，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和前景来看，传统中国文化中所潜涵的制序变迁的巨大张力，仍然将会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拖拽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36]](#footnote-35) 并且，笔者目前认为，**没有一个民主化的社会机制，将不可能有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换句话说，政治机制的民主化，是一个完备市场经济运行的先决条件之一。对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来说，政治的民主机制可能比刚性的专有产权（several property —— 这是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所使用的一个专用名词）结构还要重要得多。因为，没有刚性产权结构的市场经济，最多只是一个“名市场经济”（pseudo-market economy）；而没有政治民主机制的市场经济，却必定会是一个“腐败的市场经济”（corrupted-market economy）**[[37]](#footnote-36)**。加之，一个名市场经济可以经由内部参与者的交换与交往自发地“耦生”出某种产权结构来，但一个腐败的市场经济可能永远无力自发地萌生出它的运行所必需的政治民主机制来**。在我们经由几十年的“革命”和“运动”而企图一个无所不在、无处不在并统御整个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时，我们从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中国文化传统。然而，坐在传统中国文化的“篮子中”，我们却无能提着这个“篮子”把“篮子”扔掉。结果，我们是从有着“先天产权意识缺乏症”和“先天民主观念匮乏症”的传统中国礼乐文化精神性上，并依靠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ism），“引进”并“建设”出来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控制经济（an administratively controlled economy）体制。而目前正在发育成长中的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又正在步履维艰地从政府的行政控制机制中挣脱出来。由于在我们数千年的礼俗社会中，我们的文化拟子库中，在我们的传统中，以至在我们的民族意识中历来就同时缺乏“尊重他人产权（包括人的自身权利）”和“民主”这两种观念拟子，[[38]](#footnote-37) 这也就意味着处于改革过程的当代中国社会构造安排中同时缺乏现代市场运行的两个必要前提条件。因此，未来中国改革过程的命运必然是：它既是一个经济制序变迁过程，一个政治运行机制的渐进改革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演化过程。

在谈到传统文化与未来中国法治化的道路时，笔者这里想指出一点，即在哈佛燕京学社2005年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儒家传统与启蒙心态》的文集中，就刊载了咸在鹤的一篇文章：“宪政、儒学公民德行与礼”。在这篇文章中，在探讨在帝制中国的儒家传统里的礼实际上被用作规训政治领导人一种手段时，咸在鹤曾深刻地指出：“没有宪政向度，任何对儒家仪式主义传统的重新挪用都将只是独裁主义政治的一个托辞”。根据这篇文章的观点，我这几年一再指出：在不具备宪政民主的条件下，任何想通过思想教育、恢复儒家思想道德修养以及周期性政治运动来纠正和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渎职行为的努力，都会实际上产生一种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那就是不断强化政府的行政控制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在当下中国，尤其是如此。

未来中国的市场的发育和社会的进一步开放，以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发展，已经开启并将继续在基本社会构造层面上型塑当代中国社会自己的现代化路径，也将加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目前仍处在传统文化场景（context）中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包括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价值多元化和社会人道化）进程，将会不断促使学界反思我们的文化场景，也迟早会再把文化与制序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再次置放到中国思想界的书案前。

(本文摘要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现在是全稿)

**参考文献：**

Ballah, R., *et al*, 1985, *The Habits of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erkeley C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译本，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翟宏彪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

出版。

Berger, P. L., 1991,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中译本，伯杰：《资本主义革命》，吴

支深、柳青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出版。

Berman, H. J., 1983, *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Chan, W-t, 1944, “The 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C. A. Moore (ed.),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e Bary, Wm., T., 1988,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A Dialogue in Five St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中译本， 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何兆武、何冰译，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Edwards, R. R., 1986, “Civil and Social Right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hinese Law Today”, in R. R. Edwards,

*et al* (eds.), *Huma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费孝通，1947，《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重印本。

冯友兰，1967，《新事论》，台湾商务印书馆。

Fukuyama, F.,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London: Hamish Hamilton.

Fuller, L. L., 1954, "American Legal Philosophy at Mid-Century",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No. 6.

哈佛燕京学社（编），2005，《儒家传统与启蒙心态》，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Greif, A., 1994, “Cultural Beliefs and Organizations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2, No. 5, pp. 912-950.

Halévy, É., 1934, *The Growth of Philosophical Radicalism*, tr. by M. Morris, new ed., London.

Hall, D. L. & R. T. Ames, 1987,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中译本，

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蒋弋为、李志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Hall, D. L. & R. T. Ames, 1988, *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中译本，郝大维、安乐哲，《汉思维的文

化探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Hall, D. L. & R. T. Ames, 1999, *Democracy of the Dead: Dewey, Confucius, an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Chicago: Open Court.

Hampden-Turner, C. & A. Troumpenaars, 1993, *The Seven Cultures of Capitalism: Value Systems for*

*Creating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Germany, France, Britain, Sweden and the Netherlands*, New

York: Currency Doubleday.

Hayek, F. A., 1949,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中本译，哈耶克，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Hayek, F. A., 1973,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Rules and Order (I)*,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untington, S.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金耀基，2002，《金耀基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Levenson, J. R. 1968,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

译本，列文森：《儒教中国极其现代的命运》， 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李泽厚，1998，《论语今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李泽厚，2000，“卜松山《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序’”，载卜松山（Pohl, 2000）。

林毓生，1988，《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出版社。

Lodge, G. C. & E. F. Vogel, 1987, *Ideology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Lukes, S., 1973, *Individualism*, Oxford: Blackwell. 中译本，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南京：江

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Macfarlane, A., 1978, *The Origin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Macfarlane, A., 1987, *Capitalist Cultur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Metzger, T., 1977,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化》，颜世

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Milgrom, Paul, 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 1990.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Revival of Trade:

The Law Merchant, Private Judges, and the Champagne Fair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March, vol.2, no. 1,

pp. 1-23.

Munro, D. J., 1979,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牟宗三，1969，《心体与性体》，三卷本，台湾中正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重新出版。

牟宗三，1980，《政道与治道》，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牟宗三，1997a，《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牟宗三，1997b，《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North, D.,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中译本，诺思，《经济史中

的结构与变迁》，陈郁译，上海：上海人民/三联出版社1994年出版。

North, D., & R. P.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年第二版。

Parsons, T., 1949, *The Structure and Social Ac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中译本：帕森斯，《社会行动

的结构》，张明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Parsons, T., 1971,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Pohl, K. -H., 2000, *Interkultureller Dialog mit China*, 中译本，卜松山：《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北京：

中华书局。

Polanyi, K.,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Rineholt.

Popper, K., 1962,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1, 4th e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ye, L. & M. Pye, 1985,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ye, L. （白鲁恂），2001，“儒学与民主”，载《儒家与自由主义》，北京：三联书店。

Taylor, C., 1989, *Source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

Tigar, M. E. & M. R. Levy, 1977, *Law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中译

本，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出版。

Tocqueville, A. de, 1945, *Democracy in American*, New York: A. A. Knopf

Tönnies, F., 1991,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begriffe der reinen Soziologie*, Darn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中译本，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

Tu, Weiming, 1976, *Centrality and Community: An Essay in Chung Yu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Tu, Weiming, 1985, *Confucian Thought: Selfhood as Creation of Transformatio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中译本， 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Tu, Weiming （杜维明），1997，《一阳来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Tu, Weiming （杜维明）， 2001，《亚洲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Weber, M., 1978, *Konfuzianimus und Taoismus: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Tübingen:

Mohr. 中译本，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韦森，2001，《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韦森，2002a，《经济学与伦理学 —— 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韦森，2002b，“从文化传统反思东西方市场经济的近代形成路径”，《世界经济》第10期。

韦森，2003，《文化与制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郑家栋，2001a，《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家栋，2001b，“‘超越’与‘内在超越’—— 牟宗三与康德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中西文化对比，该走出简化陷阱了

秋风

刚才韦森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内容非常丰富，横跨中西、纵贯四五千年的报告，我自己受益非常多。因为涉及的问题很多，我把问题略微归纳一下，大概从五个方面做一个评论。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西方？”。

韦森兄做的是中西文化之对比，或者是中西文明之对比，涉及到宗教、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经济等等方面，是两个文明体的整体的对比。韦森兄给西方文化下一个定义，两希文明，不管是希腊的人本主义还是希伯来的神本主义，最后都有一个程度不等的、或隐或显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基因。

这个说法其实很流行，过去100多年中，大家都这样说。但是，我只是基于韦森教授刚才讲到的几个事实，提出一点点商榷的意见。

首先我想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讲一下，个人主义究竟是什么含义？当我们说西方是个人主义的，究竟是指什么？大家都是读哈耶克的。当我在向别人推荐哈耶克著作的时候，我通常都会推荐一篇文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是专门讨论个人主义的，就是《个人主义经济秩序》一书的第一篇文章《个人主义：真与伪》。大家既然对哈耶克极感兴趣，我建议大家读一下。哈耶克在这篇文章做出的重大贡献，也是贯穿他整个经济、政治、秩序、社会理论的基本分析范式，那就是，西方存在两个个人主义传统。

据此，我要问一下韦森兄，你讲的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是哪个谱系的个人主义？因为韦森兄刚才引用一个人，一个学者讲卢梭、康德、边沁的个人主义如何如何，可那恰恰是哈耶克所认为的“伪个人主义”。当我们用一个非常好的词的时候，我们需要反思一下这个词究竟是什么含义？当然，韦森兄刚才自己也提到了，在希伯来的神本主义下，每个人都直接面对上帝，所以每个人都是自由而独立的。可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有集体主义？为什么以色列建立起了直到今天仍在运作的基布兹？它和个人主义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神本主义背后是不是必然导向个人主义？还是说他会导向集体主义？

韦森兄也提到一个观点，说中国人的现代革命，都是深受法国思想传统和俄国思想传统的影响。那么，这两拨人是哪儿？它们是中国的吗？它们不是在西方吗？它们和个人主义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法国的文化传统，启蒙运动，与你所赞美的个人主义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会导向自由市场、法治、宪政，还是导向集权主义？

这就是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许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回答：极权主义起源于西方，极权主义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说，都起源于西方，这个问题怎么解答？共产主义也是起源于西方的。当我们说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的时候，那这个文化与共产主义的理论和现实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众多学术研究都表明，基督教建立了最早的共产主义社群，马克思主义与犹太教、基督教之间也有深刻联系。这又是为什么？

这里我已经涉及到了基督教。韦森兄讲到了基督教我就很疑惑，个人主义究竟是兴起于天主教还是新教？你讲到的格雷夫教授，他研究的是地中海沿岸，地中海沿岸民众信奉的宗教普遍都是天主教乃至于东正教。这样的一个宗教传统与新教之间，究竟又是什么关系？

坦率的说，我对这些问题其实没有特别多的研究，我只是从听众的角度想到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系统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要解决的，因为这里有内在的矛盾。包括我们在讨论“西方兴起”这个概念时，也不能不异常小心。你提到过麦克法兰教授，麦克法兰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不是西方的兴起，而是英格兰的兴起，没有什么西方的兴起这一说。你刚才也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地中海沿岸，那是希腊文化以及希伯来最繁荣的地方，可是现在又怎么样？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真的要探讨西方究竟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国家，因为什么而偶然地超过了中国？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坚持，不光是麦克法兰，加州学派认为的，就是英格兰的兴起，别扯什么地中海、法国。而英格兰超过中国，不是因为他的市场经济，是因为他的工业革命。但请大家注意，工业革命是技术革命，它和市场秩序之间的关系，起码不是直接的，不能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当然，从宪政的角度看，大家都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现代秩序确实是在英格兰首先形成的，法国人在18世纪时最焦虑的问题就是追赶英国，他们要学习英国。

我恰恰对英格兰有一点点研究，我认为，英格兰率先启动现代转型，建立法治、宪政制度，与其普通法传统之间有非常大的关系。而大家一定要知道，英格兰普通法传统和不管是希伯来传统、还是希腊传统之间，都没有关系。普通法学家最反感的是什么？就是罗马法，它们最讨厌罗马法。当然，他们受过罗马法的影响，但当他们有了普通法自觉之后，他们从理论上都是拒斥罗马法的。相反，那些支持君主专制的人，都赞成罗马法原理。同样，英国之所以建立了现代制度，不是因清教，清教被驱逐了，而是因为国教。英国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国教。不是清教，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不是让每个人直接面对上帝，而是英国国王主导教会。

总之，我们进行100多年的对比，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西方文化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否则，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找到西方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上、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暂时地领先了中国。请注意，我用了暂时这个词，后面我会解释。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中国？

韦森兄引用了很多汉学家关于中国思想品质和中国精神特点的论述，其中核心观点就是中国人精神基体就是“无我”。这个看法，在我看来，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儒家从来没有讲过“无我”。讲过“无我”的人是佛教，但佛教在中国化之后，也不讲这个了。中国人讲的是什么？不是“断欲”，中国人讲的是节制。我想，我们都知道节制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取消它，而是控制它。其实你在中间用了一些词，“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这些说法，我完全接受，中国人就是讲究自我控制、自我节制、自我约束。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好事情。

因此，我建议韦森不要用“无我”这个词。汉学家的看法都是隔靴搔痒。中国人寻找的是思想的平衡，不是一下子走到个人，也不是一下子走到“无我”，信奉一个集体。不是这样的。所以，杜维明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准确的，就是在关系中界定自我。在一个关系中成就自我。你不能说，这是个人主义的，但这也不是集体主义的，就是在两者之间。我认为，在两者之间，恰恰是美德，因为亚里士多德等诸多贤哲都讲过，中道才是美德。你不管是偏向于个体、把自己树立为这个世界的立法者或者主权者，还是把一个共同体树立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或者至高无上者，一定都会出问题。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对中国文化怎么认识？应该去考察其内部的丰富性。比如，一个儒家士大夫，儒家士君子，是不是完全无我，没有任何个性？当然不是，我们看一下历史上那些儒家士人，他们都有非常饱满的生命力，但是，他们都知道自我约束，他们不会放纵自己。他们都会在诸多具体理论关系中尽心尽力的承担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孔子讲的“仁之方”。仁之方有两点，第一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都知道。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划出人与人之间界限，不要伤害别人。孔子还讲另外一条仁之方，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构成中国的仁，构成了我们思考自己和外界之间的模式，这个模式我概括就是“能进取譬，斯为仁之方也”。从我开始，不断体会他人。我是一个基点，恰恰不能说中国人“无我”。我是通过我来理解其他人。在我和其他人之间构成一个相互的通感的能力。这是斯密所讲的sympathy，这是礼的基础。

我完全同意你对礼是在中国社会整体治理模式中居于主导性地位的看法，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治理模式，我后面会讲到这一点。

第三点，基于上面两点评述，我提出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来跟韦森兄商榷。

过去100多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进行中西文化对比，最新一轮，就是您提到的80年代开始的新启蒙运动。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就开始找原因，为什么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再一次启动了一场中西文化对比的思想知识的运动。然而，这个运动很奇怪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文化大革命是明明白白的、决然的、绝对的以反对中国文化作为其政治纲领的，我们只要随便翻阅当时任何一个文献，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那些新启蒙的知识分子把文化大革命再一次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我经常会说，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究竟是在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是在延续文化大革命？听到这些知识分子的所谓反思，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中间一定会跳起来，因为，他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摧毁中国文化作为最基本的目标，我们去看一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说的清清楚楚，为什么这个摧毁中国文化的运动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表现了？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一点在80年代以后表现最为明显，就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把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出现的所有灾难、所有罪恶，都归咎于中国文化，归咎于四千年前、归咎于两千年前的中国人。肯定有关系，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朱学勤先生在90年代一直讲一个观点，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你让2500年前的孔子为文化大革命负责任，这有没有道理？今天，大家都讨厌维稳，并扯上中国文化。然而，维稳和儒家究竟是什么关系？真有关系么？

我认为，我们在讨论当代中国历史时，一定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共产党是以反儒起家的。你看一下共产党在过去60多年来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各位我们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我们可以想一下共产党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摧毁中国文化。你去看一下中国的宪法，1949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的宪法，1975年的宪法，1978年的宪法。宪法序言都在写什么？大家不妨去看一下，它的全部的目标都是继续革命。请问他要革谁的命？就是革中国文明的命。为什么这样？当然这涉及到极权主义的一整套逻辑，不去讲他。

所以，我们在反思当下中国之种种弊端、种种体制不合理的时候，要记住这个基本事实。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基本事实，你所做的反思，就毫无意义。或者让我坦率的说，你就是在替极权主义推卸责任。极权主义在摧毁中国文化，而你把极权主义的所有灾难又归咎于中国文化，这是什么逻辑？当然，最近，共产党改变了其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恰恰从这个改变，你就可以推想他以前是什么态度。各位恐怕都记得，三、四年前，孔子像曾经在天安门边边角角站了了一百天，然后又被拿走了，这是为什么？我请各位深思这个问题。

第四点，整个韦森兄的演讲都是围绕经济展开的，从他延伸到制度、法治、宪政，接下来我想简单讨论一个问题，中国文化与经济增长究竟是什么关系？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刚才韦森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事实，他说，即使到二战结束时，中国都不逊于西方。中国在明清时期的经济怎样呢？中国是全球性贸易体系的驱动者。大家知道，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使用银子的呢？是从秦始皇时代吗？当然不是。是从明代中期，白银才变成中国主要货币。为什么？银子是从哪来的？中国是一个乏银的国家，直到今天，中国的白银产量也是非常低的。那么，明清时代的银子是从哪里来的？从墨西哥和日本来的。换言之，因为中国卷入、驱动着那样一个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以至于中国经济最根本的制度都被改变了，货币都变了。

由这一点，我们其实还可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政府和市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刚才韦森兄已经讲到了“行政控制型的社会”。当下中国确实如此，但是，传统中国从来不是这样。否则，我们无法想象，这个国家的货币是因为贸易而被改变了。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不是朝廷发布一道诏令而改变的，而是自下而上自发的改变。

刚才，韦森兄也讲到了韩国、日本，也提到中国文化对这两个国家有很大影响。那我们就完全可以说，儒家起码是推动了整个东亚的经济增长。而且我们，可以做一个跨文明的对比。世界银行在几年前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到了一个所有人都很少注意的事实，那就是迄今为止，二战以后吧，这个世界上大概有十几个国家从中等收入水平，达到了发达国家程度，其中一半在东亚，另外大多数在哪？在欧洲。这说明什么？我们知道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拉美、非洲、阿拉伯国家没有几个进入。你可以说，东亚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学习了西方。可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学习西方。然而，为什么只有东亚成功了？包括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有很多问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但是，中国经济毕竟成功了，为什么？是因为共产党英明领导吗？在座各位肯定都觉得不是。那是因为什么？你会说，是因为中国人学习西方了。那我告诉你，非洲那些国家也可以学习西方，他为什么没有成功？

大家再想一下，我们前一辈企业家都是什么人？都是最普通的中国农民，80年代中国兴起的第一代企业家，不是我们读过大学的这些人，而是生活在中国传统保存最好的地区的那些普普通通、只上过小学、甚至没有读过书的农民。他们为什么熟悉市场经济？是因为他们读过哈耶克吗？是因为他们读过弗里德曼吗？是因为各位到乡村给他们做过启蒙工作吗？或许，你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还不如一个普通农民。那么，他们是从哪接获得这些隐匿的智慧的？他们又是从哪里得到组织管理企业并让这个企业走向世界的技艺、德性？他们从哪得到的？请各位思考。

第五个问题，中国如何构造一个优良的秩序？

这个问题非常大，韦森兄的整个讨论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首先说明一点，我不会去讨论“儒家传统与民主”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民主是一个次一级的制度，不是最重要的制度。你会觉得很奇怪。那就请你读一下《联邦党人文集》，就知道为什么我如此说了。

我用的一个词是“优良的现代社会秩序”。这个秩序里面可能有民主，也可能有法治，有可能有宪政，但都不是必然的。或者说，即使他会在我们那套制度组合中出现，也一定会采取一个跟美国，跟英国、日本不同的形态。有人说，秋风太反动了。那我请问各位，美国的制度和日本的制度一样吗？和英国的制度一样吗？不一样。英国是三权分立吗？法国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国家吗？美国的最高法院是民主投票选举产生的吗？

有很多问题，我们都需要深思。过去100多年中，知识分子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简化。我们把西方总结成几条常识，我们以为，用这几条常识，就可以构造一个可正常运转的现代国家。这就是中国现代100多年来之所以走弯路的原因。

中国要建立一个现代的优良的社会秩序，在我看来，必定需要一场伟大的创造。我只给大家讲一个我认为的最重要的理由，也是一个最基本的理由，因为中国太大了。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制度和英国不一样，和欧洲大陆那些国家，和孟德斯鸠所谓的三权分立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还是建议大家看《联邦党人文集》，里面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因为美国太大了，所以不可能采取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度，而必须采取代议民主制度，他们起了一个词“共和”。所以美国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共和制度。今日中国如此之庞大，13亿人，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庞大的一个政治实验，我们简单地抄西方的制度就可以吗？当然不可以。

我们怎么做，我们必须回到中国。刚才韦森兄讲到礼俗中国，说明礼在中国扮演了支柱性作用。我们不妨想一下，为什么这样？中国起步的时候，你不能排除他走民主这条路的可能，但是没有，为什么？我用一个非常简短的讨论来结束我的评论。

让我们回到中国的基本事实。不管是希腊人还是希伯来人，当他们建立政治生活的时候，他们都是小共同体，比如说希腊，希腊哲学家讨论的基本问题都是城邦如何。大家知道城邦有多少人？公民只有五千多人，你敲一声钟，所有公民都可以到广场上举手表决。当中国开始形成的时候有多大？包括今天山西省南部和河南西部地区，你站在黄河岸边敲一声钟，会有几个人来？所以，中国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不投票表决的路，而形成了各种礼的控制，由此有了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平衡等等所有这一切。

今天我们有13亿人，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该怎么过？不是一个简单的举手投票就能决定的。所以刚才韦森兄一直强调宪政，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真正深入理解宪政是什么含义。过去这些年，我都不用民主这个词，我用的都是宪政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有更大的延展性，可以有更广阔的思想空间。

简单说，我们需要思想，而不是仅仅传播常识。如果我们不能够思想，或者说放弃思想，就是刚才你最后讲的，放弃思考的责任，做思想上的逃兵。那各位，让我说一个比较悲观的预言，中国将仍然在灾难中徘徊不已。因为，建立这样一套社会治理秩序是人间最复杂的事情，如果你认为用几条常识就可以解决，那你就错了。我们要传播常识，但起码，作为学者，我们需要思考，学者与知识分子要有分工。

最后，儒家究竟在现代中国优良社会秩序构建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不能展开讲，我最简单地说说我的结论。中国优良的社会治理秩序一定是立基于儒家，否则，这个秩序永远不可能稳定。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要看一下历史就可以了：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王朝，从西汉中期以后所有王朝，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夺取政权、打天下，异族入侵、叛乱、阴谋篡权都可以，对此，儒家都不讨论。因为打天下是天命的问题。真正需要讨论的是什么？如何从打天下转变为治天下。治天下的含义是天下太平，怎么太平？我想在打天下之后，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都经历过一次儒家化的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太复杂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我未来可以给大家讲。

秋风：

刚才莫志宏女士两次指控我是编造了韦森兄的观点，自己空树一个靶子批评。韦森兄可以打开你的PPT看看最后三个结论，你看一下这三个结论，我相信你会做出一个更公正的判断。

在所有讨论中，我都是坚持一个基本的看法，我们要公正。不管是对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要有一个稍微全面的把握。这是我刚才一直在讲的一个观点。我决没有意思说我们要排斥西方，我现在正在翻译哈耶克的《立法与自由》这本书。但是，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秩序的时候，我自己会告诉我自己，我要明白我站在哪里。我一定要明白我自己站在哪里。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看法。

[秋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7月13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与“一起读哈耶克”共同举办的「韦森：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看中国法治化道路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法律传统——个体与社群之间

许章润

2014年7月13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看中国法治化道路研讨会」，对于韦森教授主题报告的评议。据现场录音记录稿整理。

刚才，两位教授，韦森和秋风，各持己见，各拥理据，互有往来，将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也将讨论进一步深化了。我没有能力做更多的评议，肚子也饿了，饿了立马低血糖，头晕心慌，仿佛大脑停止运转，只能在技术层面，略申己意，并向两位致意。

第一点，关于主题报告的方法论。现场聆听，感觉今天韦森兄的研究进路，是从语词分析入手，层层展开。我们知道，语词分析以对于语词单元的剖析起步，既是一种语言哲学进路，也是置身今日这一意义繁复的超复杂社会中，有效解剖认识对象的一种可欲方法。不宁唯是，先从语言、语词分析入手，而实际衷心所寄者，在于申说，语词引导了我们的观念，并且塑造了我们的观念；语词从社会生活中来，又在应合着社会生活节奏的自我塑造过程中进而悄悄地塑造着社会生活。从而，不妨说，语词缔造了世界，包括法律规范世界与实际生活世界；作为“思想的物质外壳”的最小单元，语词映射着大千世界，语词就是存在，存在之存在于语词，一如语词呈现着存在，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法言法语”是法律和法意的存在的家园。总之，从语词分析入手，不失为一种方法，常常也是可欲的和有效的方法。

如此作业，韦森兄广采多种资源，调动多种方法。晚近以来，在我这个门外汉观察，经济学家不仅擅长设定命题，而且，多半以问题为导向，经由“问题”，这个“问题”，而非别的什么，自我证成。故而，其得自圆其说，亦如它常常难免是一个自问自答的循环论证。今天，韦森兄就调用了文化比较、思想史考察、语词分析、制度分析等一系列方法，各方联动，多元排比。经此综合调度，不仅在于揭示“问题”及其文化差异，更在于明示当下中国的制度困境和可能的未来前景。问题导向，分析引路，而终究落实到解决问题的理念阐释、制度设计和实践操作，体现了经济学家的干慧，可取，赞成。

第二点，关于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两分法。置身今天这一西方文明笼罩世界而全球多元文化并存的初始条件下，如此作业，从语词追溯制度理念，进而探查其背后的文化倾向性，概以“中西文化”为轴心，搭设起一个比较框架，概为百年之间中土学术致思的惯常手法。之所以如此作业，不仅是因为西方文明凯歌猛进，而晚近的文化转型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西化的进程，使得一切学理作业和实践操作均不能无视西方文化的强势存在，而且，在于此种手法一旦成为习惯，啸啸乎一种路径依赖，虽说简单而片面，可再想绕道而行，却已然不易。因此，今天韦森兄循沿此径，着意说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西之间，广义而言，出现了今天这种治道差异，及其知识论上的歧异，势必牵涉到方方面面，庞杂而幽微，挂一必漏万。在此，韦森兄把它们化约为“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在此两相对立的架构中解说东西之别，进而引申到法治话题上来，可能也有古今之别的意义含括其中，一方面看固然大而化之，另一方面说，却也举重若轻。

我们知道，作为一种运思逻辑和理论叙述技巧，径直以某一范畴或者某一命题起步，而展开思旅，概为一种常用方法。至于此种范畴或者命题之是否摇摇欲坠，又当别论。当年康德写作《法权哲学》，径从自然社会和文明社会的两分起论，而由自然法则和自由法则入手，于严辨“我的”和“你的”这种二元结构中，展开什么是法律，怎样的法律得具正当性的推理，阐述人的主体性与个体作为权利义务的承担者的实践主体的品格。其之煌煌法权哲学思旅，竟然只是奠立在上述两分的基础之上，无损其思想光辉。今天以“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元对立起步，而区辨中西文化各自拥有的观念资源，进而由此展开论述，可能存在很多问题，因为任何一种简单分类都不可避免会有自身的缺陷，也都会遭至各种批评，但是与其简单批评凡此两个语词所标立的二元对立之简单，不如分析基此展开的论述有无逻辑性，是否与各自指向的对象若合符契。刚才讲到以社群主义作为中国社会基本人际格局和社会结构的特征，必然会牵涉到人本主义与家族宗法体系的问题，一定会让读者联想到传统“老中国”之为礼俗社会、礼法结构的问题，所谓“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诸项，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而言之，在此叙事的背后，更为深层的涉及到文化还原论、文化决定论、文化至上论和制度决定论、环境决定论等叙事模式，以及家族主义、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和天下主义等观念体系。它们林林总总，联袂而来，不一而足。凡此种种非此即彼的理论上的大是大非，哪里是一时半会儿所能讲清道明的，又岂是一人一文一世即可“独断乾坤”的。就此而言，今天的有限讨论，韦森和秋风的对垒，不是将问题简单化了，或者明晰化了，而是将问题复杂化了。我的意思是说，将讨论进一步深化了。照此题目之宏大，可以争论一生一世，再争论一生一世也！

第三点，由此，涉及到制度变迁、文化信念和生活方式及其三者互动诸项。韦森兄以人本与神本对举，要言不烦。我想起曾有人说过印度文化的鬼中心问题，所以不妨加一个“鬼本”。多重交互的复杂性，告诉我们需要区辨其文化背景，以及从制度安排和行为方式着手辨析政治与政治文化的不同，法治与法治文化的差异。我记得已故的诺奖得住，终生任教芝加哥大学的施蒂格勒教授在回忆录里曾经讲到，1940年代末期到1950年代初期，“二战”之后不久，他去欧洲参加朝圣山协会的年会，感受到西方文化中的多元性，体现在人民的日常起居和行为方式中。就拿守法而言，他调侃说，“英国人遵守一切法律，法国人不遵守任何法律，美国人只遵守自己喜欢的法律”。这里，不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及其人民的守法模式不同于欧陆拉丁一系，就是英语国族本家内部，也有如此之区别，非亲历者不能察识，令人开眼。

实际上，今天我们说个人主义是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单就拿其中的个人主义而言，其于东亚社会建设法治国家而言，却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面貌并不一致。日本和韩国，我们不能否认它们是民主法治国家，但是与持守个人主义的英语文明之间，无论是实际社会生活方式，抑或立法与司法，还是公民个人的守法模式，均可能存在重大差别。如今台岛作为中华民族和大中华地区“先民主和法治起来”的地区，其之儒家文化底色，作为制度建构的参与性因素，同样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其之社会群体生活和个体私性生活如何践行和表达“个人主义”，同样不同于欧美，尤其不同于英语一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单一的理论或者一元论的历史建构论，没法解释今天的复杂社会。因而，其为一种解索致问的理论叙事方式，依然保有生命力。——或者，一定的生命力，就看运用者的识见、眼光与功力了。当然，此为理论作业，与实际生活的价值皈依是两回事。作为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但凡个人自由、个体尊严，基于道德主体性的意志自由、契约神圣等现代价值，均不可否认。这也是我们谈论现代中国、现代制度、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以及理想而有尊严的现代人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第四点，由此伸展开来，我们看到，晚近主要人类文明都差不多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着从神圣秩序向世俗秩序的转换。不过，在此总体宏观论述框架内，其时序有别，推展方式不尽相同。可能，两希文明经过千年的演化和挣扎，在16世纪现代早期以还，特别是经过18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从神圣秩序跨入现代法治社会，由此率先开启现代工商社会的新型文明形态。那边厢，相较而言，中国的神圣秩序不若两希那般彰显，似乎商周之际即已逐步解体，历经战国和秦汉之变，演变为礼法秩序和礼俗文明，中庸平和，环绕家族人本打转，延绵两千年，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随着现代工商社会登场而转向法治文明秩序的建设进程。但是，此间一大关键在于，不管历史如何演进，迄而至今，宪政、民主和法治，无分东西，不分古今，其为现代秩序的基本要件，已然成为一种人心所向，在在不可否认。盖因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有一个问题是共同的，就是如何解决我们这一众群居的“杂众”，虽有种族、利益和观念的不同，却在政治上和平共处。就今天而言，如何使得十三万万中华儿女在政治上和平共处，是最为紧要而根本的问题，蔚为国族的最高智慧。为此，需要动用多元资源。从制度建构而言，则民主、宪政和法治，不可或缺。因为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如前所述，所要解决的是“你凭什么统治？”“你的权力从何而来？”这样的大是大非。在此，历尽修炼，晚近人类殚精竭虑所能提供的最为精要的方案，要亦不外以民主来解决权力来源问题，借宪政解决权力配置问题，靠法治规范民主和宪政的运作程序，全体国民一般的性质。它们三位一体，合则多利，分则俱伤，由此构成现代世界“双元革命”背景下的基本政道和治道。如此这般，十八世纪“大分流”之后，今天其实到了“大合流”时段，好东西，只要有助于过日子，过好日子，好过日子，拿来用就是了，管他东南西北！

第五点，关于分享的问题意识与解决问题的各自进路。是的，置身上述情形下，韦森和秋风，两位虽说理论与思想资源有别，进路亦且不尽相同，但都分享了一个共同问题意识。它不是别的，就是在中国的今天如何达成一种理想的政治愿景，如何使中国变成这样一种现代秩序，从而，根本奠立全体公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制度基础。也就因此，面对现实的问题，如有法不依，广泛、普遍、持续的有法不依，执政党的言行分离，政府和人民的合谋式腐败等等，使得我们在探讨现今中国现实条件下究竟如何解决“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权力配置的合理性”和“权力运作的合法性”这三大核心问题之际，究竟如何下手，遂成疑问，而各展才思，各有腹案。就拿“有法不依”来说，讲述了转型时代社会生活、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法律文明和制度建设各自脱节的尴尬，牵扯到制度的有效性、人民的文化心理和当局的政治诚意等多项内容，特别是法治之意味着对于最高权力的规范，触到了现代政治文化的最为关键之处。可能，二位对此都有同感，也有痛感，而分享了问题意识。是啊，这不正是搅得我们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一个现实困境吗！要不是对此念兹在兹，沛然不能自已，跑到这儿来费口舌干吗呢？！

但是，这个地方牵涉到一个问题，需要斟酌。什么问题呢？就是刚才韦森兄讲到的“中国法”和“西方法”，或者，“传统中国法律”与“现代西方法律”的对比。我觉得，这一问题太过宏大，牵连广博，需要做专业梳理，粗枝大叶不行。当年严几道翻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曾说“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义”；“西人所谓法者，实兼中国之礼典”，可谓识见高明。职是之故，如何辨析与调和两种法律概念，尤其是在比较研究中不至于颍书燕说，三岔口，产生因知识不足所导致的分歧，需要做具体的学术梳理工作，绝非一般性的大而化之所能奏效。

不过，有一条我想是能成立的。刚才韦森兄讲到“何处有交易，何处就有法律”，这是典型的经济学家的表达。根据在下这个法学家的研究来看，略作补充，可能更为贴近实际。所有的社会，首先都是一种伦理社会，然后才以财富的创造、传播、分配和消费的最大化为核心，经由互惠的交易来组织生活，适成一种经济社会。伦理社会在先，经济社会在后，然后才有市民社会以及现代的公民社会、政治社会等项目，乃至于有所谓“体面社会”或者“正派社会”之愿景。经济社会意味着“何处有交易，何处就有法律”，而先于它存在、作为一切人类社会基本属性的“伦理社会”则恰恰告诉我们，“哪里有家庭，哪里就有法律”。考究法律的发生论，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还是具体个案，全世界所有的法律家族，不管是古典罗马法，还是老中国的法律传统，抑或共产党进城以后的立法史，它们均首要制定两部法律，此即《婚姻法》和《土地法》。婚姻解决代际传承、伦理结构，关乎基本人伦和社会稳定；土地解决生存问题，关乎安身立命。所以，“哪里有家庭，哪里就有法律”，与“何处有交易，何处就有法律”，二合一，最能说明法律的创世纪。

第六点，刚才秋风和韦森两位教授都提到“维稳”问题，韦森兄慨言几千年来中国法律就只在“维稳”，而秋风兄未必同意。我的一个粗浅观察是，政治和法制的基本功能在于确立主权、提供秩序、分清敌我、划分公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采用今天当局的“维稳”概念，在并且仅在“提供秩序”这一维度立论，则不妨说这是法律的基本功能，也是政治的基本功能，有何奇怪的。毕竟，如同亨廷顿所言，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却无法存活于有自由而无秩序的格局之下。将古典中国的政治法律功能悉数归诸今日意义上的“维稳”，恐非确解。

不过，说到“维稳”，不妨多说一句的是，今天动用大量GDP施行增量维稳，实为特殊历史时段的历史现象，也是特殊政体的特殊自保手段。各位想一想，倘若今天北京每一辆公交车上都有一位维稳人员，每一节地铁车厢里均有一名保安值勤，则所动用的人力物力，消耗靡费，堪称海量，岂能延续。而如此草木皆兵，几达风声鹤唳地步，就差人人自危，还怎么过日子。我们不禁要问，值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众生活日益改善之际，却闹到这种地步，到底是怎么了？何所由来？欲将何往？

思来想去，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历史到了这一波大转型的最后收束时段了。在现代世界和现代秩序的意义上，所有的转型社会，若果最后转型成功，都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政权的来源问题，据此而架设起国族政治生活的根本支柱。换言之，此时此刻，你凭什么统治？为何你有权力？为什么你掌有立法权而我必须服从你？你的政治权力，统治权，仅仅说“老子牺牲了三千万人头换来的”，行吗？不行，那是丛林规则，那是强盗逻辑，一种前现代王朝政治理路，早已摆不上桌面了。既然权力或者政权如何而来这个问题尚未解决，就是说政权的正当性没有解决，则中国社会不敢说从此安宁，中国政治不能说从此安稳，所以才使得维稳成为当下之务，仿佛一种心头之痛也。正是在此，法政哲学，可能也包括制度经济学，着力于梳理“政权的永久性的正当性”和“政府的周期性的合法性”，衷心所愿实不过架设政权来源的理路，而为现实走通预开言路，预设理路。换言之，经由民主选举提供的周期性政府合法性，以彰显和表达政权的永久性的正当性，才是这个大转型的收束阶段所当孜孜致力的最大功业，而成为真正确立政治稳定的不二法门，也就是上述全体公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根本制度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韦森、秋风二兄，我们实际上分享着一个共同理念，就是民主、宪政和法治得为中华民族走向政治成熟的必有修业这一理念。这些听起来仿佛陈词滥调的大词，或者将来有一天会成为陈词滥调的语词，表达的却是当下中国的人心所向和历史大势，也是最具政治感召力与实现公民团结可能性的分享着的价值，真正是天经地义。如起孔孟于九泉，请二老徜徉于当今之世，想必他们会说：秋风，赶紧搞民主、宪政与法治，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第七点，韦森兄引述黑格尔“中国人无历史”这一判称，以为佐证和说明，小弟对此颇不以为然。盖黑氏以所谓的德意志“日尔曼精神”来标领“世界精神”，当为世界历史精神发展的顶峰，辄言历史终结，自有其理路，却是不折不扣的日尔曼式偏见与傲慢，早为史家和哲人所弃信。在他眼中，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相较于希腊世界和日尔曼世界，中国社会“长期静滞”，例属所谓的“停滞社会”，漫长的生息历程不过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不可能从中产生任何进步，特别是缺乏精神的进步，因而无所谓历史。此公所论，实在是偏见。重申一句，这不仅是无知，更是偏见，而偏见有害于无知。黑氏囿于中国历史知识，只看到整个帝制一统时段的治乱循环，而无视中国文明从前枢纽文明以来的精神律动。事实上，天人沟通，神俗对立，灵肉争战，义利之辨，知行困境，此岸和彼岸之拉锯，在在困扰着中国心智，而激扬着中国心志，使得华夏文明的精神挣扎和思想蹈厉，如江海奔涌，未稍止息。其内在张力和道德紧张，较诸枢纽文明以来的任何一种主要文明，均不遑稍让，却又中道平和。迄而至今，仍以此翁这一早已过时的论断为己证说，说明中国心智确有平视寰宇，而自我超拔之必要。同时，也可以看出，较诸英美一系的功利主义，德国文化滥用精神价值效力于权势政治，在将它理想化和道德化之际，怂恿了一种粗鄙的自然主义和生物式的暴力伦理的后来发展，其实，早在此翁的哲学中，已见端倪也！

进而，还有一点是，韦森兄的文章在论说中国传统和中国文明时，几乎皆以当代域外西洋汉学家们的论说为凭，这便多少有些舍近求远，而有个毫厘千里的问题。毕竟，汉学家或者中国研究者的成就俱在，无庸讳言，但望文生义，亦且所在多多，同样无庸讳言。所以，韦森兄欲增大作说服力，恐需多引多述原典，汉学家们的话只作旁证可也。小建议一条，请吾兄不以为怪。

就说这么多，合掌，尚飨。

[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本文为作者2014年7月13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与“一起读哈耶克”共同举办的「韦森：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看中国法治化道路研讨会」的讲评修订稿 ]

## 中西基本问题之共同性、问题解决方案的多样性与此多样性背后的基本功能的一致性

莫志宏，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刚才大家都提到把问题搞复杂的感觉，我有这个感觉，因为讲了很多事实。就我自己理解来讲，这个题目首先提到中西方文化差异，我在想为什么从这个视角入手呢？因为中西方现在肯定面临共同的问题，如果没有共同问题，这个比较也没有太多意思。什么是共同问题呢？实际上现在大家很明确共同的问题就是扩展秩序的问题，交易不仅仅是在大家很相熟的村落里面交易，而是在各种种族、各种可能的只要称之为人的之间交易，只要有共同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就要求每个社会，不管有多大的文化差异性或者心理差异性，提供基本的共同的功能，才能回答共同的问题。这样一来，各种各样的经验事实就会变得来便于梳理了。这样问题也就可以这样表达了：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和西方社会面临一些共同的东西，这意味着肯定这些社会在一些基本的功能上是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实现这个功能的具体的载体，可能它的经验、形态会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谈到民主、宪政或者是自由这样一些最基本价值的时候，其实肯定没有说锁定在我们要以什么样的特别的具体的方式去实现，这个确实容许一个探索的空间。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关于儒家和这些问题的关系，我觉得秋风稍微在逻辑上有些不太清楚。就是什么呢？儒家如果说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文化资源，我认为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刚才这样一些价值理念，就是这些价值能够满足、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基本的功能的前提之下，儒家这样一种精神资源我相信可以为东亚的人包括中国人所用。但是，反过来讲，如果说咱们中国不能解决我们和其他社会一样面临的扩展秩序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不能满足这个最基本的功能，这个时候儒家的东西肯定就会变异为、堕落为为集权服务。所以，刚才韦森老师提到这个基本事实，好象这个事实很奇怪，儒家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跟这些东西兼容的，但是前提就恰恰是说你这个社会能不能提供出这样一些基本的功能出来。当提供出这些功能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我们一定采取某种一模一样的跟西方的形式.认为说中国必须采取和西方一模一样的制度，这是伪命题，韦森老师没有提出这样一个特别弱智的伪命题，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花很多精力反驳这样的伪命题。所以，我们今天关于这样基本的价值上所有的知识分子应该有特别明确的共识，至于说这些价值我们以什么样经验的制度形态把它探索出来，我相信这个是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的。儒家我也相信可以在中间发挥极大的作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我觉得真的不如经验中的人来的实在，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而否认了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也就是我们大家共同面对的基本的问题、每个社会的制度必须为解决它们提供出来有关基本功能的问题，这是一体的事情，我想把这个捋一下。

[莫志宏，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7月13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与“一起读哈耶克”共同举办的「韦森：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看中国法治化道路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土地法律制度

## 我国的土地法律制度要从根本上改变

**盛 洪**

**一、关于《土地法律制度的原则框架》报告的介绍**

谢谢张老师！我们的课题叫土地法律制度的原则框架研究，首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课题是由天则经济研究所和君泽君律师事务所成立联合课题组进行的研究，我们也得到了河山国际资本集团的部分支持。这个课题是从2012年6月就开始了，一直到2014年9月告一段落。课题组的成员有盛洪、颜俊、杨俊峰、程雪阳、徐振宇、李人庆、杨华、白琳。我们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开过至少四次的专家会议，向下列各位专家请教过对这个课题的意见和建议，

陈剑波，程烨，党国英，傅蔚冈，高王凌，华生，卢峰，陶然，王才亮，王卫国，魏耀荣，咸鸿昌，姚中秋，张曙光，赵燕菁，郑振源，周其仁，周天勇等等很多专家，我在此向这些专家表示感谢！

这个课题的基本成果是《土地法律制度的原则框架》。这个原则框架包括15个部分，一是序论；二是中国土地的主权含义；三是在国家主权下的土地产权；四是土地产权类型；五是土地产权的登记；六是土地产权的交易及其秩序；七是集体土地产权的拥有、行使转让与消灭；八是政府对土地产权的拥有、获得和转让；九是对政府土地产权行使的监督；十是政府土地收益的上缴、使用与监督；十一是政府对土地产权的征税、补贴和管制；十二是政府对土地公共管理部门的定义、权力及责任；十三是土地规划及政府土地规划部门的定义、权力及责任；十四是对涉土地事务的政府部门的限度和监督；十五是土地纠纷解决的司法程序。

我们为了研究这样一个土地法律制度研究框架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背景研究，也形成了19章的研究报告，这19章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部分，第一章是论租税同源、分离与互替。第二章，论永佃制的经济性质，第三章，土地产权自由交易是节约土地的有效制度。

第二部分是问题与改革建议，第四章，《土地管理法》及其“修订草案”批判；第五章，我国现行土地法立法目的之检讨；第六章，宪法第十条的问题与解释；第七章，我国土地利用制度的现状、问题与改革；第八章，土地登记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1998-2013；第九章，土地征收、征用制度；第十章，土地产权的交易及其秩序；第十一章，土地诉讼制度；第十二章，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困境与改革；第十三章，现行土地管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第十四章，传媒报道恶性强拆事件简要统计分析。

第三部分是历史与借鉴。第十五章，制度应该怎样变迁：中英土地制度变迁比较；第十六章，中国土地国有制的历史演进；第十七章，城市土地国有是如何写入宪法；第十八章，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形成与变迁史；第十九章，英国土地开发权国有化的教训及其启示。

由于时间关系，不可能对后面这些研究做详细的介绍，就是把题目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也使大家能够了解我们研究的基本结构。

下面我大致简要的讲讲我们设立这个课题的背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近65年间，始终没有一部《土地基本法》。构成中国现有土地法律制度的是《宪法》的相关部分，以及《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这种法律结构，不仅不够完整，而且缺少基础性的原则框架，几十年的实施表明，它存在严重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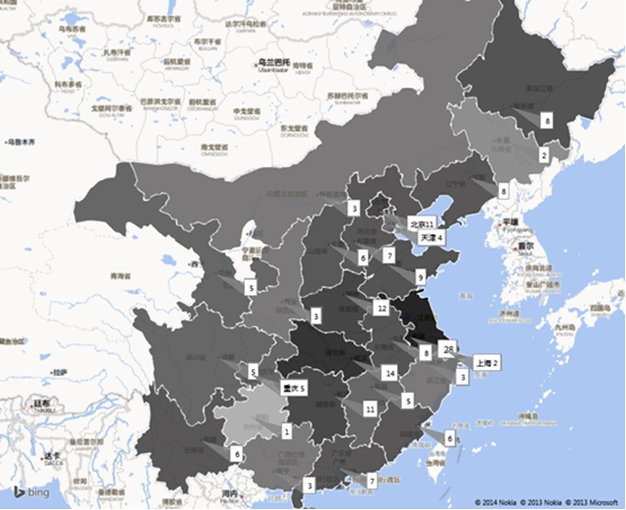
首先《宪法》中有关土地的部分没有形成一个没有内在原则矛盾的体系，不同部分互相冲突，个别地方存在原则性问题。如对土地产权的规定，以及对财产权利保护的规定，与对土地产权的限制和否定同时存在。

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条款则不仅是用土地用途的性质来反证所有权安排的合理性，违反产权形成的基本机理和原则，且没有城市区域的动态视野，当城市扩展时，就会对农村居民的产权造成威胁。

在缺乏宪法性法律的前提下，《土地管理法》并不是一个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的法律，而是更像一个侧重于行政管理的部门文件。正因如此《土地管理法》倾向于削弱和限制农村居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如规定农村土地不得改变用途，如农村居民的土地如何被政府征用，只给予平均年产量的六倍到十倍的补偿，而另一方面，却没有对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和涉土地事务政府部门的职能和权限加以界定，赋予了他们很多权力。

《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尤其是1998年修改以后，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一起，带来了不少严重问题。

第一个问题，由土地征收征用引起的大范围的严重的社会冲突。到2012年，当年约有6万起群体性冲突事件与土地有关，并且越来越趋于暴力，伤及生命的恶性事件频繁发生，更有如盘锦警察开枪杀人的极端恶性事件（李超和朱柳笛，2012）。据我们对媒体报道的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到2014年8月，恶性强拆事件一共182件，涉及全国22个省和4个直辖市，其中强拆双方的人员伤亡484人，死亡人数162人，受伤人数322人。



这是强拆恶性事件在全国各省的分布，颜色越深的地方，恶性强拆事件的频率越高，大致是江苏、湖南、黑龙江的颜色比较深一些。

第二个问题，大量失地农民就业困难，收入下降。由于土地征收征用引起了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又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以及稳定的工作岗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从1996年到2012年，约有6492万农村人口失去土地，因补偿款仅占土地市场价格的2-10%（范利祥，2006），且再就业困难，失地农民的生活近况普遍下降。据某些调查，约有68%的农民找不到工作（何清涟，2011），据湖南省统计局的调查，有37%的农民收入减少（邹礼卿，2010）。

第三个问题，城市土地配制和使用效率低下。由于政府可以强制性的低成本征地，导致过度的土地城市化，及对土地不当配制、滥用和浪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我国城市人均占用土地约257平方米。

第四个问题，国有企业免费占用、实际享用国有土地，行政部门滥用和浪费国有土地。绝大多数国有土地被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免费占用，却实际享有土地租金及其他土地收益。例如2009年，据我们的研究，国有企业少缴纳工商用地的地租高达1.2万亿（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以及直接修建和享用大而无当且奢华的政府办公楼。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豪华政府办公楼的例子，这里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十堰市武当山特区管委会的新办公楼人均办公面积达到竞高达453平米（中国经营报，2013）。

第五个问题，与土地有关的行政部门成为腐败重灾区。由于缺乏对政府部门的制度化监督，土地管理部门、征用土地部门、房产管理部门等行政部门滥用权力，设租寻租，成为了腐败的重灾区。迄今，国土资源部已有两名部长落马，据中央巡视组的消息，在2013年以来的三次巡视中发现，95%的被巡视省份存在地产腐败（刘德炳，2014），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对保障房的审计，约有4.75万户家庭违规享受保障房，约占审计家庭总数的17.4%（王姝，2014）。我们看到大量的房姐、房妹，房叔，就是这里的一员。

第六个问题，村官腐败。在农村集体被征用土地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基础上，由于农村集体主体概念模糊，以及农村集体的公共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存在问题，致使已经很低的征用土地补偿款还不能公平分配，在今天，村官腐败已成为普遍现象，据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村官腐败案有七成涉及土地，据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检察院的统计，这一比例高达92%。

第七个问题，空村现象。由于现有法律和政策对农村集体或农民个人对决定土地用途方面的限制，致使我国农村土地的使用效率非常低，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空村现象。即由于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且宅基地不能自由交易，村子里的土地得不到有效的重新配制。

第八个问题，限制房屋供给，房价飞涨。由于土地管理部门将《土地管理法》的相关条款解释为禁止农村集体在自己土地上的房屋出售或出租给非本地人，即限制和打压所谓“小产权房”，致使土地和房屋的供给显著减少，房价上涨过快。据国土资源部2007年的统计，小产权房约为66亿平方米（中证网，2008），按人均30平方米计算，可容纳当年城市人口的37%。另据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自2005年初至2014年二季度，我国主要城市住宅地价上涨了375%（中国地价网，2005，2014），按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上涨12%，这是一个过快的增长速度。同期通货膨胀率，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约为29.6%。

刚刚总结了由于现在这样一套土地法律制度存在严重问题，导致我们现在社会存在着八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要对土地制度的基本原则进行重新的、全面的研究。

我们这个研究包括很多方面，刚才讲了，有15个方面，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强调三个方面，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针对现有法律制度过分强调土地国有，并且赋予政府行政部门过大权力的弊端，我国提出要区分涉及土地的主权概念和产权概念。

中国作为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其全部领土归全体人民所有，也就是国家对领土拥有主权。这里要分主权和产权分别详细讨论，主权的含义，是国家向领土范围内之公民提供包括保卫产权在内的公共服务，同时有权向公民征税。产权的含义，是对一块具体的有经济价值的土地，通过合法的手段，包括开荒或交易获得的排他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这两个有非常明显的不同。我们现在主要的设想，“国有土地”的概念要做一个重新解释，“国有土地”是主权意义上的国家拥有土地的含义，它没有产权含义。

所以我们要强调区分国家土地和政府土地产权，过去在观念上经常会把国家和政府混淆在一起，把政府和行政部门混淆在一起，甚至官员把自己跟行政部门混淆在一起，甚至把自己等同于国家，这在观念上是非常混乱的，我们要做非常严格的区分。对领土的主权和对土地的产权的区别是，主权是一种公共权力，除了征税用于补偿公共服务成本外，它不能对土地进行商业运作以牟取利益。而拥有产权的人则可以通过行使产权获得商业利益。

在这里要强调政府的角色，政府是代表国家行使国家的一些职能，政府是一个法人，但是是比较特殊的法人，政府作为一个法人获得和行使土地产权，它要以平等的市场主体身份，遵循市场规则。他可以像其他法人一样，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平等的市场主体，要遵循市场规则，不能强买强卖，不能利用他的政府政治上的优势。然而，因政府法人是以征税的方式而运作的，所以以产权所有者身份进行土地产权交易，只是为了获得提供公共物品所必须的土地，仍不应以营利为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政府在操作土地交易的时候，不能以营利为目的。

这是第一个侧重。

第二个侧重，用永佃制的制度规则来理解和解释现有的集体土地产权。永佃制在中国自明清民国以来，逐渐发展成为非常成熟的土地制度，永佃制是在市场制度下生成的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它将一块土地的产权分为永佃权和田底权，永佃权除了永久承佃的权利以外，还包含了部分土地产权。

反观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现在我国普遍实行的土地承包制，实际上接近于永佃制，即农村集体作为土地发包人，相当于田底权所有者，而农户作为承包人，相当于永佃权所有者。承包人可以将承包权进行转包或转让等交易，只是转让需经发包人同意。我们现在的承包人是可以做转包的，也可以做转让的，但是转让还稍微有点限制，需要由发包人同意，应该说比较接近永佃制。

我国涉及集体土地产权的土地制度，可以现状为基础，向着更为市场化的方向演进。实际上，有关土地产权的更基本的规则，是自由契约制度。只要交易双方同意，且没有负外部性，就不能加以干预。只要保证集体和个人的自由契约权利，土地产权制度就会发生变化，就可能形成更有效的永佃制，即永佃权和田底权之间完全互相独立。

我们这个研究的第三个侧重点，是限制政府权力。我们原来的法律体系中，这一块儿是缺位的。要明确界定和限制土地管理部门和涉土地政府部门的权力边界。

现有有关土地法律体系，尤其是《土地管理法》因是由相关行政部门主导制定，所以尽管强调对土地的管理，却没有有关土地管理部门的描述和定义，也没有对其权力的限定。但在实际上又存在一个土地管理部门，它就成为了一个法上机构，其他与土地有关的政府部门，如征用土地的地方政府，也因该法赋予了他们过多的权力而处于无人制约的状态。

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就是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占用土地的约束和监督。因为现有法律制度根本没有有关安排，并存在着上述机构理所当然的可以占用国有土地的观念，其营利性的机构实际上无偿的获取了地租收益。上面谈到了国有企业实际上一年占有了上万亿的地租收入，这带来严重的不公正问题和效率问题。其中的非营利机构也因没有任何占用土地的限制和考核，过多占用甚至是浪费土地。上面谈到了很多政府机关盖了一些大而无当的，非常奢华的办公楼，就是这个问题的表现。这是我们研究侧重的第三个方面。

本研究的风格是有关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寻和提炼出一组有关土地法律制度的原则框架，也由于本研究想从比法学更宽的学术范围进行分析，所以本研究的文体并不是一种法律文本，而是为了更好的表达，采用经济学和法学的术语混合的语言。为了更突出本研究想表达的含义，在文本上既有原则性的表述，又有解释性的说明。通过对说明部分的阅读，更能了解原则性的表述的基本含义。

本研究在研究理想原则的同时，又重视从现实出发。我们不是想探究乌托邦式的法律体系，其实我们还是非常重视我国现有的土地法律制度和土地的产权交易在实际中运营的特点，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重视从现实出发。

我们发现，我们所提出的原则框架，虽然较之现有的土地法律体系有着根本的改变，但是在文本上只需进行较小的改动，却能解决诸多问题，收到显著的良好效果，这是一条从现实到理想之间最短的路，这是一条改革成本最低的改革方案。

下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土地法律制度的研究框架，如果对原文照本宣科的介绍，恐怕是非常枯燥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讲法律条文式的内容，大家就快睡着了。我想的方法，就是针对上面讲的八个问题，我们来看看这样一套原则框架，是否能够解决我上面提的这八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针对地方政府低价征收土地的问题，导致群体性冲突，导致强拆。

《原则框架》中，每一个原则我们都编了号，一共是81条，在这里按条去引用。

**“7. 领土的经济含义：征税权**

中国将通过其人民设立的政府在其领土范围内征税。除此之外，中国不以“领土”的名义获得其它收益，如出售（初始产权拍卖除外）、出租或在土地上经营的收益。”

这一条是排除政府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征收土地。

**“9. 领土与政府土地产权、集体土地产权、法人土地产权、其它组织土地产权和个人土地产权**

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土地产权可由各种法律主体拥有，可以有由各级政府拥有的土地产权，法人拥有的土地产权，社区集体拥有的土地产权，其它组织拥有的土地产权，和个人拥有的土地产权。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

关键是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政府没有高于其他法人或自然人的权利，他们之间的交易只能是平等谈判，不存在政府利用政治强力低价征收土地的问题。

**“18. 集体土地产权的创设**

因社区公共需要，可设立集体土地产权。现有集体土地产权是历史原因而形成和延续的土地产权，新创设的集体土地产权可由个人之间通过自由协议创设，或由集体法人通过法律正当程序或交易程序创设。”

**“30. 土地产权的交易权利**

交易权利是土地产权所有者的基本权利之一，此种权利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经立法机关同意才可加以限制。”

只要拥有土地产权，就有交易的权利，除非有立法机关的限制，同时他也有不交易产权的权利，交易不交易取决于土地所有者的意愿，排除了任何强制性。

**“43．政府对非政府土地的征购：条件与程序**

各级政府因公益用途而需征收其他自然人或法人的土地时，应按该地的市场价值予以补偿。

所谓‘公益用途’，是指设立公共服务机关，公共物品，非营利性的教育、医疗、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公用事业，和市政公用事业等所必需的用途。

如征地方与被征地方对被征土地是否‘公益用途’有争议，应提交土地征收委员会裁决。土地征收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

所谓‘市场价值’，是指临近该地的土地经市场交易形成的价格的平均值；在缺少此种市场信息时，可聘请经被征地者同意的独立第三方土地价值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以评估值作为补偿参照。”

针对第二个问题，农民失地问题。

第43条跟上面一样，就不重复了，也是限制对农民土地单方面的强制性的征收和补偿远远低于市场价值的情况。

**“44．政府对土地产权的购买**

各级政府如因非公益用途（如建设官员住房）而需土地，应依法律正当程序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竞价购买；或依交易程序向其他土地产权所有者购买。”

**“80．行政调解或裁决不应具有终局性**

在各级政府行政部门介入土地纠纷的情况下，行政调解或裁决不应成为排除司法诉讼的理由。”

**“81．土地专门法庭的设立**

各地法院应在现有框架下设立土地诉讼专门法庭；最高法院及各省高级法院应设立土地巡回法庭。”

第三个问题，针对行政部门对土地的不当配制、滥用和浪费。

**“17．政府土地产权的创设**

政府不得直接处置国有土地。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因需提供公共物品，或政府机关办公所需，应与其它法人一样，按前述法律正当程序或交易程序获得土地。无论以何种程序获得土地，都应足额支付价格。”

**“41．政府不可直接拥有未形成土地产权的国家土地**

各级政府作为法人并不自然拥有、并有权直接使用国家土地。”

国家土地是全国人民的财产，它是具有主权含义的领土。

**“42．从国家土地到政府拥有土地产权**

各级政府必须通过法律正当程序，方可从未设土地产权的国家土地中获得土地产权。”

**“44．政府对土地产权的购买**

各级政府如因非公益用途（如建设官员住房）而需土地，应依法律正当程序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竞价购买；或依交易程序向其他土地产权所有者购买。”

**“46．对审批政府土地的监督**

由于政府用地应按法律正当程序和交易程序支付相应资金，且各级政府及其行政部门的预算要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因而对政府用地的审批就在预算审批的内容之中。”

**“47．对使用政府土地的监督**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每年对政府拥有产权的土地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审查、评估，发现将政府土地用于不当用途，包括将公益用途的土地用于政府部门官员住房或商业性建筑等，应予以纠正，并惩戒责任人；土地配置不当的，应提出改进要求。”

也是一种约束。

第四个问题，针对国有企业和行政部门无偿、低效使用国有土地、占有国有土地收益的问题。

**“52．公法（国有）企业使用政府土地的租金上缴**

公法（国有）企业使用政府土地，应按市场地租率交纳地租。”

现在是根本就不交地租。

**“53．政府机构及非营利性机构使用政府土地的成本考核**

政府机构因办公所需使用土地，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可获划拨的政府土地，但应将此块土地的市场价值记入该政府机构的财务成本，以备考核。

一些非营利性机构，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意，也可部分获得划拨的政府土地，但应将此块地的市场价值记入该机构的财务成本，以备考核。同时，该级政府也应将该土地市场价值记入其对社会支出的财务成本中，以备考核。”

虽然有某些公益性，但是公益性的成本是要进行考核的。

**“54．出售或出租国有土地或政府土地收益的上缴**

各级政府代理国家出售国有土地，使之成为自然人或法人的土地产权时，应将出售收入直接上缴国库。

各级政府出售政府土地的收入应直接上缴国库。

各级政府出租政府土地的收入应直接上缴国库。

公法（国有）企业出售或出租政府土地的收入，应直接上缴国库。

非营利机构出租政府土地的收入，应直接上缴国库”

不能变成政府部门自己或企业自己的收入。

第五个问题，针对相关行政部门缺乏有效约束与监督的问题。

**“70．不得主持起草《土地基本法》实施细则**

涉土地事务政府部门不得主持起草《土地基本法》的实施细则，应委托非涉土地事务政府部门的机构，根据《土地基本法》的原则起草实施细则。”

比如说国土资源部是涉土地部门，就不应该主持起草《土地基本法》的实施细则。现在还没有《土地基本法》。在这里是假定以后有《土地基本法》的时候，这是要避免的。

**“71．不得制定偏离和违背《土地基本法》的条例或政策**

涉土地事务的政府部门不得制定与《土地基本法》相偏离甚至违背的行政条例或政策；否则，应予以纠正，该条例或者政策无效，并惩戒责任人。”

**“72．人民代表大会应对涉土地事务政府部门的越权行为予以纠正**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对涉土地事务政府部门越过《土地基本法》所定义之职能边界的行为予以纠正，并惩戒责任人。”

**“73．自然人与法人依据《土地基本法》等法律对涉土地事务政府部门的诉讼**

自然人和法人都可依据《土地基本法》、《行政诉讼法》和《合同法》等法律对涉土地事务政府部门提起诉讼。”

**“74．上级政府部门有权监督下级涉土地事务政府部门**

上级政府部门应依据《土地基本法》规定之涉土地事务政府部门的职能范围，监督其行为；如有偏离或越界，应予纠正，并惩戒责任人。”

**“75．不得干预对土地事件的报道和披露**

涉土地事务政府部门及其它政府部门不得干预对土地事件的报道和披露，否则，应视为违反《宪法》和《土地基本法》。”

针对第六个问题，村官的腐败问题。

**“34．集体的性质**

集体是我国历史地形成的民事主体单位，是以土地为基础的社区性组织，每个成员拥有平等的权利。

集体应由其成员自愿结合而组成。”

**“35．集体的主体**

在农村，集体的主体是自然村或村民小组；经由若干自然村或村民小组的同意，可以行政村为主体。

在城市，集体的主体可以是社区，或若干公民组成的团体。”

**“39．集体土地产权转让的所得的分配原则与程序**

（1）集体土地产权转让的所得应平均分配给最后一次承包地分配时确定的承包权人；如有特殊情况，必须偏离上一条，对某些个人（或家庭）进行倾斜的分配时，应经村民大会三分之二多数同意。

（2）宅基地的集体“田底权”转让的所得归宅基地使用权人。

（3）经村民大会或村民小组会议四分之三多数同意，集体自身可制定分配原则与程序。”

既然这是自愿结成的生产组织，完全可以自己来制定规则，只要四分之三多数同意就可以了。

针对第七个问题，空村现象。

**“37．集体与个人（或家庭）间的土地产权关系**

（1）作为社区成员的个人（或家庭），享有成员权利；包括：对社区公共财产的共同拥有权；包括土地在内的社区财产收益的分享权利；在承包权设立时期的承包社区土地的权利及其继承权；在宅基地分配时期获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及其继承权。

（2）个人（或家庭），无论是社区成员还是非社区成员，通过契约与集体建立了土地承包契约关系，此关系可以被视为永佃权（或“田面权”）；与之相应，集体的土地权利可被视为“田底权”；“田面权”和“田底权”都可分别地、互相独立地进行包括转让在内的产权交易。

（3）个人（或家庭），无论是社区成员还是非社区成员，也可通过其它契约与集体建立其它类型的有关土地的一般商业关系。”

**“38．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转让的法律程序**

（1）集体土地所有权是“田底权”，因而其土地产权的转让就是“田底权”的转让。

（2）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转让要经村民大会或村民小组会议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

（3）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并不同时意味着个人（或家庭）承包权（永佃权）的转让。”

还是刚才那个意思，我转让了田底权，就像一个房屋，所有者买卖房屋，但是现在有人承租这个房屋，这两者是可以不影响的，你可以转让给另外一个人，承租者继续再承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这两条使我们能够更便利的在农村进行土地的交易，如果能更便利地进行交易，就能更便利的进行土地的再配制，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土地的空置。

针对第八个问题，限制小产权房和房价飞涨问题。

**“59．土地公共管理权与土地产权的区别与边界**

1. 土地产权是自然人或法人享有的基础性、一般性权利，土地公共管理权是维护土地产权、在特定情况下限制土地产权的政府权力；
2. 土地公共管理权与土地产权没有直接冲突，土地管理权只是保障土地产权的一种辅助性权力；
3. 由土地公共管理权不能引伸出类似土地产权的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根本就不是产权，只是一种公共管理权，但是它也不能引申出对土地产权各种权利的占有和限制。

**“62．土地管理部门的权限**

土地管理部门不得侵犯土地产权所有者的权利；不得在土地产权登记条件具备时不予登记；不得擅自夸大“公益用途”的范围，进行征购；不得擅自扩大“对土地产权限制”的范围；等等。否则，应予以纠正，并惩戒责任人。”

现在土地管理部门，在现在的法律体系下没有这样的约束，可以擅自地扩大所谓的公益用途，可以擅自的发布一些所谓的条例和政策，侵犯现有的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比如对小产权的限制等等。即使在现在的法律体系下，他们这样的做法也是不合法的。

**“63. 土地规划的目的**

土地规划的主要目的是使城市基础结构能在早期为以后的发展留有充分的与合理的空间。

土地规划是在市场作为配置土地的基本机制前提下的辅助性机制。”

**“69．土地规划部门的权限**

1. 除非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规划确实限制了土地产权，土地规划部门不得以实施规划为名义，侵犯土地产权。
2. 规划部门应明确区分约束性较强的规划和具有参考性、指导性且较有弹性的规划，不得强制实施后一类规划。”

其实真正要强制实施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这是针对现有由于土地管理部门和土地规划部门对土地产权各种功能的干预，包括对土地产权自由交易的功能的干预而导致的对小产权房的限制和对房屋供给的限制，土地供给的限制，导致了房价飞涨的原则。

还有一个问题，如何保护耕地。保护耕地是非常重要的宏观目标。在这里也有两条规定。

**“43．政府对非政府土地的征购：条件与程序**

各级政府因公益用途而需征收其他自然人或法人的土地时，应按该地的市场价值予以补偿。

所谓“公益用途”，是指设立公共服务机关，公共物品，非营利性的教育、医疗、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公用事业，和市政公用事业等所必需的用途。

如征地方与被征地方对被征土地是否“公益用途”有争议，应提交土地征收委员会裁决。土地征收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

所谓“市场价值”，是指临近该地的土地经市场交易形成的价格的平均值；在缺少此种市场信息时，可聘请经被征地者同意的独立第三方土地价值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以评估值作为补偿参照。”

刚才讲过了，我们要严格限定公益用途，限定了以后，政府去直接征地的行为就被大大限定的，范围会大大减少。即使按照公益用途去征地，应该按该地的市场价值支付。现在我们知道，现在的补偿远远低于市场价值，我们刚才讲了，只有市场价值的2-10%，这样的条款怎样保护耕地呢？很简单的逻辑，肯定是按照市场价值更贵了，什么东西更贵，什么东西就买得更少。什么东西买得更少，政府买的土地更少，耕地就保留得更多。

在我看来，这一条就够了。我们假定这样的原则还不够，再有一条。

**“57．对土地产权的补贴**

1. 改变土地用途的土地产权的使用与交易应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报备案，如该部门认为该土地改变用途不利于公共利益，可给予该产权人相应的补贴，以弥补不改变该土地用途所带来的损失，使该土地产权所有者放弃对该块土地用途的改变。
2. 对土地产权所有者将土地现有用途改变为具有更大正外部性的土地用途，可予以补贴。”

比如说改变为生态用途，从整个社会来讲，生态用途对社会正的外部性，可以对这样的改变予以补贴。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政府如何从土地交易和收入中获得正当收益。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它是需要有一定的资源来支撑公共物品的提供，所以政府也要有相应的正当收益。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政府唯有通过税收才能获得收益，这里提到了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税。

**“55．对土地产权交易的征税**

对土地产权交易的卖方的收入，应按该块土地的增值部分以累进比例征收土地增值税，具体按土地增值税法的规定执行。

政府法人出售土地的所得，尽管应直接上缴国库，也应交纳土地增值税，以符合财务原则。”

**“56．对持有土地产权或土地资产收益的征税**

国家对居住必需的土地之外的所有土地产权征税。税率为该土地市场价值的1‰。

或者，对土地资产的收益征税，税率为土地资产收益的2.5%。

对非营利机构拥有的土地，可酌情减免土地产权或土地资产收益税赋。”

其实就是两块，一块是财产税，一块是收益税，国家对居住必需的土地之外的所有土地产权征税，我们建议税率为该土地市场价值的1‰。或者，对土地资产的收益征税，税率为土地资产收益的2.5%。财产税和收益税是重叠的，所以只能征二者之一。

我刚才通过几个问题把土地法律制度的原则框架大致的介绍了一下，还有很多地方没有介绍到，大家可以再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全面介绍了。

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们的期待。本研究所期待的，是提出有关土地法律制度的真正有价值的原则，并在与其他学者和公众的互动中改进和完善，并最终可以成为进入立法和修法程序的文本中的重要内容。

今天这个文本发布了以后，我们就会挂到网上。而且我们一贯的做法，我们即使今天是开了发布会，我们作为一个理性有限的凡人，肯定是有局限性的，虽然经历了两年多的研究，但是我们还有看不到的地方，请教了很多专家，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局限性，所以不拒绝以后还会对这个文本进行修改，因为土地问题实在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不敢说能够全部的，完全考虑清楚了土地各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努力要把它做完美。

而这些法案，一旦能够通过正当程序，则构成我国有关土地制度的法律框架。这就是我们的期待。

我就汇报到这儿，谢谢大家！

**二、进行这项研究是我们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大家要知道天则所的背景，天则所就是一个民间的机构，跟政府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相对比较超脱。我国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经常是有这样一种想法，“我写的是给政府部门领导看的”，但是我们的定位不是这样。我们最简单的想法，第一，我们是中国的公民，公民有这样的权利，也有这样的义务。法律是什么？法律不仅是政府的事情，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对法律提出他的意见。

天则所的定位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群体，我们对这个社会有责任。天则所是学术性的非营利机构。所谓非营利机构，就是向这个社会提供知识的公共物品，其中包括制度改革方案，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是商业性的机构，也不是政府机构；而我们自认为，我们不是政府部门的任何一个部门及其研究机构，所以我们比他们更超脱。我们对现有的土地法律制度基本是持反对态度，我认为《土地管理法》就是一个恶法，这个恶法是没法改好的。

刚才黄小虎也在批评我，说你们为什么批判《土地管理法》和修订草案呢，那篇批判文章是我2009年写的，我们把这个收在这个集子里，作为一部分，我们不仅是对修订草案提出批判，是对《土地管理法》本身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动机就提出了批判。因为它的动机就是一个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强调管理，为自己争权，削弱公民基本产权权利的东西，所以我们是基本否定的。在基本否定的前提下，我们要提出我们认为的好的土地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都有什么。所以这是我们这样一个课题非常基本的动机。

我们从来没有期待过我们写的东西谁来看，谁会不会接受，这不是我们要想的事情，我们只是想尽我们自己应该尽的责任，我们尽到了。而且我相信现在中国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有互联网，过去很难办，过去递给谁啊？我们现在就是放在网上，让大众看，也可能让政府部门的人看，如果我们的政府部门有一颗公正的心，有一颗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心，相信他们也会看，这是天则所没有向政府要一分钱，也没有向谁要一分钱，我们自愿的，免费的向社会提供的这样一个研究报告。

我们做到这一点就够了，我们只完成我们这个工序应该完成的工作，下一个工序是下一个工序的人去完成，但是他们如果不尽责，他们不完成，我们也没办法。但是我相信一点，任何一个社会的改变，首先是观念上的变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像美国的创立，不是那些美国国父从脑子里蹦出来的思想，是欧洲多少代的著作家们，这些思想家们，他们提出来非常丰富的相关的思想，最后形成的美国《宪法》。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相信这样的事情其实力量很大，只是不见得马上见效，我们也不期待马上见效。

**三、集体组织应是经济组织并且是自愿结合的**

村民小组就是自然村的村民组成的组织，叫村民小组。村民小组即使在中国实行集体化以后，人民公社以后，到了1961年以后回归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队”就是自然村，即使在几十年传统中，它也是作为基础的。现在的法律上比较模糊，农村集体到底以什么为单位，有的地方甚至以乡镇为单位，但是这存在问题，以乡镇政府为单位去出售村民的土地，这样导致了很多问题，很多乡镇政府搞工业园区，导致了很多土地权利上的冲突，它是导致现在重大土地问题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认为应该是集体单位划得越小越好。当时改革之初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就是走的这样的方向，从比较大的单位包到组，组基本上就是比较小了，比村民小组还要小，包产到户就更小了。大家能看到，包产到户带来了非常好的效果。土地也是一样的，有关土地的所有权单位也是越小越好。

再有一点，我们强调这样的态度，这个集体要有定义，“集体”应该有两个性质。第一，它是生产组织，不是政治组织，它就是一个企业类的东西，这个生产组织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不应该由法律来规定，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现在事实上存在某种制度遗产，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农业生产到底该不该，或者土地所有权该不该由集体来拥有，这个不应该由什么样的法律强制性规定。第二，在我们这个《框架》里提到了，集体还有另外一个定义：自愿结合，假如说他们不自愿结合呢？那就分开呗。我们对集体的定义，我们只是衔接现有的一些组织形式，和我们认为理想的组织。今后的集体组织，大家愿意合就合，不愿意合就不合。要看农民到底同不同意，而现在是强制性把大家捏在一块儿的集体组织，这是我们反对的，也不是执政党在文字上承认的集体组织。当初就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一直这么讲，但是实际执行过程中是强制的。现在我们说，就不应该强制的，应该是自愿结合的，没有什么实行得了，实行不了。

最后再讲一点，现在没有实际上所谓的集体所有，现在大家都把承包田看成是自己的田，有谁把这个田看成是集体的田，因为现在连地租都不讲，我们讲的永佃制还得交给田主地租，那叫大租，现在连这个都不交了。农民的土地事实上就是分开的。

**四、这个《原则框架》也是土地制度变革的桥**

首先感谢各位专家提的意见，我一开始也做了表态，即使今天是发布会，但是我们还要吸取各位专家的意见，进一步改进这个框架，现在我们也把它挂在网上，让公众能看到，其他学者能看到，就算是今天的版本。将来要改，可能两个月以后，或者半年以后，还会有一个新的版本，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确实是凡人，会有认识不到的地方。

今天几位专家都提了很好的意见，总体上都是肯定这个报告的，有很多建议还是很不错的，当然有不同的建议，方向比较不一样的，甚至是互相相反的，我们也可以从理解的角度上吸收他们。包括王才亮律师讲到的，有些东西还需要补充，像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不是也要在我们这个框架中考虑。也有谈到“集体”这样一种组织本身是不是就应该是被废弃掉的组织。但是这样的提法，我认为好象有点不能衔接现实。，在我们的报告中，其实已经谈到了，第一我们强调集体是自愿结合的，第二，如果这些集体的成员一致同意，他们去解散掉这个集体，实际上它也就被废弃掉了，没有必要通过法律废弃。这是我们的原则，这一点并不是很冲突。

黄小虎提的一些意见，我们对体制内相关的具体情况，甚至很多苦衷不太了解。我们以后应该更多的去了解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因为我们的角度不同，不见得了解，我们还是能够更多的去了解事实，能够体会他们当时的处境。同时，我也不见得完全同意他们当时的做法就一定是对的，我尽量理解他们。包括当时土地制度的形成，有它的道理，也有中国这样的政治结构下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力量更多的来源于行政部门，而不是来源于和土地相关的农民和广大居民，在这样的不平衡的政治力量下，肯定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是我有所保留的地方。

另外他还谈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解决了从此岸到彼岸的桥的问题，他这个观点还是很不错的，因为他提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把“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过去没太注意这样一条，还可以继续关注，而且能够挖掘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方面有利于改革的资源。

但是，我认为我们这个报告并不是没有桥。我们这个报告，我们这个《框架》我认为是桥。一开始我也讲到这个问题，我们做这个报告以后，我们对比了一下现有的土地制度和现有土地制度的法律文本和我们的主张，可能土地制度的基本原则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的文本并不见得需要非常大的改动，因为我们一开始也讲到了，我们将来是对“国有土地”的内涵做了一个重新解释，我们有时候不需要改变它什么，只需要对它重新解释，而这种重新解释，当然我还会讲，我认为意义非常重大的。

另外包括永佃制的提出，也是这个含义。永佃制的提出恰恰是看到了现在农村土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很类似于我们理解的永佃制。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实际上是非常小的。这里有一篇我的文章，在研究报告的第二章里面有一篇《永佃制的经济性质》，我也做了一些对比，哪些地方是一致的，哪些地方还有缺陷，准备怎么去改。我做了这个研究以后我发现，要改的部分并不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类似于永佃制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研究框架并不是空中楼阁，我们其实是从现实到理想最近的一条路，它其实也是一个桥，这是我的回应。

华新民提到的观点，我同意，我们对城市祖宅，私产这一块关心的不够，以后要加入这一块。

郑司长提到的意见都是比较基本的，他原则上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谈到了英国的土地管辖权和所有权是一样的，跟中国不太一样，我们把主权和产权分开的想法似乎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我的回应是，英国并非如此。英国实际上所谓的管辖权，现在被认为就是一种主权，没有任何产权的含义，过去的保有权现在被认为就是产权，这是英国的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我们的构想也是参照了英国土地这方面的构想，包括很多有关英国土地制度的文献。一个非常经典的文献，是英国国王和新西兰的毛利人之间签订的《怀唐依条约》。一共三条。第一条，毛利人承认英王的主权，二是英王承认毛利人的产权。我们受到了这个两分法的启发。

另外一个参照，中国自己，过去是《中华民国土地法》。这里讲到了领土“属于人民全体，其经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者，为私有土地”，实际上也是这种两分法，虽然这种两分法不是特别清晰。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公有土地”，类似于我在这里讲的，政府依据一种正当程序来获得的土地，政府的土地产权。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某种基础的。

郑司长还谈到了一点，可能是一种误解，我们讲有主权和产权两分法，我们从正当程序获得的土地产权，并不意味着这块土地不是领土，这两个概念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在中国领土上获得了土地产权，这是一点儿也不矛盾的事情。像一个外资到了中国也可以租一块地，也可以买一块地，但是你不能说这块地不是中国领土，领土概念和产权概念是并行不悖的，是两个不同层次。可能有一些误解。

我们这里不存在绝对所有权的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所有权的误解。我们谈到“田底权”，我们并不认为它就比“田面权”优越一些。永佃制其实给了我们启发，田面权和田底权是可以分别去卖的，你可以卖你的田底权，你的田底权并不能支配我的田面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

另外还有产权创设的问题，我们讲的是产权本身创设的法律程序问题，刚才郑司长讲的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小岗村的问题，我觉得这不是产权创设，我认为这是创设产权制度的创设。小岗村跟中央博弈，最后获得的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本身是制度本身的创设。我们说的是在这个制度下，产权怎么创设的。当然在我们的框架里，一种是初始产权的创设，还有经过交易的创设。初始产权的创设，原来就是无主土地，就是一块领土，通过拍卖，通过其他方式，或者通过开荒获得的权利，是不矛盾的。

另外还有一点，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关土地制度确实要抛弃掉意识形态的，否则不能还原真正的土地制度。我不太同意这样一种说法，1949年以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地主土地制度，这是不对的。“封建”是指的从国王分给封臣，封臣分给领主，领主分给保有农，这个制度在春秋战国以后就结束了，之后就是纯粹的土地私有制度，我不同意这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说法，就是私有产权制度，有充分的自由交易的权利。英国的土地制度才是封建的土地制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还原到没有意识形态的，对制度比较纯粹判断的情况中来。

徐老师刚才提的意见，我刚才已经基本上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就是要为中国做贡献，没有别的动机，我们要是有私利的话，做这个事情就有问题，心眼歪了再提供这个框架的话，是误国误民的。

张老师提出的一些建议，我们这里面应该有比较大的篇幅在解决政府浪费土地的问题。一个是刚才讲的，作为主权的国有土地和政府拥有产权的土地分开，对于政府拥有产权的土地要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当然这个限制包括他要遵循市场规则来获得，包括他怎么使用等等等等，它的收益是要上缴的，这些方面我们还是用了不少笔墨。

还有集体组织的问题我都同意，我们的定义，我们在这里是有的，集体就是自愿结合的组织，我们强调是自愿结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集体的发展方向，我们想做一个桥，这个桥是从原来的身份制度变成自由人结合。

另外还有所有权取得问题，我们专门有一章土地登记，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个偏重技术性。其实我们认为土地登记，真正能够确权，把土地四至搞清楚了，然后你发证，他才能够更便利的进行交易，如果没有这样的安排，其实我们的土地产权，第一是比较虚幻的，第二，不利于交易。但是这种土地登记，它是相当复杂和成本相当高的一件事情，而且如果我们要自愿的进行这样的工作，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大家知道中国最早做这样的事情，鱼鳞册所发的地契，后来一直到了民国都是作为土地交易非常重要的依据。英国一直到1925年之前是自愿登记，但是登记的比例非常低，很多人不愿意登记，后来英国搞过强制性登记。最近我们发现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跟一个印度专家交流，他说现在由于有卫星技术，GPS，搞清楚土地的四至非常简单，所以在技术上，比以前要先进得多，成本要低得多。我们也在想，这方面我们在技术上能有什么样的推进，将来如果要做的话，可以用这个技术，这一点将来可以再考虑。

何清涟这个资料我们考虑一下，张老师对她的严谨性提出了怀疑，我们是要考虑的，我们看看能不能找找其他替代的资料。

财产和收益的税率是否严谨，我们其实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我们在25页的说明上做了简单的介绍，按土地资产价值的4%估计的土地资产收益，这个是符合经验的，要是改进的话，只是对经验数据做出调整。按2.5%对土地收益征税，我这里做了一个解释。这里为什么定2.5%呢？我们也参照了过去田赋率，在清代末年的数据大概是2-4%，所以我们取了2.5%的数据来做，实际上4%的2.5%就是千分之一，这两个数如果能定下来，必然是千分之一。我们想强调，财产税和收益率只能两者只征其一，因为这两者是重叠的。这个数据最后是不是真能准确，取决于经验数据，这个计算比较简单，财产和收益之间的换算是比较简单的，关键在于收益率的多少，这个是要经过更多的研究，更多的经验数据来估一个更好的数据。或者还有一种方法，做一个公式，不见得是一个确定的数。但是我觉得假如说是一个法律文本，也可以是大致这样的数，因为很多法律都规定了一个比例，《台湾土地法》说地租率不能超过土地价值的8%，这是台湾土地法规定的，但是这个数一般来讲不会超过，8%是很高的。将来可以再获得更多的经验数据来提供更准确的数据。

我就回应到这儿，谢谢大家！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9月24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土地法律制度的原则框架》报告」发布会的演讲修订稿 ]

## 让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程雪阳**

各位老师好，我是程雪阳，我是盛老师课题组的成员。刚才盛老师的介绍已经很全面了，把我们的核心观点都介绍了，我补充三个小的问题。

第一，我们课题的核心精神跟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基本是一致的，我们讲了那么多的改革方案，核心原则就是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很多人把这个原则仅仅作为一个口号，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要通过这个标准却重新审视我们现有的土地制度。比如说要取消土地划拨，或者是目前减少土地划拨，未来要取消土地划拨制度。再比如说要取消每年的建设用地指标。刚才盛老师说我们要讨论规划的范围，规划的效力，郑司长原来是做中国第一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外观上看是一个规划，但是本质是一个计划，每年都是靠建设用地指标来控制，这肯定是计划体制，不是真正的规划体制。在土地领域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把历史上遗留下来计划体制负遗产给清除掉。

第二，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我想补充一点。大家一直说中国农村有三农问题，农村、农民、农地，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我最近在想，不应该这样定义，三农问题的核心应该定义成农民，我们只有理解了什么是农民，才能理解土地制度应该如何改变。目前在理解农民问题上有两个误区，一方面不把农民当成真正的公民看，把他当成二等公民，你想获得城市户口，或者你到城市居住以后，就必须放弃农村的财产，农村的宅基地，农村的承包地。如果你是一个城市公民，你从北京到上海去居住，为什么你不放弃你在北京的房子，北京的土地使用权，或者北京的不动产，为什么农村的人，他从北京郊区的农村到了城里面，比如说从海淀农村到了城里面，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承包地，放弃自己的宅基地以及宅基地上面的房屋呢？这就是把农民当成二等公民来看。

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给农民“超公民待遇”的特权，只要是出生在农村，就可以基于他出生的原因，给其划拨或者分配宅基地、承包地。城里人为什么不可以基于我出生，就要求政府给我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给我一块宅基地，也让我去盖房子，为什么要我们去买呢?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基于你的出生，比如说你出生的家庭背景好，你就幸运，如果出生得不好，靠自己的努力去奋斗，去获得财产。在土地这个问题上，现在农村的农民不是基于自己的辛勤劳动、聪明才智来获得财富，只要你在这儿出生，就要给你一个宅基地或者承包地，当然，这是理论上的，现实中很多地方已经很多年没有分配宅基地了，承包地因为30年不变，有很多地方也没有再调整了，但我们的制度逻辑依然是要无偿划拨或者分配的

在这个制度逻辑下，因为你的土地是无偿获得的，所以不能让你出售。于是，农村的土地制度在一个错误的体制里循环不出来了。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搞国有土地的有偿出让改革，90年代搞住房的商品化改革，城市里的人因为不动产的确权登记流转获得了很多财富，但是中国农村的改革，农村的土地制度和农民的集体所有，就框架而言，目前还停留在1958年人民公社时代的体制。我翻了一下人民公社时候的规定，凡是迁入和新生的人口不需要交土地基金，凡是迁出的和死亡的也不能带走，把政治成员权和经济成员权捆绑在一起，让农村变得很不正常。中国的城市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行了改革，农村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革，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继续推动农村土地制度在这个方面的改革。以后不能再给农民无偿分配土地了，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如何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呢？就是要对现有的土地进行确权登记。确权登记的第一原则是按照目前的土地承包和宅基地使用现实进行确权，如果翻历史旧账的话，就会没完没了，也不利于安定团结。不过，如果某个地方的多数集体成员反对按照现有的土地使用情况进行登记，那么应当允许他们提出更好的方案，并由集体成员按照三分之二的原则进行表决，表决通过后按照他们自己决定的方案来，这是确权登记的第二原则。确权登记以后，土地就可以自由流转了，所有人出生以后，家庭给你留下来的，你就去继承，家庭没有留下来的，就通过自己的劳动购买不动产，这样的话，城市和农村才能变成一体的。

第三，盛老师报告里提到了很多农村的村干部贪污腐败，还有很多涉黑的，包括深圳最近上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拥有20亿资产的村长，为什么村干部容易涉贪、涉腐、涉黑？中国城市里面的居委会和农村的村委会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为什么中国的居委会就没有那么多的贪污腐败涉黑呢？为什么中国农村村干部就这么容易贪污腐败涉黑？这跟国土系统为什么有一些干部贪污腐败一样，一方面他掌握政治权力，一方面又掌握很多资产，政治权力又不受到监督和制约，就可以运用政治权力把资产变现，而中国的居委会没有那么多管理集体土地和集体资产的权力，也就没有这么多的贪污腐败。

所以未来的改革中，应该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比如说我在这个村里出生的，我长到18岁，就拥有这个村里的政治成员权，我可以选村长，也可以被选为村长；如果我离开这个集体去别的地方定居了，那我的政治成员权可能就会受到限制或者丧失。经济成员权则不同，其不能基于出生获得。如果你父母是这个经济组织的成员，他把他的股份给你，你就可以成为经济组织的成员，如果你的父母不愿意把这个给你，你不能因为出生就获得这个集体的成员身份。

不过，经济成员权一旦获得以后，比如通过继承或者市场交易获得，那就不会因为户籍或者居住地的变化而变化的。只要你是经济组织的成员，你就拥有这个经济组织的股份，就跟拥有一个公司的股票一样，哪怕你搬到月球上，也是这个公司的股东，不会因为你搬到月球上了，你必须放弃你在这个经济组织中的财产。目前这个政社合一的体制是80年代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应该把这个“烂尾楼”拆掉。

很多人说集体土地有社会保障功能，我看是没有的，集体土地完全是农民的自我保障，国家又不给这个集体任何的财产，都是在内部调整，盛老师一直说中国农村土地的分配都是在家族之间分配的，外面的社会不给这个集体任何的财产，都是属于农民互助保障的，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还有人说土地就是社会保障，这个观点很可笑。土地只有投资、耕种、收获以后，才能获得粮食，你给一个70岁的老人一块土地，土地自动就能长出粮食来？自己长不出粮食来，集体土地有什么社会保障功能？

另外，土地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说集体土地所有制不能改垮，农民利益不能受损，我不知道他们这个“集体土地所有制不能改垮”是什么意思。村委会这种政治组织自然是不能垮掉的，但集体经济组织应该像盛老师说的那样，应当允许自由结合。

这是我想补充的，谢谢各位老师！

[ **程雪阳**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9月24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土地法律制度的原则框架》报告」发布会的演讲修订稿 ]

## 城市土地从来私有至今私有

**华新民**

我在网易博客和新浪微博上登了我一些文章。另外最近有一个《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我写了一份意见书，有几座城市的八百多位老宅业主的签名，递给国务院法制办了，核心就是土地，就是天则所今天讨论的土地问题。

有一点我跟盛洪老师是完全一致的，“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是指主权而不是指财产权，但是现在很多人讨论这个事情时，还是从政府拥有土地财产权的角度去讨论的。现在大部分人，全中国来讲，对于“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都以政府拥有土地财产来理解，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在这一点上，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些教授，盛洪老师，我，还有一些人，我们非常明确的认为，“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是一种政治意义，主权意义，行政管辖意义，而不是财产权意义。如果这个起点和前提都不一样，再往后讨论起来就完全不一致了。

我们老说“我国”的土地制度，先不说“我国”是很漫长的历史，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从1949年开始的，但是现在大家讨论土地制度的时候，老是从80年代开始，就好象1949年到80年代之间这段历史消失了一样。2012年我在上海《东方早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城市土地所有权的梳理和追问》，在共识网上有。天则所这文集里收了几篇文章，其中引用的政府规定，有的已经过时了，需要拿新的东西来补正。现在老说过去是计划经济之类的，但别忘了一直还留有一部分市场交易，就是城市祖宅土地的交易。大家别忘了，这些土地并不是荒地。1982年《宪法》之前，有大量的私地，这些私地政府从没买下来，因此没有权利在上面任意规划或者是卖给他人。

我在上述意见书和这篇文章里都谈到了一个谎言，涉及到1990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和最高人民法院之间一个函件的内容。我先解释一下：1982年《宪法》之前公民有属于自己所有的私地，比如说四合院，地是哪儿来的呢？是张三从李四那儿买来的，当时都是分别有地价，有房价，土地有民国时候买的，也有1949年到1966年之间买来的，花钱买的这个宅地是什么性质呢？是私人财产。那么私人财产你或者是征收，或者是没收，或者是另外一种转让，但不可能悄悄的就没有了，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1990年的这个函件，为了表示存在过这么一个程序，就说上海市人民政府在1984年发布了公告，对城市私有土地进行了申报办理土地收归国有的手续。后来我经过调查，这个公告是不存在的，也没有私房主办过私地收归国有的手续。更不要说全中国都没有过，就是上海也没有发生过，但是却把一个莫须有的事情编造出来放在这信函里面，并且后来成为一个法规内容，成为1990国土法规字13号文，就是变成城区老宅主“自然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依据。但是实际这“自然享有”没有出处，私宅到现在也是土地所有权，这是非常清晰的，也不是今天才有土地方面的规定，我在我的微博上登了1951年北京的《房屋土地登记规则》，以前一直都有私地的，民国时已经有过法规和严格的登记，以后也一样，五十年代政府还在报纸上做过产权公告，有具体的业主姓名和宅院门牌。说说这个“收归”。收归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收！如果直接告诉你：你的财产被没收了，使用这个词汇，那么感觉会就很强烈了，不会接受，凭什么没收我的财产？我犯什么罪了？而且没收的话，法院要有判决。我们看到50年代是有过法院来判决没收私人四合院的，先且不说它判决的对错。到了1966年，那是红卫兵行为，不是政府行为，文化大革命没有没收过一处私人的宅院，当时把《房地产所有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的《房地产所有证》，是土地所有权，强迫房主交到房管局，并且至今都在房管局的抽屉里。1982年宪法以后，如果退一万步，如果你“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是财产权的意思，那么已经存在的这部分土地财产应该是不包括在这里面的。另外，如果这句话本身就是虚的意思，是行政管辖，那就不单涉及到祖宅业主，而是所有业主了。

我们针对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已经递交给国务院法制办，这个意见最后是这么说的，希望国土部印制城区私人土地所有权的证，因为是继承了自己家父辈已经登记的土地所有权。我们的土地所有权没有被征收过，也没有被没收过，但现在具体怎么继承呢，你们现在说的都是“使用权”证，2002年北京给祖宅家族发了几百份所谓“使用权”证，但内容里都是开天窗的，上面的土地性质也就是土地来源，是空白的，土地期限一栏也是空白的，因为政府不知道怎么填写，这“使用权”不是出让取得也不是划拨取得的，北京市国土局向国土部去函问怎么填写，至今也没有得到答复。实际上这很清楚，根本就是所有权，就是私人土地所有权，但是就不明确的挑明。

对于老宅的土地，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4年讨论城市私宅土地的时候，也表示了不是划拨取得也不是出让取得，另外还决定，如果老宅的主人现在把宅院转让给另外一个人的话，那个人也不应该向征服交土地出让金，为什么呢？因为这土地不是从政府那里来的。原来土地一直是自由交易的，文化大革命前是自由交易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也是自由交易的，跟政府没关系，政府的工作就是做做登记。可是2010年以后，北京、上海等有些城市却擅自要求私房主交土地出让金，私房主不愿意交，为什么交？地又不是从你那里来的！现在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而且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私宅都是自己修自家的院子，现在没有土地证，没法得到工程许可，没有工程许可就没法修缮宅院。现在很多私有四合院的主人面对这个问题，突然规定让我交土地出让金，我为什么交，一个是改变了我的土地性质，从永久的产权变成了70年，而且我交不着，这个土地又不是从你那儿来的，很多稍微明白一点的人都不交，但是这样的话，也拿不到土地证，也修不了房子。此时此刻，北京市国土局已经打报告给国土部，没有答复。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应该找谁去说，国土部有什么人回封信也好啊，他可以说暂时先这样，还是继续空白着，起码先让我们修房子或者买卖房子，先让我们过日子！但是话说回来老这么空白也不行啊，这涉及到很多人的民生问题，很多人年纪都大了，文化大革命也受到过迫害，现在天天还为房子的事着急！

比如说齐白石，齐白石他家在跨车胡同的宅院，现在家里后人还在那儿，房屋还在，但那个院子的土地早就被政府卖给开发商了，政府凭什么卖？那个地不是荒地，那是一个私人宅院，齐白石怎么得到那个院子的？是一幅画一幅画画出来的，用卖画的钱买下来的。

我们的财产，现在很多老宅子，政府总是通过没有法律依据的政策、文件来应付，虽然同时也有法律，但是现实中行政部门都一律不理睬法律，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告，也不理睬。最高法院在2008年就表示废除了原来不让经租房主后人继承经租房的规定，那个规定是1964年做的，而且当年法院也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政府的某文件。现在都废除了，可以继承。于是当事人拿着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告到建设部去，要求取消若干年前一个侵犯祖宅主人权利的文件，但建设部却说：最高人民法院出这个也不跟我们商量商量。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还有北京东城区，已经和正在给私人宅院里房管局盖的违章建筑发房产证，给在别人的私地上盖的那些野屋子发房产证，好变成房管局的财产。

我这篇意见书最后是这么表示的：土地才是不动产，不动产最根本的是土地，核心是土地，不用修改1982年《宪法》也可以继续给老宅主人制作土地所有权证，因为所有权从来没有丧失过，要是没收财产，要有一个告知，告诉犯了什么罪，要是征收，你得给钱，这是对老私宅的主人。

对整体中国业主来讲，就需要修改《宪法》，因为我认为将来都是应该有一个所有权证，所谓的使用权是非常荒诞的，全世界哪里有？香港有，但香港是很特殊的地方，这事情有特殊的背景。从中国大陆来讲，从历史上来讲，一直都是跟欧洲一样，私人的土地所有权。

这件事情，天则所写的这些，可能对有些城市方面的老宅这一块儿还是说得太少了，而且也缺乏一些实例，因为都是一些专家学者写的，理论性很强，缺少对正在发生的实例的描述，应该补充一下。

还有，我认为有一些误区需要纠正，我还是觉得这些学者应该跟发生问题的老宅主人有一些接触。其实每天都发生情况，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天都在出很多问题，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有的时候，甚至在私宅院里，街道办事处的人跑进去跟有的房主肉搏，抢宅地。现在绝大部分老宅主人没法去法院，法院一方面说我会保护你，另外一方面又有什么文件，表示不受理老宅子的诉讼，让老宅主人找欺负他的行政部门，结果就是走投无路。

我就先说到这儿。

[ **华新民** 著名土地维权专家，致力于北京胡同保护工作。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9月24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土地法律制度的原则框架》报告」发布会的演讲修订稿 ]

## 我对土地制度改革有信心

**黄小虎**

  收到这个稿子以后，抽时间看了一下。我感觉这篇东西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涉及到制度，涉及到政策，涉及到经济，涉及到政治，涉及到一般的制度，也涉及到一些基本的制度。我个人知识结构、水平、能力可能难以做一个全面的概括，我选一个角度，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谈谈对原则框架研究的几点意见。

       第一点，对现行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改革的方向，比如说公平补偿、统一市场、政府垄断等这些问题上，我个人的看法与你们的框架研究有不少的共同之处。我2012年承担了清华大学委托我的一个课题，题目叫“征地制度改革问题研究”，这个课题我去年完成，其中我有很多的想法和你们有共同之处。

        第二点，我的看法和你们的框架研究可能还存在一些差异，大概主要有这么几个：

       1、因为我是过来人，俗话说的体制内，现行的土地制度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摸出来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还原到每一个历史节点，当时恐怕很难做别的选择。

       我举一个例子，国有土地90年代初出了一个《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条例》，这个《条例》出来的本意是推动土地由过去的计划分配转为到市场配置。但是这个《条例》出来以后，当时就有学者提出来，政府又管地又卖地，等于又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里面有问题。我92年刚到土地部门，当时叫国家土地管理局，我听到这个意见以后，对当时的土地局长王先进说，恐怕咱们的办法有些毛病，社会上有些学者有些意见。他听了以后对我讲，你这个意见对，有道理，但是现在做不到，没办法。他为什么这么说？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制度推动实际上是困难重重，阻力重重。推了十年，没有在全国确立土地有偿使用的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就是无偿配制土地，包括北京市一直到1999年，2000年还是以划拨土地为主，就没有搞有偿使用土地。当时的北京的土地是张百发管，把土地划拨给城建集团，这儿修一条路，那儿架个桥，那儿搞个广场，这叫实物地租，肉烂在锅里，这多省事。你现在搞什么有偿使用，还得让我拿钱买地，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所以北京市根本推不动。不仅是北京市，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主要精力就是两件事，一个是耕地保护，二就是怎么推土地有偿使用。

       推了十年推不动，就是说并没有在全国全面确立这个制度，所以这个制度本身的弊端就被掩盖了，没有表现出来，或者表现得不突出。到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那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政府机构改革，撤销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国土资源部，这可大不一样了，国土部是政府的组成部门了，过去的国家局是副部级，北京市算什么级啊，书记是政治局委员，单位和机构的级别在官场上是起作用的。一个是规格高了，另外像张百发这样管地的人统统下去了，新上来的干部没有过去计划经济的那种管地的经历了，国土资源部从98年开始，在全国全面的确立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制度本身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而且越积累越多，以至于到现在矛盾如此尖锐，刚才盛洪也做了很多的分析。

       但是回过头来看当时，在推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那个时点上，能够把经营和管理分开吗？国家土地局在推有偿使用，推还推不动，土地的经营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土地部门来管了。我举这么一个例子，这个制度的形成有它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一点，你们的研究框架似乎不认可，我不敢确定，我觉得不认可。

       2、如果说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很大成绩，恐怕也不能够否认土地制度在这其中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当然，什么事情都是逐渐的走向自己的反面，现在还这么说，当然我是不赞成，但是历史的看，还是应当肯定有过积极的作用。对于这一点，你们的研究似乎也不大认可。

       3、框架研究比较详尽的描绘了彼岸的重要性，将来要建立一个什么东西，我把它称之为“彼岸”，这是有重要的价值，首先我是肯定它的重要价值。但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身处此岸，我们怎么样走到那个彼岸，要经过哪些步骤，怎样一步步达到那个彼岸，这个问题也需要深度的探讨，如果不解决桥的问题，在这个桥上一步步的走向彼岸，就只能采取休克疗法。恐怕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

       我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解决了桥的问题，架起了一个桥。长期以来，我们所探讨的征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土地市场的改革不能取得突破，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触及政府经营土地这个深层次问题，政府又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一身二任，政府的管理部门，特别是同一个管理部门，又管理又经营。十七届三中全会也提出来统一市场，征地制度改革，为什么不了了之呢？原因就是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不是部署全面改革，而是侧重于农村改革，因而就不可能涉及到政府职能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解决，其他相关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来要把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分开，这个改革如果实施，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府经营土地的问题。到那个时候，其他的相关土地制度的改革就船到桥头自然直，顺理成章了。

       但是实施把管理者和所有者分开这样的改革，还需要创造条件，把握恰当的时机，这恐怕还要经历一个过程。比如说，要取消土地财政，就必须要有财税体制的改革来取代它，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你的财力从哪儿来，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什么样的土地能进入市场，农民愿不愿意进入市场，恐怕跟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有很大的关系。现在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不动产统一登记等等，说句实话，推出的速度之快超乎了我的意料。我感觉到大概过不了几年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成效。

       这些做法都是为土地制度根本性的改革在创造条件，现在这些改革已经推出，从中既可以看到中央改革的决心，也可以看到土地制度改革的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基本上比较清楚了：先易后难，先单项后综合。三中全会决定里没有一个专题是土地制度，但是它是把现行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都分解到其他的题目里去了，这个思路本身就表明了中央认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的，它需要一项一项的推进，最终才能够把这个问题根本解决，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土地制度改不改，怎么改，什么时候改，说实话，国土资源部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就是一个具体的工作部门，这件事关键在中央。我认为中央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解决了桥的问题，但你们的框架研究似乎对这个认识还不足。

       最后还有一点意见，供参考。这个框架研究主要是针对2009年的《土地管理法》的“修订草案”展开分析，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太恰当，我作为国土资源系统内的人，更早一些的讨论倒是参加过一次，但至今也没有看到过你们拿到的这个草案。这说明有关方面很慎重，一个内部讨论的东西不能最终代表他们的意见。我今天上午刚听说，他们最近又搞了一个新的《土地管理法》修改的稿子，据说只有极少人知道这件事。很可能经过三年以后变化又很大了，究竟拿哪个作为评论或批评的依据呢？恐怕还是要以公开发布的为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公开性实在是太差，有点神神秘秘，以至于天则所只好拿着内部的稿子来做靶子，有针对性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对此也可以理解。

[ **黄小虎** 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咨询委员 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9月24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土地法律制度的原则框架》报告」发布会的演讲修订稿 ]

## 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应当实事求是!

**王才亮**

那天会务组把报告发给我了，我认真读了，我感觉这个报告总体上代表了国内当前对土地制度研究的先进水平，有很多观点让人耳目一新。过去有一个特点，学者讨论归讨论，网上发牢骚归发牢骚，发完了讲完了就没了，这个是把很多讨论争论的问题理出了一个思路，并且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对这个报告总体上我是予以肯定的。

同时我也有三个想法。总的来讲，对于土地产权的问题，我认为是当前中国绕不过去的问题，我们现在认定的土地权属按照《宪法》规定是土地公用，城市所有，农村归集体所有，这两种形式已经过去了32年，中国的客观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进步不快，但经济领域的活跃是不以行政长官意志为转移的。既然改革开放了，国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决定并且推动上层建筑的变化，土地制度，土地法律制度毫无疑问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发生变化也是必然的，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应当实事求是!这里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土地私有的问题。现在土地私有是禁区，不能说，但是社会实践当中，定为红线，定为底线都没用，客观的情况，土地已经在私有。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这个集体并不仅仅是指村委会这个级别，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还包括过去集体经济办的那些乡办企业，乡办企业是持有土地权证的。这种企业随着改制之后都变成个人了，很多地方虽然没有变为个人，但实际上也是个人的。而且乡村企业的土地，企业的厂房，企业的财产可以抵押，可以流转，按照现在的做法，流转的时候变成了使用权，如果不流转呢？实际上是已经私有了。这个问题，长期的掩耳盗铃不能解决问题，既然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经济成分发生了变化，经济成分的多样性应该体现为作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土地上，土地产权多样化。

在我们讨论土地私有，提出这个主张，是在2005年大规模讨论物权法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考虑到当时人大没有修改《宪法》的计划，所以在《土地法》的起草和最后定稿当中，大家做了一个妥协。其中对个人住宅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来了一个到期自动延续的说法，没有讲到土地私有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已经是国有的土地，显然不能大规模搞私有化，分给个人，但是通过出让，通过转让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能否变为个人所有呢？我觉得是可行的，至少在当前来讲，不会引起政治上太大的动荡，我们的确在房屋和土地的管理上一直有困扰，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遇上发生纠纷的时候，始终面临着这个矛盾，房屋所有权我们希望它的寿命越长越好，而土地权益，按照《土地管理法》希望越短越好，短了政府可以再卖一次钱。矛盾不可避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是绕不过去的问题，这个文章网上公布征求意见的时候，这个问题很可能会是一个热点。

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讲国有土地是谁的?这个稿子最好的特点之一，向社会讲清楚了一个社会学、政治学上的常识，国家不一定当然就是政府，政府也并不一定当然就是国家，政府仅仅是国家要素当中的一种。我们过去长期认为政府是国家，政府官员就代表国家，现在需要把这种错误理念纠正过来了。但是我们现在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始终困扰着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有也是多层级的。比如说《预算法》当中讲到的国库，中央政府有国库，地方各级财政也有国库，理论上都是国家所有，土地也是这个情况，理论上是国家所有，实际上各地政府在管着，在用着。各级政府之间如何来划分权利义务管理，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政府跟政府之间，下级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现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了，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土地制度单从经济制度方面恐怕很难推动。一级政府不仅是下级服从上级，更重要的是对辖区里的选民负责，这个社区政府才是有民意基础的，才能长久。现在在处理中央和地方，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不同层级方面，如何划分权利义务现在是一塌糊涂，土地出让金的收益有一个分配比例，但是将来土地使用权方面如何划分权利义务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在这个文章当中，基本解决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政府要用地也得按照公平交易来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能否补上这一课，这就更完备一点。像大的项目，跨很多省，中央决定的，各省、各地市也应该有一个层级上的权利义务。

第三个问题，我们现在提公有，其中一个重要形式是集体所有，这个概念太过时了，我认为现在不应该再提集体所有，将来新的法律制度应该是一种法人组织所有。法人组织所有是临界于公有和私有之间的状态，本质上是私有，你是一个法人组织，法人组织是由人组成的，无论是有限股份还是无限合作，最后都是个人的权利义务在承担，除非你是国有企业，国家投资，尤其是单一性的国家投资企业，除此之外，都可能是私有。即使是国有占主导地位的，允许私人股份在里面，也是私有。能否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把集体所有权废掉，改为法人组织所有。

我学习完这本书稿以后，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我感觉这三个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争论很激烈，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能否一并考虑进去。谢谢！

[ **王才亮**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拆迁法实务专家。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9月24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土地法律制度的原则框架》报告」发布会的演讲修订稿 ]

## 立法制度问题改也难

**徐更生**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所以看完这个课题报告后有点儿迷茫。看来，这个报告是针对《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意见稿》提出来的课题组意见，它也代表了部分学界方面的意见。我本人是同意这个报告的观点的，因为它的研究方法与我本人的十分相似。我在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时候，因为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换句话说农业的发展是有其自身规律的，要想让农业发展更快一些，就必须研究本国以及各类国家的农业政策及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中研究和总结出农业发展的规律，这样才能使本国的农业发展少走，甚至不走弯路，从而早日使农业得到快速发展，使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早日实现城乡的一体化发展。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就发现中国土地法律规定与农业发展规律不相符合。因此我在看这的报告的时候很有同感。

但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发现，在中国像《土地管理法》这样的“问题法律”比比皆是。《土地管理法》只是我国“问题法律”的“冰山一角”。然而，它在中国问题法律中具有代表意义。

为什么我国竟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法律”呢？

我曾看到过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制定《宪法》时的一次讲话。他的大意是：他根本不相信《宪法》，只是那些人要，那就给他们制定了一部“宪法”。在“文革”时期，他也曾多次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之类的话，鼓励民众起来“造反”。他的这种思想和态度对国家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在国家法律制定方面，我曾有过两次亲身经历。第一次，记得在1991年初，我受聘担任制定《农业法》的专家组成员。在专家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很多专家要求领导明确我国农业发展的思路以及要制定一部什么样的《农业法》。在第二次会议上，会议主持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农业法》就是要在现有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把有用的条文归纳一下编成为法律。听了这种回答以后，我就不辞而别了，再也没有参加过会议。另一次是在2002年晚些时候，我再次被聘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专家组成员。在第一次会议上，很多专家几乎一致表示：一是不同意制定“合作经济组织法”，而建议制定“合作社法”，因为所有合作社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制定各种专业合作社法；二是我国需要制定的是“合作社法”，而不是“合作经济组织法”。因为合作社是国际公认的组织，而“合作经济组织”是一个含糊不清的词，以致有一阵有的高层领导人把中世纪的行会式组织也称作是“合作经济组织”。专家组几乎一致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但是这两个要求一直没有得到领导上的认可。直到2006年10月中旬，即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通过的前一周，农业部的一位领导喜形于色地来电话告诉我说：“上级领导终于同意使用‘合作社法’了”。所以这个法律名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最终被改为《中国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由此可以看出，在上世纪90年代，立法当局对于立法基本上还没有太大的感觉，只能在现行的政策法规基础上“挑选”、“归纳”成为“法律”。十多年以后，领导的认识和态度确实有了进步：首先，合作社是中小生产者和消费者进入市场的国际公认的组织形式，各国的合作社法已经十分规范，因此专家组内争议不大，但是提了很多意见；然而，在理发的整个过程中，始终看不到领导对这些意见的正面反应。但在法律整个制定过程中却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领导”的决定性作用。有意思的是，在专家组最后一次会议的饭局结束后，法制委的一位领导问我：“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反对政府怎么办？”这似乎反映出领导对于法律的一种忧虑感。

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经常接触国内外的许多法律文本。相对而言，我的感觉是我国法律的成熟度远不尽人意。在这方面，《土地管理法》只是一个典型。中国法律问题在哪里？

问题之一是中国法律的随意性。如上所述，任何事情都有其自己的规律，不仅经济发展是如此，即使政府管理也是如此。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无论各国国情有多么千差万别，但它们对同一种法律都会有很大的一致性（规律），只有把它们的共同点与中国的具体情况（国情）结合起来制定的法律就会是一部不错的法律。一部只有既符合遵循某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又符合本国的真实国情的才能是好的法律。在“规律”和“国情”之间，事物发展“规律”始终是第一位的，而“国情”则永远是第二位的。可惜的是，我们往往在过分强调“国情”的情况下，急于求成地制定出来的法律会有太大的“与众不同”，这种法律最有可能是“问题法律”。那种一味强调国情而忽视规律制定出来的法律是走不出“中国式道路”的。

问题之二是法律往往带有部分利益色彩。纵观世界各国，法律都是由国家的立法机构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制定出来的，是不能夹带有任何个人或集团利益的。但是我国的法律都是有主管机构或部门牵头起草的，而且最终必须得到“领导”的批准。上面所说的《农业法》是由农业部牵头起草的，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则是由农业部和供销合作总社分别牵头起草的两个文本的基础上合二为一的。因此都可以从法律文本中看出主管部门的旨意和利益的痕迹。这是立法之大忌。这种法律一旦通过并付之实施必定产生偏差。

问题之三是采用封闭式制定过程，缺乏公众的直接参与和监督。在国外，法律的提出和制定过程中，不仅要经过实业界和法律界的反复争论和讨论，而且也要反复召开各种听证会汲取各界人士的质询和意见，并且在吸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才有可能成为法律。现在，国内也开始采用“听证会”的形式来听取“民意”了。但是在国外，有关法律听证会的消息都会在报纸上公示，社会上所有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自由参加，听证会的主办方不能指定或挑选某些人出席。因此在听证会上，除了法律提案人（提案方）以外，持反对意见者往往占绝大多数。因此法律提案人需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意见。而中国听证会的参加者最后都是由主办方挑选的，因而就会出现全场只有1人持反对意见的尴尬局面，从而成为人们讽刺“中国式听证会”的笑柄。同样，这还显示出主办方对民意的不自信。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问题法律”不是对立法的知识或认识问题，而是比法律知识更深的意识形态和立法体制问题，因此不是那么轻易得以改正的。不仅如此，这种立法体制也把法律制定变成了少数人的“专利”，从而致使国内广大民众对立法和执法养成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几乎很少有人去关心与立法有关的事情。这是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重大障碍之一。

总之，在目前的体制下，中国立法体制的改革不可能因为一篇关于《土地管理法》修改意见的报告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但是，这个报告确实有可能让它的读者们开始关注中国法律的现状及其问题，有利于提高公民对立法和执法的法律意识，也有助于中国未来法治社会的建设。我相信这个报告一定会在这个方面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 **徐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9月24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土地法律制度的原则框架》报告」发布会的演讲修订稿 ]

## 对《框架》的几点意见

**张 曙 光**

我觉得这个稿子比过去几稿有很大的进步，有些问题讲清楚了。我有三个意见。

第一，既然叫土地法律制度框架，应该讲永佃制，应该明确，其实有些法律用语是可以用的，因为它确实是用益物权，不是债权，既然是用益物权，在这个基础上，把用益物权做实，恐怕是现在法律制度应该解决的中心问题。从这个角度上去说，可能能把问题讲得更清楚。

第二，虽然是讲土地的法律制度，我觉得现在国有土地可能是非常大的问题，国有土地实际上是无主的土地，无边界的土地，浪费最大的也是国有土地，因为集体土地有个承包权承包到户里家庭，如果土地价值升值了，承包人还是很重视的，国有土地没有主、没有边，其地政管理基本上无人管理。

但是国有土地没有明确的边界，没有具体的主体，恐怕主体还得落实到具体的持有主体上去，现在国有土地的浪费很大，寻租的机会很多，腐败的机会也很大。我们可以看看为什么那些将军别墅能够大量盖起来，什么原因？恐怕与国有土地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关于集体土地，我在考虑一个问题，实际上集体所有制是一个传统的身份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还讲到了集体成员权的问题，我觉得恐怕这个问题在这里面不解决的话，很多圈子都绕不出来，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土地制度改革能做得好吗？

再讲三个次要的问题，所有权取得的问题里面，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恐怕需要来考虑，所谓赋权颁证，这个问题不涉及恐怕有点问题，赋权到底怎么说，能不能给一个解释，理论上应该说清楚。

第二个问题，建议不要使用何清涟这个材料，第7页上，根据某些调查，68%的农民找不到工作，他现在在美国，根据什么调查呢？第二，我和他有一些笔墨官司，这个人学风不严谨，只要对自己有利的材料都可以拿来用。既然如此，建议不要用这个材料，他现在也不在国内，调查什么呢？

还有一个小的问题，第25页，关于土地资产收益的征税问题，你给了两个办法，一个是按费率为土地市场价值的千分之一，第二是税率为土地资产收益的2.5%，这两个东西是不是相近或者相等，税率上的这种问题，因为资产收益和市场价值有些东西的变化很大，当然你是相对数，但是市场的状况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对这个问题来说，有计算可以，没计算，这么给出来的数据，可能有问题。

我就这些意见，对不对供你们参考。

[ **张曙光**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9月24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土地法律制度的原则框架》报告」发布会的演讲修订稿 ]

## 研究土地法律制度原则要采用《物权法》通用的大陆法系的概念

**郑振源**

今天是这个课题的发布会和研讨会，作为课题发布会，这个研究报告，对土地法律问题做了全面的研究，很好，提出现在的土地问题，提得很准确。提出的一些改革意见，原则上，我完全同意。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会来讲，对于研究报告的思路有点意见，提出来探讨一下。

盛先生主张现在的土地管理法应该全部推倒重来，不是《土地管理法》的修改问题，应该推倒重来。我觉得不能把现在的法律概念都全部推倒重来。现在的法律概念是大陆法系的概念，不能以英美法系的概念来替代大陆法系的概念。盛先生把英美法的概念用到中国来了，这就出现一些问题。

1、对领土、土地的概念。按照大陆法系的概念，领土是政治管辖权的概念，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都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960万平方公里享有主权，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管辖的范围叫做领土。土地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财产权的概念。

英国的法律土地是有双重所有权的，全国的领土都是英女王所有，管辖权跟所有权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不能说中国的领土都是国有土地，这跟我国国有土地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也不能把土地的概念分成国家形式主权的土地和自然人和法人拥有和行使产权的土地。在自然人、法人拥有和行使产权的土地上，国家就没有主权了吗？这个分类不大恰当。在中国的大陆法系上，主权、治权、所有权有很明确区分，主权、治权是统治权的概念、管辖权的概念，所有权是财产权的概念。有的学者按英国法律的概念把治权叫行政性的财产权，这跟中国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把英国的法律概念挪到中国来。

2、把法律分为公有领域的法律和私有领域的法律，公权只能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不能侵犯私人领域。这个说法也不恰当。我们对土地所以要有统治权（治权），具体来说，一是产权的立法权，二是规划管制权，三是征税权，四是征地权，是这四权。英国法律里，认为这是行政性的财产权，同中国是不一样的。英国法律上，土地的产权都是对土地拥有的权利，中国的法律体系不是这样的，所有权是经济意义上绝对的所有权，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种权能。把所有权的一部分权能，一部分占有、经营、收益、处分权分离出来，作为用益权给他人使用，按使用目的分作宅基地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用益权和所有权不是并列的，只有一定范围的权能。所有权是自物权，用益权是他物权。行使治权（公权）就是保证公民有合理的财产权（私权）同时防止行使私权损害他人利益、公共利益。

3、盛先生把产权的创设和取得混在一起，说产权的创设，有两种创设，一种是市场交易创设，一种是习惯创设。这也不妥。中国的产权可以是权利主体共同博弈的结果，创设一种新的产权，如承包经营权，不是习惯创设，也不是交易创设，而是小岗村的农民跟政府进行博弈而创设的。但是产权的取得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可以是祖上传下来的，也可以是政府划拨得来，也可以从市场上交易取得，所以不能把产权的创设和产权的取得方式混为一谈。

[ **郑振源** 原任国家土地管理局规划司副司长，研究领域主要在土地资源、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制度和政策。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9月24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土地法律制度的原则框架》报告」发布会的演讲修订稿 ]

2014-10-

## 土地法律制度改革的重点：一是赋予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平等的产权，二是改土地计划配置制度为市场配置制度

**郑振源**

下面我谈谈土地的法律制度改革的看法。我认为土地法律制度都是土地制度在法律上的体现，或者说土地制度用法律来加以规范化。土地制度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土地所有制，土地产权制度就是土地所有制的法律体系。另外一个是土地资源的配置制度，一般称为土地管理制度，土地管理法是土地管理制度在法律上的体现。

先说土地产权制度，在不同的所有制下有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为什么土地所有制会发生变化呢？根本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市场发展的结果，新的土地所有制的发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益主体利益博弈的结果，第二种是意识形态强制性变迁的结果。中国的土地制度，从封建地主所有制变到农民土地私有制，这是一次意识形态强制性变迁的结果。第二次从农民私有制变成集体所有制，也是意识形态强制的结果，并不是利益博弈。政府运用政治权力强制性地进行了所有制变迁，它的经济效益并不好，集体所有制搞了20年，粮食问题都没解决，城市土地国有化搞了20年，土地的经济效益也很差。改革开放以后，重视经济效益了，小岗村的农民跟政府博弈的结果，土地公有公用的所有制改为土地公有私用的所有制，这大大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

现在有些专家学者提出全国土地国有，也有的提出要土地私有。这两种形态在现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下都不可能。共产党就是以消灭私有制起家的，《共产党宣言》讲，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消灭私有制，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说这不是搞资本主义，是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因此，要全部实现土地国有，农民不干；要实现土地私有，共产党不干。现在最好的办法，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就是把土地公有公用变成公有私用，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出路。

《宪法》已经说了，城市土地国有，就不能改变了。私人住宅用地国有化，是意识形态暴力的作用，但《宪法》不改，这种情况也改不了。

现在我们研究土地产权制度应该研究在土地公有私用制度下土地产权应该怎么样，不要把永佃制放在一起来讨论。永佃制是是封建地主所有制下无限期的租赁制，地主的田底权就是他的所有权。佃户拥有的田面权就是用益权，在中国现在的土地所有制下，不可能实现永佃制，我只能够把经营承包权，从现在的有限期的经营承包权改成无限期的经营承包权。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集体所有制和国有制，两种所有制不平等，这不是看不起农民，而是他们的产权就不平等。我们改革的方向，要求集体所有制跟国有制拥有平等的产权，这个建议才是中央可以接受的。

第二个问题，土地管理制度的法律。土地管理有两种含义，包括经营管理和，行政管理，准确的说应该是土地配置制度。现在我们的土地配置制度，1998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规定政府行使规划权，把所有土地都放在指令性规划、计划控制之下，一切土地都要按规划和计划来使用。这个计划配置制度效果很坏，研究报告里所提的种种土地问题，都来源于土地计划配置制度。我写过几篇文章说，现在造成的七大土地问题，根源都是在计划配置制度造成的。因为计划配置制度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束缚土地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要修改《物权法》，对集体所有土地的产权重新立法，重新规定。第二，对政府的规划管制权要改，计划规划的功能要改，不要把计划规划作为土地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按照三中全会的决议，要让市场成为土地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计划规划是土地资源市场配置的调节手段。

二是规划编制方式也要改，不要政府制定一个规划，然后大家去执行，而要改成公众参与式的规划，由跟规划有关的人一起共同制定。意大利一个城市规划专家说了，城市规划不是法律，也不是科学，城市规划就是一个协议，一个合同，有关人士坐下来协商订下来的一个合同。

三是行使征税权的形式要改。现在土地管理制度改不动，很大的原因，现行财税制度和政策造成的，把土地出让金收益当作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最大的源泉，现在地方政府搞城市建设都要靠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收益是集体土地的地租，政府把农民集体土地的地租拿过来，变成政府的财政收入，用这个财政收入来建设城市。这个财税制度不改，土地产权制度就改不动。

行使征地权的形式也要改。报告里讲了很多，我都赞成。

我就说到这儿。

# 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

## 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纪要

2014年5月6日至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在京举行。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一个以经济学为主的研究机构，希望为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一个较好的平台，集中讨论近年来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故而发起组织了本次大会。

大会主办方包括：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董辅礽基金会、华南农业大学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天经济研究中心。

5月6日上午8时30分甘德安院长宣布大会正式召开，主办方代表人茅于轼、史正富、毛振华、罗必良、陶永谊分别致辞。

茅于轼教授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提醒学者对目前经济学学科分化隔阂而缺乏交流的现状，增加彼此的交流和分享是很重要的。毛振华理事长讲到董辅礽基金会一直致力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所以支持天则经济研究所为本次大会做的努力。史正富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实践已经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创新机会，所以中国的学者应该走出悲情意识，用互相学习的心态面对经济学家内部的分歧，就能推动学术进步。罗必良教授认为分工没有交易会引发严重问题，但是分工又会产生交易成本，所以本次大会就是一个好的交易平台。加上参会的不仅有综合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还有民间组织和机构，这些主题的跨界和碰撞能为中国理论创新做出应有的贡献。陶永谊研究员认为在经济理论上被我们顶礼膜拜的发达国家也出现了金融危机，中国如何走向复兴之路需要有理论创新与之相映成辉。

5月6日的研讨共分为七个单元。

第一单元主持人为林毅夫教授，汇报人为黄有光教授，点评人为陈平教授。黄有光教授的主题为“如何举行理论创新”。他认为创新有两个重要要求，一是要能解释实际经济运作，二是要能对政策有指导意义。为了做到这两点，在分析问题之前做合理的假设便是重要的。他提出了一个是否接受不现实理论假设的方法论，即要看假设是否会误导所要研究的问题本身。比如同样是将一辆车假设为一个质点，在计算从北京到上海需要多久的情况下是合理的，在计算穿越红绿灯时撞车的概率时便是不合理的，这就是由于后者的情形下质点的假设会误导结果。他还列举了经济当中“代表人”（representative person）的例子，即假设每个人的偏好和禀赋一样，在用“核理论”分析一般均衡时是合理的，在分析分工（亚当斯密，杨小凯）时也是没有误导性的，所以是可行的。之后一个例子是封签拍卖理论中，用每一价格水平上的叫价平均分布假设，来推导出“第一价格”方式和“第二价格”方式是等价的则是有误导性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科斯用“全有全无”假设反对对污染收税也是有误导性的。那么，怎么来判断假设是否对问题有误导性呢？黄有光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综观经济理论”，即要用常理和直观来看它是否有误导性。

陈平教授作为点评，同意黄有光教授提出的判断假设的标准。他本人不同意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方法，比如在做回归分析并预测时就无法假设经济结构不变。陈平教授举了两个例子进行补充，一是宏观理论中的IS曲线在开放经济情形下失效。第二个例子是当代经济理论只讲消费方，不讲供给方，是“半边经济学”，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经济波动的基础不在微观也不在宏观，而在于中观，即金融及产业结构。

随后，盛洪、高王凌、孙涤、张维迎、林毅夫教授进行了讨论。盛洪教授认为假设和结论不相关时假设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与问题相关那么就要用到黄有光教授的假设判断标准。但他不同意黄有光教授关于科斯反对税收的例子，他认为科斯所用的是边际分析，因而不会是“全有全无”。高王凌教授作为历史学家，认为有时一个“瞎编的例子”特别有用。孙涤教授认为用一定的经济理论假设只能正确解释很少的一部分经济现象，但是用这些假设去分析其他一些问题则有可能出现问题。张维迎教授认为有些假设可以让我们找到问题的根源，不能说因为假设不现实就没有意义。林毅夫教授指出经济学当中有很多可以创新的方向，研究者能够挖到金子还是能挖到煤，需要依靠正确方法论。

第二单元主持人为盛洪教授，汇报人为陈平教授，点评人为何梦笔教授。陈平教授的主题为“从均衡经济学到复杂演化经济学”，他提出了自身对经济学方法论变革的理解，即经济学方法从线性分析走向非线性分析，从均衡分析走向非均衡分析，从稳态走向费稳态，从单体走向群体。因此，他提出复杂经济学的概念，这个概念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他举例说到，经济学中凸函数假设违背生理学，用价格作为一个标量无法处理高维空间问题。陈平教授还用“小波理论”来分析金融市场，结果发现把市场作为中性的白噪声是不对的。随后，他用复杂经济学来处理增长问题，在这个视角下就出现了代谢增长理论，在这个理论当中，经济学的核心不是价格竞争而是份额竞争，知识不能像资本和劳动那样积累，科技才是增长的动力。根据复杂经济学来理解的复杂社会，陈平教授提出了新和谐社会的设想。在新和谐社会里，能者授权，按时间付酬，爵位世袭。

随后，何梦笔教授进行了点评。他谈到物理学领域本身有一个分支叫做经济物理学，通过陈平教授的论文，何梦笔教授还认为能源这个要素要在增长理论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张维迎、黄有光、林毅夫、盛洪、黄凯南教授进行了讨论。张维迎教授同意从演化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学，但是不同意用中观经济学中的政府产业政策来实现创新，他认为创新仍然是市场和企业的功能。林毅夫教授肯定了陈平教授不断挑战传统，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很重要，但是他不同意陈平教授对理性人假设等等基本假定的批评。黄凯南教授认为陈平教授的理论会在建模上出现困难。盛洪教授指出经济学处理复杂问题往往采用存而不论的方法，这是经济学聪明而又有生机的原因，因此盛洪教授认为将简单问题用物理方法复杂化也可能会出现问题。

第三单元主持人为毛振华先生，汇报人为陶永谊先生，点评人为张曙光教授。陶永谊先生的主题为“互利：经济的逻辑”。他主要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两个假设，一是将市场划分为需求方和供给方两方，另一个是供需分析忽略了时间维度。因此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股票等资本市场的追涨杀跌现象，提出用互利的观念来替代经济学自利的观念。在互利的观念下，双方互惠的过程中就有了价格变动和经济周期，而且在交易中有一个合理价格区间，在这个区间内双方都得利。而政府的作用就是确定这个合理价格区间并进行引导。

张曙光教授是评议人，认为陶永谊先生创新的地方是用互利人假设替代自利假设，并提出来二元耦合的框架。但他也认为这个理论有很大的偏颇，简单否定理性假设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建议陶永谊先生要用自己的理论把古典经济学包含进去，而不是排斥和否定。

随后，史正富、林毅夫、盛洪、张维迎教授进行了点评和讨论。史正富教授指出资本金融市场的确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不同的情形和市场，因此通过这个特殊例子否定传统是偏颇的。史教授对现实当中企业的互利政策才提出了质疑。黄有光教授认为传统理论也没有否定互利，可能是由于对基本的经济分析缺乏了解。林毅夫教授认为要从实际的情况进行创新，提出一个完全理想的模式来解释世界是会出问题的。盛洪教授认为经济学本身是中立的，资本市场的追涨杀跌也并没有违反基本经济理论，只是不能用数量作为坐标。张维迎教授认为私权的核心就是互利，不互利的制度是不可能持续存在的。

第四单元主持人为罗必良教授，汇报人为叶航教授，点评人为莫志宏教授。叶航教授的主题为“神经元经济学”，他介绍了如何用经颅直流电刺激的方法基于计算机仿真来研究人的偏好，从而打开偏好黑箱。神经元经济学的发展受到的障碍主要是医疗技术条件，但是经颅直流电设备比较便宜，为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具体而言，给定一个实验，即实验者参加一个筹码游戏，情况一为每个人有100%的概率获得50个筹码，另有50%的概率获得200个筹码，50%的概率损失100个筹码；情况二为每个人有100%的概率损失50个筹码，另有50%的概率损失200个筹码，50%的概率获得100个筹码；在这两个情况下，实验对象的脑反应是不同的，在情况一的情况下人的大脑对风险显示出更大的反应，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冒险。因此，神经元经济学为人类的偏好提供了生物基础，也对人们的选择一致公理提出了挑战。

莫志宏教授为本单元的评议人。她认为经济学的创新首先是当代学者与之前学者的一个对话，而不是拿出一套本身并不完善的理论去否定前人的工作。通过实证或者操作性的实验方法本身就抽象掉了或脱离了现实。尤其是行为经济学仅仅能解释某个具体情节，而要为人的行为提供一个统一的基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行为经济学做不到，经济学本身也无法做到。

杨其静、盛洪、林毅夫、孙涤、罗必良教授进行了点评。杨其静教授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就是不断吸收批评者的意见吸收消化了，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就是能够解决分析具体的问题，而经济学本身是问题导向的。盛洪教授认为人在千万年的进化中形成了自动反应，它有可能是偏离理性行为，但是研究这些自动反应也是有意义的。林毅夫教授澄清了弗里德曼观点出现的背景，认为大家首先要弄清前人的思想。孙涤教授认为人有时并不是按照期望效用值来行为的，很多情况下输和赢本身就是不一样的。罗必良教授认为期望视角下的等量收获与损失本身是不一样的，因此神经元经济学可以为新古典理论提供好的生物科学及人类学基础。

第五单元主持人为史正富教授，汇报人为林毅夫教授，点评人为何全胜先生。林毅夫教授的主题为“新结构经济学”，他认为落后国家应该充分理论比较优势原理来调整经济结构并获得经济发展。通过林教授的观察，他发现凡是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转型的国家都失败了，而经济转型成功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那便是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背景，便是二战以来各国的转型事实，在理论上便是要回归到亚当斯密的思考方法，即要重视禀赋和禀赋结构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为了转变成发达国家，需要借鉴与自身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通过比较优势不断逼近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并以此来实现赶超。这也意味着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都是非常重要的。按照新结构主义，非洲有些国家正在按照这个理论来实践，并在一定阶段上取得了成功。

何全胜教授是本单元的评议人，他认为新结构主义框架下可以分析很多现实问题从而意义很大。在当代经济现实当中政府和市场的确是同时起作用的，但是林毅夫教授需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在这一点上何教授认为新结构主义还需要做很多解释性的工作。

管毅平、茅于轼、冯兴元、毛振华、张曙光、孟捷、曹正汉教授做了点评。管毅平教授认同新结构主义的提法，他认为政府提供的是一套稳定的秩序，而市场则是在制度框架下有效产出。茅于轼教授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反而是经济机构，在要素市场上存在严重的扭曲，因此还是需要用一般均衡的理论去纠正扭曲。冯兴元教授认为结构问题非常重要，但是结构之外还有技术问题，他认为将技术假定为内生的不一定符合现实，而且除了比较优势之外还有竞争优势。毛振华教授认为新结构主义需要解决政府和市场的结构关系，恐怕两者之间有替代关系。张曙光教授也认为新结构主义需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互动，中国的最大问题是结构问题。孟捷教授同意林教授的主要结论，不同的一点是即便禀赋和优势一样，组织生产的知识也有差别，而这一点很重要。曹正汉教授也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对政府市场权力边界问题提出了疑问。

第六单元主持人为卢锋教授，汇报人为黄凯南教授，点评人为刘业进教授。黄凯南教授的主题为“演化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他试图利用人的认知模式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一个统一分析框架。黄教授认为演化经济学的框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方法论上采用达尔文变异选择跟扩散的框架；在数理模型上需要能够把创新内生化；微观基础上需要把偏好演化概念具体化；提出认知理性假设来将这个框架动态化。有了这个框架，可以用一套主观博弈规则来解释制度演化。以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例，演化经济学的模型发现近十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在降低，而结构变迁的效应在上升。

刘业进教授为本单元的评议人，他认为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交易，研究交易就意味着经济学要研究社会和经济的演化，秩序和演化是永恒的。但是刘教授认为黄教授用演化经济学来解释GDP增长是在用新范式解释老套的问题。而GDP本身的统计就是不符合演化经济学的思路的。因此，从演化的角度，今天经济学要看到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一本生物学方面的书，不要把它理解为道德方面的书。

黄有光、沈华嵩、陈平、盛洪教授等进行了点评。黄有光教授认为演化主义也要讲人类主义，人类的快乐是重要的。沈华嵩教授认为演化经济学要取代新古典主义还有一个非常遥远的过程，主要是它缺乏微观基础。陈平教授不同意制度的形成是个体层面和制度的相互作用，而是在结构层面和开放系统。盛洪教授认为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就是把复杂问题模型化简单化，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演化经济学似乎太过复杂，它不必去打倒古典经济学，而是去互补。史正富

第七单元的主持人为赵农教授，汇报人为吴思先生和高王凌教授，主题为“历史对经济学的挑战”，点评人为姚中秋教授。吴思介绍了自己如何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历史和社会问题，并从中提炼出血酬理论来解释暴力与资源分配。具体而言，吴思教授通过不同行业的死亡率和工资差异不同来计算生命的价值，也就是说明了生命和财务的关系。所谓血酬就是暴力掠夺的收益，当暴力掠夺收益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就会发生，便是血酬定律。应用经济学的均衡方法，可以用来分析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之间的均衡，暴力集团内部各方的均衡以及暴力集团之间的均衡，从中可以引导出最佳抢劫率、团伙内部分配以及最后的政治经济均衡。

高王凌教授介绍了自己研究中国农村改革的心得，辨析了演绎与归纳之间的争论。他认为中国传统经济制度中许多特点，农业的家庭经营，土地的私有租佃，农民选择自由，世袭系统，市场制度，商品经营，过去都叫封建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实际上通过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当代在政治上给社会留下的空间甚至不如传统社会。同时历史事实与社会科学理论往往有些相悖，在这一点上高教授更倾向于尊重历史事实。

姚中秋理事长是本单元的评议人，他认为不管是用新古典经济学来解释人的行为，还是说用中国的历史的事实来探索经济学的边界，都是从历史的角度呈献给人们中国的一些事实。中国的转型本身提供给中国学者一个后发优势，因此，要把中国的故事讲清楚，目的并不是证明中国很特殊，而是我们要证明人很复杂。

黄有光、赵农、茅于轼、孙涤、陈平教授进行了点评。黄有光教授认为血酬定律分析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对暴力和资源的分配本身也很重要。茅于轼教授向吴思教授请教了怎么解释所谓的合理伤害权。孙涤教授认为现在的贫二代即便生存没有受到威胁而也会有动乱的可能。陈平教授认为高王凌加收的观察很有益，从历史案例归纳出经济规律，才有可能去构造大的理论体系。

5月7日的研讨共分为四个单元。

第一单元主持人为孙涤教授，汇报人为史正富教授和张维迎教授，点评人分别为曹正汉教授与沈华嵩教授。

第一单元的第一位汇报人为史正富教授，他的主题为“国家财政体系初探——复合财政制度”，他介绍了财政、金融新经济领域对现代宏观经济学带来的挑战，并从中提出了自己的复合财政制度构想。具体而言，在他看来，政府支出具有不同的内涵，即支出是否具有资本性还是仅仅为费用支出。中国的情况便是政府支出具有资本性，因此财政制度与西方公共财政制度是完全不同的。简单而言，中国的财政体系是资产负债关系。国有企业、土地财政和金融平台上融资相当一部分构成的是资产和负债管理，资产负债管理是物质式管理，这被称为复合财政体系，这是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鉴于此，他认为中国的政府效率是比较高的，目前的发展方式也符合符合财政制度的逻辑。

本单元的点评人为曹正汉教授，曹教授在方法论上提出了质疑，即用中国的特殊财政体制来批评整个宏观经济分析似有不妥。但他认为史教授对中国财政的资本性的观察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中国的财政体系不稳定，是由于财政的功能第一是用于保证下级政府的利益，所以很难用这个体制来创新宏观经济理论本身。

黄有光、盛洪、张曙光教授进行了相应点评。本环节围绕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和逻辑展开了热烈争论。黄有光教授认为进出口和投资不能抵消储蓄的时候，才有总体的产能过剩的可能，因此与史教授关于投资的看法是相反的。盛洪教授认为史教授关于问题的把握是精准的，但是开出的药方却是南辕北辙的，政府的干预本身会加重问题而不是解决了问题，并从中认为政府干预是对宏观的创新。张曙光教授认为国家本位的分析似乎有问题，尤其是中国财政体系本身存在很多问题。

第二位主讲人是张维迎教授，他的主题为“经济学的转型”，他把经济学上升到经济哲学的高度，介绍了经济理论从静态到动态、从功利主义到权利主义、从利益到理念的转变，论证了理念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举例来说，大企业的存在是合作理论的一个结果，没有大企业就不可能有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从权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外部性，就会发现外部性是一个伪问题，而它本身是一个权利界定的问题。从利益到理念，就说明了人的尊严、自由，以及社会民主本身都是人类的追求，仅仅通过功利主义无法实现人的其他价值，也无法解释历史上的改革怎样克服了改革者本身的利益受损。因此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需要大家有理念作为支撑，而不是利益作为支撑。

沈华嵩教授是本单元的点评人，他认为与物理学相比，百年来物理学经历了三次科学革命，而经济学在同期却没有太多的突破和创新，因此他认为经济学的范式创新是重要的。

罗必良、胡必亮、陶永谊、李人庆、陈平、盛洪教授进行了讨论。罗必良教授同意张维迎教授的全部观点，但是他认为从功利到权利的转变有待商榷，因为对理念的追求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功利行为。胡必亮教授认为如果经济学从经济理论转向哲学视角，有可能使得经济学不能称之为科学。陶永谊先生则认为权利的边界是义务，和义务是对应的，因此权力的权利并不是说全部带来腐败和丑恶，权力对应的是责任，只有超越了这个边界的时候，才是不合理的。李人庆教授赞成张维迎教授的观点，认为经济学不应该跟社会的经济伦理相切割。陈平教授反对思想市场的概念，因为思想不是盈利竞争的。他也认为哈耶克的经济学完全无法解决危机，认为政府什么都不用做的观念不对。盛洪教授同意张教授的观点，但他不认为外部性的概念没有意义，因为确实有很多没有在现有的制度规则下定义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单元为挂牌讨论。挂牌讨论分为三个主题，分别为黄有光教授的“综观经济分析”、管毅平教授的“权威、国家发生学”以及孙涤教授的“超越经济理性的合作行为”，参会学者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议题进行了自由讨论。

黄有光教授认为传统的三个分析方法，微观、宏观和全局均衡，各有优缺点。比如完全竞争之下，一个厂商面对的对他产品的需求是水平的，面对水平的需求，在均衡时厂商不会多卖出商品，这和现实是不一致的。经济里面有一些变化，技术改进、成本降低、需求变动等等。结果从一个均衡到另外一个均衡，全局均衡之间不能比较。而综观分析方法，就是不区分产品和厂商的差别，从而求得整个市场的平均价格。在平均价格下，如果市场需求线是平行的，就是一般均衡分析，如果市场需求线倾斜，就是凯恩斯的经济分析框架。从而综观分析把新古典和凯恩斯的情形变成了特例。在这个框架下还可以解释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在实际政策建议上，黄有光教授对政府干预的态度是折中的，就是凯恩斯和哈耶克都各有道理，经济系统实际上不是黑和白，而是灰色的。

围绕综观经济分析，张维迎、陈平、黄凯南及陈平教授对外部性问题展开了讨论。黄有光教授认为外部性是要得到承认的，比如环保问题就是外部性的表现，无法绕开政府的解决。黄凯南教授认为环保其实是侵权问题。而张维迎教授认为外部性的概念忽略了权利的维度，私有产权的界定就是为了解决外部性问题。

管毅平教授的“权威、国家发生学”则主要是提出了一个框架，即希望用暴力机制的起源来解释权威的发生，并从权威关系推导出国家的产生。但关于如何推导的逻辑细节和模型构建则缺乏具体的说明。吴思先生则为这个讨论提供了一些历史事实，以及国家如何从历史的角度上产生。曹正汉教授、杨其静及陈钊教授则建议管毅平教授注重刻画所要描述的问题的客观环境。

孙涤教授的“超越经济理性的合作行为”，他讲的是人的合作是必需的，合作是历史上长期博弈的结果，也可以称之为演化。博弈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个是源于人的生物性，通过基因规定了自由意志是怎么回事，第二个是文化上必须建立一些规则。人类合作是抱团的，也是在历史上不断的演进，市场的作用就是引导人们和陌生人抱团合作。而这些合作行为往往是超越理性本身的，因此孙涤教授提出这个观点以供大家讨论。

胡必亮和李人庆教授认为孙涤教授提出的问题并不明确，没有给出能够具体讨论的方向。叶航教授则从神经经济学的角度给出证明，人的合作行为源于人类本身最基本的情感，包括内疚在内，大脑对人类的行为有很多我们并不十分理解的控制。陶永谊先生则认为人类的合作是生存策略的一种。盛洪教授认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人类为什么有远远高于其它物种的合作水平。史正富教授则认为经济学创新可以从大的范式上来创新，但是有一个逻辑起点之后要有具体的理论，否则的话很难讨论问题。

第三单元主持人为张维迎教授，主题为“如何进行理论创新（一）”，共有9位教授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研究。陈钊教授汇报了“经济理论研究创新中的几对关系”，他认为中国规模巨大，所以有创新机会，但在创新中需要注意理论与实证、国别研究与一般研究、政策研究以及学术研究的关系，要做到合理的处理这些研究间的关系；

茅于轼教授汇报了“数学如何改变了经济学”，他认为数学是人类逻辑的体现，因此将来的社会也会需要一般均衡的指导。目前中国消费品市场实现了一般均衡，但是要素市场还远远偏离，需要纠正市场的扭曲；

何梦笔教授汇报了“演化经济学如何创新”，他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类型不同，不同的国家类型分属不同的经济谱系，因此要引入文化演进的分析视角；

曹正汉教授汇报了“结构、制度与转型——中国制度经济学”，他认为中国的制度结构是中央治官、地方治民，中央利用这个结构来分散治理风险，或者叫做分散烧锅炉。在这个结构与制度框架下，过度分权与过度集权同时并存，这为中国转型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对象；

甘德安教授汇报了“基于复杂性科学的家族企业跨学科研究”，在复杂性科学视角当中，混沌吸引子理论认为初始条件不同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利用这个理论去分析家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会得到一些有用的结论；

罗必良教授汇报了“经济理论如何创新”，他认为经济学的理性假设非常坚实，因此中国的特殊性所表达的对象的特殊性有可能会构成中国学者关于经济的话语权。同时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也有利于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扩展，经济理论需要从纯粹理性假设出发去研究现实问题；

李斌先生汇报了“算法框架理论”，他认为经济学的非理性问题是由于参与者陷入到了计算过程之中，由于计算问题本身需要时间，而时间的滞后则会破坏一般均衡成立的条件；

胡必亮汇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文化视角”，他认为创新的基础便是真实的世界，而其中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地下钱庄转为地上就失效，社会网络也是文化现象，地方的不同文化带来了各地经济现象的分野；

杨其静汇报了“垂直产业视角下的国有企业研究”，他认为经济理论是问题导向的。国有企业的存在可以从混合寡头竞争模型和稳定宏观经济角度上解释，但是产业的垂直控制理论可以证明国企是在政权暴力基础上实现执政条件下的租金最大化，因此对国企改革很悲观。

第四单元主持人为冯兴元教授，主题为“如何进行理论创新（二）”，本环节采取学者自由讨论方式。其中，莫志宏教授对科斯的理论进行了一些批评性的点评，即我们讨论的问题都是经过合理理解的事实，如果事实本身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就无法讨论。盛洪教授和茅于轼教授对一般均衡理论的逻辑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探讨，黄有光教授强调要加强经济理论的解释力而不是去为创新而创新，罗必良教授指出经济学的推广意义，陈平教授认为中国学者应摆脱悲情意识才能更好创新，赵农教授认为市场是有瑕疵因此要关注市场背后的隐含机制。

最后，张曙光教授做大会总结。他认为大会开得很成功，是各方面学者的一个盛会，大家立足于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历史科学、经济哲学的相互借鉴和相互启发，讨论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重大理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不同学科在共同解决经济问题、拓展经济研究方法方面进行了一次良好的对话。他建议大家关心中国的现实与中国的问题，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边际创新，推动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会务组

2014年5月8日

## 理论创新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黄有光

**原题**：不现实的假设是否可以接受？理论创新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会议，见到很多老朋友。尤其高兴的是昨天听到说茅于轼老师获得全球十大思想家之一，而且是唯一的华人，全球十个人，这是比诺贝尔奖还稀缺的，很少。

我今天要讲的是《不现实的假设是否可以接受？》的这个方法论问题。刚才的幻灯介绍我是Monash大学的教授，我2012年底已经离开Monash大学了，成为他们的荣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我现在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任Winsemius 讲座教授。

**宇宙是怎样来的？**

根据第一次议程，我的演讲题目是《宇宙是怎样来的？》。我很奇怪，我没有提供这个题目给会议组织者，为什么出现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我两三年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的一本书的题目，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会议里面，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昨天高岩副所长到机场接我，在车上，我问起他，原来是他们曾经开会决定用这个题目，说黄有光讲过的，尤其是盛洪所长认为这本书讲的很好。所以，开会决定让我讲这个题目，不过我没有得到通知，我以为是搞议程的人弄错了，所以就叫他们修改过来了。

这个题目是讲宇宙是怎样来的？答案是宇宙是被创造的，创世者是进化而来的，而且是从五个非接受不可的公理证明的，回答了科学界不能回答的，科学的答案是宇宙是大爆炸来的，但是不能回答大爆炸从何而来？宗教界说宇宙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不能回答上帝从何而来？这本书是2011年出的，英文文章也是2011年在美国Journal of Cosmology发表；这是美国Harvard-Smithsonian Institute 的Center of Astrophysics 的科学家们所主编的期刊。

因为我们是讲理论创新，所以我还是回去讲方法论的问题。盛洪所长说明天可以有挂牌，我现在讲的是：不现实的假设是否可以接受的问题，这不是讲我自己的创新，明天专门介绍我的创新，挂牌的时间很长，所以有可能两个都可以讲，一个是讲宇宙是怎样来的，一个是讲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经济分析。

**如何进行理论创新？**

在讲不现实的假设之前先讲一般的，我现在讲如何进行理论创新这个会议主题的东西。有几个要点我想强调的，一个是为什么进行理论创新？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原有的理论有些不足够的地方，我们想要改进，想要加强经济分析，而才去创新，我认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第二，为什么要改进这个理论的不足？就是使这个经济理论，即使它可能由于经济理论主要是在西方社会发展出来的，所以可能他对西方社会相当适用，但是不见得适用于中国的情形。所以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而且中国从中央计划转型到市场经济，有它的特殊的情况，所以我们原来的经济理论在解释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有不足，所以需要去创新。

创新的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要在解释实际经济上能够提供一些洞见，使我们更好的认识实际经济的运作，或者能够对经济政策有一些指导性，而这两个通常是相互有关的。第二，由于要解释实际经济，就要有一定的实际性。理论有很高的实际性，就考虑很多复杂的因素，就很难进行分析。这就跟可操控性有冲突，这就是现实性（Realism）和可操控性（Manageability）之间的冲突。我只针对其中一点，就是你为了使它能够操控，通常就采用一些不很现实的，不实际的假设，这些假设是否可以接受。

**不现实的假设是否可以接受？**

针对这个问题，经济学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早在60几年前就在他的一篇文章与书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1953）里面，提出他的观点，他说实证经济学不需要考虑它的假设是否现实，只要它的结论是被证实的就可以了，这篇文章10年后（1963）引起很强烈的争论，直到今年将要出版的文章都还在讨论。去年科斯在9月去世，10月张五常教授在深圳开了一个会，我们在座的有几个人参加了，会议上发了纪念科斯的文集，包括旧的和新的。这里面提到科斯对经济方法的一些观点，所以就使得我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我在几个月来写了一篇文章，就在这个会议资料里面。

我的看法，我本人认为我是折中主义者，我对很多不同学派和对经济学方法论不同的看法的文章，都认为他们的说法有正确的地方，还有最近的一篇2014的文章是强调实际的重要。对于这个问题“不现实的假设是否可以接受？”的答案，要看情形，有些情形可以接受，有些情形不可以接受，要看你这个实际的假设是否使你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如果是有误导性的就不可接受，如果没有，只是简化分析，结论如果是对的，就可以接受。而且同一个假设，在分析某些问题上，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完全一样的假设，在分析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不可接受的。

**同一个假设，有些情形可以接受，有些情形不可接受**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驾车从北京到上海，你算北京到上海有几公里，开车平均速度几公里，除一下可以知道几个小时到上海。假定你的车只是一个点，不考虑你的车的长度，只是一个点，从北京这个点到上海这个点需要走多少时间？你假定你的车子是没有长度，这是简化的假设，对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接受，不影响你得出几小时可以到上海。同样的假设，假设你的车的长度只是一个点，没有长度，同样这个假设，在另外下面的问题就是不可接受的，假定你说你要过一个交叉路口，没有红绿灯的交叉路口，两边都有车过去，你要说我闭着眼睛开车过去，不看旁边有没有车，另外一边的路每小时有多少车过，你要说我不看，我就开车过去，会跟另外一辆车相撞的或然率有多少，你要算这个或然率，如果你知道车的次数等信息，可以计算这个或然率。但是，如果你假定你的车没有长度的话，你不管是多么多车的交叉路口，你的或然率就是零。所以，你就得出结论，我闭眼开车过去，相撞的或然率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同样的假设，你回答这个相撞的或然率，这个假设[车没有长度]是不可以接受的，实际上或然率是相当高的，你过去可能就死掉了。所以，完全同样的假设，在一个问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另外一个问题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因此，要看你分析问题的性质。

**经济学内可以接受的不现实假设**

刚才是驾车的例子，现在我们看经济学里面实际上被应用的例子，在经济学里面，实际上的经济分析里面用的假设。第一个是简化的不现实的假设，但是是可以接受的一些例子。

**极限定理**

在全局均衡，国内99.99%都叫做一般均衡，这显然是错误的译法，“一般”是相对于“特殊”，或者“具体”，而general是相对于partial，应该是全局相对于局部均衡，相对于局部均衡，不是一般均衡，一般是相对于特殊的。所以，你们以后不要再用‘一般均衡’，这是错误的译法，是不懂得经济学的人的译法，你继续用‘一般均衡’，就表示你对什么是一般均衡不是很理解，应该是用“全局均衡”。

在全局均衡里面有一个极限定理，就是当交易人数增加的时候，这个经济的核（core）会缩小，当交易人数增加到无穷大的时候，这个核，[核就是没有被排除的可行的（feasible）的分配]。这个核随着交易人数增加而缩小，证明这个极限定理，用了一个非常简化的假设，非常不现实的假设，假定增加的人是完全一样的。两个人交易，这两个人可以是不一样的，但是增加人数的时候，是跟原来这两个人一样的，原来是A和B，从一个A和一个B，增加到两个完全一样的A1、A2，B1、B2也是完全一样的，至少在偏好和禀赋上是完全一样的。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我跟你有不一样的偏好，不同的禀赋。但是，当我们已经证明出来这个极限定理的时候，当人数增加时，核缩小，当人数增到无穷大的时候核缩小到只剩下一点，这点就是完全竞争的均衡。当我们证明出这个定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人数增加这个核会减少，是因为人数增加，增加了交易可能性，我们就知道即使增加的人数偏好不同、物品也不同，只要不是不同到他们用的东西我们吃了就会死，这样就不能交易，只要有一定共同的偏好和禀赋的话，交易的可能性还是增加了。因此这个假设大致不影响理论的结论，因此是可以接受的。

**杨小凯的分工理论**

另外一个例子也是类似的，杨小凯对分工的分析，假设分工之前每个人是完全一样的，这是抽象掉不同人之间的不同的复杂性，简化了分析。而且让我们集中在分析这个分工造成的结果，而不是人际差异造成的结果，所以让我们更加针对问题的核心，所以这个假设也是可以接受的。杨小凯的分析得出很重要的结论，得出亚当斯密以前没有得出的更多的结论，而且是用数理的分析，严格推导出来的。因此，在杨小凯没有去世的时候，他是2004年去世，今年我们将在7月5、6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纪念杨小凯去世10周年的会，7月7、8日在Monash大学也会举办纪念杨小凯的会。杨小凯去世之后，我们让诺奖得主布坎南写了一篇纪念杨小凯的文章，布坎南在这篇文章里面讲他在2002、2003年分别向诺奖委员会提名杨小凯，很可惜他去世，不然我们可能已经不必再等华人经济学家什么时候拿到诺贝尔奖，可能已经拿到了。

从这个人人相同的假设可以得出，即使没有外生给定的比较优势，分工也能够造成内生比较优势，即使两个没有不同的人或国家，也能够由于规模经济，分工而造成专业化的经济，通过贸易而双方得利。当然，实际经济中也有外生的比较优势，所以在杨小凯的分析之下做这个假设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实际经济没有外生比较优势。所以，实际上林毅夫也对，杨小凯也对，各有对的地方。这个林-杨争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有一点误导性了。

**综观经济学用的典型厂商**

我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这是我自己用的，在明天挂牌的时间里面可以进一步解释怎样进行，我这里只是讲它的结论，而没有分析怎样进行这个理论创新。所以，明天我可以介绍怎样进行这个理论创新。

我在1986这本书（Mesoeconomics: A Micro-Macro Analysis）里面(附录3I)，用完全传统的全局均衡的分析，证明出给定任何一个外生的变化，无论是在成本上或者需求上的变化，理论上存在一个典型的，或者代表性的厂商，而这个厂商在产量和价格上的变动是能100%的反映整个经济在总产量和平均价格上的变动的。所以，这个论证是支持可以用这个简化的典型厂商的简化的。而且还另外证明，用简单的加权平均的方法来定义典型厂商的特性是怎样的，然后根据这个简单定义出来的厂商，他对给定一个外生变化的反应，在价格上和产量上的反应，是能够近似的代表整个经济在总产量和平均价格上的反应的。所以，这两个结论就给用典型厂商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而且是用传统全局均衡的方法得出的。我们只看一个典型厂商代表整个经济，这个结论是否可接受？这个证明就是说它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这个分析方法，不能用它分析相对价格的变化，这是不能的，所以它有它的局限性。

**经济学内不可以接受的假设**

接下来，我们要讲那些不现实的假设是不能接受的例子，而且是实际上在经济学上被使用的。

**第一与第二价格拍卖**

经济学上有一个重要的拍卖的机制的设计问题，就是你用怎样的拍卖的方式能够确保你要拍卖出去的这个东西是去到对它评价最高的人的手上，而不是给评价低的人得到，因为那就有效率上的损失。还有是否能够给拍卖者得到相当高的价格。有各种拍卖方式，我们如果看那种不是口叫的，可以看到对方出多少钱，而是写在信封上的，就是你出多少价钱，对方不知道，交给拍卖者。这个拍卖方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第一价格”，，一个是“第二价格”，也就是威克利拍卖，，由诺奖得主威克利（Vickrey）提出来的。所谓的“第一价格”，就是每个人写出他要买的价格，最后全部开起来，提出最高价格的人得到买这个东西的权利，而且就花他所提出的价格。根据那个最高的价格卖出这个物品，所以叫做“第一价格”。你用“第一价格”，每个拍卖者都要隐藏自己的最高愿意付多少的钱数。例如，你认为这件东西最高值100块，比100块更高，就损失了，所以用100块买的话，完全没有消费者剩余，你何苦买呢？因此，如果你最高评价是100块，你拍的时候可能只是出价95块，你要有一些消费者剩余，所以每个人压低自己的价格。而这个压低的程度，可能各人压低不同的程度，所以这个物品不一定是由评价最高的人拍得。

如果用“第二价格”拍卖，同样是每个人出价，写出价格最高的人，物品卖给他，但是，不是根据最高价格，而是根据第二高的价格卖给他。假定最高价格是100，向国成出价100，其他是100以下，这个物品卖给向国成，但是出价第二高的是林毅夫，他出98块，所以向国成只要花98块就可以买到，是以第二高的价格出售。这时候每个人不需要隐藏自己真实最高评价，因为向国成认为100块刚好值得，如果他把出价压低到99块，没有影响，他依然是以98块卖到，要是压低到97块，这个物品就给林毅夫拿去了，向国成就没有得到这两块钱消费者剩余。所以，压低价格对你只有损害，不能得利。所以，在第二价格拍卖之下，每个人不须要压低价格，这是很好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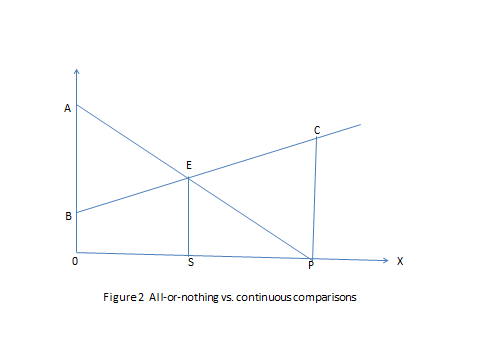
有一个证明，说第一和第二价格，这两个拍卖方式是等价的，而且是在世界最好的期刊里面发表的，而且更加惊奇的是，这个有误导性的结论，在全世界微观经济学的最高级的书，是微观经济学博士生水平的最有名的书（Mas-Colell et al. 1995），里面，介绍这个结论是按照正确结论介绍的。为什么得出第一和第二价格的拍卖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解释应该是不一样的，第一价格之下只能是压低价格，压低价格之后，这个物品就不一定是被最高评价者拿去，这和第二价格拍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得出一样的结论？得出一样的结论是基于两个简单的假设。第一，假设他们只有两个拍卖者，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出价的情形，但是彼此假定对方最低可能出的价格是多少，假定最低价格是一样的。假定我认为这个物品最高是200块，如果对方超过200块，对我来讲是无所谓了，让对方买好了，因为超过200块对我不利。所以，我有兴趣是0-200之间的价格，对方也可能是在0-200之间出价。但是对方的最高评价如果是220，他的兴趣就是0-220之间出价。更重要的是假定我最高愿意付200，我假定对方在0-200之间的出价，任何一个价格的可能性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假设不合理，如果这个东西值200万，190万、180万的可能性远远高过一万、两万的可能性，怎么会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假设不但很不现实，而且还得出误导性结论。因为你假定完全一样的话，你要把你的预期就是对方有可能0-200出价，我应该出什么价格？对方从0到超过200都可能出价，但是200以上我不管了。从0-200的对方可能出价里面，如果可能性是完全一样的话，我要最大化的是我得到这个物品的可能性，乘以我的消费者剩余，这个预期价值最大化。这样我应该就是出中间价，0-200，我就出100。对方是0-220，出价的可能性是一样，他就出110的中间价。我们彼此出中间价，那个物品依然由最高评价者得到。所以，他们的结论说第一和第二价格拍卖的方法是等价的，是由于他假定从0-200之间这个出价的可能性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彼此出中间价，彼此出中间价的话，物品依然由这个最高评价的人得到。但是，实际上我想对方出价，如果我想买这个物品的价格是200万，我一定假设是190万、180万的可能是远远高于一万两万的。而且各人的假定不同，在各自假设不同的情况下，你就不会出中间价，你出的价格比如愿意付220买的人，可能出180，我愿意付200买的人可能出190，那样就由我拿去了，那个愿意出220的人就没有拿到。所以，这个简单的假设是不可接受的，是有误导性的。所以，这个文章是不应该发表的，不应该在教科书上面的。

第三个例子，完全可分性。我们假定物品是完全可分的，我们就可以简单画图。我们可以把经济学的结论用简单的，例如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这个简单的方式来表达。这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你把完全可分的假设，用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上，你就可以得出规模报酬一定是恒等的，所有生产要素增加一倍，产量一定增加一倍，不能超过，也不能低于。假定每个有关要素都考虑进去，每个有关要素都是完全可分的，弗里德曼证明过规模报酬就会是恒等的。弗里德曼本身知道实际经济中是有不完全可分的情形存在的，所以不能说实际经济中没有报酬递增或者报酬递减的情形。但是，我们中国有经济学家，他说弗里德曼证明报酬肯定是恒等的，甚至说教科书说规模报酬可以递增或递减是错误的， 这样的结论是有误导性的，这样的简化假设的应用是不可接受的。

**科斯的“全有全无”的比较**

接下来的例子是科斯，诺贝尔奖得主，得奖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厂商的，一篇是1960年关于社会成本问题的。去年张五常介绍1960年科斯跟其他经济学家的辩论，说：“这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聚会。… 科斯问，‘假若一家工厂，因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抽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包括 M. Friedman, G. Stigler, A. Harberger, M. Bailey, R. Kessel, J. McGee, G. Lewis, L. Mints; 很多后来是诺奖得主]都同意政府要干预 ― 正如今天香港的环保言论一样。但科斯说：‘错了！’跟着而来的争论长达三个小时，结果是科斯屹立不倒。”还有，张五常(2013, p. 45-6)自己讲，“1970年我发表<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长的，但内容其实只是说，没有外部性这回事！ 当然屡受千夫指，但今天该文还在，… 而千夫则不知何处去矣！做学问是过瘾的玩意。”

批判外部性这概念， 不只是张五常一个人的看法，也有其他经济学者否定外部性的存在。而且科斯在中国大陆影响非常大，张五常用百度发现有950万条科斯的引用，弗里德曼只有他的四分之一，萨谬尔森只有九分之一。



科斯反对污染收税的结论是基于“全有全无”的比较。这个图X是污染的量，向下的线是污染者从进行污染得到的边际利益，向上的线是受害者从污染受到的边际成本（损害），社会最优点是在这两条线的交点。如果污染者是过度污染[例如到P点]，就应该向污染者征税，使污染者的税后边际利益线跌下来，通过S点，这才是社会最优点。但是科斯不仅不用数学，他连图形都不用，他只用例子，他的例子是针对自由污染、完全污染[即P点] 和零点。这样哪一种是比较好的就是不确定的，要看ABE与EPC这两个三角形哪一个比较大。有可能是完全自由污染比较有效，也可能是完全禁止污染比较有效。因此，用“全有全无”这样的比较，可以看到要看个别情形，来决定是否禁止污染。但是，对污染收税不是完全禁止污染，而是使污染从P点减到社会最优点S。所以科斯用这个比较， 来反对庇古（Pigou）向污染收税的看法是错的。

类似的错误，有如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上的论述，关于经济学上的错误多的是。所以，经济学上并不像孙滌昨天吃饭的时候讲的，经济学上很难证误的，这本书上可以看到很多证误，而且可以看到每个被证明错误的都是错误的。

**实证的局限**

弗里德曼就是用“你的理论得出的结论是否被证实”为最重要，我认为实证当然重要，但是不能单单看实证。例如我们考虑这个理论，这个理论说太阳是围绕地球旋转的，它的预测就是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太阳升起来，你根据这个结果去实证，真的是每天100%太阳从东方升起来，100%证明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太阳不是绕地球的，而是地球绕太阳的。所以，实证的很多情形，尤其经济学很多情形是很难得出确定性的证实的。所以，你不应该完全看实证，在可能的范围内，如果你的假设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如果依然是可操控的话，你用比较实际的模式是比较好的。

**综观分析的例子**



例如弗里德曼说假定完全竞争得出的结论并没有问题，但是可能以前没有发现有问题，但是金融危机我认为就是有问题了。根据完全竞争的结论，就可以得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减不影响实际产量或者就业，只影响价格。如果厂商是完全竞争的，对厂商物品的需求是水平的，那需求上升了，如果没有时滞，边际成本也上升，产量是不变的（如图）。如果厂商不是完全竞争的话，需求线是向下的，需求的增加造成价格增加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也可能会有产量变化而价格不变化的情形，这也是可能的。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不同？因为在需求上，如果需求线是水平的话，水平的需求线不能左右移动，只能上下移动，上下移动就是价格的变动。向下的需求线不但可以上下移动，也可以左右移动，左右移动就可以造成产量变动。而且从成本方面来看，如果需求线是水平的，边际成本线一定是向上的，你多生产的话，边际成本增加，边际成本增加了，你就要增加价格。当需求线向下的时候，边际收益线通常是更加向下的，边际成本线可以是向上，水平，甚至向下。所以，你多生产，边际成本不见得增加，多生产，价格不一定增加。

我这是用综观，把微观、宏观和全局均衡综合起来了。怎么进行这个综观分析？我明天挂牌的时候会介绍。

**结 论**

简单的结论，要用常理和直观来看它是否有误导性，不能受思想意识的影响。刚才讨论的科斯反对对污染征税，我认为是受到反对政府干预的影响，关于环保问题，市场是有失灵的，必须政府做，政府做不见得更好，可能更糟，如果更糟就设法改进，因为环保的问题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这个问题是非解决不可的。谢谢大家！

**（讨论部分）**

**黄有光：**

我不同意你说的第二点。我认为科斯全有或者全无的误导性，我并不是反对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假定没有交易费用，污染者和受害者之间，双方可以通过协议达到最优化，这点我没有争论，我不是针对这个科斯定理。如果能够通过协议，即使在少量的交易成本的话，能够通过双方同意达到最优点，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污染的问题已经被协议解决了。评估需要征税的情形是当受害者很多，尤其是污染的问题，包括将来几百年以后的人受害，这个协议的交易成本太高了，因而没有得到解决。这时候才需要政府征税，因为税率是可以控制的，我完全不同意说税率是全有或者全无，而科斯的方法是边际的。科斯的文章也不是完全没有边际的概念，他有些例子是考虑到边际的。但是，他反对对污染征税这一点上是根据全有或者全无的比较，这是错误的。

**黄有光：**

刚才我已经大致回答了，没有具体问题要回答了，补充一下刚才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关于科斯对庇古的批评，科斯1960年关于社会成本的文章，一开始就把庇古大名写上，就是批评庇古。庇古就是说外部性的问题，庇古的方法就是，政府应该对污染的外部成本征税，减少过度的污染。科斯定理是假定完全没有交易成本，我们看上面那个图，就是污染到P点，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受害者就跟污染者谈判来减少污染。如果你原来是不允许污染，但是污染一些是有利的，如果完全不污染，就不能生产了，所以也是可以通过谈判达到最优点。后来有人说没有交易成本的世界是科斯世界，科斯说这个说法是最大的错误，因为科斯说，“没有交易成本的世界是我要劝经济学家离开的世界。”科斯之所以讲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形只是一个导论而已，他想分析的就是有交易成本的情。关于污染的问题，交易成本是非常高的。只要你付出交易成本，它远远大于得利。科斯的文章很长，在后面几节里面的题目都有讲到庇古。他批判庇古税，科斯用完全污染或者完全禁止污染，哪一个更好不一定，但是对污染征税，对社会来看，如果税率不是过量的，这肯定是好的，是改进的。因此，根据张五常的介绍，而且这个介绍是被另外一个诺奖得主史地格勒（Stigler）证实的。科斯和另外几个人争论，科斯问是不是应该对污染征税，20对1支持征税，辩论几个小时后，是21对0，都被科斯说服了。他们完全就是坐在那里，科斯就是用完全污染和完全不污染的例子辩论，完全没有画图形。如果你允许中间情形，对污染征税应该是可以考虑的。当然你让政府征税，可能又有其他问题，例如贪污、行政成本等问题，所以让政府征税不见得更好。所以，有些右派经济学者否定外部性存在，他怕政府搞的更糟。外部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否定外部性存在，可能是基于你让政府做可能更糟，但是污染的问题已经严重到威胁人类生存，因此必须做，政府做如果更糟的话，就应该再改进，不然我们全人类就死了。

[ **黄有光** 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2014年6月20日

## 历史实践可以检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

陈 平

我是这次开会第一次见到黄有光教授，原来听小凯说了很多次，今天相见恨晚，你说的东西我全赞成。但是，作为讨论者，我还是要提点问题，实际上我提的问题是补充你前面的内容。

**弗里德曼的计量模型检验标准不懂经济学和物理学的差别**

我非常不欣赏弗里德曼那本《实证经济学》，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是什么呢？他没有区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别，他有一个说法是说“如果你的预言可以被验证的话，什么样不现实的假设都可以接受”。但是，你知道做计量经济学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做out of sample test。例如我有一个样本的数据，属于过去一个时段，例如1950-1980年。假设经济结构不变，做了回归把参数定下来。你对1980年以后的事件往外推测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外面时段（例如1980-2000）的经济结构没有变化呢？所以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检验看起来很好，但是操作起来计量经济学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我说的经济时间序列不是稳态，而是非稳态(non-stationary)。

**抽象是否现实要看研究对象**

今天黄有光教授提出来的新的判断的标准我是接受的。当然还有一个小的原因，因为我的老师之一 Robert Herman，也是大爆炸理论创始人之一.所以讨论宇宙起源问题，我们也有共同语言。

对物理学来讲，比如行星运动，可以用一个质点描写，抽象掉地球的体积，这是高度抽象的东西，为什么可以接受？因为他可以解释行星运动。但是你想解释地球的地震，你用质点描写就不行，地球必须画成有层次的球层。

**经济学中误导政策的案例之一：代表者模型和IS曲线**

黄有光教授的标准就是，假设可以看起来不现实，但是结论不能有误导，这是很好的标准，经济学有很多理论的误导，特别是意识形态和利益的误导。

我举两个例子补充黄有光老师，结论不能有误导的判断标准是可操作的。

第一，我认为经济学最误导的模型就是代表者模型。黄有光教授刚才讲的厂商的例子就是个代表者模型。最误导的代表者模型就是宏观经济学的IS曲线（利率和投资的反向关联曲线）。它意味着降低利率就能增加投资，也就增加产出。我们这次经济危机最大的教训就是发现IS曲线不灵。标准经济学就要一袋子土豆用一个点代表，政府降低利率，就可以增加投资，增加投资就可以增加产出，美联储的利率降那么多，有什么结果，结果很可能是负的，为什么没有刺激投资？你可以假设降低利率在正常的健康的经济形势下可以刺激投资，但是宏观经济学从来没有人定义什么是健康的经济。我的观察很简单，在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候，你可以把他当做封闭经济考虑，可以不考虑国际竞争。在1950-70年代，美联储降低利率，美国的投资确实增加。1970年代以后，石油危机，欧洲美元市场诞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不行了。蒙代尔告诉我，肯尼迪当总统时，萨谬尔森和托宾的建议就不灵了。为什么？美国降低利率，资本就外逃到欧洲美元市场。换言之，降低利率的后果不是一种可能，而是三种可能。哪三种可能？第一， 伯南克降利率证实了市场的负面预期，对美国经济前景非常不看好，投资不确定性非常大，资本家拿钱干什么？ 后来的cash, 钱拿在手上观望局势，等到大企业垮台了我再抄底，现在我不投资。第二条，投资不但不增加还减少，减少到哪了？资本外逃，跑到中国和亚洲，经济增长率更高的地方，70年代是跑到欧洲美元市场。第三种，才是IS 曲线预言的增加投资，增加产出。到目前为止，只有油页岩的投资在增加，原因不是货币政策，而是技术突破。美国整体危机六年了，至今投资起不来，改革也搞不下去，基础投资又没有钱。我们一大批人在学宏观经济学，拿一个IS曲线讨论货币政策，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这次金融危机证明完全是错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开放经济，不是封闭经济，利率和投资不是一个单向线性的简单直线。从这点来说，我大力支持黄有光先生的标准，误导性的简化假设是极其危险的。

**误导案例之二：拍卖的次优价格**

第二条，我也非常欣赏刚才黄有光举的拍卖的例子，我也认识威克利（Vickery），他没有得诺奖的时候，开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的时候没有人理他，我对这个老头很感兴趣，就去和他聊天。他提出一个“次优价格”。就是拍卖时，中签的不是出最高价的人，而是出第二高价的人，来制约过度投机。

新古典经济学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管它叫“半边经济学”，什么是半边？就是只讲消费者的视角，不讲生产者的视角；或者只讲借贷成本，不讲放贷的利润，片面的说事，什么消费者剩余等等。比如，你凭什么说降低利率就可以促进投资，是从借钱方的角度说的，你降低利率，我借钱的成本降低了，但是对放债的人不是好事，你降低利率，我回报减少了,银行就惜贷。所以，我们教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都是半边经济学。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假装社会公平，只讲消费者主导，只讲消费方，不讲供给方。你现在发现凯恩斯讲就业不足，如何拉动消费？老百姓得先有稳定就业，然后才有消费。美国现在稳定就业都没有，发钱叫老百姓拉动消费，可能吗？根本不可能。老百姓拿钱先还债，后者留着应急。半边经济学的另一个例子就是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卖土地是供给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是供给方经济学。地方政府要创造政绩，又没有钱，怎么办？卖地。地价越高，财政收入越高，短期政绩越好，那就是“第一价格”。如果我引进黄有光介绍的这个“次优价格”，是不是解决问题呢？也不解决问题，“次优价格”，地价还是太高。受损的是实体经济，制造业跑了，上海变空了，年青人就业怎么解决？广东也面临这个问题。

我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最优价格、次优价格？为什么不是平均价格？黄老师给的答案非常精彩。他的理论模型就只有两个交易者。如果我求均值，要求多个交易者。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来看经济学，就觉得经济学很奇怪：经济现象远比物理现象复杂，任何一个生物学家都明白人的本性是社会人。但是经济学的模型比物理学生物学都简单。经济学里只讲鲁宾森经济，只有一个人，自己对自己优化。最多两人交易，或两人博弈，“多”人交易就没有。

**误导案例之三：Lucas 的微观基础论和干预无用论**

当年我和黄有光关心同样的问题，就是中观经济怎么算？

卢卡斯讲货币中性论的时候，有什么微观基础，就是家庭的消费和工作。微观基础是无穷多家庭，无穷多家庭怎么做理性预期的决策会是一样的呢？卢卡斯混淆一和多的差别，说代表者的行为等价于一个家庭。这是一个极端简化的假设。做科学的人明白单体问题和二体问题是等价的。做一个质心变换，二体问题就变成一体问题了。所以两人交易这等价于单人交易的优化解是可以的。但三体问题就不行了，混沌怎么出来的？三体问题不可积分，所以任何问题从三到多，你从一体、二体得到的结论马上改变。我们研究的结论和卢卡斯相反，决定经济波动的是中观基础，中观在金融、在产业结构，不是微观基础几千万的家庭消费者。从这点来说，我非常欣赏黄有光老师的发言。

**历史实践可以检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

黄有光的书我还没有读，回去拜读你的书：《从诺贝尔奖得主到常人的经济错误》。我个人认为经济学不是应用数学，也不是人文。经济学不能像人文那样兼容并包。经济学应当是经验科学，实验可以检验。但是经济实验和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可以创造一个稳态的实验室，经济学检验主要靠历史的实践，尤其是大萧条、金融危机，可以检验，互相竞争的理论，包括货币学派、凯恩斯派、奥地利学派在哪些理论和政策上有对有错，能清楚发现和否定令人误导的理论。谢谢黄老师。

[ **陈平**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标题为编者所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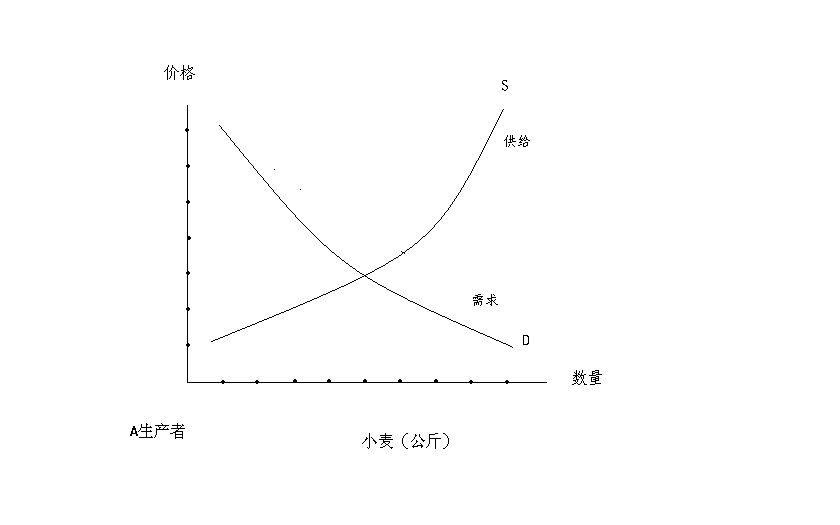
## 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转变

陶永谊

一提起经济学，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首先想到的是自利，想到的是看不见的手，想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所以，我们的主流经济学也有一个别称叫自利经济学，这个自利是从哪来的呢？是从个体本位的方法论框架引申出来的。即以单独的经济人作为经济的基本分析单元，以个人追逐私利的行为作为经济活动的原生动力，从个人的逐利行为中推导出整个市场的变化，比如供求关系和一般均衡，这就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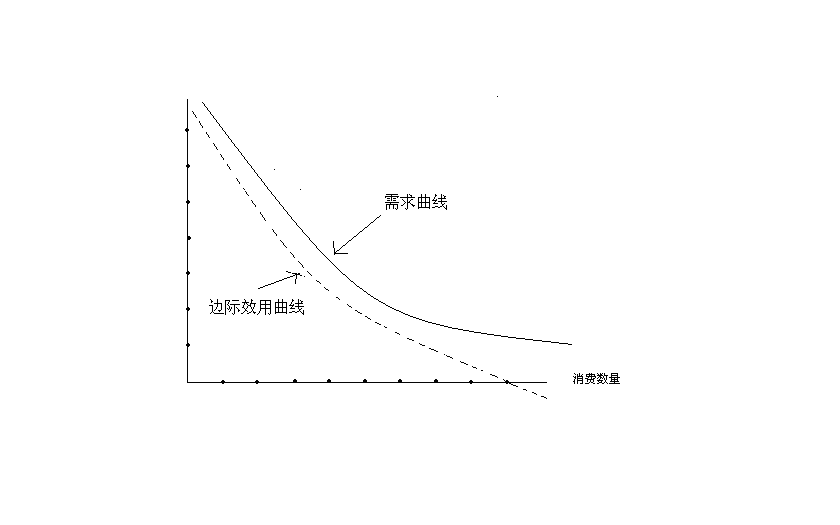
所有经济学的方法论争以及一系列对经济基本问题的看法，如果要找到根源的话，其初始分歧点，就是基本分析范式的分歧。分析范式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基本分析单元。物理学的基本分析单元是原子，基本粒子；化学是分子；生物学是细胞和基因。我们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元是什么？经济学教科书的回答是——独立的经济人。

打开经济学教科书，通常一开篇就是这个图：



图中的需求曲线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供给曲线从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两条曲线相交的点为均衡点。经济学最终论证的，其实也就是中间那个均衡点是存在的。我提出疑问的是，这个图是不是哪里出错了？我学经济学，一开始也认为商品交易理当如此，但到后来下海经商后，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这个图形中只有一个生产者，一种商品，也只有一个商品的价格。但是，我们知道商品经济是交换的，这里头我们没有看到生产者的需求，生产者的需求包括他的生产性需求和他的消费性需求，但是在这个图形里面没有反映。如果我要加进生产者需求，供给曲线还会不会这么走？比如说我的贷款到期了，我作为生产者，要不要低价把我生产的商品卖掉呢？又比如我有一套房子，当我发现一个回报率高于房屋租金收益的投资项目时，尽管现在房价很低，我也会把它卖掉，去投资那个收益更高的项目。如果没有生产者需求，你尽可以说，价格升高生产者才会增加供给，也仅仅是可以而已。但是，如果加入了生产者需求，不管是他的生产性需求还是消费性需求，这个图就不能这么画了。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图里面没有时间坐标，但是均衡点的实现，却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供求双方反复博弈才能实现的。加入时间坐标之后，这个图形的意义就变了，为什么？我们先看需求曲线，各位都是经济学家，这一条线谁都知道是什么，但是我现在还要问这个问题，这是什么线？如果加入时间以后，我就要问这条线是过去的线，现在正在运行的线，还是未来的线？如果我们加入时间坐标以后，这条线能不能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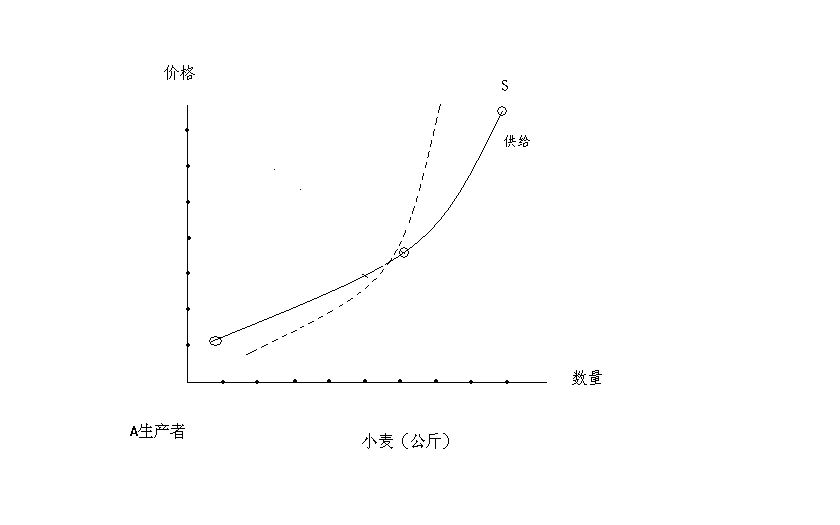


我们先看，假如说这条线已经是过去的线，它已经实际发生了，比如股市从6000点跌到2000点了，是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的那样，我们从高位一点点的下去，越低买得越多呢？如果你问市场的投资者，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后悔，后悔自己买早了。他们在做什么事呢？通常是在上面买了以后，跌下来害怕，卖掉了，半山腰冲进去，跌下来，又卖掉，越往下越不敢买，跌到最低点的时候，往往是市场最黑暗的时候，很多人会赌咒发誓再也不进入股市，敢买的人是最少的。并不是越往下价格越低买的人越多。所有大宗商品都是地量地价，天量天价，反而是最高位，需求量最大，成交量最大，买得最多，和主流经济学的假定相反。所有的市场都是这样，不管是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以及猪肉、大蒜、红小豆、姜、糖......等消费品市场，都是如此，为什么？我一会儿再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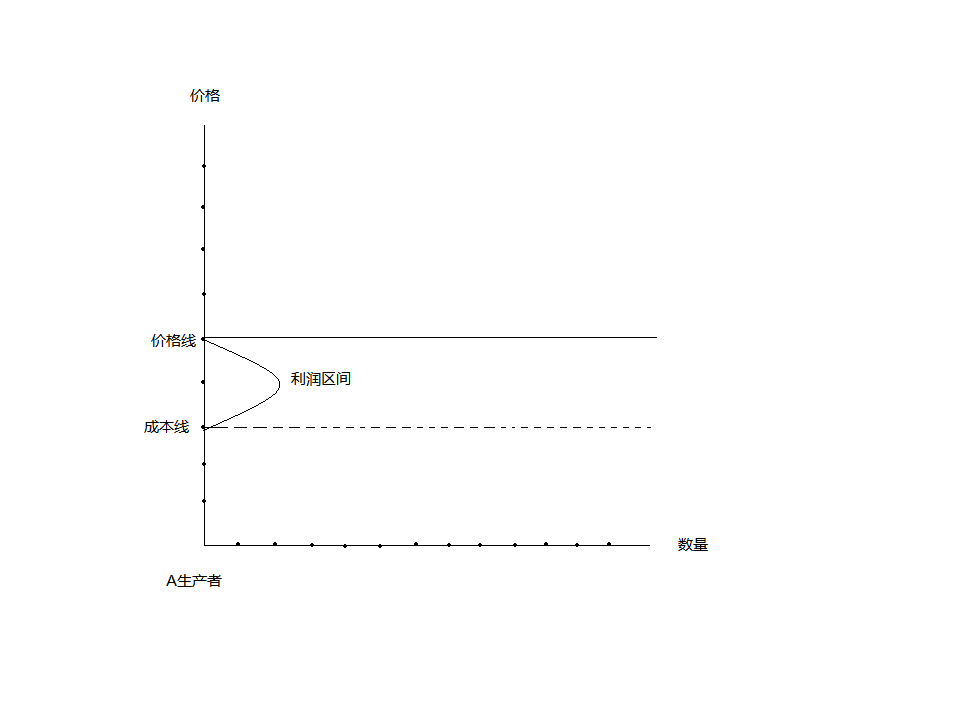
我问如果是现在的线，假定6000点跌到2000点，就到这一点了，我问在座的诸位，该不该买？现在看低的能看到1000点，看高的能看到6000点，谁对？谁是理性的经济人？事实是在这个点位你并不知道该不该买，以及该买多少。这是讲现在。

如果它是未来的线，假定我们是在6000点高位，你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你知道股市会跌到1600点，你会在下跌过程中买吗？肯定不会，你会等跌到1600点的时候买。一加入时间坐标以后，我们这些假定就全都是废话。

我们再看供给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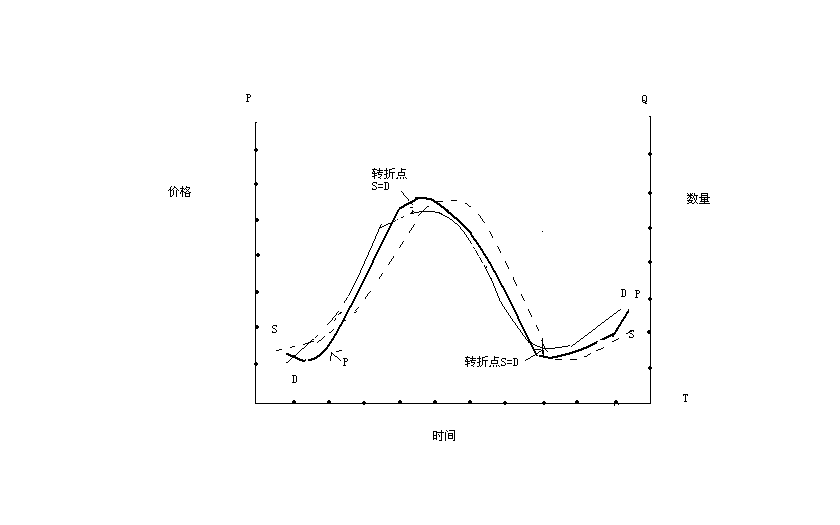


我刚才说了，你这条供给曲线没有讲生产者需求，生产者需求是什么？如果是生产性需求，那就是他的生产成本，如果你的生产成本的上涨超过了产品价格的上涨，如上图所示，你还会不会增加供给呢？应该不会。从交换的角度来说，你这条线不成立。维护主流经济学的人会这样来辩护：我们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假设价格上涨会导致生产者增加供给。事情真是如此吗？如果我们假定成本不变。生产者无限增加供给的前提是什么？并不需要以价格上升为前提，只要价格不变就足够了。只要不变的成本和不变的价格之间有利润空间，比如，有20%的利润，我就会无限地扩大生产。我们看这个图：



有利润空间，且固定，生产者就会增加供给，这也是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下假定的状态。在假定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供给不需要以价格上升为前提。

实际上的价格运行是什么？请看下面这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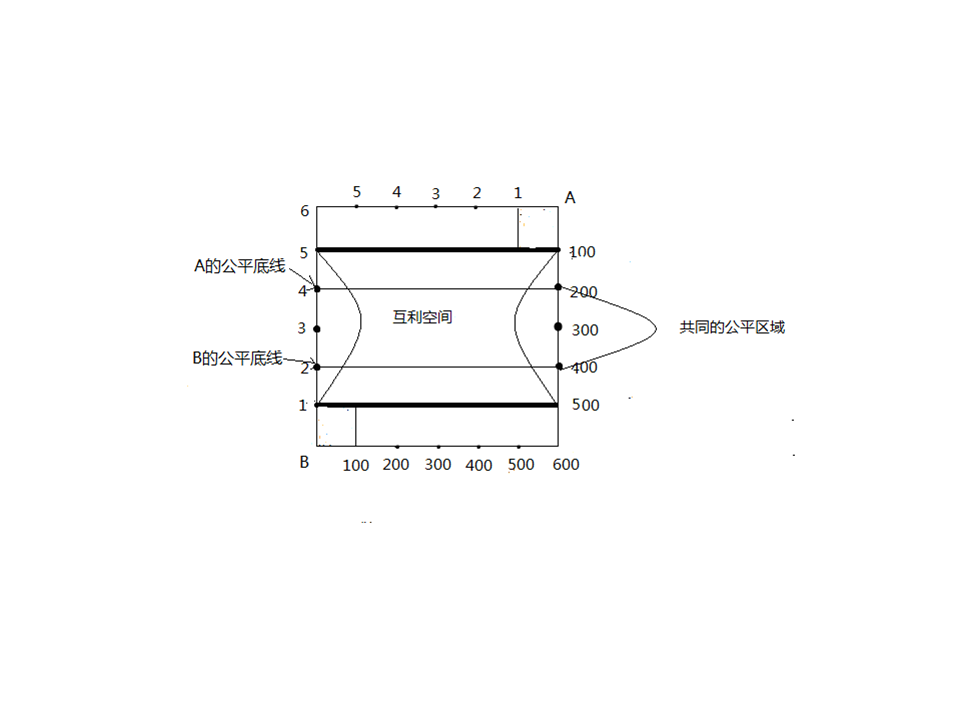


与我们经济学教科书描绘的不一样，这个图有双纵轴，就是价格和数量两个是并行的，在价格上升的时候，交易的数量也在同步增加。这个是为什么呢？这就是资本的存量和流量之间的转换。而且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同向而行的，而不是相对而行的。即上涨的时候供给量和需求量同时上涨，但只要需求量大于供给量，价格就会上升；同样，当价格下跌时，供给量与需求量同步下跌，只要供给量大于需求量，价格就会下行（更为复杂的价量关系请参阅拙著：《互利：经济的逻辑》第五章）。两者相交的点S=D，不是均衡点，而是转折点（见图中的S=D之处）。

另一个有趣之处是，市场价格会自我实现。当上涨产生赚钱效应以后，就会吸引更多存量，比如银行的存款，国债，债券，或者是房地产的资金，会转移到资本市场里来，这是存量变成流量。在价格上升过程中，不断的上涨本身会形成更为乐观的预期，就吸引更多的存量转化为流量。所以越往上涨，不管是买入还是卖出，数量都在增加。如果上涨的行情跨年度，投资者赚钱效应会增加消费，使一部分消费类上市公司的业绩得到改善。另外，上市公司通常都有交叉持股，股价上涨会增加上市公司的资本收益。从而形成进一步的上涨动力。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实现。当然股价不会无限上升，这个转折点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资本存量向资本流量转换到了它的极限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政府出台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市场就会出现反向运动，每一次上升都会被更多的抛盘打下来，高点一个比一个低，低点也一个比一个低。股票赔钱了，投资者的消费也会受到影响，上市公司的交叉持股大幅缩水，资产负债表自然也不那么好看了，从而形成进一步下跌的动力，这就是下跌产生下跌，越跌大家越不敢买，形成恶性循环。直到资本流量向存量的转变达到极限，买入量终于可以超过卖出量时，市场才会止跌。所有的走势都是过头的，不是涨过头就是跌过头，不会出现向均衡点收敛的走势。股票市场自产生以来，都是大起大落。大宗商品市场和其他初级消费品市场也是如此。

我觉得最奇怪的一点，就是我们经济学家实际上并没有进入到这个市场，他们是作为局外人、旁观者来看这个市场的，但却以斩钉截铁的态度讲价格运行的轨迹，显得十分武断。根本的问题在于分析范式出了问题。经济学讲个体本位，以独立的个人作为基本分析单元，所以我们就会在推理的时候带来一系列逻辑悖论，包括收益最大化的假定。在资本市场实现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在最低价买入，在最高价卖出。从个体本位的角度，似乎没有问题。但是，放到交易系统中，你在最低价买入，一定要有傻瓜在最低价卖给你，你在最高价卖出的时候，一定有倒霉蛋在高位接你的盘，你的最大化受益是以别人的收益最小化为代价的。这不是普适法则。

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要改变这个分析范式。判断一个分析范式合理不合理，要看这个基本分析范式是不是涵盖了我们所要分析的经济类型的基本要素，如果简化到失去了基本要素，就会失真。添加过多次要因素，就会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商品经济的本质是交换经济，它的基本范式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至少要有两个生产者，要有两种商品，另外要有两种商品价格，你才能构成一个商品经济的基本的交换单位。这个才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分析范式。在这个范式里面可以看到商品交易的边界在什么地方，请看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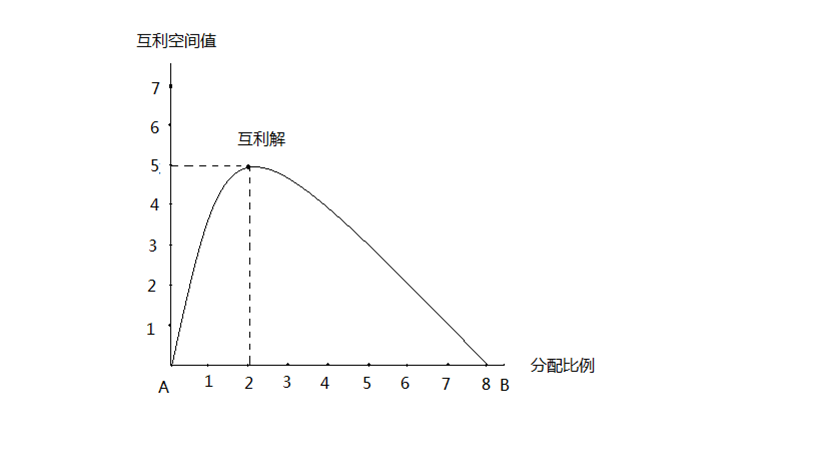
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左下方和右上方这两个小方块是在没有分工的情况下，双方自给自足时的生产效率，分工以后，大家技术改进、效率提高，就会产生比各自分别单干的时候更高的效率。这个更高的效率形成了双方的互利空间，双方通过分工提高效率以后，再通过交换分享这个效率，这是商品经济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如果交换比率超越了互利边界，比如上下两头的黑线，这是重置成本。如果按这个交换比率进行交换受损害的一方认为还不如自己生产，你的交换就无法完成了。中间两条线叫做什么呢？叫做公平底线，在行为学实验中可以找到它们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样的博弈条件下，比如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式博弈，讨价还价式博弈，完全民主式博弈，公平底线处在什么位置，行为学家做了很多实验，由于时间关系不在这里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本人拙著《互利：政治的智慧》第二章。

我们经济学讲个体本位，只有一维向量，一个座标，这就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人利益扩张的边界会和另外一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边界相冲突，最后演变成囚徒困境和斗鸡博弈。囚徒困境就是大家都选择背叛，按照理性原则和自利原则，理性经济人的占优策略就是永远选择背叛，最后的结果是双输。互利就是要合作。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主持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实验。他用囚徒悖论的模式设计了一个有限次重复博弈的支付矩阵，并向全世界的博弈论专家发出邀请：找到这种囚徒困境博弈“锦标赛”中最好的策略（即能收到的总支付最大）。在连续三次竞赛中，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阿纳托尔·拉波波特教授提供的“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策略均胜出。所谓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就是第一回合选择“合作”，然后每一个回合都重复对手上一回合的策略。

对此，阿克塞尔罗德总结出，好的策略（也就是可以获得生存优势的策略）要具备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善良，即永远不首先背叛。这与利益最大化假设下的占优策略（总是背叛）完全不同。二是宽恕，即很容易忘记对方过去的错误，一旦对方“改过”，即以合作对待。三是不嫉妒，即当别人和你赚得一样多时，你依然很高兴。显然，这对决策主体的要求，就不仅仅是自私那么简单了。所以。主流经济学的完全自利原则，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生存策略。在欧奇斯和罗斯1988年做的最后通牒试验中，分了8个试验小组，其中4个偏向自私自利的小组，平均收入最低。这似乎暗示着，那些按照自利原则去行事的交易当事人，有可能在现实的商业活动中被淘汰出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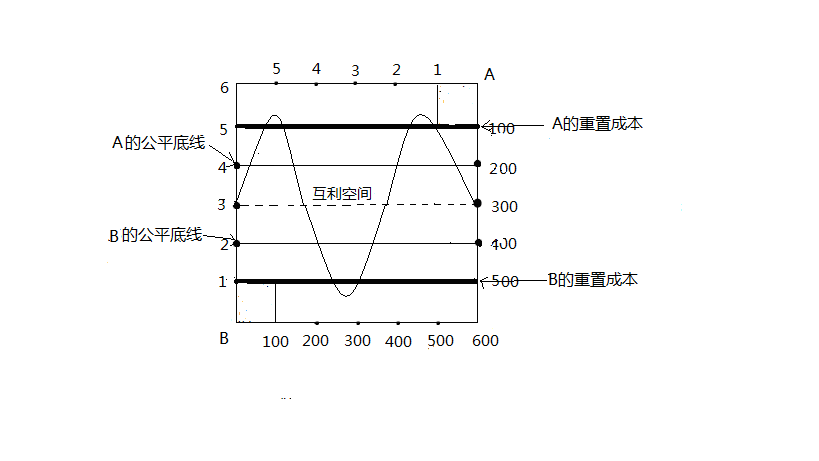
互利空间实际上是一个弹性空间，它会随交换比率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分配比例定的合理的话，互利空间会扩大。换句话说，互利空间不是一块固定大小的蛋糕，我多分了，你就少分了，不是这样的。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比较容易理解，1929-1933年大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也包括日本。当时松下幸之助的企业刚刚起步，生产许多新的

产品，金融危机来临时，商品在仓库里面堆积如山，当时他在住院，他的属下给他打了一个报告，就是怎么裁员，怎么降低工资。但是松下幸之助说我一个人也不裁，一分钱也不降，上半天班，剩下半天干嘛呢？去推销产品。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两个月时间内，所有的产品销售一空。这就是说，互利可以形成正反馈，给我们带来更高的效率，使这个互利空间扩大，蛋糕增大，使每个参与方都能够从中获利，并不是零合博弈，我多得了，你就少得了。所以，下面这个图形表示什么呢？就是互利空间值和分配比例有一个对应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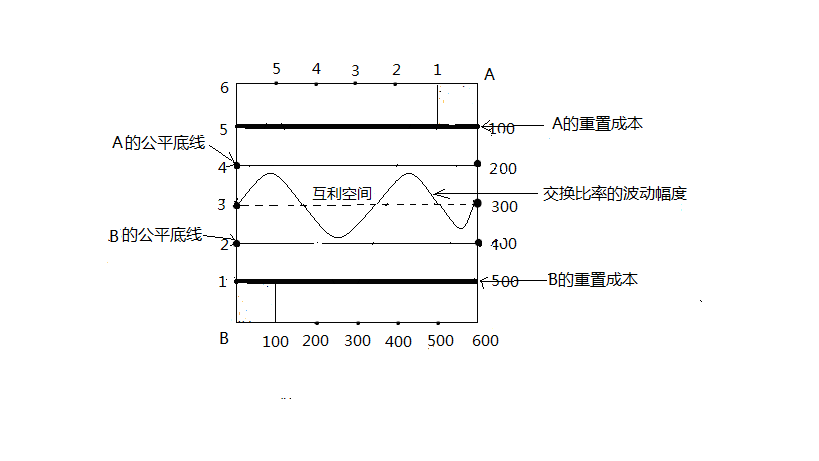
我们需要寻找到的是互利空间的最大化，就是对所有利益参与方，在互利空间中占有份额的正增长。生活当中例子非常多，包括棚户区改造，包括劳资关系，包括体制改革，因为时间关系不展开了。实际上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就是互利解，即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在这个前提下实现互利空间的最大化，我们所有的政府决策都应该追求这个目标。

回到这个互利空间的图形，我们来解释价格变动的意义：



把价格变动放到互利模型里头，我们来理解它的含义是什么。我们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对于价格变动讲的是货币和商品关系，是买卖。但是，如果从交换的角度来说，价格变动实际上是交换比率的变动。比如猪肉价格上升，其他价格不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用其他商品和猪肉进行交换的比率发生了变化。从这个二元模型里头我们能理解出所有价格变动的含义，它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一旦价格变动所反映出来的交换比率的变动走向极端，就会突破商品交换的重置成本，也就是分工的重置成本。分工的重置成本是什么含义？就是我和你交换还不如我自己生产划算。结果是大量生产要素向价格虚高的产品生产领域流入，因为按照极端的价格，意味着你即使是二百五，也能赚大钱。要素跨部门无序转移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等你生产出来以后价格就一路下跌，下跌到什么程度？大蒜跌到7分钱一斤时，不要说无效率的生产者受不了，就是最有效率的种植户也只能破产，你只能赔本甩卖。所有市场的效率，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你扔掉的牛奶，烂掉的大蒜，刚盖了两年就拆掉的猪舍.......都造成大量的无效投入。价格的波动，并不是总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人们的选择是有成本的，如果我们假定英国食品价格是均衡价格，英国每年有40%的粮食被浪费掉，就意味着你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和需求对接，让需求方不感到短缺，需要多生产40%的东西跟他匹配，剩下那40%是浪费掉了。更不要说价格走到极端的情况下许多的无效投入最终被淹没了。

我们争论了这么多年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却始终没有说清楚政府和市场边界在什么地方，市场确实有价格的引导作用，但是并不一定都是正面引导，在很多情况下是误导。用下面这个模型就可以看出政府作用在哪里，它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说，政府的作用就是要把价格的波动范围，控制在互利空间的公平域之内。政府可以不去直接生产，但是政府要控制交换比率的变动，这个事情在中国有过成功的案例，这就是唐朝大理财家刘晏对粮食价格的调控。刘晏根据历史统计数据，把粮食价格变动分五个档次，每个档次分别规定不同的买入和卖出数量，他通过“常平仓”建立了一个仓储系统，地方官员发现粮食变动到某一个价位的时候，根据他事先编好的程序，不用请示朝廷，就主动去做。如果请示，研究以后再批下来，再赈灾，人已经饿死了。最后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安史之乱之后，中唐反而出现了很少有的兴旺景象，粮食价格稳定，民众安居乐业。还有一条大家没有想到的，就是政府不征税，却可以通过这种高卖低买的过程增加政府收入，不增加民众负担，这才是真正互利的做法。

所以，互利的二元结构，可以反映商品经济交换的本质，把基本范式确定以后，我们就可以从里面推论出其他许许多多分析方式，并且可以演化出多元的模型。我觉得关键是你分析的起点一定要正确。就好比说我们要盖一个大楼，要把地基选对，如果没有把地基选对，你楼盖的越高就越危险，最后终究会塌的。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 **陶永谊** 下过乡、当过兵、经过商也做过学者，现为独立学者、执牌证券分析师、中天经济研究中心独立投资人。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 神经元经济学 深刻认识人类行为的科学

叶 航

根据会议安排，让我讲一下神经元经济学。从2004年美国成立国际神经元经济学会到今天，刚好整整10年。国内对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其实很早就跟进了，我们2005年就写了神经元经济学的综述。《经济研究》找不到匿名审稿人，直到2007年才发出来，到今天也已经过去七、八年了。经常有人问我，国内的神经元经济学研究现在进展如何？坦白说，我们的后续研究进展很慢，因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首先是它的技术门槛特别高，比如，最基本的研究工具，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正电子发射成像（PET）等设备，价格动辄两三千万元。另一方面是它的跨学科研究性质引起的，浙大7所附属医院虽然都有这个设备，我和汪丁丁曾经与三四家医院都谈过合作研究，但最后都没了下文。这就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困难之处，搞医学和神经科学的人往往很难明白经济学想做的研究是怎么回事。经济学研究与普通的脑神经研究确实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我们的研究往往涉及博弈过程中的脑认知，它需要两人、甚至多人的对垒；但磁共振和PET的操作要求很苛刻，人进去以后就不能随便活动了；而且博弈过程的信息交互也是一个难题，它需要多台设备同步运行。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医学院的老师虽然都很热情，但最后往往不了了之。这也难怪，医院做一次磁共振收费近千元，做做一次PET收费近万元；商业利润非常大，给你做这些研究就没有什么动力，所以很难进行下去。

好在神经科学的技术发展特别快，近两三年来的突破，就是出现了新的技术工具，比如功能性近红外脑成像（fNIRS）。与磁共振和PET比，不但价格便宜（市场价大概四五百万元，让学校买就比较方便），关键是操作要求没有磁共振和PET那么严格，它允许被试动来动去，因为它的测试探针是定位在大脑上的，位置定好以后，人动不影响测试，非常适合做行为博弈研究。正因为近年来技术上的突破，所以我们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另外，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补充。10年前我和汪丁丁翻译Neuroeconomics的时候，颇费了些周折，最后决定将其翻译成“神经元经济学”（关于这个译法，我们在2007年《经济研究》发表的综述中专门作了说明）。但近几年来，以Neuro为前缀命名的学科越来越多，比如Neuromanagement（神经管理学）、Neuroethics（神经伦理学）、Neuromarketing（神经营销学）等等，其它学科都按惯例将其命名为“神经某某学”。所以现在我们写文章时就比较少用“神经元经济学”这个名词，干脆符合大家的习惯，将其称作“神经经济学”。

下面通过我们最近做的一个脑成像实验，给大家介绍一下神经元经济学究竟怎样进行研究。我们的实验是研究人类损失厌恶的神经基础。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异象”（Anomalies），即人们的行为完全偏离了标准经济学模型的预测。上世纪70年代末，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就发现了人类风险决策过程中的“损失厌恶”现象，而损失厌恶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早上林毅夫提到，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他把人类的利他行为作为一种偏好包含到效用函数中，从而极大拓展了主流经济学理性假设的视野。这没有问题。但对理性假设还有另一方面的挑战，这就是卡尼曼他们做的工作。因为理性假设的核心是一致性公理，一个理性人的行为必须符合一致性公理的要求。但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人们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遵循一致性公理的要求。对主流经济学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更致命的挑战。

以损失厌恶为例，它在哪些方面挑战了主流的理性假设？理性假设有两个基本内容，一个是作为理性决策最大化目标的期望效用理论。在期望效用理论中，期望收益的大小与收益的正负没有关系，比如6元钱收益减5元钱成本，还有1元钱盈余。也就是说，不管是收益还是成本，1元钱的价值就是1元钱，所以它们可以合并在一起计算。但卡尼曼他们却发现，人们对损失的估值要远远超过同样大小的收益。用公式可以表示为-v（-x）＞v（x），这显然是违背期望效用原理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实验来中发现，如果一个赌局为50%的概率赢1千块钱，50%概率输1千块钱，通常没人会去玩。虽然按期望效用理论计算，它们的期望收益是相等的。理性假设更重要的内容是一致性公理，而损失厌恶对理性假设的另一个挑战，就体现在对一致性公理的违背上。假设有A和B两个情境，情境A：选项1为100%获得100元，选项2为50%获得200元或50%获得0元；情境B：选项1为100%损失100元，选项2为50%损失200元或50%损失0元。根据期望效用原理，A和B中的期望收益是相同的；如果一个人的偏好是风险规避，无论在情境A还是情境B中，他都应该选择不包含风险的选项1；如果一个人的偏好是风险追逐，无论在情境A还是情境B中，他都应该选择包含风险的选项2。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却发现，绝大多数被试在情境A中选择的是选项1，在情境B中选择的却是选项2。这一结果表明，同一被试在情境A中是一个风险规避者，在情境B中却成了一个风险追逐者。这就是所谓的“偏好逆转”，它显然违背了一致性公理的要求。卡尼曼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的合作者特沃斯基因为逝世而没有获此殊荣），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获奖词中提到，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人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但来自实验的研究却表明，经济理论中的某些假设需要做出修订。

现在讲讲我们做的脑成像研究。我们希望搞清楚人在做出上述决策时，他的神经基础是什么。说到底，神经元经济学无非就是研究人们决策的神经基础。我们的实验设计把卡尼曼做过的实验进行了扩展。因为只让被试做两个选择，脑成像不一定能够记录下神经元的反映。于是我们分别为上面的情境A和情境B设计了一组选择。其中情境A为收益域实验局，它由9道分别包含一个固定收益选项和一个风险收益选项组成，如第1题：（1）100%的概率得到100个筹码，（2）50%的概率得到200个筹码或50%的概率得到0个筹码；第2题：（1）100%的概率得到100个筹码，（2）50%的概率得到190个筹码或50%的概率得到0个筹码，等等。情境B为损失域实验局，同样由9道分别包含一个固定损失选项和一个风险损失选项组成，如第1题：（1）100%的概率损失100个筹码，（2）50%的概率损失200个筹码或50%的概率损失0个筹码；第2题：（1）100%的概率损失100个筹码，（2）50%的概率损失190个筹码或50%的概率损失0个筹码，等等。我们让被试在计算机上进行选择，并以内置的随机程序给出每一选择的实际支付，实验结束后以10:1的比例将被试获得的筹码兑换成人民币作为他们参加实验的报酬。在被试进行选择时，我们同时用功能性近红外仪扫描被试的大脑皮层，从而获得他们决策时的大脑成像。这个实验是去年暑假期间完成的，我们通过浙大校内论坛cc98在线招募了30名被试，专业覆盖人文、社科、工科、理学、生物学、医学等20余个不同院系；其中男生20人，女生10人。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实验结果。这是功能性近红外脑成像仪的外貌（PPT展示），它的体积比磁共振小多了，在我的办公室里就能做。功能性近红外脑成像的主要原理，就是利用血液对近红外光的反射来测量大脑中含氧血红蛋白（HbO2）和脱氧血红蛋白（Hb）的浓度变化，从而标识出脑区的激活状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二维成像图，上面这张图是被试进行收益决策时大脑皮层的激活状态，下面这张是被试进行损失决策时大脑皮层的激活状态。请注意，右上角的这一块和左上角这一块有明显的差异。当被试处于收益情境时，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Left 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被明显抑制；反之，当被试处于损失情境时，右背外侧前额叶皮层（Right 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被明显抑制。相关的脑科学研究表明，对应该区域的脑区主要执行的认知功能包括思维和直觉、信息的回忆加工、以及情绪的解读等等。通常，大脑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参与正面情绪的产生和调节，右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则参与负面情绪的产生和调节。我们的脑成像研究有三个重要发现：第一，损失厌恶是有其神经基础的，人类处置收益与处置损失的脑区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第二，人们的偏好是异质的，这与主流经济学对人类偏好的同质性假设不符；第三，人类的决策行为并非完全依赖理性的计算，事实上人的情绪也参与了这一过程。比如风险规避，它可能是某种恐惧感的产物，阻止了我们去冒险。

上面介绍的是脑成像研究，但对神经元经济学来说，这个研究还没有结束。因为你虽然揭示了损失厌恶的神经机理，但却没有解释人类为什么会具有这一特殊的神经结构。这就涉及到对人类行为和心理演化机制的研究。但演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会牵涉多重变量，以及随机性、涨落性和涌现性等多种复杂系统的特征，这些性质一般无法给出精确的解析性分析，也就是说经济学常用的数学方法无法用来分析这个问题。在自然科学中，对这类复杂系统，比如气候变化、潮汐环流、疾病传播等等，往往是通过计算机仿真来研究的。因此，神经元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需要引进计算机仿真实技术。

为了研究损失厌恶行为的演化机制，我们首先要给出一个模型。这个模型背后的故事非常简单：我们假定一个原始人出去觅食，看到一个大蘑菇，正要采这个蘑菇的时候，突然前面跑出一只野兔；他现在面临的抉择——究竟是采蘑菇还是追野兔？野兔的热量比蘑菇大，但是有风险，如果追不上，回来这个蘑菇就可能被其他人采走了。为此，我们需要设置5个基本变量：一个是食物的种类，到底是低风险食物还是高风险食物；第二个是给出不同食物的热量；第三个是获取某种食物的概率；第四个是各种食物在自然界的分布，即丰度；第五个是行为的突变率。另外还要做一些基本假设，例如一定的热量可以使一个原始人维持几天生命，多长时间不补充热量就会导致死亡，以及热量与一个人繁殖率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们把这些变量和假设编成程序，就可以用计算机来模拟原始人的生存状况和演化过程，并试图搞清楚怎样的觅食策略更有利于原始人的生存。

这些图片是我们通过计算机仿真得到的结果（PPT展示）：这张图表明，如果给定低风险食物的热量为1个单位，高风险食物的热量为10个单位；低风险食物获取的概率为100%，高风险食物获取的概率为30%；低风险食物的丰度为0.8，高风险食物的丰度0.4；突变率为0.001；那么仿真结果表明，具有风险规避偏好的原始人（由仿真图中的绿色曲线代表）就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这张图表明，如果把高风险食物的热量从10提到12，获取概率从0.3提到0.5，丰度从0.4提到0.6，仿真得到结果就不一样了，风险规避行为和风险追逐行为都有一定的进化优势，很难分出伯仲。如果将高风险食物的总体期望收益提高到低风险食物的3倍以上，风险追逐（由仿真图中的红色曲线代表）就会替代风险规避成为具有进化优势的行为。这个结果很有意思，它与卡尼曼等人对损失厌恶的研究非常接近。卡尼曼他们通过大量的行为实验发现，一单位损失带给人们的负效用大约需要用2.5~3倍的收益才能弥补。所以，我们通过计算机仿真得到的结果能够很好地映证并解释卡尼曼等人在行为实验中发现的经验事实。对人类的生存活动来说，要达到这个条件需要较高的生产效率。在人类演化初期，不可能提供这么高的生产率。只有到了距今60万年左右，人类学会使用火以后，生产能力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距今3~5万年左右，人类发明了弓箭才大幅提高了捕获其他动物的效率。但相对人类700万年的演化史来说，我们的祖先在90%的时间里事实上都处于生产率极端低下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风险追逐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就像一个在沙漠中行走的人，额外的一加仑水可以让他感到更舒服，但损失一加仑水却可能让他陷入灭顶之灾。我们的计算机仿真表明，损失厌恶可能是一种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获得的、可以通过模块化的大脑神经结构加以遗传的适应性心理本能。

由演化导致的人类大脑神经结构的改变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现代人的心智模式，在很大程度是被我们祖先的生存环境所塑型的。因此，演化心理学家认为“现代人的头脑里装着一副石器时代的大脑”。因为农业文明至今才1万多年，工业文明只有200多年，而人类祖先已经在采集-狩猎状态下生活了数百万年。这就带来一个对经济学来说非常重要的事实：人们所做的选择未必会有利于他们自身福祉的改善，除非当前的选择环境与人类偏好演化的历史环境完全一样。例如，人类对糖和脂肪的偏好是数百万年采集-狩猎社会食物严重匮乏的产物，只是在最近一个世纪内，人类才开始摆脱了饥饿的威胁。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要抑制对糖和脂肪的偏爱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哪怕他们知道过分摄入这些“养分”会导致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等一系列有害健康的症状。再如，今天人类面临的风险决策环境虽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千百万年演化过程对人类心理产生的影响却仍然没有消失。在股票市场上，人们往往会过早抛掉上涨的股票，表现出对收益的风险规避（即所谓的“落袋为安”）；但却会长期持有下跌的股票，表现出对损失的风险追逐（即所谓的“博反弹”）。这就是损失厌恶影响我们行为决策的重要例子。同样的现象在房产市场上也非常普遍，房产所有者在价格低于其买入价时，显得极为惜售；为了能在将来以一个满意的价格出售房产，他们不惜长期承受维修、税收和按揭成本。在标准的经济学模型中，这些行为显然是非理性的。因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应该不受前期投入的“沉没成本”的影响。

最后，我想讲一下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对经济学的意义。

第一，神经元经济学打开了“偏好”这一黑箱。萨谬尔森曾经认为，偏好作为人的主观愿望是无法观察到的，我们所能观察的只是人们的行为。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萨缪尔森的担忧今天已经不复存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脑科学领域内出现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活体大脑的观察技术。随着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正电子发射成像（PET）和功能性近红外成像（fNIRS）等技术的不断成熟，神经元经济学今天已经可以完全无创伤地深入人脑内部，观察人类行为与决策过程的神经机理。在神经元经济学家眼中，效用或偏好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们第一次具有了哲学意义上“本体论”的地位。这无疑会对经济学的研究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二，神经元经济学在研究中广泛使用的行为实验、脑成像和计算机仿真等技术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经验实证的工具。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非常成功，但数学只为经济学提供了逻辑实证的工具。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逻辑自洽只是科学理论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科学理论得以成立的充分条件则是它所提出的假设必须得到可观察、可重复的经验事实的验证。以物理学为例，牛顿的三大定律只有在精确预测了行星运行的轨道后，才能成为经典的力学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只有在观察到空间弯曲所引起的红移现象后，才能成为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因此，数学工具为现代物理学提供了逻辑实证的必要条件，而天文望远镜、电子显微镜和粒子加速器则为现代物理学提供了经验实证的充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实验、脑成像和计算机仿真就是经济学研究中的天文望远镜、电子显微镜和粒子加速器，它们为经济学真正的科学化提供了经验实证的充分条件。

第三，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非常大的实践意义。例如，神经元经济学对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表明，人们之所以通过金钱和物质帮助他人，并非完全出于广告效应、声誉效应等深谋远虑的自利目的；对捐赠者的脑成像显示，人脑中负责多巴胺（Dopamine）分泌的神经元被显著激活，而多巴胺水平的提高则可以给人带来精神愉悦。这个研究结论具有很大的政策意义，无偿献血的机制设计正是依赖于人们利他行为背后的精神因素，如果无视人类所具有的这种非自利的行为动机，采用金钱激励的方法反而会造成供血量的萎缩和供血质量的下降。还有一个例子，一项涉及信任博弈中委托人风险偏好的神经元经济学研究表明，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并非来自“理性的计算”，由大脑下视丘“室旁核”（Paraventricular nucleus）和“视上核”（Supraoptic nucleus）神经元所产生的催产素（Oxytocin），可以明显提高被试在人际互动中承受风险的水平。根据这一结论所做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家投资银行如果根据交易员催产素水平的高低来调整他们的岗位，比如在牛市中让催产素水平较高的人充当交易员，在熊市中则让催产素水平较低的人充当交易员，平均盈利水平可以提高30~40%。

总之，神经元经济学可以让我们对人类的行为、人类的偏好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这无疑可以极大地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由于时间关系，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 **叶航**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标题为编者所加 ]

## 演化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

黄凯南

感谢！我补充一点，我觉得林毅夫老师创建的新结构经济学十分关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边界。在他的理论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最终落在有效率或有竞争力的产业政策中。而有效率的产业政策则是“最大化实现它的潜在比较优势”，因此, 这里便存在最优的边界。同时，由于要素禀赋是内生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政府与市场的有效边界也是动态变化。这是我对林老师理论逻辑的一个理解，我在这里做个补充。

我今天汇报的题目非常大——“演化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主要是向大家汇报一下过去几年我做的主要工作。首先，先谈谈我个人理论思考的起点。我是从对均衡的思考才走向演化的。当我在受新古典均衡分析训练时，我始终有一个疑问很难解开，即均衡怎么产生，以及均衡如何内生演变，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指引下，我开始思考经济学的个体微观假设。我们知道，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个体被视为同质，运用代表性的个体描述其它个体的行为。例如，代表性的消费者和代表性厂商。当新古典经济学从一般均衡理论发展到博弈论时，经济模型中的个体假设也从代表性的个体转向有差异的个体。博弈论中的参与者们在“策略集”、“信息集”、“行动次序”、“报酬集”等都可能存在差异。尽管博弈论允许参与者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博弈论依旧假定参与者是理性，并且参与者的理性以及博弈规则是共同知识，这意味着参与者之间运用相同的心智模型（mental model）或认知模式去解读他们所在的博弈场景，亦即参与者们在认知模式是同质的。尽管经典博弈论宣称是研究多人策略互动问题，但是，从本质上讲，由于参与者之间共享一个心智模型或认知模式，它实际上是一个人心智的博弈。因此，由于预设了参与者之间在认知模式上的同质性，博弈论实际上不探讨参与者的认知问题，或者说本质上不探讨知识增长问题，它仅仅关注激励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弱化博弈论有关认知模式同质性的假设，认为我们每个人的认知模式的不一样的，即认知模式存在异质性，经济学的研究将与认知科学结合起来，走向跨学科的研究。一旦参与者的game model不一样，或者假设参与者在互动中首先是依据其主观博弈模型（subjective game model）行事，博弈规则或共同知识外生给定的假设将挖掘，参与者之间如何形成共同知识或博弈规则亦即如何形成有关博弈如何进行的共同信念将是十分重要。这意味着，参与者存在两个层面的学习，即学习博弈规则（learning games）和学习如何博弈(learning how to play in games)。这样一来，均衡的形式可能就不再由完全理性的参与者瞬时实现，而是要经过上述两个层面的学习过程来获得，亦即均衡是演化出来的。由于强调参与者认知模式的异质性，很多封闭的模型很难接受，这时更多运用多主体模型来建模，以及仿真模拟来描述。

我认为，演化经济学理论存在如下几个问题：（1）在理论分析框架方面，缺少一个较为统一的分析框架是制约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原因；（2）在微观行为假设上，同样缺少较为成熟和统一的行为分析逻辑，因而也很难构建基准的行为模型；（3）在模型构建方面，尽管越来越多的模型被贴上流行的“演化标签”，但是，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还存在很大的争议；（4）演化分析与均衡分析的比较、融合与发展还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5）制度演化分析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还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6）从技术变迁的视角研究经济演化增长较多，但是从需求和制度的视角研究经济演化增长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的研究。（7）在实证研究方法上，有关计量、行为实验和仿真模拟等方法的综合运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针对流行的仿真模拟分析存在的局限，如何运用历史分析、行为实验和计量分析来确定和校准各种参数和初始条件等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应用。

我从方法论、微观、中观和宏观等方面阐释我在这些领域的理解、研究和一些创新。

在方法论层面。通过对“综合达尔文主义”的深入研究和发展，尝试构建一般性的演化分析方法。 将“普适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选择和遗传”转述为“创新、选择和扩散”，其中，“创新机制”对应于“变异机制”，“扩散机制”对应于“遗传机制”。相应地，一个简单的演化分析可以建立在“创新机制”、“选择机制”和“扩散机制”三段论的描述上。例如，考察某种新技术是如何产生的（创新过程），并且在竞争中是如何具有优势从而脱颖而出（选择过程），以及技术是如何被广泛接受和使用（扩散过程）。但是，如果考虑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必须拓展传统三段论的机械描述，还必须考察这三种机制的互动关系（例如，“创新机制”、“选择机制”和“扩散机制”各自如何相互影响），从而考察三者的内生关系，构成一种相互反馈的环状解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这三种机制应用到解释社会经济系统多层级和多个互动者（例如，个体、企业、产业和国家）的演化分析上，并考虑各个层级的演化机制相互嵌套和互为因果关系，便能够构建多层级和多主体的共同演化分析。因此，“创新机制”、“选择机制”和“扩散机制”的相互作用及其在多层级和多主体（即互动者）间的互动机制构成了社会经济系统的一般性演化分析方法。根据问题的复杂程度，研究者可以选择社会经济系统的层级数目和主体数目进行研究。在此视角下，深入研究这些演化机制的互动机制以及多层级和多主体共同演化的机制。在解决这一理论难题的基础上，将此演化分析逻辑进一步运用到解释个体与制度的关系上。在阐释“个体主义方法论”和“集体主义方法论”两份法的局限和困境后，从学理上论证个体与制度的共生关系，研究个体如何影响制度生成和演变、制度如何影响个体认知、偏好、激励和行为，以及个体与制度相互影响的机制等。对演化经济学数学模型的研究，基于演化经济学基本共识，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考察演化模型。其一，根据是否将创新内生化，将模型分为完整演化分析模型和局部演化分析模型；其二，根据参与者理性的程度强弱，将演化模型区分为无意识演化模型、弱意识演化模型和强意识演化模型；其三，根据模型中是否考虑参与者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的差异，将演化模型区分为个体演化模型和群体演化模型。

在个体行为演化方面主要基于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神经元经济学、脑科学和生物学等跨学科研究视角下尝试构建个体行为演化研究框架、模型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个体偏好不仅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享乐主义效用，还包括各种由基因遗传的本能、个体心理倾向、内化的社会道德、价值和习惯等。可以不严格地用以下四个维度来阐释偏好的内涵：生物演化的维度、基因与文化协同演化的维度、社会文化制度维度和个体认知心理维度。这四种维度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共同作用于个体，塑造了个体的具体偏好。存在四种类型的偏好演化动力机制：物质收益变化驱动、信念变化驱动、价值变化驱动和心智模型变化驱动等。在这四种动力机制中，前三种实际都是由收益（包括外在物质收益和内在价值收益）变化驱动的偏好演化，后一种则涉及到学习规则的变化。对于个体理性假设，我提出了“认知理性”的概念，即拥有完整生物神经结构（neurobiological structures）的个体（即正常人）通过生物调节过程（bioregulatory processes）、个体学习过程和社会学习过程等各种层次的认知过程，建立应对外界环境刺激的稳定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能够促使个体有效地处理各种有关内部机能和外部环境的能量、信息和知识，提高个体在各种演化环境中的适应性。我认为，这是一个更为一般性的理性概念，它涵盖了当前各种理性研究的主要特征，充分体现了当前经济学理论与认知科学结合的趋势，它也能够调和建构理性和演化理性的冲突。在认知理性的视角下可以归纳一些个体的学习模式：（1） 无意识学习（non-conscious learning），强化学习模型（Bush和Mosteller，1955）、参数化的自动学习模型（parameterised learning automaton）（Arthur，1991）；（2） 较弱意识基于惯例的学习（routine-based learning）。这是一种较弱意识的认知行为，包括满意模型（Simon，1957，1987）、模仿模型（Bandura 1977；Rumiati & Bekkering，2003）和 VID 模型（Brenner，1999）等；（3）较强意识的个体学习模型。 随机信念学习（Stochastic belief learning）（Brenner，2004）、规则学习（rule learning）（Kandel & Schwartz，1982）、贝叶斯理性学习（Jordan，1995）、虚拟行动（弗登伯格和莱文，2004）、遗传编程（genetic programming）（Back，1996）、神经网络（Heinemann，2000）和经历加权吸引模型（Camerer&Ho，1999; Brenner，2006）等。

再谈谈对制度演化的理解和研究。从“个体与制度的关系”这一视角来梳理当前制度经济学研究存在的局限和困境。无论是仅仅从个体的视角研究制度，将制度视为个体选择的结果，还是仅仅从制度考察个体，将个体视为制度的产物，都不能准确解释个体与制度的关系。前者在方法论上容易陷入还原主义的窠臼，后者容易被贴上集体主义方法论的标签，进而被视为制度或文化决定论。这里遵循“个体与制度互动主义方法论”，从共同演化的视角来阐释两者的互动关系，将偏好和制度都纳入内生解释中，这必将推动制度演化理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偏好和制度的内涵与外延，深入研究偏好演化机制和制度演化机制，考察制度和偏好如何相互影响，进一步构建两者的共同演化机制。集中考察两种类型的共同演化机制，即由参与者收益变化驱动的共同演化以及由学习规则变化驱动的共同演化，建立相应的共同演化模型，对其进行仿真模拟实验，考察不同类型的学习规则对制度演变速度的影响。针对当前流行的制度博弈分析（经典博弈论和演化博弈论）存在的局限，系统探讨演化经济学与博弈论之间的学理关系，指出主观博弈论是沟通演化与博弈的重要工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演化分析”与“均衡分析”的冲突，并为构建一个包含制度生成和制度内生演变的理论分析框架提供良好的分析工具。进一步系统演化主观博弈论，在主观博弈论的视角下探讨两种类型的制度，即作为共同主观博弈模型的制度和作为有关博弈如何进行的共同信念的制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多群体、不对称、连续策略空间的解释制度生成和演变的主观博弈模型，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运用Swarm平台进行仿真模拟实验，考察参与者主观认知的差异程度以及不同类型学习规则对制度生成和演变的影响。在此理论基础上，选取城镇小区住宅共有资源的治理制度转型为例，使用微观田野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制度可以被定义为参与者之间互动形成的规则系统，而这种规则系统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协调、组织和约束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从而降低互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作为互动规则系统的制度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规则：其一是行为层面上的规则，即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它刻画了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均衡，是可以观察的层面；其二是信念层面上的规则，即共享信念（shared belief）（例如，Aoki，2001），它描述了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状态不确定性的共享信念。当存在多种可能的互动结果时，它描述了参与者之间有关达至某一具体结果的共同信念，刻画了参与者之间的信念均衡；其三是价值层面上的规则，即参与者之间拥有的共享价值观，描述了参与者之间对行动意义和重要性拥有共同的评判标准，它通常塑造了参与者的行为动机；其四是认知结构层面上的规则，即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共同认知模式或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 model）（例如，；North，2005）。它是指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信息拥有共同的信息加工和处理模式（即共同的信息结构），包括共同的信息编码规则、抽象规则和解码规则（例如，布瓦索，2003），刻画了参与者之间认知模式的均衡。它使得参与者之间能够运用相同的心智模型来感知和解释其所处的互动场景。在这四种规则中，除了行为规则，其它层面的规则都是很难被直接观察，但是，其它层面的规则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在行为规则上，并且会影响行为规则的稳定性。上述四种类型的规则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包含行动规则、共享信念、共享价值和共享心智模型等在内的规则系统。这种规则系统会影响和塑造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互动过程以及互动结果。在这意义上讲，制度实际上很难被明确地区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任何制度都是包含所谓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规则系统。

最后谈谈演化宏观问题。对于经济演化增长过程的理论描述是基于种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假设整个经济系统由多个不同的产业（种群）组成，每个产业由多个不同的参与者主体（包括企业、消费者和各种组织等）组成。因此，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是由各个产业的演化及其互动构成的，而各个产业的演化则是由各自产业内部的参与者主体的互动演化构成的。经济演化过程伴随着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演化，是一个多层级的复杂系统演化。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伴随着经济演化增长，而且是推动演化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因此，经济增长涵盖以下一些演化过程：一是企业的演化。这主要表现为企业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提升自身的生产率；二是产业内部的演化。产业内部存在多个参与主体的互动（例如，企业间以及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等），这种互动伴随着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而后者又影响企业的生产率和效益，促使高效益企业的扩张和低效益企业的收缩，也伴随着新企业的进入和落后企业的淘汰。在这一过程中，各个企业的增长率是不同的，产业增长率可以通过产业内部企业的平均增长率来描述。同样，伴随着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产业增长率也发生变化，产业可能经历“成长、发展、成熟和衰落”等不同阶段。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整个产业内部的技术结构、制度结构和偏好结构都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在产业的成长和发展期，创新频繁发生，在共同演化的作用下，技术空间、制度空间和偏好空间都得到扩展，产业内部存在多种技术的竞争，制度和消费也呈现多样性。当产业发展到成熟期时，创新减少，在竞争的作用下，多样性减弱，产业可能会出现较为流行和标准的技术、制度和偏好；三是产业间的演化。各个产业间的互动会进一步推动产业间的竞争和演化，这种演化伴随着优势产业的扩张、劣势产业的收缩，以及新产业的兴起和落后产业的淘汰等；四是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化。产业间存在不同的增长率，整个经济系统的增长率则是由产业群体的平均增长率来描述。由于无论是产业内部还是产业间的增长率都存在差异，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结构性的演变。而这一结构性演变的过程伴随着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演化。演化增长具有如下一些不同的显著特征：一是，在经济系统中，不同要素、单元、部门或产业并非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具有相同不变的增长率，相反，它们具有不同的增长率，即增长率是异质的。例如，在一个多部门的经济体中，每一部门并非沿着一个加总或平均增长率发展，而是每个部门拥有不同的增长率。因此，作为刻画整个经济系统增长的加总增长率或平均增长率更多是一个统计意义的概念，它表示各种差异增长率的均值。因此，演化增长分析并非直接从加总生产函数或加总增长率出发，而是基于各种差异化的经济活动及其差异化的增长率。而这种差异化的增长率是促使经济系统发生结构性变迁的重要驱动力（例如，Metcalfe 和Foster，2009）；二是，经济增长并非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所描述的动态一般均衡的过程（例如，平衡增长路径），相反，由于诸如技术、组织和制度等各种创新的涌现，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非均衡的过程。当然，在经济演化增长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均衡 ，但它仅仅是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驻点，而不能成为演化增长的终点，更不是演化增长的起点。正如Foster（2011）强调的，演化增长过程首先是一个非均衡的动态过程，其次才是在此非均衡路径上可能产生均衡的动态过程；三是，在演化增长过程中，由于各种经济活动主体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演化增长本质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自组织过程。在此过程中存在诸如正反馈效应、路劲依赖、锁定和结构不可逆性等复杂系统的特征；四是，演化增长更为强调经济系统的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不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副产品，它是演化增长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内生于演化过程中，并且是促使演化增长的根本原因。从这角度上讲，演化增长不同于新古典的“狭隘”增长观 ，它更接近于经济发展的概念，这也是演化增长理论向古典经济学宏大分析视角的回归（例如，Dopfer和Potts，2008）。我构建了一个多层级、多主体的演化增长模型，由于时间原因，模型的具体细节不再讲，讲一个最近我们做的一个研究结论：（1）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可以被分解为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经济增长率受到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等因素的影响；（2）从1990至2011年，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1991年到2011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均值为10.54%，其中，由各行业自身增长效应均值为9.39%，结构变迁效应均值为1.15%，结构变迁效应占增长率比重为14.95%。除了1997年到2001期间以及2007年个别年份结构变迁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其它年份结构变迁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总体上讲，过去20多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主要还是由各行业自身技术进步引致的，但就业结构的变化也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3）中国经济增长平均68.5%左右由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积累驱动，31.5%左右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驱动，其中劳动生产率增长平均7.14%源于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重新配置的结构变迁。尽管资本积累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是，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是资本增长的2倍多；（4）以2001年为分界点，劳动增长率的贡献在此之前呈现上升趋势，之后则呈现下降趋势，后10年劳动增长率的平均贡献仅仅是前10年的一半左右，但是，结构变迁效应的平均贡献则是前10年的5倍左右。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下降，但是就业的“结构红利”总体上正在处于上升趋势。

实际上，我赞同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我更认为大量的投资应该投到促进结构升级的领域中，从而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结构红利”。

简单归纳一下：我研究的整个方法论是基于个体与制度的互动主义，研究个体时，我强调制度对偏好的塑造，即制度不仅仅具有激励功能，还具有塑造认知的功能。从这个角度上将，我们每个人的偏好都很难说是独立的，只要你承认个体偏好受社会制度的影响，个体偏好就带有一定的社会性，因此，我们或多或少都拥有社会性偏好，很难绝对区分利己和利他偏好。在制度演化分析中，我也秉承这个方法论，研究拥有不同主观博弈模型的个体之间如何通过学习形成有关博弈场景的共同知识以及有关博弈如何进行的共享信念。我尝试从主观博弈的视角来描述这个问题，秉承着这个方法论。在宏观研究中，我尝试基于偏好、制度与技术共同演化的视角构建多层级和多主体的演化增长模型，也是基于此方法论。我想说明一点，我过去研究的逻辑是相对一致的，我愿意将我的研究框架拿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讨论部分）

黄凯南：

首先我一直强调我没有否定新古典，相反，我一直强调演化分析与均衡分析的对话、交融和互馈。我再强调一下，我的思考是从均衡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内生演变。首先，我回答一下盛洪老师的问题。当前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理论对制度研究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它们主要关注激励问题。我不是认为激励不重要，激励当然很重要。但我更关心认知问题，我认为对于制度转型认知也很重要，而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我集中精力从演化的视角来研究参与者认知差异对制度生成和演变的影响。关于陈平老师的问题，我从方法论上谈个体与制度的互动主义，这个方法可以运用到多层级中，正如我在演化宏观中所谈的，企业、产业和经济体等层面。业进谈到的GDP问题，其实，我整个方法和传统的增长理论是不同的，我不是从加总的生产函数出发去构造计量模型，经济体的增长率是由产业增长率的加权得出的。而对于演化博弈运用的时间长度我有不同看法，由于假设博弈框架是给定的，对于生物演化系统，环境的变化可能较为缓慢，博弈框架可以视为给定，演化博弈可以被运用于解释漫长的生物演化，但是，对社会经济系统而言，尤其是转型经济而言，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博弈框架很难给定，演化博弈很难解释，或者演化博弈只能被用以解释相对短期的演化现象。我和毅夫老师之间没有本质的冲突。我对他的理解时，在发展经济学中，对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分析新古典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产业升级蓝图。我认为，林老师的贡献是将结构变迁纳入新古典分析中，从而得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但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创新更为重要，充满不确定性，新古典分析就很难刻画这种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而演化可能更具有解释力。谢谢大家。

[ 黄凯南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大学县域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 暴力要素及相关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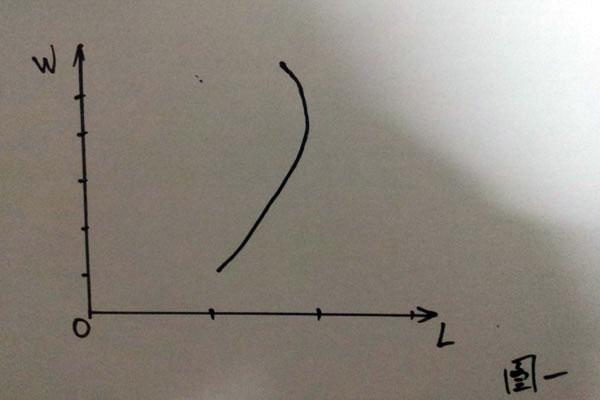
吴思

感谢天则所给我这么一个讨教的机会。我想今天谈的话题就是“暴力要素及相关均衡”。暴力要素，可以对应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我想把暴力要素或破坏要素引入经济学。反过来说，也可以看作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到暴力领域。

我用一下黑板，先介绍血酬定律，然后介绍与血酬定律有关的均衡。都说黑板经济学，可是诸位大经济学家都不用黑板，我这个外行来用。画出来请大家指教。

一、血酬定律:命-财关系曲线

这是大家熟悉的劳动供给曲线。纵轴是工资，用W表示，横轴是劳动供给，用L表示。工资越高，劳动供给越多。这种正相关的供给关系，也被称为供给规律。（图一）



现在我把这个坐标系改一下，把横轴劳动(labour)扩展为生命(life)，把纵轴工资(wage)扩展为财富（wealth），这样一改，这条劳动供给曲线就成了生命供给曲线：拼命，暴力掠夺,以命博取财富。当然，命-财关系曲线的位置也需要重新确定。

命-财关系曲线的位置怎么确定呢？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一个一个地寻找人的生命的对价，人们在什么条件下肯卖命，卖多少命，冒多大的险。一个点一个点地确定，然后连成一条线。历史上有大量命价方面的数据，但是卖命者的身份处境时间等等条件不同，找到完全相同条件下的一组数据非常困难。

于是，我用第二种方式确定卖命曲线的位置，也就是确定卖命与卖力的关系，流血与流汗的替换率，然后按比例移动卖力曲线，得出卖命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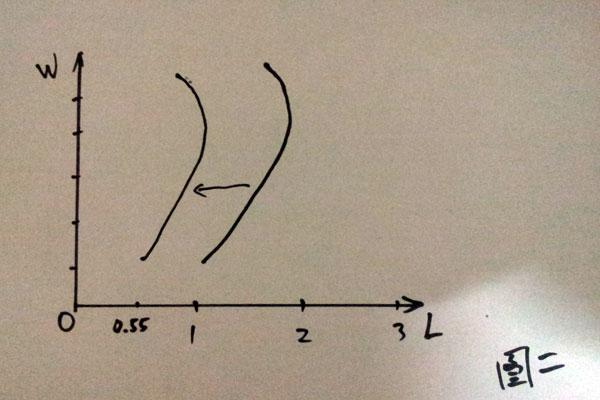
血和汗的替换率是多少呢？根据2003年劳动年鉴和统计年鉴，我计算出的比率是1：1.83。1代表一个生命年，在你的预期寿命中减去一年，卖掉一年寿命，你要多少钱？1.83代表流汗年，比如我在建筑工地打工一年多。这个比例关系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2002年和2003年，中国煤矿工人死亡率是千分之3.98。如果在建筑工地打工，死亡率大概是千分之0.08，相差千分之3.9。工资相差多少呢？煤矿工人一年多挣2578元，这笔钱，当年建筑工人要干将近3个半月才能挣来。我把这2578元看作是对这千分之3.9的死亡率的补偿。其他条件都差不多，建筑工人的劳动条件、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都接近。如果这个数字补偿了千分之3.9的死亡率，我们很容易算出来一条命值多少钱，3.9%，39%，100%就是一条命。一条命值多少钱呢？66.7万元。当年煤矿工人的平均年龄30岁，中国男人的预期寿命是70岁，一旦死了，等于损失40年寿命。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一年的寿命值多少钱。多少钱呢？1.67万。这就是上百万的农民工在工作选择中表现来出的对自己生命的估价，一个生命年要价1.67万。

如果在建筑工地打工，挣这笔钱需要1.83年，即一年零十个月。1比1.83，这就是血汗替换率。血汗替换率=年命价/年工价。如果把流汗年作为1的话，生命年就是0.55。

1980年前后,美国煤矿工人的命价约为100万美元,血汗替换率为1比1.78。中美两国煤矿工人的收入相差数十倍，但血汗替换比率非常接近。

一旦确认了血汗替换率，我们就可以按比例把劳动供给曲线从横坐标1的位置，左移0.55的位置，这条新线就是生命的供给曲线，卖命线。它描述的现象，用俗话说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图二）



当然，钱多到一定程度，工资太高，劳动供给反而减少，曲线后弯，因为人们钱多了反而不愿意再那么卖力了，他们更在乎闲暇了。卖命也是一样，钱挣到一定数量，黑道人物往往金盆洗手，曲线也会往回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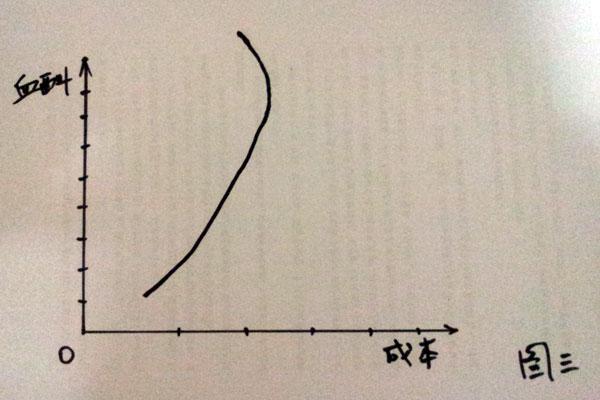
这条线描述了生命和财富的关系，我称之为命-财关系曲线。这就是血酬定律的狭义版，也是核心版。

我很快就扩大了这个版本，因为人们在卖命抢劫的时候不单考虑生命，他们权衡很多因素，例如道德，再如机会成本——我要拼命抢劫吗？我是不是还有其他挣钱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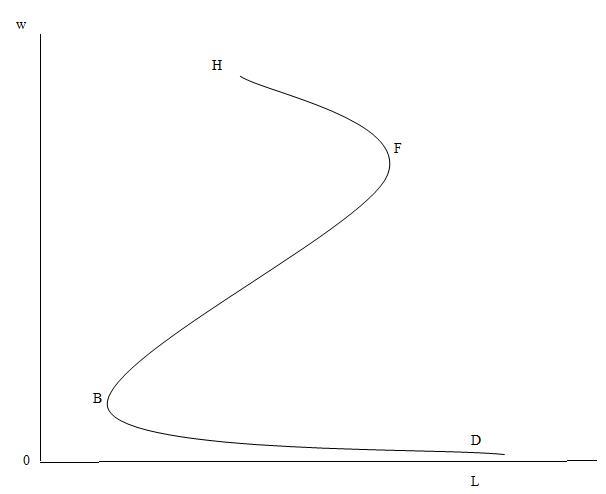
一旦把这些因素加入之后，我就把狭义的血酬定律扩展为广义的。广义的血酬定律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名词解释：什么叫血酬？血酬就是暴力掠夺的收益。第二个要点是定律，即：血酬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发生。换句话说，暴力掠夺的强度、广度与血酬正相关，与成本负相关。这个成本包括道德成本、机会成本，财物投入等等。当血酬大于成本时，人们进入。当成本大于血酬时，人们退出。第三个要点是：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这三个要点就是广义的血酬定律。

这条定律可以解释什么人容易上梁山。我们知道，穷人的机会成本低，富人的机会成本高，穷人更容易上梁山。有血债的人，机会成本是负的，他们会逃往梁山。教育水平高的人，就业机会比较多，机会成本高，就不那么容易上梁山。当然，读书人一再落第，也可能上梁山当军师。如果读书人有革命理想，把梁山当作实现革命理想的地方，他们还会主动投奔梁山，实现精神方面的人生追求。如果精神力量和物质利益结合得好，愿意上梁山的人就更多了。

在这个广义的血酬定律版本中，我再次扩展坐标系，把命-财关系曲线的纵轴从财富（W）扩展为血酬，包括了暴力掠夺的各种收益，甚至心理方面的收益。横轴也从生命（L）扩展为所有成本，包括道德成本。这条曲线，就是血酬定律的图形表达。（图三）



大家手头的《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论文集》里有我一篇文章：《弯腰下跪：命-财关系曲线》，那是我七八年前写的，那条线是之字形的，在图二的弯腰形曲线之下加了一捺。（图四）



大家不必看这篇文章了。我当时没太想明白，现在也没想明白。我总想标明，有那么一条血线，生存资源匮乏到一定程度，钱财就从身外之物变成了身内之物。比如一杯水，在特别匮乏的条件下，在沙漠里，缺了这杯水，你的体液就会减少一杯，你就更接近死亡。在饥荒时期，你不吃这一碗饭，你体重就下降一两。这时候身外之物就成了身内之物。一旦被逼到了这条血线，也就是上午陈平老师提到的生存线，在这时候机会成本极低，例如大饥荒、大规模失业又没有救济，那时候，人们会大规模加入暴力掠夺的行列。反正都是一死，与其等死，不如拼命挣扎一下。这条血线在命-财关系曲线中如何表达呢？资源越少，人们愿意付出的生命越多，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找饭吃。可是，我加上这一捺以后很心虚，好像逻辑和图形都有问题，或许应该用曲线的横移来表达。想不明白就不多说了。

二、与血酬定律有关的均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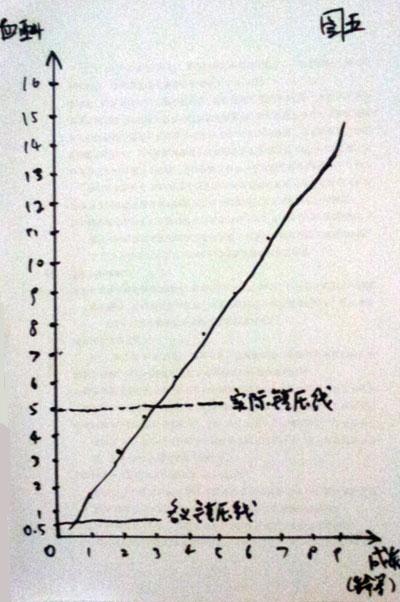
第一条谈的是血酬定律，第二条就是与血酬定律有关的均衡问题。这些均衡，至少包括四种状况。

1、第一种状况，即政府出面维持秩序的均衡。

我们知道，受害者对抢劫没需求，在暴力掠夺领域没有经济学上的需求曲线。但是，经济学上的供需均衡，正是由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交叉形成的。没有需求曲线，暴力掠夺领域的均衡如何形成？

面对抢劫，人们的需求是自卫，是抵抗抢劫，要求政府出面镇压抢劫。政府方面投入物力人力，镇压抢劫，构成了一条镇压线。

这条镇压线与命-财关系曲线的交叉点就是均衡点。政府确定某个金额标准，在此之上追究判刑，成为抢劫者的成本，让抢劫者得不偿失。镇压判刑是负激励，负激励与正激励相等时，均衡出现。（图五）



镇压线有很多条。比如说超过五千元就应该立案，这就是一道刑法规定的镇压线。实际上，现在五千元水平的犯罪量太大，已经立不起案了，这道线也成了一条名义上的镇压线。这些年实际立案的标准提高到了五万块，这也可以看作一道镇压线。当然，如果破案率不高，即使罪罚相称，犯罪的实际风险和损失还会下降，犯罪依然有利可图，很多人很愿意赌一把。破案率不高，意味着实际镇压线的位置继续提高，高出命-财关系曲线对应命价的部分，就是卖命的额外收益。我们知道，贪官污吏也是冒险拼命，以身发财，对贪官污吏的真实镇压线在什么位置呢？2009年的基本数据是，贪官污吏被追究判刑的概率约为1%，贪污十几万元判刑十年，具体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这里就不细说了。从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是：2009年，贪污到160万元左右，贪官污吏才付出一个生命年，也就是关押一年。镇压线的高度是160万。这个位置如此之高，大体可以解释贪官污吏遍地的现象。160万元关一年，大家想想这个诱惑是大是小？听说里面的生活还不错。贪官污吏获利极大，按照血汗替换率的公式推算，假如司局级干部的月薪为8000元，一个生命年的价值不过17.6万，真实收益比预期合理收益高9倍，除非道德成本高到可以补上这个差距的程度，良心非常敏感，否则，一般人很难抵抗这个诱惑。

政府应该掏多少钱维持这条镇压线？把这条压低到什么程度？换个角度说，把破案率提高到什么程度？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对镇压线的最佳投入标准是：政府新增投入一块钱，可以减少掠夺所造成的损失一块钱，这就是政府镇压投入的最佳点。当然这里不考虑社会影响，仅仅考虑经济数字。

政府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民主政府，一种是专制政府。在民主政府的条件下，民众达成协议，决定掏多少钱，维持一条什么水平的镇压线，这条镇压线是他们购买的一种公共物品。

如果是一个垄断权力的专制政府，例如一个暴力集团打天下坐江山，要保住江山，维护秩序，也要镇压大大小小的以暴力掠夺为生存策略的竞争者。不过，他们的镇压线，他们建立的那种均衡，不那么在乎民众的权利，他们可能过度杀戮，大规模严打，肃反，连坐，刑讯逼供，压缩民众的自由。这又是一种镇压线，这种镇压在短期内也很有效。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经常看到这样的均衡状态，有时候还能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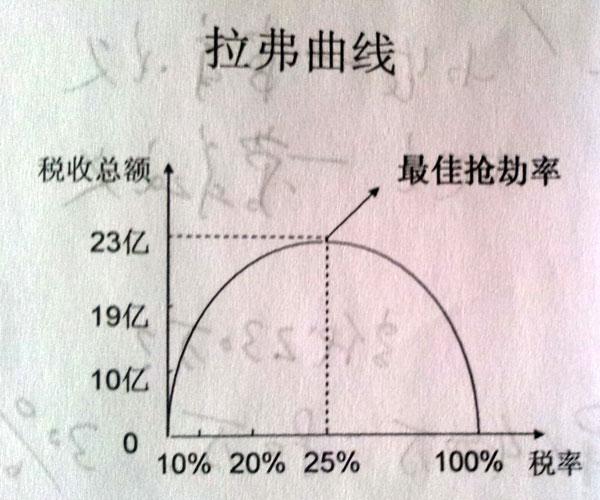
总之，有不同的镇压线，名义上的，实际上的，针对平民罪犯的，针对贪官污吏的，等等。不同类型的政府，还有不同类型的镇压线。

2、再讨论第二种状况，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之间的均衡。

这个均衡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从生产集团的角度看，面对抢劫，他们可以抵抗。集体联合抵抗，就是上边谈到的民主政府对暴力掠夺的镇压。这是积极抵抗，这里不再讨论。消极抵抗，包括逃亡，怠工，甚至自杀。从暴力集团的角度看，要对付生产集团的消极抵抗，必须控制抢劫率，控制自由度，甚至要设法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由此形成两种均衡。

第一类均衡，最佳抢劫率。

生产出来的东西都被抢光，就没有人生产了。所以，暴力集团要寻找最佳抢劫率，建立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之间长期可持续的均衡关系。这个均衡怎么表达呢？可以用讨论税率与税收总额的拉弗曲线表达。上次我在天则所谈到掠夺率问题时，盛洪说拉弗曲线描述的就是最佳掠夺率。（图六）



纵轴是税收总额，横轴是税率。税率越高，税收总额越高，高到峰顶，比如说是25%，就是最佳税率。如果税率继续提高，许多公司就会破产，税基缩小，税收总额反而下降。

税收是强制性的，抢劫也是。抢劫率也要适度，不能杀鸡取卵，一锤子买卖，也要寻找最佳抢劫率。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强盗土匪也会做出一些承诺，按一定比率收取买路钱，甚至在自己的地盘上对生产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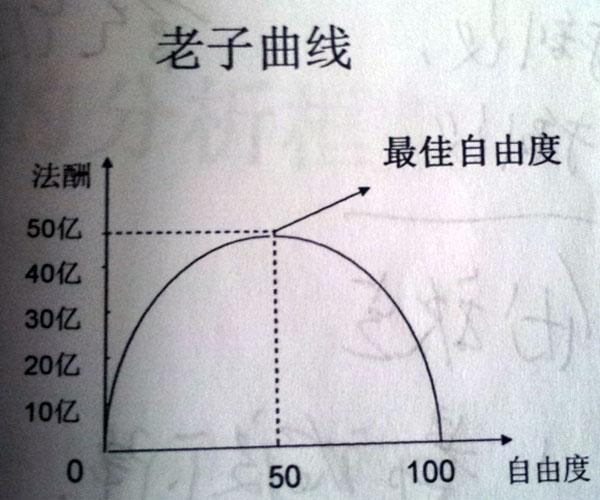
在这条曲线中，我把最佳抢劫率标在峰顶极值的位置，例如最佳抢劫率是25%。这只是长期反复抢劫者的最佳抢劫率，对流寇之类的一次性抢劫者来说，最佳抢劫率是100%。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做出了流寇和坐寇的区分，还说坐寇与被抢劫者之间存在共容利益。从拉弗曲线上看，共容利益就是从原点到峰顶这一段。这条曲线所描述的就是坐寇与生产集团之间的均衡。除了坐寇均衡之外，还存在流寇均衡。

用拉弗曲线描述抢劫率问题，纵轴和横轴都应该修改。横轴从税率改为抢劫率，纵轴改为法酬。

法酬也是暴力掠夺的收入，但是比较高级，有节制，有自律，有规矩。法酬是血酬的升级版，血酬的2.0版。用公式表示：法酬=全部税收-公共开支。法酬也是我杜撰的概念。杜撰之前，我曾经请教一位专家，我说取之于民100亿，用之于民90亿，政府运作10亿，这个公式对吗？他说对。多出来的是盈余，不足的是赤字。我的问题是，如果取之于民100亿，用之于民50亿，政府运作10个亿，剩下的40亿用之于己，修陵墓，修皇家园林，包二奶包三奶，后宫佳丽三千等等，这笔用之于己的钱叫什么？专家说没有这个词。可是，历史上到处有这个现象。这种剩余比马克思推算的剩余价值明白多了，怎么能没有一个名字呢？我给它起的名字就叫法酬。

第二类均衡，如何寻找最佳自由度？

更高级的抢劫制度，抢劫对象不是财物，而是自由。这方面的掠夺和限制也存在分寸问题，我称之为最佳自由度。我们都知道《盐铁论》，官府垄断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后来还扩展到榷茶榷酒。榷是独木桥的意思，也就是茶酒专卖，不许别人染指。这就是限制民众的自由。对自由的最原始最彻底的抢劫就是奴隶制度。对暴力集团来说，把生产者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最好？为了方便讨论，我模仿拉弗曲线又画了一种曲线，我称之为老子曲线，和拉弗曲线的形态一样，但横轴改为自由度，纵轴改为法酬。（图七）



如何寻找最佳自由度？历史上有许多故事，这里只讲一个大家熟悉的。我们回顾一下1949年以来的历史。建国初期，毛泽东与邓子恢有四大自由和四小自由之争。毛泽东把邓子恢的主张概括为“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受限制的“四大自由”，说这是纲领性的提法。毛泽东说：“我说是四小自由。这有大小之分。在限制之下，资产阶级这些自由是有那么一点，小得很。我们要准备条件，把资产阶级这个小自由搞掉。”

最后真把自由搞掉了，结果如何？大饥荒。这就相当于坐标系的原点，自由接近零点，法酬也极少，连高干的食品供应都受限制。然后，逐渐恢复自留地，改革开放后恢复大包干，恢复个体户，再逐渐恢复农村贸易自由，还有乡镇企业，打工自由，雇工自由，各个领域的自由度逐渐增加，这些社会集团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就是自由度增加的结果。与此同时，执政集团的税收总额增加，管理成本下降，实际收入大幅度增加，连贪污腐败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当然，自由到了一定程度，再增加，法酬反而下降。比如要打破能源或金融垄断的时候，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就会受损。如果这个自由度不仅包括经济自由，连政治自由都包括进去，这条曲线的含义就更加清晰。

这就是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的第二种均衡。这个均衡关注的是自由度的问题。从生产集团的角度看，就是如何用各种消极对抗的方式，从逃跑到怠工，争取最大利益或最小损失。从暴力集团的角度看，则是调动生产集团的积极性，通过最佳自由度实现利益最大化。

从以上两条曲线中，可以引出一条更高层次的规则：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暴力最强者是规则的制订者和获益者，也是秩序的主导者和维护者。

3、第三种均衡是暴力集团内部的均衡。

这个领域有很多历史故事。小规模土匪团伙内部如何分配？民国年间，土匪按照人股和枪股年终分红，人算一股，枪同样算一股。中层头目，炮头军师等等，一个人算四五股，人力资本是普通喽罗的四五倍。最高领导，当家的，一人算七八股。由此可以看出，小团伙土匪内部实行合伙制，人人都是老板，收益同享，风险共担。人力资本高的，贡献大的，差距也不超过十倍。当时枪支短缺，在暴力要素中武器装备的地位和人力相等，用生产函数的方式推论，这意味着武器要素对抢劫结果的贡献与人力相当。

在大规模暴力团伙中，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得多。梁山内部，头领的收入是喽罗收入的60多倍。在美国芝加哥黑帮内部，中高层干部的收入是普通党徒的40多倍。规模越大，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

我们可以把军阀看作血本家，他提供武器装备，发饷，竖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掠夺收益，在扣除养兵和武器弹药成本后，剩余归军阀所有。因此，一个能干的军阀，他的收入根本不是普通士兵所能比的。

4、暴力集团之间的均衡。

暴力集团之间怎么竞争？他们在前三项基础上进行综合竞争。竞争既有政治内容，也有经济内容，还有军事内容。

在暴力集团内部，他们比赛如何激励士兵，如何激励将领。对生产集团，他们比赛如何调动生产集团的积极性，建立自耕农制度，开阡陌，奖励农耕。在自己的地盘上，他们比赛如何维护秩序，肃清盗贼和各种内部竞争者。

总之，富国强兵，并在此基础上对外扩张，攻城掠地。扩张到新边界之后，是否要继续进攻，投入多大力量，攻多远，得多少县、割多少地，都是各个暴力集团在竞争中计算的成本和收益，而边界线就是各个暴力集团之间的力量均衡线。

商鞅变法推出了一套非常高明的综合竞争策略。以重赏奖励耕战，既让士兵拼命，将领善战，同时又不会制造出新的暴力集团，制造出自己未来的竞争者。这里的要害是以虚封代替实封，名义上还有封建，实际上用郡县制代替了封建制，最后全中国只有一个暴力垄断者，好比一个管理严格的垄断公司，部下都是代理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暴力均衡状态，一家独大的状态。

所谓乱世，则是大一统垄断均衡解体，多个暴力集团彼此竞争的状态。如此治乱循环，两种暴力均衡状态交替出现。

总而言之，我讲了两条：一是血酬定律，二是与血酬定律有关的均衡。均衡又包括四个领域，一是有政府的均衡，二是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的均衡，三是暴力集团内部的均衡，四是综合上述三点的政治经济军事均衡。

如果把上述局部均衡，加入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或全局均衡之中，把暴力要素引入一般均衡，同时考虑到暴力的立法作用，即元规则地位，这样的世界图景，显然更接近真实世界。

如果大家对血汗替换率的具体算法有兴趣，对中美两国工人的命价有兴趣，可以在网上找到我在这方面的文章，用血汗替换、中美工人命价之类的关键词可以搜到。

[ 吴思，《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 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 经济学的转型

张维迎

刚才讨论得很激烈，我最近老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中国人是一个低等民族的话，这个问题就好讨论了，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话，好多问题就争论比较大，但是我自己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谈的可能跟正富不一样，我回到经济学本身，我谈一下“经济学的转型”。这是我几年来思考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很不成熟，但提出来和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首先我假设四个转型，第一个是从资源配置的理论到人类合作理论的转型；第二个是从功利主义到权利主义的转型；第三谈一下从物质主义快乐观到整体幸福观的转型，第四是关注利益到同时关注理念的这样一个转型。

我们经济学研究什么？大家知道，亚当斯密研究的是发展，也就是变化，研究的是财富的创造，但是到马歇尔那儿就变成研究均衡，陈平昨天也讲了，某种意义上稳定也是分配，哈耶克是非常不认同这一点的，哈耶克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应该是交换而非配置。我的意思是，它也可以有所相关，所以经济学研究的就是人类如何合作，特别是理性人如何合作。我们过去的配置引用它是静态的，它强调的是效率。合作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它强调的是多赢、双赢。过去我们经济学理解资源配置为最有效的制度，我认为这个有偏颇，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制度使得人类的合作达到如此广度和深度，今天的每一个产品，桌子上的矿泉水都是全人类合作的成果，不是任何一个人，甚至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生产出来的。过去的配置理论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考虑人类进步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分工。小凯过去老讲这个，配置理论里面这都是给定的，每一个行业企业都是给定的，技术又是给定的，配置理论没有办法考虑推动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企业家精神，没有办法研究像信任、组织这样一些问题，更没有办法研究法律、社会规范、道德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人类的合作是最重要的。

我举两个例子，以反垄断为例，按照配置理论，一个企业超过一定规模的话，market power 就会带来效益损失，尽管有规模经济的好处，这就是反垄断的基础，按照合作理论，我这几年发表了一个东西，没有大企业就不可能有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为什么呢？因为大企业是借了人类合作的一种链条，好比说我们敢去沃尔玛买东西，是因为沃尔玛有信誉保证，背后有数千万家的供应商都是靠它来担保，沃尔玛像一个大的承包商。经济学家讲的

perfect competition，其实是没有competition的，什么意思？就像我们教授写文章讲课，写一样的文章，讲一样的课，就看谁收费低，这就是perfect competition，这看起来很荒唐的，真正的竞争不是那样的。所以大企业对人类是非常重要的，科斯讲企业是市场的替代，某种程度上是错的，企业是市场的运行方式，没有大企业，市场是没法运行的，只会有一些小的简单的交换，不可能有现代市场的。

第二个讲增长理论，按照增长理论，我们只能变成要素，增长就变成配置效率问题，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改进亚当斯密模型，还有市场本身是合作的，分工是合作不断深化的方式，还有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财富增长、市场进一步扩大，中间所有东西都是靠企业家精神來推动，只有从人类合作的角度看，才能够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从配置的效率角度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过程，由此我们就说究竟什么是好的制度？过去我们经济学就认为，好的制度就是效率最高的制度，就是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制度。按照合作理论，怎么能够推动人类自愿合作的制度才是好制度，计划经济为什么是坏的？因为它是不利于人类合作的，计划经济大家都互相欺骗，而不是更加诚实和努力，而市场经济是好的，最有利于人类合作的。

第二个转变就是从功利主义到权利主义，经济学的哲学思想就是边沁在十八世纪发展的功利主义，后来经过莫尔的继承，一直到马歇尔之后，我们现在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全部是功利主义，有个人功利主义，趋利避害、效率最大化，还有社会功利主义，就是怎么样 Maximize social welfare ，其实它和个人功利主义是一个翻版，我们大量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评价的，功利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以目标的正当性来挣得的。手段的正当性，目标正当性，很简单，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增长的目标是正当的，我为了增长可以做出任何事情，包括侵害人权，所以功利主义是工具性的，我们之所以拥护市场，是因为它可以提供给我们效率，反过来如果限制我们的利益，就会压制它。外部性不利于效率，信息不对称不利于效率，政府就应该替代市场，所以市场的失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功利主义对产权和自由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全是功利性的，就是为了达到它的目标。而权利主义，我不知道造一个什么样的英文词，刚才黄有光教授讲了一个liberalism还有liberal equality，也是一种，其实我偏向于把这几种糅合到一块，就是权利的，权利主义是什么意思？人有一些权利是不可以被剥夺的，市场最能尊重人的权利，这是市场的道德基础，而不是因为市场简单的说，它有效率。权利主义就是自然法，中国人讲的天理，我讲的天理就是西方的自然法，与康德的自由理论相一致，所以我们最简单就是人类有一些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不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是不可剥夺的，我们经济学应该传承这一点，我来举个例子。

再回到外部性问题，昨天黄有光教授谈到外部性问题，我认为外部性是一个完全错误定义的概念，为什么呢？它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很简单地说，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外部性，只要有两个人以上，好比我声音大了你听着就不舒服，或者我讲一个观点你不高兴，都是外部性，是不是感染他了，是不是就有效率问题了？如果福特生产好，马车都被挤垮了，用什么标准看？外部性没有标准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外部性本身是权利问题，什么样的权利属于谁，我只要没有侵犯你的权利就不需要补偿你，如果我侵犯你的权利了，我就应该补偿你，好比我开一个餐馆很好，打垮你了，靠竞争，高质量或者低价格，你也有同样的权利打垮我，我就不需要补偿你，但是我雇一帮人把你的门堵上了，把你的饭馆砸了，我侵害了你的权利，我就必须补偿你。从权利主义的角度，我认为得出“外部性”是比较肤浅的，要政府干预和解决它，外部性完全是一个错误定义的概念。空气污染也是一个权利界定问题，像我说话声音大你不高兴一样，有些权利我们知道没有办法完全定义，类似于公共域，这个公共域我们怎么去解决？这是需要有一些办法的。

好比以正义为例，功利主义讲的是利害，权利主义讲的是是非，我们评价的标准就是社会福利，权利主义讲的是是非，是非就是要尊重人的一些基本的权利，我们以拆迁为例，中国为什么现在大家对拆迁的争议比较大？我们过去认为中国之所以经济发展得好和快，高速公路修那么快，三峡建那么快，就是我们中国的拆迁效率高，印度，包括美国要的成本都很高，所以我们的制度比它好，就是因为完全是功利主义的，我为了经济的增长速度，我可以不保证任何人的权利，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与此相关的，像计划生育，我们要控制人口，怎么控制人口呢？计划生育，不听怎么办？强制。所以我们中国30多年来惨无人道的控制人口方式，已经给我们带来很深的伤害，中国人按照功利主义没有道德观念了，我们华南师大一个留美教授，因为超生了，学校就开除了他，为什么开除他？计划生育部门说，“如果不开除他，我们计划生育的指标就不能完成，第一名的奖就拿不到。”中国人到了为了一个奖牌可以忽视人的基本权利，可以忽视人的生命，这个非常可怕。拆迁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了你的经济增长，就要任意地侵害别人的权利呢？有些破坏性很大，所有中国的城市千篇一律，为什么？很大程度上是功利主义，不是按照权利，按照权利的话，你为商业的目的我不让你拆，你就不能拆，你补偿多少都不行。这样的话，这个城市可以留下它的历史，中国的城市没有任何的历史，任何有钱的人全部可以拆，前一任拆了，这一任再拆，因为政治观念只对自己有感情，对任何人、历史、个人都没感情，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损坏整个历史的过程。现在我们很得意我们的拆迁效率，我们越到最后我们会越感到难过，我们的这种功利主义的行为导致的这些后果。包括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功利主义的话，民主是手段，我们现在有没有民主？中国不实行民主经济增长很好，所以民主是不好的，这个逻辑就有问题，它完全是功利主义，民主不只是手段，也是目的，为什么？它是人的一种追求，为什么是人的追求呢？我们可以从一些历史来看，现代化理论，人类最早从 survival value生存的价值到现在我们叫self-expression value，它的一个重要的转变，时间关系不多讲，功利主义有它的历史基础，就是人类为了生存拼搏的时候，可能为了整体的存在甚至可以杀掉一部分人，好比说有些70岁的老人，就把他们流放了，不养他们了，因为他们影响人类的整体生存。但是人类不可能这样，根据马斯洛的人类生存需求理论，人类越到最后，Inglehart的研究横坐标就是生存价值到自我表达价值，纵坐标传统价值和世俗理性价值，一个工业化的过程首先是从上到下，从传统价值到世俗理性价值，再下一步是从世俗理性价值横向往self-expression 的角度表达，就全世界的统计，八大发达国家都在东北角，还有低收入国家都在西北角，这个具体数字我不讲，都是从他那引来的。我不是绝对说功利主义一无是处，我刚才讲的意思，我们可以将功利主义与权力主义做一些整合，有一些基本权利一定是先于任何功利的，包括我刚才讲的，人的生命和生育的权利，我们没有权利为了控制人口去杀害这些孩子，我们知道有七八个月的小孩、婴儿，我们大夫压在床上直接做了，这种事情在农村非常多的，但是实际物质利益的这些选择，我们可以用功利主义，我们评价一个项目，成本收益风险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人的尊严和人格问题，我觉得不可以用功利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不可能处理什么价值判断，樊纲原来挑起一个争论，“经济不讲道德”。我觉得讲经济学不讲道德是不对的，经济学一定有它的价值判断，有它的道德的。在一个基本权利范围内是不存在替代性的，不存在为了经济增长就可以剥夺人的权利，但是超过这个范围有一些东西可以有替代性。

第三个，我讲一个从物质主义快乐观到整体幸福观的转变，我们经济学老讲是理性的，但是经济学对人的理性理解太狭义，因为人的理性只是说人是有目的的存在物，人是有能力推理分析的，所以我们干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这就是人的理性的基本含义，这个叫理性在西方有另外一个词叫reason ，不只有rationality，一个人只要是理性的，他总能为行为找正当性的理由。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从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开始都在探讨，亚里士多德说就是为了追求幸福，他的幸福的概念我们可能不好翻译，英文翻译成happiness是不对的，应该翻译成eudaimonia，发挥人类的潜力，使人类能够最大化地得到完善，其实康德也是赞成这样一个观点的，他认为人的终极目的，本质性目的就是幸福和完善。这个和快乐不太一样的。经济学简单地说就是最大化utility，这样有的就变成一个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我们经济学讲所有目标是给定的，正当的，你的欲望都是正当的，我们经济学提供的就是一个分析工具，用最好的方式满足这种欲望。其实理性就是一种欲望的奴隶，情感的奴隶，理性在制定人类目标方面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其实我认为经济学应该是目标的理性，我们人之所以是人，我们跟动物不一样，我们不是被动地满足欲望，而是我们有权威，有自主权选择我们的欲望，哪些满足哪些不满足，我们按照人类我们个人来说，什么叫高尚的人，什么叫不高尚的人？很简单，你在自己的欲望方面的选择是如何的，如果你只满足自己个人的物质甚至生理的欲望的话，这个人不会很高尚，但是如果一个人抑制自己的欲望的话，人本身区别于动物的欲望的话，他就可能变成一个高尚的人。我想可能宗教的思想告诉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些目标理性，哪些应该满足，哪些不应该满足，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应该是欲望的奴隶。

我觉得康德讲得非常清楚，理性首先是选择目标，道德就是约束人的偏好，2000多年前我们的荀子讲过这段话，“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道这里就是理性，只有以道而不是以欲旺道，这个非常重要。两个维度，过去经济学太简单，一个维度是时间维度，我们一个人做任何决策，不是经济学讲的，买苹果还是买梨的事。我们的生命到哪里为止utility就完了，这个有问题，在座的想想，如果你去世之后没人给你收尸，没人参加你的追悼会，你现在就会非常难过，你一定会对你的一生和你身后的事情都会影响你现在的决策，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时间维度。空间维度来讲，我们人类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物，简单的生物的本能的欲望，我们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就是有理性，理性就是有尊严和自由，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别人侵害我们的尊严我们觉得很难受呢？这就是人，康德讲过，如果人没有自主权的话，人不可能有任何道德责任，为什么？否定人的自主性，否定人的自我的表达本身就是否定人本身，等于说我们中国现在好多法律是不承认我们是人，只承认我们是动物，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另外我们讲到我们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之间的关系，名誉、权利、道德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角度理解我们人会怎么选择。

亚里士多德三种生活，享乐的生活是动物性的，政治的生活是人类的，追求权力与荣誉，最后是沉思的生活，我们搞经济学的人应该过的是沉思的生活。他认为就是近乎神的生活，大部分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满足基本的生活享受之后，人类有更高的价值追求。所以我们传统的 material的福利来考虑经济学的话，我觉得问题很大，包括经济增长，如果我们为了经济增长，我们的人的尊严都没有了，我们活着连狗都不如的话，无论什么样的政府都不是好政府。所以我再强调一点，不能以经济增长率来评价这个政府的行为，至少不能唯以经济增长率评价政府的行为。

最后一点，从利益到理念的转化，传统经济学我们只关心interest，我们不关注Ideas，我们只讲屁股决定脑袋，不讲脑袋还可以指挥屁股，这是有偏颇的。利益就是一切，每个理性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所有的行为都可以justified ，理性解释，研究社会福利的话，社会变革就是一种利益战胜另一种利益的博弈，或者既得利益得benefits 大于cost去做，我觉得这很有问题，一百多年前，昨天黄老师谈到，（F. Edgeworh谈过这样一句话，“the first principle of Economics is that every agent is motivated by self-interest.”（，这就是基本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假设有好多困惑，大家想一下，如果我们人的行为都是由利益支配，我们经济学研究什么？与人的行为没关系，你研究这样人家那样行为，研究那样的时候人也那样行为，经济学毫无用处，我们之所以在这儿讨论经济学就是因为它有用，因为它会影响人的理念，结果我们经济学本身的假设就否定了我们经济学自身的价值所在，这是我长期的一个困惑，我们那么精细的经济学有什么用？我现在发现它有用，就是因为它改变人的观念，同时我们不仅没有办法解释人类犯错误，按照经济学来讲人类是没办法犯错误的，即使事后觉得不对，但是事前exante总是认为它是正确的，就像一个投资，我可能失败了。不是我就认识到我就错误了，而是不运气的事情发生了而已，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人类最大的失误一个是计划经济，世界1/3的人口生活在那样一种制度下，多少的生命和财产被剥夺和受到损失。这是人类犯得非常大的错误，我们人类历史和唯物主义相一致，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好多是错误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其实应该是反过来才对，你怎么解释美国比中国先进呢？马克思是无产阶级吗？恩格斯是无产阶级吗？史正富说他是资本家，所以绝对不会拥护大政府，这就不一定正确。有利益的问题，也有理念的问题，不能以你的出身来论证你就一定不会支持什么观点，同样出身的人，支持什么观点都可能有。既得利益者，永远一直是反对的，这是错的，历史上很多改革就是既得利益者做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也是错的，枪杆子总是在统治者手里，怎么会被推翻呢？理念发生变化，大家不认可了，无论满清还是国民党，共产党小米加步枪，打败美国飞机加大炮，好多知识分子跑到延安才有共产党的胜利，这些都是我的一些困惑。

我们的历史不是这样，历史的变革不是一种利益战胜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主义战胜另一种主义，新的理念战胜另旧理念，或者理念战胜利益，表面看是利益的胜利，而实际是理念的胜利，像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就不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战胜了资本家，而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其它主义，就这么简单。我们知道共产党自身的那些领导人，有哪一个是工人阶级出身，都是他们要推翻的那一个阶级出身，都是军阀、地主之类出身的人，怎么解释这些问题？其实大卫休谟早在200多年前讲过这个话，“though men be much governed by interest; yet even interest itself, and all human affairs, are entirely governed by opinion.””利益本身及其人类所有事物都是由理念支配的，为什么会这样？究竟什么是人的利益？并不是客观绝对清楚的，人的利益的认识是通过理念认识的，也就是说利益是由理念构造的，如果我们认为消灭了资本家，工人阶级就会更幸福，我们就会消灭资本家，尽管这完全是错误的，这是我们的理念所在，无产阶级失去的自由锁链，得到了全世界，全世界消灭的资本家的国家无产阶级有更大的牢房，但是我们认识那种理念，我们就那么去行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我们的人有好多利益，不管是物质还是非物质的，他对其它的观念就更敏感，所以我很在乎病人对我的看法，这个时候我又做正当的事，我们什么叫正当？什么叫不正当？就会影响我的行为。当然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理念怎么来影响人的利益的理解，怎么影响人的行为？这个问题是要讨论的。凯恩斯其实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威胁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同凯恩斯完全相反思想的米塞斯也得到同样的，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这样的话我们最后总结，经济学有作用，我们经济学干嘛？就是改变人的理念，让人们更好认识自己的利益所在，我们不去犯错误，选择计划经济，选择大政府这些错误，亚当斯密就是改变了人类的理念，亚当斯密之前，大家认为只要为自己的利益，就是不道德的，亚当斯密证明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为大家带来幸福，所以不是不道德的，我们接受了，社会就变革了。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过去30年做的最大的贡献，在座的好多的各位，就是改变理论。我们从一步一步开始，怎么否定人民公社，怎么否定计划制度，怎么不否定企业家精神我们就慢慢接受了，然后就变革了。我自己亲身经历最多的是价值的变革，大家认为之前价格是由政府制定的，我提出的理念：只要政府制定的价格一定是不合理的价格，这个理念突破了以后，我们的改革就找到了出路。

最后我讲正因为这一点，我们知道现在思想市场是重要的，因为理念只能来自思想市场，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哪有那么多的实践，好多实践在做的时候没有经过检验，马克思主义没有经过检验就做，要经过推理。思想市场三个层次，一个是学术市场，还有一个是传播市场，还有思想市场的二手交易，因为他们选择出售哪些不出售哪些，书商不把它摆在很显眼的地方的话，就销售量不高，如果媒体不宣传的话，销售量也不高，这一部分人影响力非常大。

还有一种市场就是实践市场，理念需要实践。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历史上消灭市场都会带来灾难，我们好的经济环境南北朝，所以创造了中华文化的灿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满清的文字狱都是对市场的破坏，不管是赞扬儒家还是反对儒家，我们讲计划经济的灾难，农村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有个经济学家董齐进，最后不让他说话了，所以形成了灾难，包括大跃进，如果我们有思想自由的话，能死那么多人吗？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我再讲一点，现在大家说下一步改革，如果没有思想市场，或者我们假定某一个人脑子里只知道中国应该怎么走，你们只要闭嘴听我的就行了，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思想不只是一个人，最后要变成绝大部分人的理念，好比我们认为，按劳分配要变成大部分人的理念，大家就集思广益才行。下一步改革同样是这个问题，不存在一个人有绝对的很清楚他知道怎么样，我再强调中国改革30年，都是通过从上到下的改革思想形成的。未来改革若否定思想市场，否定思想自由的话没有思想市场，改革就不会太乐观，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都应该有独立精神，只有个人会思考，社会不会思考，人类的这些进步都来自新的思想、新的理念，而所谓新就是传统上一定不认可的，包括昨天陈平讲的创新一样，所有创新都是开始绝大部分人不认可的，每一个创新分析很难很难的。如果大家一开始都认可了，就很难创新了，所以我们保持心灵的自由，最后一句话，我反对任何思想垄断，不论是我同意的还是不同意的，从历史上看，利用任何政府的力量、行政的力量扶持某一种思想，批判另一种思想都是非常危险的，谢谢大家！(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我反对思想市场

陈 平

张维迎数月不见，令人刮目相看。张维迎在金融危机以后发生了转型，从新古典的博弈论专家，变成了奥地利学派哈耶克的门徒，但似乎追随的是后期哈耶克。早期哈耶克研究迂回生产，受马克思影响。研究货币内生性，提出自发组织，接近普里戈金的自组织概念。后期和凯恩斯，弗里德曼争论，从经济学家变为接近哲学家。似乎张维迎在仿效后期的哈耶克。

我有几条跟张维迎有很大的差异：第一，我反对思想市场。我是做物理出身的，你是做经济学出身的。做物理的人没有特定的理论信念，任何理论如果能解释实验，就有存在的理由。所以，我和经济学家不同，只相信实验检验理论，不相信市场可以决定理论的存亡。所以我反对科斯提出的思想市场，我们今天在天则所讨论最重要的事情是发现谁有新的idea，谁就得到大家的赞美。但是，如果判断思想的优劣，如果讲思想市场，那就比市场份额或资本运作；如果讲学术民主，按人头投票，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死定了。因为匿名审稿，或者诺奖委员会投票（别说老百姓投票了）， 相对论都是发表出不来的。科学是开放竞争的，但不是民主，也不是市场。把出版市场和科学论坛相混淆，混淆了盈利竞争和非盈利竞争的基本差别。所以，思想市场这一条，我不同意。

第二条，张维迎把权利变成目的，脱离历史条件，我也不同意。把权利变成目的论，有半宗教的色彩。生物演化的基础就是资源有限，然而每个物种的繁殖能力无限。如何界定生存空间，或是生存权利？是靠竞争，保护武力竞争，还是靠立法保护？谁来立法？上帝？强者？张维迎举的例子，都是价值判断，没有经验数据和案例。凭什么说市场是合作的？计划是互相欺骗，反合作的？我在中国和美国都做物理学研究。物理学家的研究都是高度计划的。哪里有市场？物理学家的合作，远远超过经济学家.核反应堆如何拆分交易？计划经济不是苏联发明的，是德国发明的，美国托拉斯发展的。上升到哲学以前，最好先研究历史案例。

张维迎举的几个案例是非常误导的。 我们做“演化论”，中国翻译成“进化论”，翻译错了，演化，就是有进化有退化。凭什么说计划经济是人类历史上一大倒退？我的观察，计划经济也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我讲现代化有多种模式。你去过东欧没有？苏联东欧我去看过，社会发展带来的进步远远超过拉丁美洲和亚非拉的国家。休克疗法以后，苏东国家的社会福利大步倒退。所以你在观察之先，就给价值判断，这不是科学，是神学。

第三，你把计划生育列为违反人权的例子，没有依据。我刚从埃及回来。我们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埃及是罗马的粮仓，是粮食出口国，现在埃及闹动乱,什么原因？埃及已经从粮食出口国变成粮食进口国了，为什么？第一就是没有计划生育。埃及的人口增长率是中国的四倍，但是它的经济增长率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而且还学了一个西方的办法，发展所谓的人力资本，结果没有制造业，大部分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现在闹的都是他们这些失业大学生。我在美国开会讨论如何应对欧债危机，不料讨论起移民的人权问题。新美国基金会的智囊在那里讲，西方国家现在需要捍卫自己的阵地了。因为过去把技术和产业移到中国，现在发现吃了大亏。必须美欧合作自救，然后讲地缘政治，如何把中国等新兴国家排除在西方市场之外。我当场给了他一个反例：即南欧国家最近发生的人权灾难。最大的人权问题是什么？非洲的那些难民要偷渡到意大利去，死了好多人，引起轩然大波。我此话一出，美国人就马上找我，当面承认西方名义上讲人权，实际是反对非法移民。他举的例子告诉我，为什么法国、英国出兵干涉利比亚，道理和当年美国干涉海地一样，是为了防止大批难民跑到美国来。我注意到一个历史的悖论，资本主义自由从哪儿开始的？庄园里的农奴逃到城市，几十天以后就变成自由民。现在科学越来越发展，机器取代人，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言论自由反而越来越多。自由是少了还是增加了？为什么言论自由增加，因为找不到工作，总得让你发牢骚，要比革命好。给老百姓言论自由，是让你出气而已。你把自由看成是天赋人权，脱离社会发展历史的轨道。哈耶克晚期是失败的政治经济学家，不是真正的哲学家。我认为这是哈耶克为什么在政治上输给凯恩斯的原因。哈耶克在危机深重的时候完全没有对策，等于认为市场病重了会自然恢复，政府什么都不用干，市场自己能解决。你去教训重病之人不要看病求医，有人会听你的吗？我希望你看清后期哈耶克的命运，这条道路你不要走。我是老朋友的真心话。谢谢。

[ **陈平**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标题为编者所加 ]

## 数学如何改变经济学

茅于轼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经济学的跨学科创新，我觉得最成功的就是和数学的结合，所以我今天讲经济学怎么因为数学而彻底改变了。这个大概发生在100年以前，是门格尔和杰文斯等人把微积分用到了经济学。自从斯密写国富论，把经济学放在一个有逻辑的框架里面以后的100年，经济学有了不少进步，但不是本质的进步，本质的进步是发生在经济学使用了数学。我认为从那以后，我们把它叫做新古典，在那以前就是老的古典，老的古典经济学是不用数学的。

数学怎么帮助经济学呢？经济学最根本问题就是在约束条件下财富创造的极大化，大家知道碰到极大、极小的问题一定用微积分的。所以，新古典的最大用场就是告诉你怎么使得财富创造极大。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用这个新古典的理论，只有一个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很倒霉，他的资源很丰富，但是现在全世界“不幸指数”，就是倒霉程度排在第一位，因为他们用毛泽东的理论，不是用新古典，我就不详细讲了。这是John Hopkins大学一个教授最近发表的一个倒霉指数的排行榜，中国排在倒数第九位，倒数第一位是日本，日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我们在全世界中排第九位最幸福。

经济学用数学得到的最重要的结果，我认为就是一般均衡，说穿了就是自由交换，通过价格的浮动使一切商品都供需均衡，这个时候配置的效率是最高的。以后有了很多修正，由于有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合理预期等等。把一般均衡理论做了不少的修正。但是，它的基础没有变，用普通话讲就是自由交换实现了均衡。当然，这是微观上讲的。在宏观上讲，还有可能不均衡，这时候就要用中央银行的政策。

数学有一个特点，就是永远不会错，欧几里得的几何学2300年以前就有了，一直到今天还是个版本，不管是美国、中国，中学里面教的都是它。再过两千年我想也不会变(非欧几何学也一样不会变，因为也是逻辑推导出来的)。因此，数理经济学得出的结论也一样，除非数理经济学前提有什么变化，前提有什么重要的假设呢？大家都知道，一个是经济人的假设，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效用函数的假设，它必须是一个行为良好的函数，效用是可以排序的，是连续的，一阶二阶都是可微的，二阶导是负的，是单峰值的，这就是行为良好的一个函数。一般均衡的前提，自由交换的前提就是人人平等、自由选择，而且有一个司法公正来保护你的平等和自由，我认为这个条件一百年以后、一千年以后也不大可能会变。所有不同于一般均衡的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要求人要按照一般均衡假定的前提来行为，不可能不用货币，互相免费服务，这种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自愿的、平等的交换，人一定要追求利益，共产主义是不可行的。这些结论对于现在的经济学思潮会有很大的影响。当然，我想在我们这个屋子里面没有人会相信共产主义，但是你看看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把共产主义作为理想的人还是很多的。因此，我们懂得一般均衡，对于我们来讲，当前重大任务就是否定共产主义，让全中国人民都懂得只有一般均衡才有可能实现一个我们起码可以过得去的社会。

前面我讲的数学，现在我把这个数学忘掉，不讲数学，就是说一个社会需要什么，社会需要的东西，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你拿钱能买到东西。一个社会拿钱不能买东西，这个社会就非常糟糕了，你买不到粮食，你怎么办呢？所以，社会的需求就是拿钱能买东西，而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钱也能买东西，但是只能买供过于求的东西，供不应求的东西买不着。诸位年纪轻的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供过于求的是什么东西？有好多东西，多的不得了，卖不掉。举个例子，解放牌的胶鞋，胶鞋卖不掉，你拿钱买胶鞋没有问题，可以买到，但是拿钱买粮食是没有的。所以，一个社会必须要的条件，就是你拿钱买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是说只能买供过于求的，供不应求的你买不着，这个社会就非常糟糕了，万一粮食供不应求，你就挨饿了。所以，很简单，一个社会起码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拿钱能买任何一样东西，或者说没有一样东西是长期缺的。或者再进一步说，生产过剩的胶鞋能变成生产不足的粮食，我们要求这个社会胶鞋能变成粮食，好象听起来很不可思议，胶鞋怎么能变粮食呢？但是在一般均衡条件下，任何一样东西可以变成任何一样东西。因为我们口袋里的钱买什么都行，一个面包两块钱，一度电一块钱，你口袋里的钱可以买面包也课题买胶鞋。你吃一个面包花两块钱，你不吃两块钱的面包，你可以用两度电，面包就变成电了。如果没有这个功能，你怎么可能拿钱买一切东西呢？所以，什么是一般均衡？就是保证你拿钱能买一切东西，而且胶鞋是可以变成粮食的。这就是在一般均衡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个道理是听起来非常奥妙，但是又是非常现实的情况。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口袋里的钱是可以买任何一样东西的，他很接近一般均衡，但是还不是。

当你拿钱能够无障碍的买任何一样东西的时候，一个面包两块钱，一度电一块钱，你吃一个面包、用一度电，三块钱，于是我们才可以计算GDP，如果没有一般均衡，你不可能计算GDP。刚才我讲计划经济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买不着，那时候算不出GDP来，因为价格都是错的。由于可以计算GDP，这才有宏观经济学，如果没有一般均衡，宏观经济学是空的，因为宏观经济学是讲总量，总量是相加起来，不能相加，总量有什么可研究呢？而且由于钱可以买一切东西，钱可以度量不同东西，一个面包可以跟一度电相加，他们的量当完全不同，但是它的价值是可以相加的。什么价值？不是劳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因为有了这个特点，钱能够衡量一切东西，可以计算GDP，可以计算一个企业投入的各种物品。投入品很复杂，劳动、设备、资本、技术、土地，房屋，你也有产出的产品。由于有了一般均衡你可以比较投入的多还是产出的多。如果你投入的少、产出的多，你就创造了财富。在计划经济的时候，认为钢是货真价实的，水泥是货真价实，钱是空的，所以不讲钱，讲要创造钢、创造水泥。结果钢炼出来了，赔了，因为投入比产出多，国家更穷了。你想想，没有一般均衡，你怎么知道一个企业是创造财富还是浪费财富呢？而且一个国家应该进口什么，出口什么，也完全靠一般均衡的价格。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般均衡，一切都乱套了，这个社会绝对是不可行的。所以，我说我们不要讲空的数理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我们离开数理经济学，还原到日常生活里头来，你不可能想象一个良好的社会不同于一般均衡，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们国家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呢？消费品差不多是一般均衡，但是我们的投资品是远离一般均衡，首先是土地没有市场，不是竞争性的，只有一个竞争性的需求，没有竞争性的供给。资本没有市场，因为利息率不是市场化，因此我们不被WTO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我们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因为我们的投资品市场是不均衡的，因为投资品市场的不均衡，造成你消费品价格的扭曲。所以，你在进出口的时候可能搞错了，该出口的变成进口了，因此WTO规定我们不享受市场经济国家的自由贸易。这也说明了我们中国还有巨大的经济增长的空间，如果你把土地自由化，把利息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我们可以产生巨大的财富。我算了一下，光是利息率自由化就可以多出两三个百分点的GDP。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内容。

[ **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 从中国事实到普遍理论

秋 风

谢谢会议的安排者。我们这个单元成了人民大学专场了，两位发言人都是人民大学的，我也是人民大学出来的，当时是上历史系。

坦率的说，我要把握他们两位所讲的内容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听下来之后，觉得吴思先生的讨论和高教授的讨论，其学术进路其实有一些区别。我听吴思先生的这些研究，大概是要把文明的世界还原到自然状态，然后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规则和制度如何形成。可能有点像霍布斯所做的工作。当然，他大量借鉴了历史故事。尤其触目惊心的是，他把生命作为交换对象。我们经济学还是在文明层面讨论问题的，所以交换的都是商品、资本这些东西，但吴思教授要我们回到一个最自然的状态中。当人们要交换生命，经济学的逻辑还有没有效率？当然是有效率的，霍布斯也许就是现代经济学基本预设的创始人。

高教授做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历史学研究，而又有理论的视野。他透过对明清时代经济史的讨论，让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的结论。

今天，会议组织者之所以安排这两位发言，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是历史学家，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中国事实。当然，刚才，林毅夫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中国事实。现在，我们有了一个从古代一直到当下的中国事实链条。

我想，中国事实可能就是我们中国学人的“后发优势”。若干年前，林毅夫先生和杨小凯先生争论过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我曾把这个论题转换到知识的问题上，我说，我们中国学者会陷入到一个知识上的后发劣势中，就像刚才林毅夫先生所讲，我们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解决我们自己的发展问题。这就是后发劣势。今天，中国学生去哈佛，去MIT，学的肯定都是最先进的理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些理论对中国而言，很可能是屠龙之计，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反而伤害我们自己。

因此，当学习西方知识时，中国人需要有一个反思的意识，我们必须警觉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知识上的劣势地位转变到一个优势地位上。这个后发优势是什么？我们就在事实和理论之间。

西方人给我们提供了一套理论，一套非常完备的分析的工具，它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事实，不管是历史的事实还是当下的事实。但是，这套理论真正有效的时候，恰恰是我们意识到它在中国的有限性的时候，意识到它的局限性的时候。我们若有反思的意识，我们就有可能丰富这套理论，有可能用中国事实来丰富这套理论。

为此，我们恐怕不能不说，西方理论只是一套地方性知识，它不是普遍的知识，这个普遍的知识有待于中国人参与构建。就像刚才陈平老师说的，中国就是一个世界。在现有的这套理论形成的过程中，只有半个世界参与了，另外一半世界没有参与，那就是中国。也许，我们中国人发现自己的故事，思考自己的故事，在事实和理论之间持续互动，推动理论的生长，才会形成一个真正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有能力普遍地解释人的行为。现在这套理论也许能够解释西方在过去500年现代发展转型的过程，能不能解释中国？这真的是需要我们有所保留，不是毫无保留的接受它。

我们不能不如此，因为，我上面说了，中国是一个世界。这是我们思考所有问题的出发点。中国就是这样一个舞台，在中国，不管是政治、文化、经济的故事，它有一个舞台。我们可能需要讨论，这个舞台和西方人的理论中所预设的舞台是不是一样？我这些年一直在读《尚书》，我发现，其实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在思考协和万邦的问题，就是天下治理的问题。而西方理论，比如像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他们讨论的都是城邦的治理问题，那都是点状的城邦。其实，现代民主制度、现代民主理论都是讨论一个点状城邦、一个只有五千公民的城邦如何治理。可是，中国一开始就是100万人，而且分布在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的乡村地区。

这就是中国最重要的特点，由此就决定了它的观念，它的信念，它的价值，跟西方有不同之处。我没有说它完全不同，但一定会有不同之处。所以，我们从政治学角度来说，民主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考中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它根本不可能。在古代那样一个环境，它就不可能。民主在城邦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的共同体无法做到。相反，在中国，从一开始就走了共和之路。而对共和来说，“代表”的问题是核心问题。于是我们看到，后世的制度，不管是汉代的察举还是宋明的科举，都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因为，中国的规模太大了，没有办法像一个城市那样把所有公民召集起来通过民主方式解决公共问题。

我最近看考古学材料，在看费孝通先生，也在看李伯重的经济史研究，他们从不同角度讨论中国事实，中国在解决自身问题中探索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规则、制度的体系，与西方有某些不同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今天上午史正富先生的说法，我们要有主体性意识，我想，这是知识和理论的主体性意识。

但我马上要补充一句：我们也要有普遍主义的情怀。我们讨论中国自身发展历程，把中国故事讲清楚，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中国很特殊，而是要证明，人很复杂。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理解普遍的人。我设想，随着知识的积累，中国学者贯通西方的地方性知识和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发展出一个涵摄了现有西方理论、而更为普遍的关于人的科学。这是我的白日梦吗？

[ **秋风**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 创新型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是建立主体意识

史正富

首先感谢会议主办单位天则所发起这次活动，邀请我们协助，给我们这些经济学家聚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机会。

另外，我也很高兴我们中心有机会支持这次活动。我们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实际上成立得很早，但对外活动不多。那是在2002、2003年的时候，我和陈平，还有崔之元教授和刘昶教授，我们在一块儿提议建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对中国和当代世界变动的重大现实问题做些有点距离感的基础性研究；定位既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也不是政策层的研究，而是对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基础性研究。不巧的是，后来因为多种原因，比如我自己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我创办的同华投资集团上；陈平教授也因为各方面原因，没有全职在上海，而是将工作重心放到了北京大学；崔之元因为家庭原因去了清华；只有刘昶教授从美国回来做了一些研究工作。

2008年，我们中心研究出版了一套《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共14本，并开始逐渐恢复对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这两年,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课题，其中最主要的两项，一是研究美国金融体系的变革、现状以及它对宏观经济学的影响；另一个就是研究中国正在形成中的复合型财政制度和公共财政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国家治理机制的长期影响。

去年我们出了一个小册子——《超常增长》，书中模拟了未来三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长期图景，给出了一个偏向乐观的推断。这些思想总的来说还是聚焦在因新经济现实而产生的对经济学某些理论的冲击和影响上。

在研究中我们有两点体会。一是进行创新型学术性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建立主体意识。很多年来，我们引进、消化和应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取得很大成就。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应该尽快告一段落。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各种各样的变革不断涌现，而在现代经济学的发源地，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正经历着制度和生存方式的重大调整。这都为我们研究新经济现实、创造新经济理论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我们如何从系统地观察到的现实中去提炼新的理论，而不是像过去几十年那样通过引进、消化外国原理，来解读中国现实。这方面起步早的人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比如在座的，我们都很熟悉的林老师，他的新结构经济学，张五常教授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解释，还有一些历史学者的工作，方方面面都显示中国正在走出单纯引进和学习的道路，转向在学习和引进中实现自己的学术创造。

第二个体会是什么呢？就是要走出悲情意识。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近现代史是给我们留下很多创伤，一个落后民族、被挨打民族看现代世界，好的方面就是激人奋起，不好的就是有时候站在这个极端，有时候站在那个极端，不能心平气和的看待这个世界。加上十年文革，大家知道极左的冲击对中国社会造成相当大的震动和负面影响，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乃至有过惨痛的个人经历。这些无形中会影响每一个研究人员的思想倾向。我觉得今天也是告别这种思想倾向的时候了。不管怎么说，中华民族已经从苦难中走了出来，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己领导走出了文化大革命，走向明天。对我们学术人员而言，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在进行研究工作时，要先采取一个客观、理性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关系。我知道，其实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内部有相当强烈、深刻的分歧，但是分歧是好事还是坏事？取决于我们当事人的心态，如果我们把别人的挑战和不同的思想作为自己进步的养料，善于从别人的挑战中找到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动力的话，那么这种分歧越深刻，学术进步越快。

我抱着这个态度到这里向各位学习，有机会也会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跟各位交流。祝贺大会圆满成功。

[ **史正富**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主任、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标题为编者所加 ]

## 构建理论创新的交易平台

罗必良

各位上午好！非常高兴作为主办方之一来参加这个会议。

我们知道分工产生效率，但分工如果没有交易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然而，分工受到市场范围及其交易费用的约束。因此，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我们需要一个好的交易平台、一个好的交易装置。

经济理论及其学术研究已经形成若干分支。各个门派，各类研究、各种主张层出不穷，这种分工已经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但是，如果缺乏各分支间的交流与互动，极有可能影响学术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如何整合不同思想，如何通过思想交易来促进更好的理论创新，我们急需要一种平台，一种沟通的平台、一种好的交易装置与组织。我以为天则做了一种重要的选择，正是这种选择号召了我们，也感召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主办方之一，这是我今天站在这里重要原因之一。

我想天则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代表了研究机构的某种组织职能。从这个方面来讲，思想的竞争、组织之间的竞争也需要市场，我想正是这样一种民间机构，站在学术前沿能够洞察未来发展走势的战略眼光，使天则走到了今天，他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很好的交易的平台。所以，我们能够在这里作为主办方之一，应该感谢天则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已经逐步发展为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同时带动其他学科发展的学院。我们的农业经济是国家重点学科，但是我想仅仅立足于某一个角度，比如说仅仅是从农业经济学科的角度做研究，恐怕不能对中国三农问题做出根本性贡献，所以我们需要进入一个更大的知识平台，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学术交易空间。我们需要不同的主体合作。由天则所牵头、多个学术机构共同主办的本次研讨会，本身就是一种跨界，就是跨学科。

我相信，不同的知识背景，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学缘背景走到一块，通过思想碰撞与讨论，能够为中国理论创新做出应有的贡献。我更愿意相信，当中国的经济理论取得新的创新与发展时，大家会回想到今天的会议。祝会议圆满成功。

[ **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 经济学创新中的几对关系

陈 钊

我以为今天这个会是让大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更好地进行研究上的创新，而不是来讲自己做了什么创新。但我发现到目前为止，大家讲的都是自己的创新性研究。而我将从怎样更好地进行研究上的创新来谈。

我们这个会议叫做“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讨论创新研讨会”，所以，我想围绕为什么需要强调中国问题研究？怎样从中国问题研究产生理论创新来展开讨论。我觉得这里面有以下几对关系需要讲清楚，不然可能产生很多认识误区。中国研究跟理论创新是什么关系？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又是什么关系？国别研究和一般贡献是什么关系？现在政策研究越来越重视，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又是什么关系？如果时间允许，我也将介绍两项自己在研究方面尝试进行的一些创新工作。

先谈谈中国研究和理论创新是什么关系？这个会议是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中国经济学”这个说法有时候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误以为是中国的经济学。我个人不主张这样理解，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没有中国的经济学，美国的经济学，经济学就是用科学的工具、方法，进行逻辑的推理，发现规律，解释现象。当然，我觉得中国经济学这个说法也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源于中国的素材、事实，可以开展很多创新性的经济学研究，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而我们这个会议所强调的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恰恰应该是基于中国的素材、中国的事实来提出创新的理论与洞见，或是对相关的理论进行检验，发现新的规律等等。

我个人从自己研究经历出发，认为我们只要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就会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而且这里面是有大量的进行创新的空间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有其独特性，地理上的、制度上的、文化上的，这些独特性都是我们创新的源泉。以地理为例，中国是大国，而且地区之间异质性非常大，包括自然的、发展阶段的都不一样。比如我们讲到环境治理问题，有人说环境治理国外可能花十几年时间就完成了，环境就彻底治理好了。但是，我觉得中国恐怕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当北京想搞环境治理，上海想搞环境治理的时候，内地还要GDP，内地对环境不是那么在意，而环境问题有严重的地区之间的负外部性。所以，我觉得在大国的背景下讨论环境治理会更为复杂,但这也恰恰是我们进行创新的源泉,这也是最近我与合作者在推进的研究工作之一,不久就能够和大家分享这方面更多有意思的发现。我们的研究将说明,恰恰就是因为中国这个大国在地理与发展特征上和人家不一样，才可能使我们对于治理环境的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

又比如说，新经济地理学有一个关于“中心-外围”的理论，但是实证上面一直没有很好检验，我们曾做过一个实证的工作来检验这个中心-外围模式。为什么中国会更适于检验这一理论呢？因为独特的地理。第一，中国足够大，而中心-外围理论是需要有一个大的空间尺度来体现其机制的。第二，中国仅在东部有大港口，而出海口接近国际市场，这就是理论模型中的“中心”，内地则是“外围”。美国虽然也足够大，但是两面靠海，中心到外围的空间尺度可能就不够了。

中国的制度同样有其独特性，我们有大量积极的干预政策，比如产业政策就被积极广泛地实施。但是产业政策的效果到底怎样？这在理论上一直是有争论的。中国的产业政策给我们一个检验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一个制度实验场。包括对于产业政策的效果取决于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回答。

中国的文化同样独特。经济学研究里面有一个关于社会网络在市场化中的作用到底怎样的研究话题。例如，人际关系或关系网络是不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就变得不重要了？其实不一定，很有可能是社会关系嵌入到市场机制里面，帮助个人攫取利益。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问题，所以我们曾考察过关系在个人是否进入高收入行业中起到什么作用。源自于中国丰富的素材，我们也能够对现有理论进行再检验，如果里发现现有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现象，你就可以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这就是提出新理论的可能性，是创新的源泉。

我要说的第二对关系就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我觉得有一种倾向，好象大家比较重视理论研究，不是那么强调实证研究。比如到目前为止大家的发言，昨天包括今天上午，你们发现没有，基本上都是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应该是基于对中国事实素材的认识来提出新的理论，这两个东西是缺一不可。就是说你要检验理论，要发现新规律，你要有事实的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你得知道，这是需要有实证研究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当我们试图提出新理论的时候，首先得知道原有的理论是什么，这个参照系是什么？不能参照系都没有搞清楚，你就提出来一个新的理论，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学科就没有进步了，没有传承了。即便我们不是看计量研究，只是看案例，我们也要遵循科学精神，把这个事实说清楚，而不是像记者式愤青一样，这个说说，那个扯扯，然后凭空抛出所谓的创新理论，这离我心目中认为的经济学的创新应该的模式相差很远了。

正是因为中国有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很多政策又在不同时点上推行，政策的力度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多外生性的制度变化在时间、空间和程度上都有差异，这给了我们大量的机会去做一些准自然实验的经济学分析，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比如最近我们有一项研想回答出口加工区的政策效果到底怎样？我们发现，如果所扶持的产业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一出口鼓励政策就能显著促进出口，否则，其效果就不显著。这项实证研究本身也说明，有了这样一个关于比较优势的理论指导，就可以帮助我们验证这样的理论。

另外我要讲的就是国别研究和一般贡献的关系。一般人认为好象中国研究就是做中国问题的研究，好象要低一个档次似的。其实跨国研究，国别研究都非常有必要，但是做国别研究，你不能只说我就是做这个国家的研究，你要通过这个国家的具体素材找出一个具有一般性的规律。我们需要把国和国进行比较，因为国和国的制度环境不一样，这才能更好地检验现有的理论，因为现有的理论往往是在某一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得出的。所以，科斯在《经济学中的灯塔》里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一般化可能并不是有益的”，就是认为理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想法可能并不正确，“除非得出这种一般化的研究考察了在不同的制度框架内这些活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结合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的地理、文化、制度和别人不一样，把现有的理论拿过来的时候，特别需要在中国检验一下，看看这个规律在中国制度框架下是不是成立。从这个角度讲，针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研究都可能会很有价值。比如日本学者的一项研究发现，西方企业内部成功实施的对销售人员的计件激励方式在日本却没有改善员工的绩效。为什么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恰恰是这一理论并没有考虑企业内部的集体主义文化，而这在日本却极为重要。所以，在一个不同的文化下面可以产生很好的激励效果的政策，换一个环境可能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拓展原有的理论了，这个就是理论创新的一种途径。

我很想讲的最后一对关系就是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现在政策研究越来越被强调，各个地方都在搞智库，我所在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是上海市高校的智库。目前，大家对政策研究都是越来越为重视。但是，现在可能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比如，有时我们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年轻人就是要多发论文，评了教授那么压力了，就可以多做点政策研究。也有时，不同的学者被贴上不同的标签，你是做政策研究的，他是做学术研究的。我并不认可以上的这些说法，在我看来，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没有明显的界限。那么，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是什么关系？或者说，什么才是好的政策研究呢？在我看来，好的政策研究，就是“有明确政策指向的学术研究”。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其实是一回事。特别是对于广为建设的这个智库，这里所说的学术研究应该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就是你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要有明确的应用性，所提出的学术问题从实践中产生，其答案又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价值。当然，既然强调仍然是学术研究，就要有科学性，但科学性难道不也是政策研究应该坚持的原则吗？所以像茅老（茅予轼先生）讲的公租房不要设单独卫生间的说法，我在复旦上《信息经济学》课时就会拿来跟学生讨论。我问学生，很多人反对这个观点，你们怎么想？其实我想引导学生们明白的道理就是，这个说法的背后是机制设计的理念：你只有把廉租房的质量向下扭曲以后，穷人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房子，这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选择。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这种看起来的不合理却是最优的。反过来，如果你把兼租房造得和市场上的房子差不多标准，那么真正的穷人恐怕就难以分享了。这就是对政策的科学性的考虑。当然，我觉得智库还应该有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独立性和前瞻性。所以，智库不应该只回答政府提出的问题，也不只是解决眼下政府碰到的困难。这样你才既可以有独立性，还可以有超前性。我们刚刚做了一项关于职业教育回报的研究，我之前并没有专门关注教育的回报，为什么突然开展这项工作呢？因为我发现，不论是中国目前所强调的产业升级，还是城市化过程中各种成本的不断提高，都会使得以前那种靠廉价劳动力而推动的制造业增长模式不能长期维持了，我们需要有人力资本的技能提升。但是，我们的农民工现在做不到这一点，怎么办？靠高等教育吗？异地高考的推进很难，大学生自己也面临就业难的问题，相反，职业教育的人才就业率却要高得多。但是，沿海地区在职业教育上也仍然存在一些与户籍相联系制度性壁垒。那么，职业教育是否急需打破户籍门槛的限制呢？这取决于农民工在不同地区接受职业教育后，其人力资本的回报有无显著差异。我们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在东部地区接受教育的质量高于在中西部地区，所以职业教育需要向农民工放开户籍限制，让他们在东部发达地区也能平等的接受职业教育。这也符合发达地区自身吸引高技能劳动力，加速产业升级的要求。我以这个研究为例，想说明的是，这是一项学术研究，但同时也能够为政策提供有价值的指引，这正是我所认为的学者以智库研究人同的身份应该做，也能够做好的事。

[ **陈钊**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标题为编者所加 ]

## 经济学是经验科学，不是伦理学

陈 平

我在好几个国际经济学杂志里面当编委，我有责任发现中国优秀的经济学研究，帮助他们走向世界。索罗斯跟我讲，中国现在是世界大国，要承担世界责任。作为中国经济学家，我感到非常惭愧，因为在国际会议上中国经济学家的表现和影响力远远低于以色列，甚至低于拉美，印度，和韩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有一个原因：中国人只关心中国问题，不关心世界问题，尤其是中国经验是否可以走向世界？今天史正富在开幕式上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对。我们要树立自主意识，走出悲情意识。中国经济学家太多的人没有摆脱悲情情节，老想如何受西方打，要么就是反右以来的苦难，但是没有把自己视野放在全世界的角度，类似的问题其他国家也有，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总结规律。你可以从经验观察提出一个假设，经济学如果是理论，就应该是所有国家都适用。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先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因为我参加天则这次组织的创新会议，我觉得我们大有希望。除了上一次会议上我最欣赏的罗必良老师的工作以外，这次我欣赏几个工作，我认为都可以拿到国际上发表。但是文风要修改。我点评一下，当然是我个人意见。我作为当过编委的意见，估计哪些文章国际标准可以接受，请有关的学者修改为英文文章投出去发表。

除了林毅夫的东西，他是世界银行的，也是芝加哥推荐的，林毅夫的工作在世界上开始有影响了，希望更上层楼。

我认为陶永谊的工作很有意思，为什么有意思？不是他自己宣布的互利论，因为哲学解释可以在模型发表之后再展开，可以在初期减少争议。他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突破了经济周期理论。我觉得我们好多人创新，却不知道自己创新的贡献在哪。以陶永谊的工作为例，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只能解释价格的变动，不能同时解释价格和交易量的变动。你看股票市场行情的新闻，从来同时发表股票的价格，以及交易量。金融学只有一个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很有名，也是学物理的，就是麻省理工学院金融学院教授王江。他的研究就是试图解释交易量。但是王江的模型还是计量经济学的噪声驱动模型，不能解释内生的交易量和价格的关联波动。我认为没有革命性贡献，因为他还是一般均衡的框架。但是陶永谊的定性模型，描写股市价格和交易量都是过度波动，比去年获得诺奖的 席勒的工作更深刻。如果陶永谊能发展数学模型，并用经验数据验证，将是金融学的重大成果。在这点上我认为，如果陶永谊能发展他的东西的话，我认为是我看到的最有希望的中国经济学家。这么多人研究经济周期，研究资产定价理论，他是唯一独创的中国人的贡献，可以在世界上拿出去。

第二，我认为两个历史学家的贡献也是可以拿到全世界去的。吴思观察的暴力血酬，不是只有中国才存在。我首先想到墨西哥，也想到美国的暴力。所以，如果你稍微修改一点，你可以讨论暴力和权利的起源，先讨论1.0版本，再讨论2.0版本，先把几个经验事实搞好。如果有定量的事实，甚至能算出生命的价格，和美国的研究可以比较，因为美国保险公司算过生命价值，因为车祸，从经验数据计算生命值多少钱。这个东西可以走向国际化，但是你要摆脱悲情意识。不要一讲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实际上是普遍规律。做得好，可以超越科斯，因为科斯讲交易成本高，才选择法庭。吴思提出第三个可能，如果交易成本或不确定性太高，就选择暴力，包括政府暴力，或黑手党的暴力。吴思的历史观察超过经济学家，一定要走到全世界。

第三，我认为有希望的研究，但是方法论有问题。今天杨其静的发言，就是讲国企无效率。你怎么能在经验研究之前就先下结论？国际规范是不接受的。因为经济学是经验科学，不是伦理学。

杨其静可以在开头提一个好问题：国企有无效率？如果假设无效率，为什么普遍存在？但是他的结论立脚点错了，为什么错了呢？不是我说错，而是金融学的MM定理。我第一次受启发，从新思考国企问题，是1995年留美经济学会在上海开国企改革研讨会时，我陪同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Merton Miller，米勒在上海的发言，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产权重要，但是没有优化解。此话怎讲呢？他说产权简而言之有两个模式，英美模式、德日模式。英美模式什么特点？短期行为，投资不足。德日行为什么特点？长期模式，投资过度。我当时就我明白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其实接近德日模式。MM定理你要懂的话，资产价格和债务结构没有关系，跟债务结构没有关系就是跟产权结构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肯定是别的东西，例如技术、管理，领导力，战略等等。无论是国企或私企，都可以在这些方面的竞争有胜有负。你讲国有企业没有效率，我给你一个反例，英国铁路私有化以后比以前更糟了而不是更好，重新考虑国有化。为什么？忽略了铁路的网络效应，也忽视了私营公司不一定有能力投资更新技术。所以，全世界对于企业是国有还是私有的辩论已经超越当年邓小平讨论的白猫黑猫的问题，已经从产权进入商业模式问题了。这点，新制度经济学是落后的，躭在产权陷阱里出不来，就无法理解为何周期性金融危机，周期性出现国有化的新浪潮。当然过度国有化，也会抑制创新，下一波又是私有化。但是没有稳态解，更没有优化解。

我认为甘老师的研究也非常有前途，因为东亚都是家族企业，港台都是家族企业，如果你讲私有产权有效率，美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大企业已经社会化，没有核心股东了。弗里德曼的理论就不成立。因为经理层管的不是自己的钱，是大家的钱，和国有企业没有本质区别。史正富今天没有报告他的一个成果，就是“看不见的所有者”。通用电器的主人是谁？股权高度分散了，你讲私人产权决策的灵活性，前提要有核心大股东。当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人发明一个词叫“裙带资本主义”。当时周其仁不看好韩国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后，继续有争论。周其仁就认为台湾中小企业比韩国大企业优越。韩国现在发展起来，三星可以挑战苹果了，台湾IT企业反而不如大陆。如果苹果的战略是对的话，戴尔(Dell)计算机就不可能是优越的。垂直整合和水平整合谁更优越？科斯讲交易成本，不能判断。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讨论一个好的问题，先要做归纳法，像达尔文一样广泛的搜集事实，全世界看，各个历史阶段看，然后想背后的逻辑。不要先下结论。我觉得如果甘老师和杨其静能有对话，就可能产生新思想。这样的话，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才是有前途的。

第二个感想，方法论，尤其数学，在经济学的地位，这是重大问题。今天茅于轼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一般均衡理论对社会有多大的影响？我非常愿意跟他讨论，因为我跟茅老师是多年好朋友。回顾经济学史，就是经济学用数学到底效果怎么样？我可以讲有正有负，我可以想到的经济学的数学成功的地方，可以跟物理学相比的，不多。大家都承认没有麦克斯韦方程，就没有电磁场，没有爱因斯坦的场方程导出质量和能量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原子能的发现。如何检验不同的物理学理论，不是靠逻辑或数学证明，而是靠实验检验。我自己在1970年代参与挑战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研究，当时挑战爱因斯坦的新理论有十几家，我和我的同学陈应天，也是一家。陈应天后来在剑桥当了 fellow。美国宇航局专门发射卫星来检验爱因斯坦和其他的引力理论。结果在实验误差范围内，我们这些挑战者没有赢，爱因斯坦没有输。我这才体会到实验的重要。目前物理学实验没有足够证据质疑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我才觉得转行做经济学，因为经济学的理论，几乎没有严格的实验验证，很多理论显然与事实矛盾。

经济学里我能想到的数学模型成功的例子只有两个，第一就是列昂提耶夫的投入产出分析。投入产出分析怎么来的？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对物资分配搞计划经济，战时靠市场经济不行，投入产出是标准的在美国发展的计划经济模型。第二个，就是我目前挑战的期权定价模型，Black-Scholes 模型。这是唯一一个经济学的高等数学走在前面的案例。因为期权市场几乎和期权定价模型同时发展。有了BS模型，期权价格可以用经验数据计算，不像供求曲线是无法计算的。本人的贡献，发现BS模型是布朗运动模型，描写短期行，长期要爆炸，我把这个方程改为生灭过程，是群体模型，比新古典代表者模型前进一大步。

除此以外，经济学用数学，实践上有负面结果。最大的灾难就是一般均衡理论。此话怎讲呢？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东欧前苏联转型推行休克疗法的时候，我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在美国做政策讨论，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我在美国待了30多年，凯恩斯派、货币学派的，供给学派，争论不休。但是在东欧转型的时候，美国、西欧的经济学家全部一致意见，休克疗法，价格一步放开。理由呢？两条，第一条就是阿罗-德布罗的一般均衡模型，价格市场自由浮动可以自动实现稳定的单均衡。第二，西德战后的艾哈德奇迹。二次大战德国被炸平了，美军在战后初期实行价格管制，和中国解放初期一样，以维持社会稳定。但是黑市无法禁止。德国经济学家艾哈德利用美军决策的漏洞，突然把价格放开，马上价格平稳，市场开始恢复。西方经济学家觉得这个市场自动均衡是普适规律。东西德实行货币统一，为德国统一铺路的时候，西德科尔总统也一下子把价格放开，结果怎么样？是最大的失败。弗里德曼天上撒钱的故事，在德国实行的结果，既没有产生通胀，也没有刺激经济，而是是东德企业大规模倒闭，西德不得不补贴东德转型，十年间转移支付达东德GDP的一半，才有今日的德国实力减弱，欧盟东扩危机。原因呢？东德马克变为西德马克，东德传统出口市场，苏东国家没有外汇，占产量一半的出口市场立刻瓦解。东德居民拿到西德马克，不买实用的东德产品，只买西德的时髦产品，国内市场也大部丧失。虽然东德企业技术水平比中国高得多。但是中国渐进开放，给企业赢得学习时间。东德企业没有学习时间，破产后被西德派来的MBA学生接管，把一代管理精英全部退休，经济还能不跨？ 休克疗法和东欧的失败，就是一般均衡理论的最大失败。

我今天听黄有光老师讲一般均衡模型，我听懂了。一般均衡模型的数学问题在哪里？一般均衡的思想是对的，所有交易都关联。方程对不对呢？方程是错的。为什么错呢？物理学家叫超距作用，也就是科斯讲交易成本为零，速度可以瞬间达到无穷。交易之间相互之间传导速度无穷大，价格和产量的调节不需要时间。学过相对论的人知道，光速的传播速度最大，怎么可能如此多人之间能瞬间达到均衡。我查历史数据，英国人学会饮中国茶，茶叶贸易持续逆差，价格调节不起作用，只能动用“看得见的手”，先打鸦片战争，再用殖民在北印度种茶叶，补贴铁路修建，搞了100多年，才扭转贸易逆差。美国，中国扭转贸易逆差，都花了许多年。至今美国没有扭转1970年代以来的贸易持续逆差。怎么一般均衡能这么快实现？科斯根本不懂牛顿定律常识。行星惯性运动不需要花能量，但是火箭和火车的加速和减速都需要花能量。火车在铁轨上跑，火车头的能量要比牛大得多。我和茅于轼都是做过铁路的人，调节需要时间和能量，这样的道理，一般均衡的经济学家不懂。因为阿罗是应用数学家，不是物理学家。

第三，讲一般均衡里面没有数据可以输进去，就无法检验模型，只是黑板经济学。今天黄老师做的事情我听懂了，相当于物理学的平均场理论，讲一般均衡有无数产品，其实能处理的只有一个产品，别的东西都平均化了。这一点从方法论来讲，是微观决策的宏观环境模型。因为模型太远离现实，跟经济观察毫无关系，这是范式经济学，不是实证经济学，和弗里德曼讲的实证经济学差的远了。但是，黄有光的模型比卢卡斯的动态均衡模型深刻。因为可以为凯恩斯政策辩护，我很欣赏。卢卡斯模型玩儿玩儿可以。但是如果你做政府政策的依据，像伯南克那样，救寡头，不救实体经济，拿一般均衡理论来指导经济政策，就是大灾难。世界银行为什么发明“中等收入国家陷井”的说法，为什么呢？要迎合发展中国家的愿望。要有一般均衡，贫富是供求关系决定的，自然公平，要什么发展？要发展，就证明没有一般均衡。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有穷有富，有差异，才有交易。干嘛要发展？发展就是非均衡。

[ **陈平**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标题为编者所加 ]

## 理解国有经济：产业控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杨其静

首先，非常感谢天则邀请我来参会。关于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我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我顶多来报告一下自己的一个研究。

在报告之前，我先讲点题外话。听了前面很多学者关于经济学方法论创新的发言，我受到很多启发，但同时也觉得很困惑。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至少对我来说，经济学从方法论来说就只有一个——个体主义的成本-收益比较法，并努力将其坚持到底。我始终认为，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不是方法论导向的。我们在面对一个问题时，若原有的分析策略无法解决，我们就找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以便让它更适合现实。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学方法。至少我是这么简单地理解，并且我希望坚持到底。对于张维迎老师上午讲的观点，我非常同意你的理念，比如，社会发展是“主义“与”主义“之间的抗争。确实，学者们可以提出自己的主义，但是主义最终是要被政治家选择的，而政治家在选择哪种主义时，他是理性的。他在想：“我这个主义推出去之后有没有选民支持我，有没有民众跟我一起闹革命”。换句话说，这种理念最终能不能取胜，除了背后的信念支持外，更关键的还是看是否符合了政治家和民众的理性选择。我想，若当时共产党没有鼓吹打土豪分田地，农民也不会跟着他干。事实上，农民可能根本就不关心某个抽象的主义。

现在，回到我自己的主题上。国企是我们始终绕不开的一个改革话题，而对于国有企业问题的争论已经非常多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国有企业的问题，跟踪相关文献。我们逐渐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事实上，我是先想了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再思索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是否有价值。其实，这个问题大家都在想。我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将大家对该问题的思考框架化并给出严格证明。

我们讨论国有企业或者国有经济，第一个判断就是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对于国企为什么没有效率，解释非常多。从Alchain到张维迎老师，很多人都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国企没有效率。既然国有企业没有效率，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讨论如何改革国有企业。一种观点是，国企无效率，那就产权改革，全部民营化。另外一种建议是增量改革，通过发展民营经济来迫使国企改革。这其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改革是不是最终导致国企全部消失？还有一种改革途径是“抓大放小”。不过，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放小”的同时一定要“抓大”？现在，混合所有制又被很多人鼓吹。混合所有制是一种产权改革，但却不是国家将国有控股权干净利落地完全放掉的改革。我们要思考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是“混合”而不是彻底民营化？以上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既然国有企业缺乏效率，但改来改去还是保留了大量国有经济。因此，我们就要解释为什么国有经济始终大量存在。学者们从两个方向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解释。一个方向关注于：国企为什么应该存在？在“应该存在”的逻辑下又有这样几种说法。第一种是在混合寡头框架下讨论。混合寡头是指在一个产业中既有国有企业，又有非国有企业。如果是纯寡头，它们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很可能有损社会福利。在产业中加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至少部分地追求公共利益，比如稳定就业和宏观经济，从而会平衡纯寡头的负面影响。但是，在这种解释中有两个严重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第一，它假设当政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尽管学者们提出了多种社会福利的测度方法，但问题在于政府可能并不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另外，我个人认为更为关键的地方是，它假设经济是平的。所谓经济是平的，是指经济体被抽象为一个行业，其中一部分是国有企业，一部分是民营企业。但是抓大放小提醒我们整个经济并不是平的——哪些行业让国企控制，哪些行业可以让给民企。这显然不能用混合寡头模型来加以讨论。

关于国有企业的存在，另一个解释关注于：企业为什么“会”或“能够”存在？这是一个“实证”的逻辑，且基本上是从产业组织的逻辑去理解。复旦大学的宋铮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行业中，民企效率很高，国有企业效率很低，但为什么国企会生存下来呢？他们的答案是：经济体中还有一个金融部门，而这金融部门可以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提供廉价资金，从而使得国有企业能够存在。另外一种解释就完全是在I.O.(产业组织理论)的逻辑下讨论。比如，刘瑞明就借鉴经典的产业垂直控制模型，认为处在上游的国企是具有垄断性，可以向下游企业抽取垄断租金。后面还有一个王勇。他关注的现象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出乎意料地成为了最大赢家，但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是国有企业挣了钱，民营企业很惨。这是为什么呢？他的答案是：民企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挣了其他国家的钱，而好处却被上游的国企抽了租。

虽然他们已经意识到垂直产业链的问题，但还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没有回答。这就是：为什么当政者一定要进行产业的垂直控制？如果从历史阶段来看，为什么在一些经济发展阶段中，政府控制产业或者发展一些产业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有，当某些时候，为什么政府会放弃一些产业？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原有框架下没有得到解决。

除了刚才纯粹产业组织理论的逻辑，也有一些学者进行政治经济学视野的思考。比如，Shleifer的想法就是：政治家和企业家之间存在一个共谋，政治家向企业家发放补贴，获得企业家对他政治上的支持。当前更有影响力的学者是Acemoglu。他的逻辑是什么呢？他关注的是：精英阶层会不会把一产业开放给一般民众，从而换取政权的稳定性。不过，即便在这个分析框架中，产业仍然是平的。

我们现在试图做的工作，虽然最初是来自于中国问题的思考，但当看了很多材料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思考完全可以拓展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那么，我们要做一个修正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将上述两种观点进行综合。同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努力将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坚持到底。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坚持认为：执政者追求的目标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继续执政，并在继续执政条件下的租金最大化。为此，他会如何做呢？事实上，只要意识到经济体是由垂直产业链组成，当政者就只需控制产业链的一端就可以。为了在继续执政前提下最大化租金，他会如何进行产业控制呢？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我们的论文在2012年已基本完成，但还在不断完善中。不过，基本的框架和逻辑就是这样。除了强调一个经济体是由产业链组成之外，在这个政治经济学框架中，对国家的理解更为关键。国家的本质特征又是什么？就是一个暴力机制。因此，在模型中必须要体现这一点。归结起来，模型的故事很简单：为了便于抽租，政府可能会选择对产业链中最容易控制的一端进行控制；但是，在进行产业控制和抽取租的过程中，他会造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当政者就需要引入一个暴力机构来进行维稳；可是构建和维持暴力机构也是有成本的。这样就会在其中形成这样一个权衡——产业控制强度与暴力机关规模。

通过该模型中，我们发现，当政者到底如何进行产业控制，这与市场需求规模、人口规模和结构等因素关系。比如，中东、北非近些年的各种“革命”很可能跟人口结构和规模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和现代产业或者是城乡之间的差别有很大关系。

我们的模型还可以解释，在一个阶段当中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会主导工业化，而且这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是因为，国家控制的国有企业可以廉价地提供工业中间品，从而促进下游弱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就业，从而也有利于政权稳定。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参加全球经济竞争中，出口企业和工人觉得日子很苦，但却屡屡遭受大量的反补贴指控？为什么要有央企？为什么要抓大放小？为什么要控制土地？为什么国有企业要掌控金融业？因为这些行业都是容易被控制和最容易抽取租金的一端。这也是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很困难的重要原因。

由此，我们还可以意识到，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印度。因为它的人口体量与我们相当，一旦印度制造业发展了，很可能对我国的国际需求一方产生最大影响，从而会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稳定。

[ **杨其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基于复杂性科学家族企业跨学科研究

甘得安

我汇报的题目有点像陈平老师的同党，或者是一个追随者，跟黄凯南教授也是有一致性。我是接受复杂性科学和演化经济学，研究一个具体问题。当然，我没有陈平教授气势磅礴、高屋建瓴的大的体系，我只想把复杂性科学和演化经济学研究家族企业，而且研究家族企业的几个核心问题。我把我的报告概括为“三非”，非线性，因为我不是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来解释我的研究。第二，非主流。因为现在企业研究基本在新制度和新古典范围内，我是用复杂性对企业研究来说，特别是家族企业研究来说是非主流。第三，非成品。因为缺少一些实证分析。

第一，家族企业研究学科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我们很少关注，在80年代以前全球管理学界很少关注家族企业研究。对国内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真正关注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2000年中山大学储小平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影响很大。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家族企业涉及面非常宽，历史也非常长。按照我们的研究90%的民营企业是家族企业，像温州是99%都是家族企业，但是我们没有研究它。第二，这个研究很零乱，所以我们说我们家族企业是可以转换角度研究的课题，从1994年发表第一篇家族企业的文章，大约现在发表50多篇，也出了三本专著加一个文集，也是国家社科的一些成果。

我研究的出发点就是觉得家族企业研究缺少一个范式，现在研究家族企业的，我们主要学港台的，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来找理论。从管理学也找，但是真正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没有一个框架。按照我个人理解，如果一个学科或者一个研究对象要用众多学科解释，它应该是一个前科学，或者是科学的初级阶段，而不是真正科学阶段。新制度经济学，我觉得对企业的产生还是不能说清楚，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生产函数，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科斯说企业是对市场的一个替代，这个当中蕴含的一点企业是怎么产生的，但是没有完全说企业产生的机理。我们看到家族企业的特征，部分是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解释的，实际上还有很多部分是不能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有这么一些思考。第一，我要回答家族企业为什么比非家族企业更容易产生？也就是企业是怎么产生的？我个人认为新制度、新古典没有严格回答这个问题，新制度比新古典更好一些，但是严格说新制度经济学也没有理论上逻辑一致的回答企业是怎么产生的，更没有回答家族企业为什么比非家族企业更容易产生。我们接受复杂性的自组织理论，我们看特别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农民，或者是不三不四挣大钱的人，他没有金融市场、没有信息市场、没有人才市场，靠什么？就是靠他同在一个生存线上的兄弟、父母共同创业。所以，他当时不是利他的，就是亲缘利他，而不是互惠利他。1991年读书回来武汉的时候，当时觉得学了知识没用，什么资本论，学了没有用，就到企业去一边教书一边打工。发现很多创业的企业，就是我跟你合作，请教授，请博士，我给你多少股份，这些被请的人说你的股份不值钱，你给30%、40%不值钱，我要你每个月给我工资。所以，家族企业首先是一个自组织，当然发展过程中也有他组织。

第二，复杂性科学就是昨天他们讲到的多主体，大于等于三的多主体，因为家族企业和企业最大的不同就是家族进入了企业这么一个环节，他比非家族企业具有更多要素，因为要素更多，就更容易涌现新的组织形式。

第三，非线性。家族之间成员，吃饭的时候、晚餐的时候，随时可以进行沟通，一种家族观的认同，比较容易涌现企业。

第四，还有演化经济学说的惯例搜寻，因为平常在一起，从小在共同的环境中产生，他们有很多默启的知识，用心灵契约代替文本契约，所以更容易产生家族企业。

第五，差序结构，费孝通老师说的差序结构，但是他没有说差序结构为什么导致中国家族企业产生呢？这也是我们复杂性科学的层次，层次增多的时候就导致新组织的产生，所以差序结构产生家族企业的原因是因为企业是一个复杂性适应系统，特别是家族企业是复杂性适应系统，因为复杂性适应系统有更多的层次感，导致它比非家族企业容易产生。

第六，企业家精神，家族企业核心问题就是企业家精神。张老师1994年出了一个“企业家的契约精神”，当时因为做家族企业这方面国家课题的时候，跑遍了很多企业，这与创始人很有关，可能创业者死了，这个企业就死了，这种企业家精神，我觉得中国最缺的不是资源、不是资本，应该是缺少企业家的精神。这是我从微观角度解释为什么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更容易产生。

如果宏观解释，我们中国说的最多的就是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半封建就是家族，半殖民就是企业，整合起来就是家族企业。不管是洋务运动时期，民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都是这么体现的。还有，中国这个国家的特征一个是国一个是家，缺少中间组织，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是建设中间组织，社会结构从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型，而从家族到国家的时候，最有效的组织方式就是家族企业。

我觉得既然用复杂性研究家族企业，几个核心问题必须研究，比如企业家问题，关于企业家的理论很多，企业家的静态理论、动态理论，我想用复杂性的混沌吸引理论来解释家族企业的企业家是怎么创业的。

首先，我觉得企业就是复杂适应系统，家族企业肯定是复杂适应系统，那企业家就是这个复杂适应系统的混沌吸引因子，企业家负责外部扩张，他既是自组织者，也是他组织者，通过能动性、信任性来实现自组织发展。为什么有的家族企业不能发展，有的家族企业发展了？就是把家族的经验移植到企业就产生家族企业，为什么有的做的大，有的做不大呢？有的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敏感，不断的自我复制，就是我们现在夫妻店之类的，而有的对环境非常敏感，他寻找新的产业，新的治理结构，新的资本结构，就导致这个企业的发展。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治理结构，就是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很重要的不同，就是家族系统和企业系统混合在一起，他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组织了，他把很多非理性的、感性的东西移植到家族企业，可能家族在创办之初，他非理性的东西很利于他内部团结，当企业发展以后，也导致这个家族企业发展的瓶颈，就是用心理契约替代了文本契约。

再一个，家族企业有很多千奇百怪的行为，就是适应性导致复杂性，中国非常特殊的经济政治环境导致中国家族企业千奇百怪的形象。还有非线性，因为他有很多感情的因素，姻缘、血缘、地缘。以前讲的线性是三个意思，一个是线性函数，一个是拟线性函数，一个是线性逼近的，我讲的非线性，就是线性逼近也是不可以的。

还有一个就是富不过三代，但是没有证明为什么富不过三代，这里一个表是一个气象学家洛伦茨做了一个计算机的仿真，他是由于一个偶然原因，通过50多次到70多次迭代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我记得张老师写一个文章，就是一个企业家创业历史是25年，好象有这么一句话，三代正好是75年。到迭代75次的时候，万分之一的差别导致千万倍的误差。右边这个图是1975年一个叫李天岩的研究生写的文章。他证明了一个非线性系统，特别是一个迭代方程经过三次迭代就处于混沌状态。所以，从理论模式与数据是可以支撑“富不过三代”的经验判断是对的。但是也有反例。就是一些家族企业确实富过三代，怎么解释？就是和这个参数α有关系，这个就和产权的集中度，产业的问题，家族成员在里面的参与程度有关，应该做一个关于参数α的回归分析。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非成品，缺少实证分析。

展望有这样几点：

第一，我想做家族企业研究范式，但是复杂性科学是缺少范式的科学体系，这是我的困难。第二，要研究家族企业，首先要把企业理论理清楚，但是企业理论现在存在一些问题。第三，我们要把复杂性科学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家族企业，特别是中国家族企业要本土化，复杂性科学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初始条件不同会导致今后巨大差别。所以，在研究家族企业新的范式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初始条件。谢谢！

[ **甘得安**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院长。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移动互联网与我们的生活

## 盛洪：支付宝不仅有技术意义，更有制度意义

谢谢张老师，听了大家的发言还是很受启发，我也有一些想法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曹红辉谈到移动金融到底在技术上有多大改进，好象还是有所保留。我其实比较同意这个看法。当然它有很大改进，我觉得改进方面就是，它把很多零碎的时间可以用来交易，这是对交易更大的便利，就像我们现在经常在客厅一边看电视，在演广告的时间就把东西买了，原来不行，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按照制度经济学来讲，这就是降低了交易费用，降低交易费用核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使交易更多了，并不是说我只是节约了点儿交易费用，而是说我买东西更多了，这是有非常宏观的意义。

但是，它有多大的变化？这还是要有所保留，其实我们看到的只是中国的现象，我们要对比中国和美国，我们可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部分人在接触网购，使用的支付手段是支付宝，还有其他的支付，但是美国人基本都是用信用卡，在我们看来很传统。这是中国和美国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我认为是制度上的区别，区别包括中国信用卡普及非常晚，而且信用卡文化没有形成，很少有人习惯用信用卡在网上支付，但是我们习惯用支付宝。这个区别是什么？区别就是中国银行体系是国有垄断银行体系，因为它们的垄断地位，它们不愿意提供大众的支付服务，以及商业信用服务。大家可以注意有两个服务没有，第一，个人转账服务没有。在移动金融之前，美国银行给是个人提供转账支付服务，中国的银行是不伺候你的。第二，商业信用它是不提供的，即是小微企业得不到贷款。所以，商业银行应该做的大量的事情它们没有做，因为它们是垄断的，它们不竞争，不靠这个吃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网购，其实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它跟现货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一样，网购肯定是先付钱再给货，或者必须有一方先有一个动作，所以支付宝做了很大的贡献，现在说支付宝有风险，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支付宝的出现就是提供安全的，它是第三方担保，我给了你钱，你不给我发货怎么办？正是因为有了支付宝，网购才有了很大发展，所以支付宝是提供了安全。提供了安全也提供了商业信用，这种商业信用是商业银行应该提供的，只是中国国有银行不提供而已。所以我们中国人觉得特别便利，其实我在国外买东西还是用信用卡，但是在中国还是用支付宝，这是由中国的制度决定的。所以，中国感到移动金融有这么大的便利和变化，它不仅有技术含义，还有制度含义，这个含义就是打破了现有国有垄断的银行体系，不伺候你的这个体制，如果没有支付宝，它还是不伺候你。它们现在抱怨，其实是它们应该想想它们提供了什么服务，这是非常核心的问题。中国移动金融的变革不仅仅是技术的变革，而且是制度的，所以才有这么大变化。不然中国大众现在都没法跟美国人一样便利地到网上买东西。

第二点，正是因为支付这一端有支付宝这样的网络公司提供的服务，而这种服务的恰恰是商业银行应该提供的。其实它有一个优势，我们应该知道在市场这样一个工艺流程中，或者市场链中，谁是最有优势的呢？就是最接近消费者的是最有优势的。应该是市场为王，不是生产者为王。你突然发现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流程中，其实是在银行前面加了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就是支付，原来银行自己不提供，而它提供了。其实它相对于现有的银行体系是有优势的。你得经过我才能获得钱，我还可以对你进行选择，支付宝上面有很多银行可以选择。这个导致优势对比发生了变化，这些网络支付公司，它反而是有优势。它发现如果我提供了商业信用，提供了转账支付，最基本的道理，我拿这个钱就可以贷款，就是商业银行的规则。它又发现我还可以吸储，所以就有了余额宝，而且这是符合商业银行的道理的。所以，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来讲，确实这个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阴谋，是因为原来国有银行不做这个事，它不想跟人竞争，但是事实上有新技术就跟它竞争了，所以这是问题。当然，我觉得如果只是单家的支付宝肯定是问题，但是我相信这个支付宝并没有法律上的垄断地位，而且现在有很多网络支付的手段。所以，我觉得将来我们希望的还是竞争性的，当然最后可能真正的提供支付服务的，是要有信用积累的，是让人相信的，所以也就是两三家，不会太多。当然，这个模式必然是有的。

第三点，关于网络金融跟宏观经济的关系，刚才程炼讲得非常好。他说为什么M2对GDP的比重上升，事实上是支付结算系统的数额上升，这个上升是什么含义？就是交易量上升。实际上核心的是一个社会之所以发展，很重要一点要看交易量，这使我想起了诺斯的一个看法或者他的一个结论，他对美国交易费用占GDP比重做了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交易费用占GDP比重是上升的，其实这跟程炼的结论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呢？这个逻辑非常简单，恰恰因为支付手段便捷了，所以交易量上升了，交易本身就带来财富的上升。但是，GDP只是财富中一部分，所以虽然GDP也在上升，但是交易费用比重上升更快，这个逻辑是这样，包括货币，因为货币就是交易的媒介，所以交易量上升就是货币量上升，也是交易费用上升，这是等价的，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有了这样一个更便捷的交易形式，就有宏观结果，也就是说这些年来这么多的网购比重的增加，不是说它抢了所谓实体店的生意，而是创造出来新的交易量，也就是创造了新的GDP。假如没有这块，经济增长就不会这么快，这个逻辑很简单，实际上交易手段的便捷，节约的交易费用，不是节约了那一点费用，而是交易量增加了，交易量增加又是GDP增加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样交易手段的便捷导致交易量的增加，同时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这是所谓金融深化的概念。什么意思呢？货币是最核心的，货币就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大家相信就行了，你只要相信，我就能够非常便捷的进行交易，它是为了让你完成交易。所以，每一笔交易的完成都是在货币从甲转到乙，它在加速货币流通速度。既定的基础货币量的前提下加快流通速度，就等于是货币供给总量在增加，就是金融深化。反过来讲，如果我们限制它，比如一年只限制你买一万元，这是对宏观经济的毁灭性打击，这从宏观经济来讲是不可取的，如果谁做这个事，那是社会的罪人。你不能说限制用支付宝交易，这个交易就会回到国有银行，没有这种可能性，一点都没有。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很核心的就是我们发现了支付宝和余额宝出现与一些不安全的事情是没有关系的，就跟你在高速上看见有交通事故是一样的，我们的思维一定不是要把高速公路关掉，而是考虑怎么改进安全性，提高安全性的问题。所以，如果因为支付宝或者余额宝出现一些不安全的事情就把他限制住，把它关掉，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也是对我们宏观经济巨大的打击。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3月17日天则所召开的“画‘鬼’----移动互联网与我们的生活”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校订】

## 刘业进：余额宝是企业家精神的产物

关于互联网金融，我想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来说，支付宝和余额宝的出现，它之所以被创造和存活下来，说明存在一个前提即市场中一定存在可套利机会，这个机会与中国银行业的行政垄断有关，垄断体制下的商业银行可能不在乎这个利润机会，它靠自己的存贷差获利活得非常舒坦。余额宝和天弘基金合作，看准了一个巨大的套利机会，就是把散户的小额资金收集起来作为一个大户与商业银行做人民币业务。有套利机会，有利润捕获，就一定意味着有资源配置失当或者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空间。余额宝和基金公司合作捕获这个机会，把这个机会利用起来。而以前这个机会没有利用起来，而现在有新技术支持可以利用了。它既然有利可图，就必然意味着存在大量资源配置错误。企业利用新技术套利的过程，就是一个纠错过程，其实是功德无量的。对这种企业家精神驱动下的行为，完全不要惩罚和打击。恰恰相反，我们要充分利用企业家精神，把这个套利机会驱逐干净，促使资源配置就是走向均衡的过程。这是一点，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来看应该保护他，当然也要防范风险，但是不能打击他和惩罚他。

第二，两种范式下GDP统计指标的问题。现在我们宏观经济分析都用GDP这个统计量，从来没有怀疑过。其实GDP的准确含义，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GDP是对经济秩序有效复杂性的一个非常不准确的测度。哈耶克和布坎南讲，经济是一个秩序，我们要测度一个经济秩序的程度或者有效复杂性程度，现实中无法找到指标可以测度它。幸好，星际系统中有价格信号，我们用经济系统中最终商品的价格和数量相乘再相加，或者从收入的角度加总，得到一个叫做“GDP”的指标。其实准确的刻画一个经济系统的秩序程度，恰恰可能是另外一套指标，就是程炼提到的经济系统中的加总交易量，比如说程炼博士刚才讲的非现金支付的交易量，这个交易量加上传统的现金交易量，就更加准确刻画了经济系统中导致秩序的行为。怀特海曾经说，“过程即实在”。经济的过程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交易，我们对交易的刻画就是对经济中交易量的刻画，它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经济系统的核心特征——有效复杂性程度。所以，从这个视角看，我们可能要改变传统上GDP的统计方式。或者弄两套并存，专门刻画交易的一套统计指标；现有的GDP指标。交易视角的GDP统计是过程导向的；现有的GDP统计是结果导向的，服务于人们直观思维的也可以存在，但是远远不足的。

最后讲比特币的问题。比特币有的人唱衰有的人唱好。我觉得比特币回到货币本质。货币是一个“社会科学事实”。什么是社会科学事实？社会科学事实就是我们大家都认为它存在它就构成一个事实存在。是我们的同意，我们的约定，一种在人际中流行开来的看法，使得它就成为一个事实。当然，同意并不是让大家开会，可以是你默认，你愿意使用它，交易它。你默认了它，它就是成为一个能够用作交易的工具，能够储藏的工具，它就是货币。所以我认为比特币方兴未艾，他很可能就是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的一个现实证明。而且对于它的总量的控制，比如2100万的总量控制，设计上是保证总量无法突破的。这种硬控制，这可以对抗任何法币的通胀行为，因为原则上任何法币都是没有总量控制的。事实上，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不搞通货膨胀。比特币设计者限制了一个货币发行总量，意味着通货膨胀没有空间。将来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可以控制风险但不要扼杀他，很可能对人类货币制度带来一个创新。

【 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3月17日天则所召开的“画‘鬼’----移动互联网与我们的生活”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校订 】

## 未来乡村建设的图景：一个逆「城镇化」的过程

卢跃刚

天则所“画‘鬼’——移动互联网与我们的生活”主题演讲：《未来乡村建设的图景：一个逆“城镇化”的过程》

去年雅安芦山420大地震，我被壹基金聘为顾问，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同时被腾讯的子云和壹基金秘书长杨鹏这两口子强行安上了“微信”。这家伙太厉害了！在手机上阅读、发言、转发，这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记得六七年前，菊红请我到腾讯讲互联网信息传播，我概括了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十大特点。我只是感受到了革命性变化即将来临。地震之前，我读了迈克尔•塞勒写的《移动浪潮：移动智能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的价值比八十年代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大趋势》更加惊心动魄。我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一次以智能终端为载体移动互联网的，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创造性破坏”，其深刻的程度可以与瓦特蒸汽机、珍尼纺纱机、福特“T”型车相比拟，价值甚至远在此人类经验以上，因为这场革命是温和的、扁平的、共享的，每个人都可参与、每个人都是主体、每个人都可能受益的革命，它不仅是人类财富的存量革命，更是人类财富的增量革命。如果你愿意承认这种温和的革命的存在并且已经到来的话。

今天的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新型城镇化”有些什么具体内容，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从报道来看，其目标是“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着重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问题”。

这些话，这种思路，在我看来，无非是加大城镇、乡村基础建设投入，增加城镇就业、生活人口，绝对减少乡村人口并实现向城镇人口的转移，实现乡村各种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所以，在各级政府那里，城镇化问题会被简化为“圈土地”的问题。而且它所针对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问题之一——“三农”问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三农”问题基本上是个假问题。是城市化角度，政府或城里人主导，已经呈现出了巨大弊端、至今都还在消化的工业文明的理路，它没有揭示中国乡村问题、或者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真相和实质。或者说，它依据的是传统工业文明的思路，跟它所倡导的“生态文明”是背道而驰的。用工业文明的逻辑来实现生态文明的目标，是问题根源所在。这里的潜台词是，中国城镇化问题的背景，是人类文明的转型，要回答文明转型过程中的主体是谁的问题。一言以蔽之：不从乡村的文明主体性地位思考问题和解决方案，就很难找到真正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

要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问题，只要看中国发展模式的后果便不难推知：城里人期待着一场大风，乡下人期待着一场洪水。怎么讲？雾霾没法治，等着一场大风把它刮走；中国70%乡村被垃圾包围，河道里垃圾成山、成龙，等着汛期来，一场洪水给它冲到下游。我们只要在城里每天观察PM2.5，在乡村社区公共场所——道路、河流，以及呈现出来的民族心态，你就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问题：一场深刻的伦理危机。“食品危机”仅仅是它的后果之一。

乡村公共生活的废弛和伦理的崩溃，只是现象之一。我把乡村问题概括为“三空”问题：农业产业空心化、乡村社会空壳化、农民家庭空巢化。问题没有找对，很难对症下药。产业空心化是问题的核心，“空壳化”“空巢化”是“空心化”派生出来的问题。农村人多地少，至少存在三亿以上的剩余劳动力，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生长激素所支持的农副产品生产（我称作“四毒”生产，还不算各种小工业对乡村土地、河流的污染）及价格，使得单位时间和土地的产出不足以支持农民满足基本的生产发展、生活需求。因此，社会资源的配置，对乡村来说，是施舍性的，补偿性的，边缘性的，甚至是剥夺性的。于是就有了“乡村的报复”：乡村食品消费的二元化。你不是要搞城乡二元化吗？好，我的回答是：乡村食品消费二元化，我农村人吃的生态食品，给你城里人吃的毒化食品。请问各位，城里还有放心食品吗？当然，乡村的报复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但是在传统的现代化理路、城市人本位、配置资源方式，以及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都不可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实现生态文明的转型。经过多年的研究、实践，特别是四川两次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的参与，受到“智慧城市”的启发，我们提出了“智慧乡村”的思路。顺便说一下，“智慧城市”是一个失败的概念和实践，中国的实践与互联网开放的性质、理想是背道而驰的。可行性：四个一（一个商业计划书、一笔投资、一个移动互联网平台、一支队伍）。从可解决的问题、可激发的存量、可提供的增量的来看，这个过程一定是“逆城镇化”的过程。投资为什么不去追逐稀缺资源，不去追逐超额利润，不去围绕着自己的偏好、生活方式、身体和心理危机？这将意味着，个人和企业，趋利避害的牟利的或公益的投资选择，将可能发生革命性变化。

革命形态，大的方面，想到的大致有五个方面：1、按照生态文明、优化自然和社会资源配置的原则重组产业链，使得传统产业如农业、教育、医疗健康等可能有几何倍数的增长；2、重构社会分工体系、职能；3、存量激活、增量倍增的良善效果前无古人；4、有着重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的无穷潜力；5、可以最大程度地调整并摆正人、组织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并形成新的世界观。

[ 本文为作者在天则经济研究所2014年3月17日主办的「画“鬼”——移动互联网与我们的生活」研讨会的主题演讲, 转载请注明 ]

[ 卢跃刚 报告文学作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 ]

# 城市发展与制度创新

## 从PPP与资金效率提高看其关联的混合所有制创新

贾 康

我们现在已经得到明确的信息，从国务院领导层到有关管理部门如财政部的领导层，高度重视在实际工作中间推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或者称为政府和企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样一种机制创新。在可以预期的PPP机制创新过程中间，资金效益方面的提高，是合乎学理分析的，也是国际和国内的一些经验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佐证的。当然，为了把这个事情处理好，还要结合我们现在阶段上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做更多的探索，还需要克服一系列相关的困难。

我们从理论框架角度可以相对清晰地勾画：作为资金运用，使包括政府的资金和企业、社会资金以合作的方式加入进来，推动PPP项目建设过程中间运营效率、资金效益的提高，这样一种正面效应是非常值得看重的。

首先PPP的正面效应可以体现为：从政府主体角度看，减少财政支出的压力，提高财政资金总体使用绩效。这当然就关系到政府的职能怎么样更合理地定位和更好地履行这一问题。我们在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间里反复讨论的“政府应该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大原则，在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里面的具体体现，就是特别强调了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们改革的核心问题，为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非常清晰地表述，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依照这一指导思想，政府职能作用的发挥所面临的各项任务，在具体的考察中仍是千头万绪的。但最突出的事情，将覆盖我们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两大方面，一个是怎么样推进新型城镇化，一个是怎么样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两大事项都将使财政感到非常沉重的支出压力。

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我们走向现代化、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从基本的数据来说，未来几十年间，我国城镇化的实际水平要从目前的不到40%，一路走高到70%左右的高位，到那时有可能转入相对平稳发展期。在此之前的时间段上，大约会有接近四亿人要从农村区域转入城镇成为常住人口，算术平均一年就是1300万以上。我们去年实际提供出来的新增就业岗位是1310万人。这里面大部分是所谓转移人口，即从农村区域转到城镇，他们最大的可能性是以后要在城镇区域成为常住人口。那么这些进城人口所需要的市民化待遇，必须得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效供给、支持和保障。资金数据呢，社会方面听到有关部门所说的40万亿元，大都表示好像说得带点儿夸张意味了，我看到网上有些人甚至带有讥讽之意，说政府这一提40万亿元，就好像拉出了一个“大跃进”的架势。其实理性地看待这个计算，一点儿也不夸张，如果把今后几十年要进城的每一个人所需配套投入的资金平均算作10万元，那么静态算账合计就是40万亿元。而实际上，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有效供给，从基础设施和其他“人力资本培育”的一些配套事项来看，10万元我看都打不住。假如按一个人头15万元来算，那么就将是60万亿元静态计算的投入总规模——当然这将是在几十年的时间段内陆续发生，动态算账数值还将会高出许多。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具体的供给要涉及到道路、桥梁、隧道、涵洞、上下水、供电、供热、供气、医院、学校、绿化……，可以拉出一个长长清单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供给。显然，如果只是期望于政府怎么加大投入去解决这方面资金支撑问题，是不能够适应现实需要的，必须要充分地考虑把已经壮大和雄厚起来的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加入，这样形成政府和社会资本、企业资本的有效合作，才有望把我国今后几十年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投入问题处理得比较好。实际生活中间，这些年因为有这种城镇化的压力及相关发展的迫切需要，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已经迅速增加。我们十分需要积极考虑在今后结合地方债阳光化的制度建设，在增量和存量两个方面，由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对于一部分地方债（地方已发生的和未来有可能发生的实际负债）实现有效的置换和替代。

另外要考虑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有关学者已经有基本形成共识的较清晰的测算，形成一个具体的曲线图：大概是在2030到2033年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所需要给出的保障给付支出压力的高峰阶段，它的前面和后面合在一起覆盖好几十年的支出压力区，现已经到来。2015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迅速消失，代之而起的就是人口老龄化对我们形成的满足养老和老龄医疗服务等等社会客观需要的新时期。这种压力出现后，在今后几十年间，它会表现为年度的支出强度要持续上升然后再缓慢下降，此过程中间，中国整个养老体系从硬件到服务所有的投入必然要发生，就是要满足相对应的一系列有效供给方面的需要。如果不能处理好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政府的履职是不合格的。政府必须从通盘规划和自己的行为上，把所有的战略考虑、策略考虑和政策设计综合在一起，与方方面面互动，处理好人口老龄化几十年发展过程中间，怎么样尽可能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来实现我们经济社会的和谐和平稳发展，那么就必须运用诸如PPP这样的模式创新来鼓励和引入大量的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进入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

所以简单归结为一句话，仅从这两个非常现实的实际生活的重大挑战观察，我们就可以看出，对于政府而言，选择在PPP这个概念之下，积极地推进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机制、制度创新，是化解财政压力、政府债务压力和充分尽责地实施和谐社会管理、贯彻中国梦发展战略的客观必然要求。缓解政府财政支出压力的同时，就意味着政府尽职尽责中总体的资金绩效水平的上升，因为这必然意味着政府资金的乘数效应、放大效应较好地实现了。

其次，要说到与PPP这样的机制创新相对应，我们的社会公众可能得到的受益和实惠，即从资金使用“以人为本”这样一个角度表现出来的综合绩效的提高。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公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空间极大地被激发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服务的需求是超常的或倍增的，如果从社会心态和社会氛围来看，现在有非常典型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特点。应该讲，民众自己跟自己比，社会成员中绝大多数人生活境况是越来越好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满意度却往往并没有随之提升，幸福感没有上来，甚至在某些场合它不升反降，更伴有以焦虑、纠结为特点的情绪和心理感受。其实和其他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对比起来，这是有一定共性的。进入中等发展阶段，这个挑战它所带来的整个社会必须处理好的这一特定阶段上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怎么样进一步提高效率和满意度，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这种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愿望的有效供给，必须借助于机制创新。PPP恰恰可以在这个方面使政府在继续发挥应有作用的同时，把其他的社会力量，如企业的、专业机构的、社会组织的，包括非盈利组织的、志愿者组织的等等力量合在一起，不仅是壮大资金力量，而且可以在运营管理上、绩效提升上形成各个主体之间优势互补，各方以最有优势的特长去管理最适合由自己防控的风险，这样就可以使公共工程、公共服务在建设和其后的运营过程中间质量水平、绩效水平、管理水平得到提升。那么从经济学的范畴来说，这就是形成资金绩效提高，而使老百姓得实惠这样一个正面效应的有效机制。因为PPP就是把参与者多方的所有相对优势有机结合在一起。政府的相对优势是一般而言更有全局眼光和规划设计方面的优势，在组织功能、保障力方面，政府也是有它特定的相对优势的；而企业在管理方面则有所谓“内生的”天然优势，它特别注重自己参与进来以后怎么样能够取得投资回报——企业的参与不是简单地让它“学雷锋”，让它尽所谓社会责任，它基本动力源的模式没有改变，仍然是投资取得回报。那么它怎么样有效地取得回报？在特许权框架之下，在一个相对而言很长的、一下子锁定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段内有稳定取得回报的预期的同时，它会调动自己所有的相对优势，在“细节决定成败”的种种具体的节点上，把管理运营的水平向上提升。这就是非常值得看重的企业方面的特殊贡献，而这恰恰是政府的弱项。当然适合这种PPP项目的民间资本，应是那种偏好于相对稳定地取得长期的回报，而不是特别看重短期财务表现上盈利数据很高、侧重短中期回报的类型。而现实生活中有这种偏好的资本为数日趋可观，它们附带的管理技巧、专业知识、内生的对于绩效的关注、参与进来后对于PPP项目的贡献，是我们特别值得重视与追求的，因为这些都会具体表现到要从项目中受益的老百姓，可能得到建设工期有效控制、工程质量有效保障、运营服务更为细致周到等种种实惠，使满意度、幸福感上升。当然，还有其他的专业群体，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设计师事务所等等的参与，所有这些专业力量，它们的相对优势具体到不同行业、不同的项目，等于在一个个PPP项目中现实地提升性价比，也就是使资金效益提高，使老百姓得实惠。当然这就是一个我们必须很看重的、使老百姓的愿望得到更好满足的有效机制，其正面效应按经济学语言说，它提升的也是资金绩效水平。

前述第二个角度已带出了第三，就是我国已经壮大、在资金力量上已经雄厚起来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持有主体中，一大批有日益强化的发展意愿、并在偏好类型上适合PPP的企业，它们会打开一个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这种企业的发展，在进一步发展“现代国家治理”治国理念下的现代市场体系、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系之中是市场经济舞台上的重要主体，它们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新的空间，参与进来寻求共赢多赢，是符合企业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是符合全局利益的。在经济学的视角上，这种多赢、共赢是实现了总体资源配置优化中微观主体资金绩效与宏观全局资金绩效的有机结合与统一。

总之，简要地说，从政府、公众、企业三个视角上，PPP机制都有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而且这些正面效应完全可以通过我们前面的分析而落到今天研究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综合绩效水平的提升上。我们追求“少花钱多办事”就是要靠这种机制创新来形成长效的保障条件。

既然我们这么看重资金效益的提高，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到此就基本上归结了PPP的重要意义？我认为还不够。PPP是一个融资、筹资机制的创新，同时又是管理机制的创新，这都是值得肯定的。而在中国现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PPP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在战略层面上值得直接说明的制度创新意义，就是它直接呼应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方面联通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即现代市场体系运行的产权基石方面的制度创新，要主打混合所有制。这样的一个突破和PPP机制创新形成了天然的内在连接。因为PPP概念下比较标准的、如财政部楼继伟部长特别推崇的具体形式，是“狭义PPP”的特殊项目公司，英文缩写为SPV，它是非常清晰的标准化股份制框架，参与各方的股权是非常清晰地合在一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SPV就是股份制框架之下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形态。

我们看到三中全会的《决定》里，有非常丰富的改革内容，有的细心人士总结了三百三十六条具体改革切入点，但如果最浓缩地讲精神实质及其重大突破，《决定》给出的“现代国家治理”作为一个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后面跟着多次出现的“现代市场体系”里面，在说到资源配置中间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样的原则性概念突破之后，紧跟着的我认为要抓住不放、对实施制度创新有突破意义的操作点，就是市场经济产权基石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其实这里已经挑明，就是要以“现代企业制度”中代表性形式股份制框架下的混合所有制来主打，混合所有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怎么理解这个混合所有制？我不赞成有的学者所说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就是混合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个事情，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明确地作为实践中间的一个指导方针了，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现在所说的混合所有制，实际上强调的是一个一个市场主体，它们内部的产权结构怎么混合的问题。这个内部产权结构，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之下，也就是股份制的框架之下，应该形成不同来源的股东、即股本持有者，它们在一个一个具体的市场法人主体内部，以混合、合作的方式形成潜力、活力最大释放的稳定机制，来寻求共赢和多赢。这是“现代国家治理”所内含的多元主体充分互动、以最大的包容性实现生产力解放的一个具体的机制创新切入点。这样的混合所有制在我们市场经济的细胞——市场上的一个个的市场主体内部，打开了进一步提升活力、促进发展的空间，它其实是在前面早已经在现实生活中间运行的种种混合所有制的一个正面概念的肯定，并对其今后大力实现更好发展的指引。在中央没有作出这样的强调之前，这种混合所有制其实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和存在、运行。我们考察的一些具体PPP案例，可以作为说明，比如，中国内地本土民间资本加入的第一个BOT项目——福建泉州的刺桐大桥项目，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SPV形式，这个项目公司是多元主体，共同合作中按股份制形成了清晰的产权结构。但这样的混合所有制，在理论的探讨方面显然还很不足，近来还看到了不少的争议。我认为还需要学术界作进一步的努力，把它通盘的逻辑与内容，作出正本清源的正面认识。

我试着在这方面谈一下自己的观察和初步思考。在结束文革恢复高考后，我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当时在进一步学习《资本论》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敏锐地意识到并特别地强调了股份制出现的意义。他首先从实物形态来说，如果没有股份制，那么铁路的兴建还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由于有了股份制，这种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所需的项目建设，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地借助股份制形成资本聚集而再历经一个较长周期把它建设出来。他看到铁路兴建这样的实例之后，引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就是：股份制在原来的私有制框架之下已经实现了一种对于这一生产关系私有制的特定性质的扬弃，但同时他又说了一句，这还是在资本私有制基本框架之内的消极扬弃。那么又过了一百多年之后，我们看看现实世界，是不是应该再有一点理论上的突破？市场经济企业制度现实发展形态方面，我认为，我们不可回避地要看到现实形态已比马克思当时可以观察到的情况又多出了很多轮次的发展。当年我们在上大学时，学习这些经济学知识的同时，也听到了一些外部案例，比如说，那个时候就讲到大规模的跨国公司，比如像通用公司，它们的股权结构是什么样的：已经高度分散化了，很难找出其中谁是“资本家”的代表，不像过去，比如洛克菲勒财团，闻其名你就知道它的资本家代表就是有血有肉的洛克菲勒家族成员。但到了通用不行了，其股权很分散，这个人持有一点股，那个人持有一点股，一下还找不出一个具体的所谓资本家的代表。大量的股本持有者，是所谓产业工人和社会上的民众，包括企业内部自己的员工及社会上其他的所谓普通劳动者。所以有人说，已经有一个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的概念，用来描述像通用公司这样的具体股权结构。

当然在那个时候，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讨论到此为止，可想而知，因为有意识形态方面大家觉得不宜再深谈的一些顾虑。那么到现在，又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进一步地讨论一下，像具体的标准化的股份制，在股份较充分地多元化、分散化的情况下，它在上市的环节，英文现在的标准表述叫go public，即“走向公共”。这样的一种标准化现代企业制度，在它上市环节所说的走向公共意味着，实际上在制度安排上形成的这样一个公众公司，它必须最大限度地披露它所有的信息——财务的信息、资产的信息，也必须实际上承诺它对于公众的责任，它必须在这样的一个混合所有制的产权安排的基础之上，于社会化大生产中把各个股东自己的利益追求和社会的所谓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要求最好地实现结合。那么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消极扬弃之后，它已经上升到了带有积极意味的扬弃？我觉得是值得探讨的。我认为在中国经过这么多年千难万难对于市场经济的探索，一步一步地从“基础性作用”说到“决定性作用”，从原来所说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推到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间，我们现在实际上指导思想的主线，就是要强调实事求是，要讲求与时俱进，不是简单地贴标签，而是看到这里面的制度机制创新带来的“解放生产力”的现实启示与潜力空间。

于是混合所有制与PPP的结合，对于全局转轨和全面改革战略，必然成为非常值得看重的一个结合点和切入点。我们现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的认识，当然就应该把理论和实际打通，回到现实的应对挑战方面，来助推攻坚克难、到2020年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的配套改革。解放思想观念，往往是先行的、关键的，正如邓小平南巡的一锤定音的突破：计划与市场都是运行层面的机制问题，并不存在“姓社姓资”的分野，这才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与如今表述到位的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那么顺便说一句，我就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意识到中国的高铁建设有它的相对优势，又有大量的资金需要，那么很多人讨论起来只说到了我们的铁道部改组为铁路总公司以后应发行铁路债券，到此为止，怎么就没有人讨论一下：为什么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铁路的筹资就不能引入股份制呢？我对这个事情感觉很迷惑，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思想障碍在那里，我不是太清楚。但我联系到是不是跟我们看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已经延续若干年的一些争论有关？一说到股权结构，一说到股份制的发展，便有一种思维定势：需要在这里边问问是姓“公”姓“私”还是姓“社”姓“资”，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我认为，上面这样的一种先贴标签的认识在中央三中全会实际上确立了把股份制这个框架之下的混合所有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之后，应该被抛到一边。其实这种争论没有抓住真问题，我们是不值得这样贴标签式地继续争论下去的。我们看看实际情况：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的调控中，由从供给端发力，决策层经过斟酌以后给“两房”、通用、花旗这些既有金融层面的又有实体经济层面的企业法人注资，用的是公共资源。把公共资源、财政为后盾的资金注入这些股份制公司以后，这是“国进民退”吗？有很多的中国人当时作如此解说，甚至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在救资本主义”。当然有了这种注入之后，稳定了大局、涉及整个世界，因为在美国当局有此种动作后，其金融和经济局面在风雨飘摇之中似乎一下子又趋向于稳定下来了。那时我就注意到，资中筠老师发表文章说：前面那样的解读没有道理，这里面不涉及什么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在股份制框架下，可以运用的政府能动调节与市场主体自调节合作互动的机制，当然经济学的解说还要进一步把对它的分析考察作出提升。其实这样的机制过去已经看到有先例：我们再往前追溯一下亚洲金融危机，当它冲击到香港的时候，有“港元保卫战”，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危急局面中斟酌之后下决心启动介入措施。索罗斯那边发动攻击，这边特别行政区政府一下子把隔夜拆借利率提高300%，这使“金融大鳄”预期的短期头寸资金的成本一下子上升到他出乎意料。同时，因为索罗斯早已经在货币市场和股市、汇市、衍生工具市场等等同时布局，做了原来的铺垫和埋伏而一起动作，这边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措施是当股价迅速下降时（这是必然的，索罗斯那边也意料到并早作好了这方面的对应的措施），动用土地基金和外汇基金入市，一下又把股市托住。这是索罗斯们没有预料到的，所以虽然股市是在往下走，但决没有落到索罗斯原来设想的那个地步。那么这是用公共资源对股份公司注入资金，特别行政区政府持有的这些原来认为平时不必持有的股权拿到手里以后，稳定了大局。风平浪静之后，它又以盈富基金的方式减持，还可以卖个好价钱，赚的钱进入公库，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这里边得到了相对好的体现。这些调控过程中你说它姓“社”还是姓“资”？没有意义。

此外，还有多少年延续下来、现在仍然没有办法下定论的“公有制是‘为主体’还是‘为主导’”，如何探索认识“混合经济”的概念，国有制和国有企业是否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等根本问题。国际上特别有影响的萨缪尔森经济教科书中，作者作为非常有影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对合理的、主导的所有制的基本看法就是“混合经济”。我认为，从实事求是角度观察，“混合经济”联通的“混合所有制”的概念对于中国现实地处理深化改革、践行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来说，亦是很重要的。“为主体”或“为主导”，都有阶段性和层次性。可能在从传统体制走向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开始阶段无法一下子走到“为主导”的表述，一定要强调“为主体”，这可以避免很多激烈的观念冲突，把一些该做的实事抓住了往前推。但到了某一个阶段上，很多人就不满足于“为主体”了，他觉得这会机械地理解为50%以上的股权才是“主体”。那么，“在某些行业、某些领域、某些地方、某个阶段上如果低于这50%，是不是就丧失了‘主体’，是不是就是一个重大的方向性错误？”在这种争议中，不少人也就倾向于“为主导”的表述了。“主导”更强调的是辐射力、影响力、控制力，这跟党的十八大报告里的概念是对应的。但在内部讨论中，仍然会有一些人说“如果一下退到‘为主导’，会不会是整个社会主义都成了问题”？这也是一个看问题马上就会上纲上线、对决策方面也很有冲击力的考虑视角。有的同志把公有制等同于国有制，不认同或者不明确股份制也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那么观点上可能就更对立了。对此，我不太赞成拘泥于“为主体”或者“为主导”的表述，能不能把这种争论淡化掉？“混合所有制”在概念上的确立，正是在作出淡化处理。

在混合所有制的框架之下，这种政府能动调节加上市场主体自调节的空间，结合我们必须正面考虑的“供给管理”这方面的政府作为，可能形成一个相对好的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方案，来应对经济生活中间的一些矛盾与挑战，化解矛盾凸显和冲突因素，而使公众利益得到提升、得到保障。我们这里无非是要认识，这样的由PPP而联系混合所有制的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包容性，以及它所带来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所以我认为，在当前我们讨论PPP机制创新，应对公共事业发展中的资金压力，应对中国城镇化、老龄化等等这些重大挑战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充分注意PPP的机制创新除了在融资、筹资、管理和资金使用效益等等方面的可能贡献之外，对于中国全面改革，从产权基石的夯实上升到现代市场体系，上升到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与发展来说，都具有莫大的意义。这种支持转轨、深化改革的意义，是非常值得我们在探讨一个个具体项目，推进对于具体项目更好的管理和相关政策优化的同时，时时放在心中，与现代化战略全局结合在一起更好地加以认识和把握的。

[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财政学会公司合作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本文为作者2014年5月29日在天则所主办的「2014年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与制度创新论坛」演讲修订稿 ]

## 公共政策的定量评价

——以北京市东城区数字化城管为例

赵 农

1.主题发言部分：

非常感谢大家，我是最后一个来做演讲，题目叫作公共政策的定量评价——以北京市东城区数字化城管为例。我谈的这个是一个技术活，公共政策的定量评价问题说实在是比较麻烦和比较复杂的，当然它的意义也不容置疑。为什么我们要对公共政策进行定量评价呢？这和现有的单纯对公共政策定性评价的弊端是有关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大多情况下都是拍脑袋做出来或者是听取一部分人的意见而作出。事后政策的效果究竟怎样，对不同群体的利害关系究竟如何，虽然也有不少文章在事后也做一些评价，但是这些评价往往都是定性的，是从一个侧面或者是从某一个立场出发来进行的，定量评价确实比较缺乏。

我们经常说，中央或者地方出台了这个政策或那个政策，过几年之后又怎么样，好象没有人管，这是大家普遍的共识。另一个问题就是公共政策往往和公共财政结合在一块。我们知道公共财政通常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功能：其一是国民收入再分配；其二为宏观经济调控；其三就是资源配置。第三项是指公共品提供哪些，提供多少，是否合算。政府掏钱来提供公共物品，花的也都是纳税人的钱。它所提供的公共品是人们需要还是不需要的呢？它所配置这个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呢？这些都应该和定量评价结合到一块，否则你说不清楚。

有幸的是我们天则经济研究所曾非常偶然地介入到与此相关的一项研究之中，在盛洪所长的领导下基本上调动了全所主要的科研力量，用了大致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这一课题。

首先我对北京市东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作简要介绍。这个项目是由原东城区书记陈平主抓，运用GPS等先进技术手段，进行不间断的城市管理。怎么来做呢？有一个信息中心和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用城管通（城管通像手机一样），进行无线联系，且有GPS定位。城管到哪个地方大屏幕都知道，某些人在几号地区，在什么位置都非常清楚。如果遇到一个井盖被偷了，城管到达这地方拍照，上传信息管理中心，然后中心下达指令，及时把这个井盖补上。还有清理垃圾、小广告，路灯安装等等。东城区按照一万平米为单位，划分为N个网格。

网格信息及时传达到信息管理中心，利用城管通传输的语音和图象信息，信息管理中心责成相关部门迅速解决问题。东城区采用数字化管理之后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如何对这个事情进行定量评价，老实讲这是世界级难题。我们当时收集了很多材料，至于怎么来进行评价，我们并没有拿到现成东西。东城区在之前也邀请了国内数量经济的权威机构和人士，他们也花了很长时间来做研究，也没有提供合意的评价方法，因而未果。天则所承接了该项目，最终完成了《北京市东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经济评价》之研究报告。

其实针对公共政策或者公共行为，没有统一的指标体系或方程来进行计算。然而我们认为基本的经济学知识肯定有用，这就是成本-收益分析，就是供求理论。还得根据具体问题进行攻关。大家都知道，数字化城管需要研发，需要购买设备，还要配置一定的人员等等，这些都是成本。有些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分摊进去，有些则按实际花费进行计算，但是关键对于效用和收益，前后怎么来测算，显然难度比较大。

天则所课题组首先确定了总的分析方法。由于城市管理涉及内容非常庞杂，若要细分，则有好几百项。可否通过每一事项评估加总而得出城市管理的整体评价呢？这种方法不是不可以用，但工作量太大，而且未必准确。在某些时候，运用模糊方法，采取整体思路，反而能够取得意外的效果。《研究报告》运用微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基本原理，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系统评价了北京市东城区采用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之后的制度变迁、成本节约、效用增加、福利增进、效率提高等结果，为该区数字化管理系统的经验总结及其推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采用了较为先进的居民意愿支付问卷调查和模拟市场的公共物品计算，研究报告的结论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精确性。我们所采用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居民意愿支付法。该方法所用的问卷调查内容太细致，就不一一都讲了，可以谈些核心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这种状态，如果退回到原来这个状况，你认为应该获得多少补偿？这样就能拿到关键的几个数据，然后根据所确定的几个点，我们就把最难的的需求曲线模拟出来了。有了它之后，才能谈的上别的。关于问卷调查方面，我们请了非常权威的学者设计问卷和处理数据，回收了1300份问卷，还做了入户试调查，数据也做了非常严格的处理。

下面讲一下该项定量评价的研究特点。我们的研究报告将城市管理作为公共物品来研究，在研究中引入了公共物品评价体系和相应的评价方法，从而在理论上超越了一般的节约或者是降低政府成本的局限。通常的评估只说降低了政府成本是多少，往往回避了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效用增加了多少。由于总效用减去总成本是社会福利，这个福利变动多少，其实是最需要知道的。该研究报告将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自始至终贯穿了建设社会服务型政府、社会管理型政府的价值理念。我们就是要将其他的抛开，追问政府究竟提供了多少服务，居民的感受究竟发生了怎样及多大的变化。

我们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与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城市管理包含了许多部门，涉及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其绩效难以量化。为此该研究报告创设了“件天”的测度单位和“总保运量、保运量、破损量、保运率”等概念，使定量研究成为可能。否则就无法把不同的东西进行加总。第二，公共物品由于其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难以直接被市场评价。该报告以意愿支付法作为主要的方法，以模拟市场方法作为一个验证的方法，比较恰当地衡量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经济价值。第三，在合理及谨慎的指导原则下，力求简化模型，使研究相对简单明了。第四，在整个研究中谨慎性原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体现为意愿支付调查的样本数量和质量达到了相应要求，成本计算是充分的，产出和效用计算是比较保守的，不同的评价方法之间可以相互印证，针对分析核心与基础的需求函数进行了拟合优度检验。我非常有幸地参加了整个研究过程。

下面讲一下研究的基本结论。（1）东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基本逻辑是依托技术创新而进行的制度创新，通过降低政府内交易费用，带动和激发整个城市管理体系提高效率，尤其是通过降低考核成本，提高约束和激励水平，导致城市管理各部门的效率提高。请注意，这种考核是随时进行的。数字化城管之后，公共设施保有量从5139605件天提高到11803844件天。（2）根据对居民的问卷调查，旧的城市管理体制实际上存在每年约1亿元的社会福利亏损。在原有城管模式体系之下，分部门运作，自己待在办公室里喝茶，弄几个临时工在那里忽悠。在那种模式下，我们衡量了百姓的满意程度和为此支付的成本，社会福利竟然是负的，即成本高于效用，每年的社会福利净亏损为1亿元。（3）东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至少每年为东城区居民、从业人员和旅游者带来约1.58亿元的新增福利，并使东城区的城市管理系统在社会福利方面扭亏为盈。刚才说到，社会福利是总效用-总成本，原来福利是负的，每年成本要高于总的效用，现在已经变成正的了。（4）如果旧的城市管理体制达到新体制下的效果，每年就要比新体制多支付5400多万元的成本。假如回到原来的那种状况，怎么才能达到现在这种绩效呢，必须每年增加5400多万的成本支付才能达到现有的绩效。（5）虽然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有很大改进，但由于背负着旧体制的成本，在财务上还是亏损的。所谓财务上就是他得到的收益和成本之间，成本高于收益，但是成本已经低于效用，这是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也有朝着公共物品最佳配置方向努力的空间。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有着很强的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可以向更大范围和更多领域推广，这是我们得出的研究结论。

此外我们作了跨省研究。如果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向全国660个城市推广，每年可带来1463亿元的总成本节约和575亿元的福利增量，直接创造约49万多个就业机会。我们不但计算其内部的状况，还把它在全国推广之后带来的情况也做了估算。

该项目是我在天则所参加的若干个项目之中，尤其是咨询项目当中，比较得意的一项研究。难度非常之大。我们在盛老师的带领下，大家竭尽全力，每时每刻遇到挑战，许多人奉献了智慧，也取得了令人非常满意的结果。况且，有了这项基数定量研究，再加上张林讲到的序数定量研究，天则所掌握了两套针对公共政策和公共物品进行定量评价的手段和能力。我们也希望各位可以介绍这样顶尖的定量评价方法，以改善中国的公共政策以及公共物品的提供，谢谢各位。

2.提问环节

张颖：我想问一下赵先生，您刚才提到的公共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究竟是怎样的，还有具体方法是什么？

赵农：我们不是什么指标体系，我们主要测算的是社会福利的变动。你知道了效用，知道了成本，这中间的差值就是社会福利。这里没有什么指标体系，就是硬碰硬来进行计算，比较前后效用增加了多少。如果你对细节感兴趣，可以下来再交流。当然其中确实有难度，比如我们要找出几个点才能模拟出需求曲线。公共品的需求曲线和私人品需求曲线不一样，私人品需求曲线是个人需求曲线的水平加总，公共品需求曲线是个人需求曲线的垂直加总。我坚信咱们的方法是科学的，有许多经济学的妙用在其中。正是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发现数字化城管还未达到最理想的状况。我简要回答到此，谢谢你的提问。

[ 赵农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29日召开的「2014年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与制度创新」论坛的演讲修订稿]

## 地区发展战略的价值选择——以喀什、阳城和前海为例

钱 璞

各位下午好，天则经济研究所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一直在参与地区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实践。我首先把我们在地区发展战略当中，所提倡的战略价值选择做一个阐述。然后介绍三个地区战略规划案例，喀什、阳城和前海，这是具有不同特征的三个地区。

首先地区发展战略基本价值选择是什么？我们一直提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也是天则一直提倡并贯彻的基本原则。地区发展也是资源配置的过程，涉及到了土地、人力和资本的资源配置，应当通过市场机制对这些资源进行配置。在地区发展的战略当中，我们对于市场的理解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是需求，市场规模有多大，是立足于本地的市场还是放在一个更大范围的市场中来看地区的发展。第二是指交易的场所，具体到空间载体当中就是城市，我们一直在讲交易是城市根本的一个内容。城市要提供这样一个交易场所，不仅包括一个具体的场所，还包括围绕这样一个交易功能所衍生出的各种各样的服务设施和产业。第三就是一般所理解的市场的制度规则。

我们在价值选择当中的第一个具体选项：开发区还是城市？在地方发展当中，比较普遍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开发区模式，另一种是城市模式。开发区模式是现在地方政府采取的比较普遍的一种模式。这样一种模式主要缺陷在于用单一目标的和简单产业结构的开发区替代具有综合服务功能和有机产业结构的城市。而开发区一般比较独立，其弊端也在于由于脱离了城市，因而在发展当中存在局限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提产城互动。城市有很多的功能可以为生产服务，开发区单一的产业结构和独立的区位丧失了城市集聚作用带来市场价值的增加，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地区的辐射作用和吸引功能。一方面使得城市缺少丰富和完备的服务功能，导致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另一方面缺少城市中服务功能的支持，制约了开发区的发展。

造成的问题就是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不同步，城镇化滞后工业化。我们国家一直以来非常强调工业的发展，现在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的比例基本上是一比一，国际上城镇化率比工业化率基本上等于二，跟发达国家比这一比值更低。注重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到现在形成了工业结构需要调整优化，产品过剩的现状，下一阶段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不足。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当中也提出了“城镇化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扩大内需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我们现在需要转变发展思路，从原来的偏重工业化，到更重视于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不仅带来了巨大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也可以带来创新要素的聚集和知识传播扩散，有利于驱动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第二个选择就是依赖于工业还是借重服务业？开发区模式是以吸引工业企业为主。但工业企业只是产业结构当中一部分，它的发展要依赖于市场中的资源，还要借助于各种服务业的支持，包括金融、信息、物流、科技、中介等多种服务业。现有的依赖于工业的思路当中，人们一般认为工业才能提供增加值，给本地发展带来GDP，事实上发展服务业也是可以带来GDP的。发展服务业还有一个优点，它可以独立于本地的资源和工业而发展的。例如贸易产业不仅可以交易本地产品，也可以销售外地的产品。并不受本地资源和企业限制，也不仅与本地的市场需求有关，可以放到更大区域的市场需求当中来发展服务业。

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和市场功能有关的服务业，可以通过推动市场的发展而促进工业发展。现实当中有很多的案例都证明这一点，浙江省和广东省不仅是经济大省，也是市场大省；义乌主要是通过发展专业市场和服务业来带动工业和经济的发展。对于企业来说最大的优惠就是市场需求，不仅是低价的土地和税收优惠的政策。

第三就是企业选址是资源依赖型还是市场导向型。企业选址有两种取向，一种是资源依赖型，一种市场导向型，其基本机理就是对运输成本的节约，然而这两种取向的发展前景不太一样。资源依赖型的企业受到本地资源类型和数量的限制，缺少产品多样性的发展空间，也会随着资源耗竭而迁出，从而使本地发展面临转型问题，当资源衰落之后产业接续怎么办？市场导向型企业则会随着市场需求结构变动有着更多样性的发展空间，并且会随着市场规模扩大而成长，当然在发展初期也会存在与当下市场规模的问题。这也是在市场发展初期存在一定市场失灵地方，后面会讲到政府在这个时候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一个地区而言，如果只是以本地资源吸引企业，发展前景已经被资源类型和数量限制，不可能带来突破性的经济发展。而且由于具有资源禀赋，会过于依赖资源型产业从而限制其他的产业发展，包括服务业发展也是不足的。对于一个市场导向型的企业，则可以突破本地资源的限制边界。

第四就是人的城市化还是土地的城市化？这是我们国家现在面临很突出的问题，土地城市化要快于人的城市化。名义上的城市化率达到52%，人的城市化率还要低于这个比例。城市的本质是聚集，所带来价值增加就是人的聚集产生的市场的网络外部性。城市化首先是由于人的城市化，从而派生出或者是带动出土地城市化。我们国家目前来讲是相反，先是行政主导下的土地的城市化，然后是人的城市化。导致的一个问题是土地利用缺乏效率，是低密度的利用方式。城市化的结果应该是土地的节约，是人均用地减少，我们的现状正好是反过来。对于一个地区来讲，推动城市化要建立吸引人口、企业进入的制度和环境，包括市场制度环境、生活环境和均等的公共服务制度。

人的城市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城市的发展是依赖于人口密度提高，人的聚集所带来的网络外部性，可以增加交易的机会，降低交易的成本，人们可以从中分享到更多的交易的红利。将人口密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才会产生更高的市场网络外部性。而在对土地的使用上，则要根据与人口密度、经济密度相对应的土地市场价格，对土地进行配置，以达到在总量上节约、在结构上合理的配置。

第五个选择是城市发展战略当中注重大企业还是同时注重小企业？地方政府一般非常重视大企业，招商引资对象主要都是面对大企业，尤其是特大企业，例如世界500强和央企，这些企业不仅是国内各地政府竞相争取对象，也是国际上一些国家争取到本国投资的对象。我们一般认为大企业的投资可以带来更多GDP，吸引大企业落户也是目前考核体系之下政府对应的行为。但是这类大企业很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实际上并不会给本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不能真正带动本地经济发展。在企业退出的时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非常大的困境。

世界500强和央企，是各国各地方政府竞争的对象。因此，期待一个特大企业的落户是非常不确定的事情，往往要等很多年，也不一定会有结果。但在同一时间，土地被闲置，造成很大的机会损失。反过来，因为中小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并且多侧重于服务业，能够很直接地为本地增加就业机会。服务业本身会增强本地城市功能，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创造环境。在另一方面，推动中小企业以及个体户的发展，是成本极低的事情。只要政府能够降低企业进入的门槛，有效保护企业和个体户的权利，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就会很快发展起来。并且与大企业不同，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可以很小的单位分别地陆续地发展起来，无需等待积累到一个很大规模再去发展，因而可以获得当下的和持续的发展效果。

第六个选择是社会收益最大化还是财政收入最大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在有利于更大范围经济发展的同时，本地区的社会收益最大化。单方面地追求财政收入，反而导致对本地区整体利益的损害。例如目前的土地财政，就是把财政收入最大化放到社会收益最大化之上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压低给农民的土地补偿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这不仅把农民该得的收入转移到了政府手里，而且还增加了征地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紧张与冲突。在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没有按照市场规则获得土地，也就不知道土地的市场价值，也就没有有效配置土地资源的市场信号，导致对土地配置的无效率。最终，会使社会收益下降。而这又会反过来抑制财政收入的增长。地方政府应把社会收益最大化放在第一位，财政收入是本地区收益最大化的自然结果，可以获得两者共同的增长。

第七个选项就是市场化的方法还是用政府干预的方法，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探讨的。用市场化方法来配置资源能够得到最佳的经济效率，但也会存在一些市场失灵的地方。接下来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城市发展当中政府的职能是什么。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当中比较明确提出来“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使城镇化成为市场主导，自然发展的过程，成为政府引导、科学发展的过程。”这里界定了三个政府职能：制定规划，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市场主导的制度环境。我们在地区发展战略当中也一直在贯彻这些基本原则，政府职能就是做好两件事情：一件是进一步进行市场化改革，为企业家与居民提供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一个就是补救市场失灵。补救市场失灵跟上面的规划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务是对应的，我们把规划放到公共服务当中，这也是市场失灵的一部分。

第一个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补救市场失灵。

包括政府要做城市规划，天则所目前利用空间经济学来模拟城市怎么在市场机理的作用下演进生成，以及各产业如何在城市空间上分布的。第二就是要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在城市各项规划当中，产业规划和功能区分布规划是相对有弹性的，而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规划则是刚性的，但是由于具有公共产品特征，不可能由市场自发来提供，政府在这方面负有提供的责任。具体的提供方式可采取公私合营，根据项目特征，对一些非营利性的公共产品，政府需要在财政给予支持。第三政府要对城市发展筹措资金，避免依赖土地财政。筹措资金是比较广义概念，包括政府的财税收入，吸引外部投资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这是我们今天上午一直探讨的主题，如何应用PPP模式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城市的基础设施当中，这样可以避免由于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不足而阻碍城市的发展。第四就是促进产业集聚，产业在临界点之下集聚速度比较慢甚至可能形不成有效的集聚。在初期需要实施促进产业集聚的政策，例如减税和降低房租等。第五就是发展生产型服务业，产业的发展不仅是依靠企业自身的发展，还要依赖于配套服务业的发展。在初期由于市场规模比较小的时候，可能金融、信息、中介等服务企业发展不起来，也会反过来制约产业的发展。为促进服务业领域发展，政府可以实施一些补贴交易费用政策。也是在我们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研究当中总结出的对交易费用的补贴机制。中关村科技园区政府并没有直接来主导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更多是根据企业的需求进行交易环节的补贴，设立一些产业基金，对中小企业购买生产性服务进行补贴，降低企业聚集的成本，降低生产型服务业发展的成本。第六就是促进企业合作。在我们国家现有的制度环境和信用机制不健全情况下，企业联合起来的成本比较高，需要政府来牵头建立行业协会或产业联盟，促进行业自治和企业间合作。

政府要为城镇化筹措资金，要采取尊重产权制度、遵循市场规则的方式。（1）在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时，按照土地的市场价格予以补偿，用市场价格来配置土地资源；（2）在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投资时，要借鉴和采取公私合作伙伴模式；（3）对城市发展进行融资，例如以有收益项目为基础进行债权融资，发行地方债券等，要明确这些都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控制债务和风险的机制；（4）建立产业发展基金；（5）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主体，建立合理利益回报机制。例如投资道路，会带来周边土地升值，投资者应该分享土地升值的收益。最明显一个例子就是港铁，港铁是全世界少有可以盈利的地铁。其主要方式就是港铁公司投资地铁建设，同时也获得了周边土地的开发权，把土地开发和地铁建设结合在一起，通过土地的升值，以出售或者经营周边物业来获得对地铁投资建设、运营的补偿。

第二个职能是提供市场制度环境，这需要政府自身制度环境的改变。

首先我们的执政理念还有政府的服务观念要进行改变，要有一个市场主导的思路。第二就是城市化的发展，意味着人口和资源流动，向人口密度更高的地区集中。在我们做的阳城规划中，人口向中心城区集中的时候，意味着其他地区人口的流出。而在GDP主导的考核机制下，可能会造成各个地区在招商引资过程当中形成各自的体系，并没有从整体县域的经济发展考虑，产业在整个在县域上的布局是相对分散的。新型城镇化下要求改变这样的单一考核机制，根据各乡镇的不同情况，对工作成绩做相应的考核安排。例如生态环境方面的考核。第三就是政府部门和企业要形成合作的体制，政府借重民营企业的资本与经营能力，但仍存在着一个与民营企业对接和协调的问题。公用事业经营并不是政府把服务责任交给企业就可以，在合作当中政府还是要在很多地方承担职能，比如说对质量管制、对安全的管制，对具有自然垄断性的产品价格监管等等。政府要恰当地把握管制的原则，与企业之间形成有机的结合与有效的合作。第四，城市要吸引外界的企业和居民，就要提供更好的，具有竞争力的公共服务。在行政部门内部，可建立对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效益进行考核的机制，而不是财政收入和GDP最大化的考核机制。我们天则所也做了相关一些研究，例如对于公共治理指数、东城区数字化城管这类公共产品，如何进行定量的评价。第五政府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将一些职能交给行业协会、联盟或者其他自治组织来做，改变以往由政府包办的管理的方式。制度变革也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多GDP增长。

下面我们介绍三个地区的发展战略案例。这三个地区具有不同的地域和经济特征。喀什是新疆的边境贸易城市，前海是跟香港制度对接最前沿的地区，山西阳城是中部一个普通的县。

喀什位于新疆最西部，周边跟五个国家接壤，是中国从西部通向中亚和南亚的主要口岸，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区位资源优势。喀什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枢纽，他的兴衰和贸易密切相关。从丝绸之路的路线图可以看出，从喀什通往中亚和南亚可以有多条路径选择。喀什素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美誉。这样的区位资源优势使得喀什具有成为贸易重要通道的潜力。喀什跟周边城市形成一个网状通道结构，这个网状结构当中有很多节点，而喀什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因此我们提出喀什的战略应是建立“以喀什为重心的中亚和南亚的经济圈”。从地理位置来讲，喀什是一个可以分享贸易红利的城市和地区，作为贸易中心是可以从交易当中获得本来是由生产者所获得那一部分收益。喀什本身的产业基础比较薄弱，资源也是有限的，如果单单依托本地资源来发展经济是做不大的。所以要把喀什放在中亚、南亚甚至更广的范围当中考虑他的经济战略。经过喀什可以形成双向或者多向的通道，中亚和南亚国家可以从喀什来到中国的市场，中亚和南亚也可以借道喀什互相贸易，而内地的产品则可以通过喀什交易到中亚或者南亚，为贸易提供产品的多元性和通道多元性。当这个生产和市场网络形成的时候，喀什可以分享到其中更多的贸易红利。战略角度来看，喀什通道的打通，带来的不仅是喀什地区及周边地州的工业化发展，还会对新疆及更广大的地区的发展提供市场需求的动力。

第二就是前海发展战略，我们给前海做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制度方案，一个是产业规划。从地理位置上，前海可成为深圳、珠三角以及香港地区的主要交通枢纽。香港本身是贸易性的口岸城市，但发展已经受到了限制，包括用地和人力资本都成为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香港发展应跟深圳放在统一的框架当中考虑，我们提出前海的发展战略“深港的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不仅是产业合作，也包括资源合作，制度合作。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一方面是新增和补充深圳与香港的城市功能，一方面是前海本身的产业布局，为前海获得深港一体化所带来财富增量的一部分，是1+1>2的发展。

第三就是阳城县的发展战略，跟前两个不一样，阳城县并没有什么贸易上的区位优势，只是中部非常普通的县，没有区位上的优势。属于资源依赖性型经济，煤炭产业为主，现在大的形势下面临经济转型的要求。从阳城县本身来讲目前有一定的基础和发展空间产业是陶瓷和旅游两个产业，阳城有非常丰富多元化的旅游资源，有一些旅游资源是世界级的，这个作为未来发展两个产业选择。阳城县之前的发展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开发区模式，资源依赖性产业，注重工业发展，中心城区密度低，功能不完善等，这些制约了阳城县经济的转型。我们调整的基本思路是把城镇化作为区域发展的发动机，城镇化的主要内容是交易，把发展专业市场作为交易的主要选择。阳城有陶瓷产业基础，但现在基本是就生产而生产，产品生产出来之后通过各种货运渠道销售到其他地区，本地并没有分享到交易红利。因此我们把发展专业市场作为交易的主要选择，以市场为导向来吸引和推动派生工业的发展。把旅游业作为城市化的辅助内容，旅游本身也是一种交易，是对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是阳城县城市化过程当中不可或缺主要内容。

从市场需求角度来看，阳城县的经济体量、本身市场需求规模都非常有限。但如果从供给角度，阳城县的市场范围就要大得多。产品附加值越高，越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其市场范围越大。阳城有区域性的旅游资源也有世界级旅游资源，这些产品都可以突破本地区域的界限。阳城的发展战略就是采取地区专业化和产品差异化的策略。由于市场和旅游服务要依托于城市空间和功能，所以发展贸易和旅游战略的推进，有赖于城市化的推进。因此，要改变和完善阳城县城及周边城镇的功能和空间布局，提高城市密度，并丰富阳城县城镇的服务业。贸易与旅游的发展，会反过来吸引更多的生产企业到阳城投资落户。服务业的发展，也为阳城县的转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空间。

谢谢大家。

[ 钱璞 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共事业研究所副主任、项目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29日天则所主办的「2014年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与制度创新论坛」演讲修订稿 ]

## 中国PPP存在的问题与新一轮PPP的发展方向

赵旭

大家早上好，根据会议安排，我的发言会分为两段，前面讲讲PPP的一些新的进展，后面介绍一下我们青岛的一个案例。

什么是PPP？PPP就是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但这个定义在中国会有一些特殊情况，其中强调第一个P就公共部门，他不仅仅是指的政府，有可能是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包括比如说投融资平台，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供水、排水企业等等。第二个P是私营部门，中国有一些特殊，应当定义为以营利为目的，通过竞争来获得公共服务项目的企业、资本。不是从所有制角度定义私营部门，这里的私营部门有可能包括国有企业，比如说首创、北控这些企业做了很多的水务项目、PPP项目，它们是第二个P，而不是第一个P，虽然它们是国有的，但是以营利为目的，通过竞争获得项目的。第三个P就是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有很多的含义在里边，不仅仅是说这是一个合资关系，政府与私营部门合资；也不仅仅是说政府把这个事就交给企业去做了，政府就不管了，而是里边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这个P意味着三种关系的转变：一是本来由政府直接来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为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说政府就不管了。怎么个共同完成呢？就是第二点，由政府单独承担责任变成政府和企业共同分担责任，分别承担各自责任，第三点就是分担风险，由政府完全承担风险变成政府和企业各自承担风险。这里原则上来讲谁有能力承担风险就由谁来承担风险，谁有能力控制风险，就由谁来承担风险。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技术风险就应当由企业承担，你建了污水处理厂就要保证把污水处理干净；而土地风险、政策风险、价格风险等等，像供水价格是由政府定价的，这个风险就要由政府承担。不能说成本上升了，现在需要提价，而政府控制着定价，不让提价，这个损失还要由企业承担，这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应该由政府来承担。

为什么要PPP呢？过去认为，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存在市场失灵的解决方案就是政府，以前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新的经济学研究不这么认为了，而是认为政府也会失灵。所以到了里根和撒切尔时代就开始了一个再市场化的过程，这个时候PPP就在国际上掀起一个热潮。中国第一个PPP项目，1984年就有了，而在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领域大规模推广要在2002年开始。引入市场机制以后，政府角色就要有一个转换，政府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变成发起者、购买者、监管者、最后保证人的角色。

此后PPP就作为一个机制，后来甚至成为一个理念，开始被大家广泛采用。

中国经历过这么多PPP，也存在一些问题，我把主要的问题稍微梳理一下。

首先是对PPP的认识和理解还是存在一些偏差。

一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推动PPP的时候动机主要还是“钱”，把PPP当成单纯的融资手段，没有太重视效率提高。而在国际上PPP提出来的主要动机是提高效率，是因为政府提供服务的低效率。因为中国把它当做融资手段，就会偏爱融资和运营一体化的PPP模式，后面会讲什么是融资和运营一体化的模式。

第二点对公用事业的“筹资”和“融资”概念有些混淆。不管你用什么手段融资，包括PPP融资，只能解决资金在时间上的不匹配。我们知道政府的税收是一个稳定、有增长的特点。但我们的基础设施需要一开始就有一大笔的投入，再慢慢回收。这里存在时间上不匹配的问题，所以需要融资。但是融资并不能解决你本身的钱从哪儿来，你本身的钱必须向居民（服务者）收费，或者是政府用税收来购买，政府购买以后让被服务者去享用，也就是筹资。从筹资角度你还是要落实最后承担服务成本的资金从哪来，因为PPP的投资人是要收回投资的，并且是要有回报的。

第三点就是不能够正确地理解PPP的责任和风险的分担理念。这里可能第一个P和第二个P都有问题，都存在着缺乏合作精神的问题。从政府讲有一种卸包袱的思想，希望向私营部门推卸这种责任和风险，也有对私营部门不信任的问题。而私营部门，则存在对公用事业特点理解不足，什么资金都进来，其中有些资金是不适合做这个的，它需要比较高的回报，需要冒更多的风险，但是公用事业是风险比较低，回报不高但比较稳定的行业。

其次是实务当中也会有一些问题。这都是由于理念存在问题就带来了这些实践当中的问题。实际的履约情况因为很多原因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是不太乐观的。当然还有政府能力不足的问题。

前面我们讲到中国PPP的主要特点就是融资和运营一体化。我们讲PPP的时候，理论上有几十种模式。但我们看过去中国的PPP模式其实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特许经营，伴随着出让股份或者是增资扩股，也就是融资加运营。这个主要发生在供水领域还有城市燃气领域。第二个模式就是BOT/TOT或者是ROT，主要是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还有高速公路这些领域用这个模式，还是融资和运营一体化的。我们后面会说，融资和运营一体化降低了效率。

另外一个问题，经过前面一轮PPP以后，现在形成了一个“双轨制”的格局，就是政府提供服务和市场提供服务并存这样一个“双轨制”。“双轨制”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是经营主体，有一部分（政府轨）是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包括投融资平台公司、原来的供水公司、排水公司等，另外一部分（市场轨）是市场主体，也就是说PPP项目；其次，市场轨的PPP项目的获得途径是市场竞争，而政府轨的公用事业企业是政府自己成立的；三是政府发挥作用不一样，政府轨上政府会直接指挥和控制，而在PPP项目政府只能做引导和监管；最后管制方式也是不一样，在PPP项目里面政府只能依据法律和合同进行监管，而在政府轨，政府可以直接控制这些企业，可以凭借其权力来直接干预。

造成“双轨制”的原因，一是现在政企没有完全分开，二是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认为需要保留一些行政干预权。

现在我们再提PPP的时候，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改革方向，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次是土地财政现在也面临一个调整，但土地财政有它存在的理由，土地财政也不会完全退出，但比重可能会下降。三是资本市场开放度、成熟度和02年的时候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意味着公用事业融资有了更多选择。这个表现在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金融工具不断完善，民间资本的组织化程度提高。民间资本原来没有多少投资空间，也没有多少合法手段，要么存银行，要么排队买国库券，要么民间借贷，动不动就会成为非法，很麻烦。

对于新一轮PPP我们有一些新的期待或展望。首先我们要对PPP的理念要进行再认识。其次我们有了更多选择空间，应该更加审慎地选择PPP项目，要加强PPP前期工作，选择哪些行业、哪些项目适合什么样的融资手段，适合什么样的PPP模式。三是在谈判当中要尽可能的明确PPP项目的边界，明确责任风险的分配，更要强调合作精神。四是要强调政府的支付责任要有预算保障，这是实践中发生问题比较多的地方。五是引入PPP要重视提高效率，重视转换政府职能。六是要加强基层政府的能力建设。

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些创新。

一是，如果有可能要推进公平开放的统一大市场。要通过推进特许经营制度全覆盖，把所有在位企业全部纳入特许经营，给它们一个特许期，一个特许期之后就进入竞争。这样将会打破地域垄断和所有制的限制，鼓励并购，将能够造就中国的水务巨头、能源巨头，像威立雅、苏伊士。现在是“双轨制”，行政部门控制很多自己的企业，自己直接提供服务，这种情况下并购不可能发生，这是政府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界限很清楚。

二是探索融资和运营相分离的PPP模式。应当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在资本市场上达成融资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在专业运营市场上达成提升运营效率的目标。

这里有一张表，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把融资和运营分离开来会产生很多的好处。融资和运营合在一起，参与竞争的企业既要有非常强的融资能力，又要有非常强的运营能力，能够参与竞争的企业就非常少了，所以我们有一个阶段就看到所有大的项目招标就那几个玩家在玩，别人玩不了，竞争是不充分的，在资本市场和运营市场都没有达到最好的效率，这个是其实是不利的。把融资和运营分开之后，我们就会在这两个市场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效率。

当然这样会导致未来的PPP结构更加复杂。我最近跟一些人沟通，发现已经有了一些苗头，有一些迹象在这么做。比如说PPP项目会有更多参与方和更复杂的交易结构，原来的交易是两方，PPP当中前两个P各为一方，未来第二个P可能有多方。比如，政府加上一个战略投资人（如水务上市公司，既投资又运营），再加上财务投资人，战略投资人可能只投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由财务投资人来投。具体怎么来做这个事情呢？可能是“并购基金+上市公司”模式，水务上市公司可能跟一个基金管理人一起成立一个并购基金，这个并购基金就去竞争PPP项目，PPP项目做成之后，把若干个项目整理好再打包卖给上市公司。因为上市公司有他的特点，上市公司不能经常增发，所以他要有一个缓冲阶段，这个可以由基金去做。而对于基金（PE），大家知道LP是不能够长期持有的。通过这个模式LP就有了退出渠道，上市公司也有了稳定的项目来源，所以有这种组合。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政府加上一个运营商，再加上财务投资人，这个就是融资和运营分离了，在一个PPP项目里边实现了融资和运营的分离。这里的财务投资人可以是一些偏好长期稳定回报的基金，比如说保险资金、将来的企业年金（国外企业年金很重要）、还有社保基金这一类，希望有稳定回报，希望持有稳定回报资产，这恰恰是公用事业的特点。财务投资人的具体做法可能也是通过成立并购基金，去获得项目、整理项目，再把它卖给偏好稳定回报的基金来长期持有。我认为这样的模式很快会出现。这样竞争就增加了，因为财务投资人在原来的融资和运营一体化的框架里边他是没有位置的，他没有运营的能力，做不了；而在这个新的框架里头他是可以进来的。这是我觉得未来会出现的一些事情。

## 为竞争而垄断：以综合管沟为核心的公用事业投资运营监管模式——青岛高新区的研究案例

下面我介绍一下天则所在青岛高新区做的一个项目，这个案例是公用事业投资、运营和监管的基本模式。这是盛洪所长带领一个课题组做，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是受课题组委托给大家介绍一下。

概况和背景就不详细讲了。这个高新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是一片空白，但它周边已经有了四家供水企业，三家污水处理厂，四家供热企业，一家管道燃气企业，还有全国性的电力、电信和广电供应商。一个关键信息是规划有72公里的综合地下管沟，这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我们这个方案的一个核心。

说到公用事业，大家都知道传统上都是由政府来提供，造成成本高、效率低，成为财政包袱。欧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实践给了我们借鉴。2002年建设部《关于加快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出台后，中国的PPP也取得了很多的效果。

在这个项目里头我们的基本目标是这么几个，首先是保证服务质量的提高和稳定，服务的安全还有不间断地提供，其次方案要有可操作性，要简单高效，另外我们要充分地利用融资空间，还要有合理的定价，使得项目在商业上可行，最后要有有效的监管。

我们为项目设定了一些优先原则，我们的方案要简单，要尽量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如果说某个行业既可以由政府提供服务，也可以由企业提供服务，就尽量选择由企业提供服务。从政府的角度，原则是无为而无不为，尽可能避免政府直接的介入和干预。在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监管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发挥市场的作用、民间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作用，甚至可以发挥文化的作用。

具体理论不多说了，跳过去，因为时间有限，直接讲讲公用事业作为整体的性质。大家平时分析得比较多的是每一项的公用事业的性质，自来水、污水处理的性质，但公用事业作为一个整体是有它自己的性质和特点的。从时间的维度来看，在一个新区、一个新城，基础设施在初创阶段更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到成熟阶段会有更多私人物品性质。象青岛高新区或者是其他的新城，刚开始的时候入住率很低，但所有公用事业都必须要建好，不建好一个企业都不能入住，一个居民都不能入住，首先必须要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公用事业作为一个整体在初创期公共物品的性质很强。随着入住率提高，居民、企业的付费程度，能够覆盖的成本更高，它的公共物品性质就会减弱。再比如一个水库刚建起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为了保障供水，防范干旱，平常不用，保障性的，公共物品性质很强。随着城市人口越来越多，需要越来越多水的时候，动用这个水库作为日常供水，这个公共物品性质就下降了，这是从时间维度。

还有一点就是从空间维度。从每一户居民来看，公用事业他是公共性的，但是如果从一个新城、新区整体来看的话，公用事业就是新城、新区功能的一部分。没有这个功能就不能成为新城这个产品，就不能叫新城，没有公用事业怎么能叫新城、新区呢，就不能。所以空间范围扩大来看，从整个新城新区的角度，公用事业的公共物品性质就没有了，公用事业功能的收益就体现在土地里面。所以另外一个特性，公用事业环境可以产生两项收益，一个是吸引企业居民入住可以为政府带来税收，二是形成土地增值，这是我们讲土地财政有他的合理性的原因。

现在这个表是公用事业的结构及其性质，比如我们常常讲供水有自然垄断特性，这是不够的，为什么不够呢？从表上可以看到，供水有很多环节，其中可能只有某一个环节（如管网）是有自然垄断特性的，而其他环节是有竞争特性的。三中全会决定里边还专门提到这个问题，要推进竞争环节的市场化改革，中央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这一点也是我们这个方案的一个关键，原则就是能竞争就不垄断。

看下一张图，我们有两条轴，一条轴反映公共物品性质和私人物品性质，一头就是纯公共物品，一头是纯私人物品，各种公用事业可以摆在不同的位置上。还有一条轴就是竞争和垄断，从完全竞争到自然垄断，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状态，包括不完全竞争、有效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等等一直到自然垄断，不同的公用事业可以摆在不同的位置上。这两个轴结合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图，这里有四个象限，按不同公用事业，其公共性的强弱和垄断性的强弱采取不同的制度安排。

这里要强调，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性质随着时间或者说随着技术的进步会有变化。比如说电信垄断，大家都知道现在电信基本垄断不了了，为什么？现在很少用座机，都用手机，手机就完全没垄断了或者是基本上没垄断了。从技术上来讲没有了，当然现在还有行政垄断。而现在行政垄断也在打破，现在有170号段，170就是虚拟运营商，已经开始放号了，包括京东、迪信通他们都可以放号，有更多的套餐给你选择。再比如宽带，现在有了4G，4G将来成为竞争者，这些垄断都是会慢慢打破的。再比如有线电视，现在有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盒子，这些盒子都是可以替代原来的有线电视，都有直播电视，只要带宽够宽，就可以，未来有线电视不是必须的，家里有网络就足够了。

下面再讨论综合管沟在我们这个方案里头有特殊意义，它是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私人物品，综合管沟在技术上为公用事业供应商提供了一个竞争的物理空间，这个后面会详细讲。方案的一个思想就是“为竞争而垄断”，就是利用综合管沟，把各个公用事业中的自然垄断环节，整合为一个大垄断，其他环节就可以竞争。这张图，左边就是各公用事业通常的状态，如自来水公司自己有水厂生产，通过自己的自来水管网、卖水给用户。右边是综合管沟模式，把自来水、供热、电信和其他的所有管网都做到综合管沟里边去，全部由一个人来持有，就是综合管沟的业主来持有，这样的话，就为水厂、供热厂、电信创造了一个竞争的环境，大家都可以接入和使用管网。

我们还定量计算了综合管沟的效益。一般来说，综合管沟直接收益会小于总成本，但是总收益（直接收益+外部收益）大于总成本。外部收益最少包括两部分，一是减少开挖。要说明的是，减少开挖的收益不全是外部收益，有一部分是内部收益，也就是说服务提供商（比如自来水供应商）因为不用开挖，维护成本就降低了，水管漏了直接补，不用挖出来再补。此外，开挖会造成交通中断、居民生活不便，这是减少开挖的外部收益。二是综合管沟创造竞争环境也带来了外部收益。根据我们的测算，综合管沟的公共物品性质大概在67%，也就是直接收益大概在33%。而综合管沟投资带来的土地增值可以达到124%，也就是说仅仅从土地一项来讲，综合管沟带来的收益就已经是大于成本了。

下面讲我们提出的网络型公用事业的总体模式，就是“综合管沟+最后一公里”模式，就是进入综合管沟的各种公用事业管线，以及到达居民家里的最后一公里管线全部由综合管沟来持有、垄断，使得各类公用事业的供应商就可以竞争。

以供水为例，有三种模式来实现。

第一种，综合管沟运营公司负责自来水经营。自来水由综合管沟公司向各供水厂购买，然后销售给消费者。这样在供水厂供应这一端形成了竞争，综合管沟就是采购商，各供水厂竞争，谁的价格低买谁的水。

第二种模式，由一个独立的自来水特许经营商经营自来水，同样向各供水厂采购自来水，租用综合管沟的管网配送，最后零售给消费者。

第三种模式，综合管沟公司不经营，也没有独家的特许经营商，而是由多个自来水零售商经营自来水业务，零售商向各供水厂采购自来水后，租用综合管沟的管网配送，再零售给消费者；或直接由各供水厂自行经营自来水，租用综合管沟的管网配送，最后零售给消费者。这是非常创新的模式，国外可以找到案例。原理是这个管网所输送的东西是同质化的，各个水厂生产的水是一样，只要符合卫生标准，燃气也是一样。不同厂家生产的水在一个管网里边跑，到达不同的用户，并不需要区分到底是哪个自来水厂所生产的水进了哪个用户家。所以，自来水厂可以直接跟用户签约、供水、收费。综合管沟这一方根据各经营商（水厂）的合同、收费来控制各家的自来水进入管网。

这三个方案可以按顺序先后采用。

此外还可以有一些竞争的办法，比如增量竞争。对于自来水行业来说，单纯的“厂网分离、竞价上网”可能会有一定问题，因为自来水行业有地域性，供水厂有供水半径限制，不能远距离供水。如果一个水厂已经存在，竞争以后没有中标，一吨水都供不了，水厂就生存不下去。如果是建新厂，存在竞争失败的风险，投资人就可能不愿意投资建设。所以可以采取增量竞争的办法，经营商可以和区域内所有水厂签约，保证所有的水厂60%的生产能力可以采购，大家是同一个价格。但是60%以上的水要竞争，要竞价，同样能够达到竞价的效果。

再说一下电信，可以参照泰龙模式。综合管沟可以敷设光纤，电信、有线电视或者是宽带运营商可以租用或者是购买综合管沟的光纤，包括最后一公里。泰龙模式，就是有个驻地网运营商来建好驻地网，然后可以通过一种软件切换电信服务商，某个用户这个月要用移动的固定电话或者是宽带款待，下个月他觉得你的服务不好，要换电信，通过软件就可以切换到电信，很容易做到，通过这个手段可以形成竞争。在我们这个方案里面更扩展，不仅是驻地网还有综合管沟里面的管线都可以由一家来垄断，这样各家电信服务商可以租用管线，公平接入，公平竞争。政府要做的就是对管线持有者进行管制，对接入条件，包括价格进行监管。

所以总的思想就是通过综合管沟的垄断，这一个环节的垄断来达成其他生产环节或者是销售环节的竞争，是这个方案的总体思想。

下面再简单说一下综合管沟的收费模式和财务安排，前面讲了对综合管沟大致估计就是公共性是67%，也就是2/3。我们考虑成本回收可以在1/3和2/3之间来确定，可以进一步简化为两种收费模式。第一种就是8年免费、8年减半，后面八年按照折旧来收取。另一种方式就是按公用事业运营商使用综合管沟的流量来收费，刚开始流量少，收费就低，到后来流量高，收费就高。这是资产成本回收，还涉及到维护费用，也可以参照这两个模式，八年免，八年减半，以后全额收取维护费；或者是按照流量收费，都可以的。

代表政府拥有综合管沟和最后一公里的资产的公司——综合管沟公司会亏损，政府应该要给予补偿，补偿方法就是一个是现金，一个是土地。

前面讲了网络型公用事业，还有一部分是非网络型公用事业模式，稍微简单一点，不具有垄断性质，而是竞争性质，一般采用作业外包模式，我们的方案讨论了作业外包的不同模式，这里不详细介绍了，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稍微说一下监管。我们提了两个可能的模式，一个是成立一个公用事业监管委员会，一个是不成立监管委员会，而是由建设局监管。同时，我们提出了一个“监”、“管”分离的思想，我们说“监”和“管”可以是两回事，“监”是获取信息，可以成立一个统一机构去获得监管所必需的信息。“管”涉及很多的法律，比如物价必须由物价局管，这是中央法律定的，地方是无法改的，比如服务质量必须在建设部门管，排放标准必须在环保部门管，法定的权力，不能动。所以把“监”和“管”分离，可以组建一个统一的监管信息中心，把获得的监管信息提供给主管部门，由法定权力部门做“管”的决定。这样来实现监管统一化。

别的就不讲了，谢谢大家。

2. 提问环节

提问：有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新一轮PPP跟城镇化密切相关，大家都知道这一轮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以人为核心怎么来体现出这个以人为核心对PPP的影响？

盛洪：因为上一轮以政府为主导，以政府为主导他应该说对城镇化的核心内容其实有一个失误，就是一个城镇化把一些土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盖那些房子，修的马路。这种城镇化带来一些失误，一个土地的城镇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人的城镇化的速度，土地变成城市的速度比人进城还要快。这个实际上是违反城镇化的基本核心内容。我们知道城市概念不是有楼有大街，城市概念是有人，这是他最核心的方面。这个方面由于有人的聚集，产生了好处就是市场网络的外部性。人的聚集带来很多交易机会，带来了大量由交易所带来的收入，就是交易的红利，这是城镇化最重要的方面。

从这个意义来讲，如果把城镇化仅仅理解为把这个土地变成城市基础设施，高楼大厦变成所谓的宽阔马路，这是错误的。所以城镇化带来几个问题，一个是地方政府利用他手中的强制、低价从农民手里强征土地。而给农民所带来的好处非常的有限。经常是这个土地的使用价值非常高，100万一亩，他给农民2万一亩给农民把地拿走了。

第二由于地方政府比较地价拿到土地，他们不珍惜土地，滥用土地，对土地的使用和配置比较浪费，就出现了有广阔的马路和高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一轮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第一他理解城镇化首先是人的聚集，而不是别的什么。由人的聚集带来商业价值，我们再去盖高楼，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去修宽阔的马路才是城镇化的正道。一方面如果不是只着眼于土地，从土地中获得土地财政，也会改变政府跟农民之间的关系，也会让农民更多分享城镇化带来的好处。第二方面以人为核心，就会人的城镇化的速度会逐渐要超过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实际上更重视已有的城镇化中的人的聚集，人的聚集带来了更多商业价值，也带来了对土地更节约的力度。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如果以人为核心的话，更有效的城镇化（供参考）。

赵旭：我稍微补充一点，人的城镇化和PPP关系，可以简单回答，简单点说就是有很多农民要进城变为市民，通过PPP可以在提供更多基础设施方面发挥作用；复杂来说，就是涉及到PPP的效率问题。现在做的很多PPP效率不高，比如下雨会淹死人，城市基础设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所以不管是对已有的城市居民还是要进城的农民，都要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效率，PPP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作用。

提问：提两个问题，理论上如何界定投融资和PPP，PPP是财政投融资再创新还是相互的一种机制？第二按照现行价格机制，收费机制和价格调整机制，如果我们不能把政府投资成本能够相对公平合理由使用者承担，而是由政府补贴承担。前期政府建设投入会减少，后期会伴随大量财政补贴增加。在中国建设这种价格机制下，PPP的发展到底应该是先突破价值机制还是先突破项目审批机制？

赵旭：我稍微补充一下。从你的问题上来讲，要分成服务提供端和服务消费端这两头来说，PPP只涉及到服务的提供，讨论的是由谁来提供服务。政府自己提供服务，由财政来筹资资金建设、投融资，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由私营部门，由企业、由市场来提供服务，这是两个方式，这是PPP要解决的。

至于说是谁付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是消费端要解决的。我们要有一个观念，这件事情不管谁来做都有成本，成本跑不掉，政府做有成本，企业做也有成本，不管你看到看不到，喜欢不喜欢，它就在那里。成本必须要被覆盖，定价够了消费者就全掏了，成本是3块钱，政府定了3.20，3.30块钱，消费者支付就覆盖成本了；如果定价没定够，政府定了2块钱，剩下一块钱政府就要出。常有的情形是，政府的企业，不需要利润，消费者只出2块钱，企业亏损就挂帐，这个有很大问题。公用事业有个特点，亏损不会导致立即倒闭，折旧上有很大余地。如果管网原来30年要换，但是企业会用到50年，表面上没问题，但水质会有问题，会漏水。政府定价还有多重考量，包括产品或服务的公共性，还有价格是不是要体现资源的价值（如要不要节水），也有政治考量。比如医疗的成本100块钱到底老百姓付多少，政府补贴多少，这就是政治考量。所以说要把服务的提供和服务的付费分开来说。

提问：我想问一下有PPP之后，政府要面临一个融资风险的问题，在融资风险管控方面不知道各位专家对政府有什么建议没有？我们想了解一下。

赵旭：PPP实际上是一个市场机制，你要把你的项目推销出去，企业接你的盘，市场要认可，当然涉及到风险防范机制。政府可能自己会拍脑门，不知道有没有效率就扑进去建了。但是把它做成PPP项目，面向市场招商，就要经过市场的检验，这本身就是一道风险防范机制。

[ 赵旭 广州天则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29日召开的「2014年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与制度创新论坛」的演讲修订稿]

## 盛洪：空间经济学和城市规划

谢谢颜俊，大家下午好。我讲讲这个题目“空间经济学和城市规划”。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公用事业发展和公私合作体制，涉及到我们的城市发展，必然要讲规划问题。规划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性质，就是规划实际上是规划未来。规划未来就首先要预测未来。预测未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怎么规划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预估未来。

这涉及到对地区和产业如何发展的理解。克鲁格曼他是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他的贡献主要是新贸易理论和空间经济学。，他讲了这么一段话， “图灵提出，对于一组几乎完全相同的细胞组成的胚胎来说，它是如何自我组织成迥然不同的有机体的呢？事实上，图灵的中心分析模型是关于一个由细胞环组成的简化胚胎的，这与轨道经济的结构基本上完全相同。”他想说的是，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或者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像是一种有机体。

另外一个人是巴里•卡林沃思，他讲“规划是在一个具有‘市场理性’的经济体制内运作。”。我们讲城市化是一个资源在空间中的配置问题。规划的前提和基础是市场理性。当然中共十八大也提出这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可以有非常广泛的理解。我们知道这句话可以用在资源在空间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城市的发展和地区的发展是由某种机制在起作用。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理解如果我们想预见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城市未来发展的话，我们必须知道决定这个发展的机理是什么，这就是市场制度。资源在空间中的配置结构是一种自发演进的有机体。所谓这样的市场制度其实由于有这样一种机理，人们遵循市场制度的行为，最后会形成某种市场机理决定的类似有机体这样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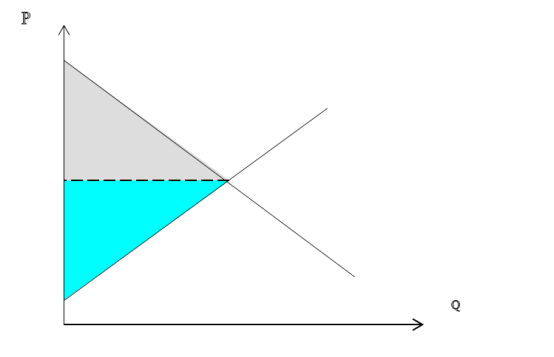
我刚才讲的规划要预测未来，我们怎么预测未来的问题，我们就有了某些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市场制度是资源在空间中配置的基本制度。市场制度本身是一种自发演进的制度。它的特点是通过无数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分散决策，形成了资源的有序且有效的配置，同时也解决了激励和效率问题。无利不早起。

它还揭示了城市的发展和资源在空间中配置的特点。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家知道什么是熙熙攘攘，熙熙攘攘一定不是在一个人口较少的乡村。一定是在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都市才产生了熙熙攘攘。只有熙熙攘攘，才能够有利，这个含义非常的重要。有了市场制度才会形成这种情况。每个个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聚集在一起，就有更多的交易的机会，就有更多的交易红利，他们就从中获利。还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越是聚集，他们这种机会越多。所以市场化在某种情况下，在某些节点上具有某种马太效应。我们越是聚集，越是获利，越是获利，越是聚集。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明确地理解，无论在资源空间配置还是产业发展方面都是以市场制度为基础性制度的。这样我们预估未来就有了依凭。我们到底依靠什么去预估未来，我们靠的是对市场的理解。

假定是市场制度，我们才能用空间经济学。为什么？是因为经济学就是人们对市场的理解。经济学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描述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是如何在市场规则下演化的，也就能帮助我们预估未来。经济学的假设就是有一个市场制度，假设是别的制度，经济学就无能为力了。正是因为我们认为有这样一个市场制度，我们假设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他追逐自己的利益，遵循市场规则，我们的经济学是能够做这样的分析和研究，甚至能够提出某种粗略的对未来的预估，这是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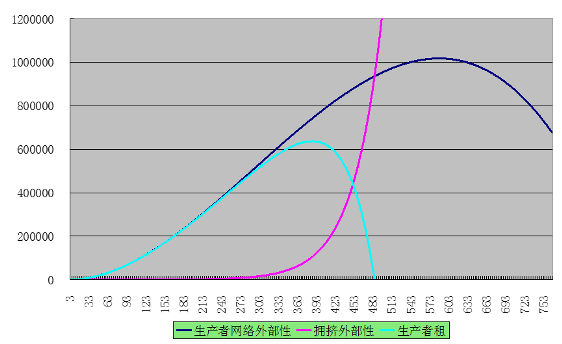
已经发展很成熟的空间经济学，就是以市场制度为假定前提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解资源空间配置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什么意思？我们一般的经济学讲供给需求，讲成本和收益。我们一般经济学缺了一个具体的空间维度。在座很多人可能是读过经济学的，一般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是没有空间的，我们讲市场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空间概念。我们把经济学逻辑放到具体时空中，发现能够得出很不同的结论来。可以理解在现实空间中为什么有些地区人们就聚集在一起在那扎堆，有的地区根本没有人去，这就是空间经济学能够给我们去解释的，我们把具体的时空放在了经济分析这样的框架下，我们就能够理解。所以克鲁格曼讲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某些地方有城市，某些地方没有城市，城市有大有小，城市之间有距离，都是由空间经济学来解释。我们现在从一般的经济学发展到空间经济学，我们这种方法就能够对城市发展或者是地区发展作出某种分析和预估。它可以帮助我们模拟城市或区域怎样在市场机理的作用下演进的，以及各产业是如何在城市或区域空间中分布的。在此基础上也可以模拟政府政策的操作。

在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学的基础上我们做了一些改进。他的研究主要是以生产的规模经济性作为空间集聚的原因。他说由于现代的工业生产有规模经济性，要大规模生产，就要集聚。这个解释其实还不能充分解释当下很多事实。在现在大多数城市中主要以交易为主，不是以生产为主。比如说城市中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教育文化甚至政府都可以理解为广义的交易，而不是在城市中心是有很多工业企业，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假设从为生产聚集走到为了交易而聚集，这个假设就更接近我们所面对的城市的现实。我们的研究就是做了这个假设的改变。我这方面应该说有一些思考，我去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交易与城市》，发表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上，大家可以看，就是这套理论基本的阐述。以交易为基础的基本思想核心就是，有一个成功交易，如甲乙就交易条件达成一致做成买卖，带来一笔交易红利，这个假设也是现代经济学基本假设。



这张图，左边三角形无论是上面灰三角还是下面蓝三角，两个加一块就是交易红利。大家可以想交易越多，交易红利越多。怎么会多？就是大家扎堆，大家聚在一起，大家才能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才能获得更多的交易红利，这个扎堆和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城市，这是城市的核心概念，这是它的基础。

由于大家去扎堆，聚在一起，扎堆的人越多，应该说交易机会就更多，交易红利就更多。所以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基本逻辑，所谓扎堆的多和少我们用一个比较学术的概念来替代，就是“人口密度”。交易红利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而增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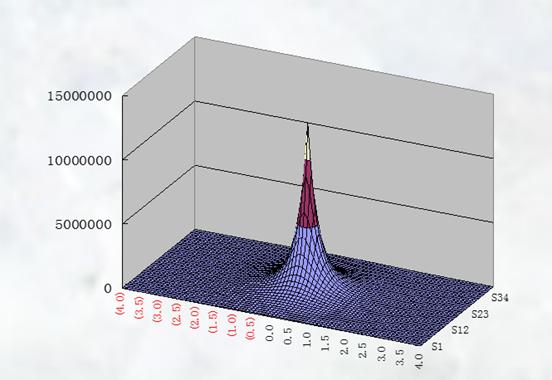


这张图，横轴代表人口密度，纵轴代表经济收益或成本。深蓝线代表随人口密度增加而带来的市场网络外部性的增加，但到了人口密谋特别高的一个点以后就会下降。符合经济学的规则，就是效用递减，成本上升。同时扎堆还有一个负面结果，扎堆会带来拥挤。人越多会带来更多的交易红利，人越多也会有更多的拥挤成本。这两项力量，一个是收益，一个是成本，他们交互作用最后会形成一个合力。亨德森讲，“在外部经济与不经济之间存在一股合力。”大家也能感受到，北京又好，北京又不好。这两股力量最后形成一个合力。我这个图上，蓝线是交易红利，这个红线是拥挤成本。到了最高点就往下掉了，对应就是人口密度，其实在其它条件一定情况下，最后由交易红利和拥挤成本共同决定，形成最佳的城市规模。在这样一个人口密度高度上，它就停止脚步不再前进了，这是新的均衡。

同时城市是具体时空中的市场，具体时空中的制度。市场制度在具体时空中突出地表现为城市。我们不能想一平方公里有一百人会有市场，他们互相之间相见都很困难。所以一平方公里在五千人以上，北京、上海都是在三四万以上，只有形成这样的人口密度，才能形成真正的市场。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城市同时就是具体时空中的市场制度。所以我们还有一套方法去分析作为城市的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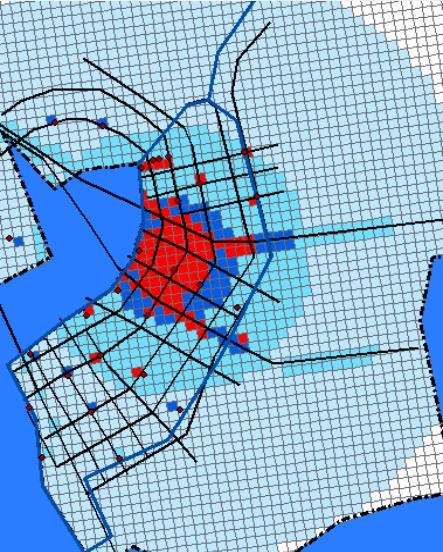
非常有趣的是，我的一个常年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基本的研究单位就是交易。交易是分析制度的基本单位，这个交易跟我前面说的产生的交易红利的交易，形成城市的交易基本是一回事。我们发现可以把这个交易和那个交易放在一起，它们中间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交易费用。这是制度经济学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交易费用跟交易红利对应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空间经济学的方法和制度经济学结合起来。

我们开发出来这个模型，有六个纬度，是一般均衡模型，我们不讲学术的定义，用一句话来讲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有N个市场，任何一个市场的一个因素发生变化导致价格变化，最后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均衡。我们这个模型是一般均衡模型。其中一个局部变量发生变化，都会带来全局的变化，直到形成新的均衡，这是它的特点。这就意味着生成任何一个局部数据都与全局有着一致性的关系。六个纬度，首先有三维空间，第四个纬度是时间，第五个维度是产业，第六个维度是制度和政策。



三维空间，我们强调这点是因为现在做规划的时候，一般只是做二维的规划，没有第三维的密度的概念，没有经济密度概念，更没有经济密度对应的经济效率的概念。我们这个空间经济模型可以给出这个概念，为什么有的市场没有效率，有的市场有效率，有的市场达到了一定的人口密度，缺少密度这个市场就没有效率。在真正做规划的时候，你要考虑这个城市的密度，你不考虑就会有问题。

第三维的资源配置问题，我们借助模型，又借助了地理信息系统表达。我们在前年、大前年我们给深圳市前海合作区做产业规划的时候，可以动态地表达，三维动态表达背后全是数据，这个模型是生成数据，模拟城市发展。我们做的是15年的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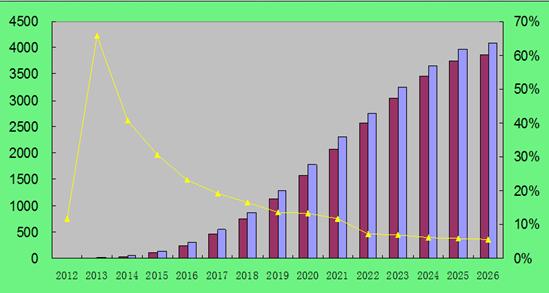


这个图是我们给前海做的产业布局的图，做的是2026年，这是一个表达。

还有一点就是制度和政策。我们刚才讲了可以把空间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结合起来，我们对各种制度和政策做了模拟，来看看各种制度和政策，看我们推行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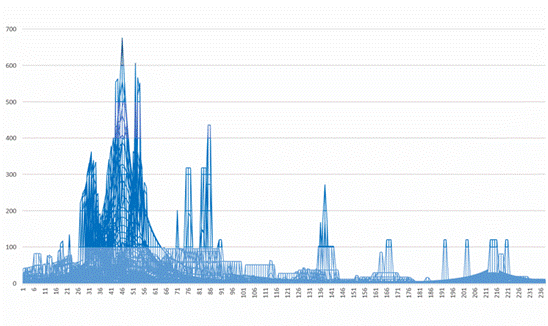


我们这里有“原初的GDP”，还有“初始推动政策GDP”，政府初期的时候投入大量资金去投入到某一个地区或者政府本身自己的政府办公楼也迁在这个地区等等。还有补贴交易费用，补贴房租、支持行业协会等等，产生这种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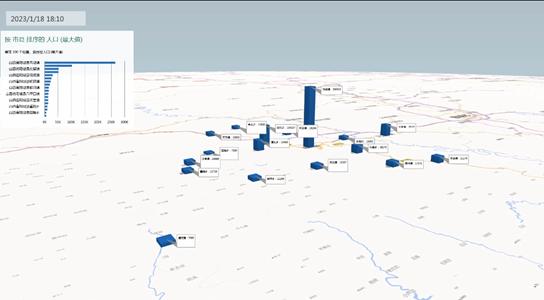


这是各种政策总体的效果图。基本上在政策推行的初期产生的影响比较大，这个黄线就是影响的百分比。但是过了四五年之后逐渐降低，越到后来政策的效果越小。这个说明一个问题，给了我们政府一个概念。政策只有在初期推行比较好。如果政策实施时间太长反而没有什么效果。

我们在去年又接受了山西省阳城县的一个委托，做这样的一个规划。阳城县好象是一个小小的县，我们原来做的是深圳市的规划，但是阳城县的规划很复杂。为什么？我们原来做前海合作区的规划的时候，是新填出来的一片空白地，只有15平方公里。而阳城县有近2000平方公里。我们受前海合作区委托的时候，没有那么复杂。第二阳城有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前海合作区什么都没有。前海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只考虑服务业不讲工业和生产企业，所以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但是在阳城县是有生产企业和工业产业，这又复杂一倍。另外还希望我们做生态环境规划。所以我们在进一步做规划的时候，增加了四维，维度就到了十维了。第一维是现有的产业维度，生产性产业维度。第二维度就是资源纬度，资源包括煤矿、铁矿，当然也包括旅游资源。还有一个维度就是乡镇维度，还有一维就是环境维度，最重要就是空间比较大。这是我们做的2028年的县域产业分布，结合已有的企业分布，产业分布，人口密度分布和城镇分布，加上我们模型的模拟，最后形成这样的结果。



这是侧面的一张图，表示地面上的复杂性。原来我们做前海规划时就是圆锥形，现在地面非常复杂，有企业、有城镇、有人口，比较复杂。



这张图是表达各个乡镇的人口分布情况，在乡镇这个维度我们也是做出来了。

这个数学模型我自认为功能非常强大。但我还要强调，这究竟是一个模拟，比真实情况简单得多，也不可能完全预见未来。我前面说我们能够依赖空间经济学模型去模拟未来，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一种方法能够模拟未来，没有一种其他的假设机理能够模拟未来。我只知道假定有一个市场制度在那的话我们能够模拟。假设是一个政府制度，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有很多不确定性，哪天政府官员突然改变想法，我们是无法模拟的。但是市场制度可以被模拟。但我们也要非常慎重地看待这个模拟，它不能完全预见未来。尽管数学模型能够提供大量模拟出来的数据，但要谨慎把他们看作是城市化和产业发展的大致轮廓，作为制定规划时的参考。

我们强调市场是基础，那么政府做什么呢？政府应该做好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进一步进行市场化改革，为企业家与居民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在中国，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不完全是市场制度。土地买卖是政府垄断，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还要进一步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尤其是各个地方政府更是如此，他们不但管制而且干预，妨碍了市场的发挥。

第二是补救市场失灵。做好第一件事情，要更多让市场来决定地区和产业如何发展。就如同我今天早上所说，对有效的市场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类似一种自然力。其实不需要政府去努力，老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自然会使经济发展起来。在一个恰当的一个范围内，市场来决定地区和产业如何发展。

再有一点，就是我们面对的不是物，我们面对的是人，市场中的主角，像一个一个个人。他跟我们政府官员差不多，他们都是人，而人最大的潜质，是他头脑中的创造性不可预估。最聪明的作法是为这些人和企业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我们也可能期待他们头脑中的创造力爆发出来，为地区甚至为整个国家、为世界带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好处，就如同像乔布斯的出现，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的出现是一样的。没有人预测他们能出来。但是我们很多政府部门官员他们总以为自己是最高明的，这是最可怕的。比如我们接触一些政府官员，他说我现在很忙，忙着审批，我让哪些企业进入我的高新技术区。他也看不懂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文件。我说你不用也么干，如果你这么去审查要进入高新技术区的企业家的话，如果在美国有这样的制度的话，就不可能出乔布斯、比尔•盖茨。当时没有人懂什么叫个人电脑，没有人懂什么是DOS，你不懂就不需别人发展吗？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要做一件事情，恰恰就是能够尽可能的让人类的天才脱颖而出，带来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

第二件事就是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在通过模拟市场而制定规划的框架下做一些辅助和促进的工作。有一些市场失灵，我们通过模拟市场对未来有大的预见，我们会预见比如说这个城市将来会发展多大，这个预见在某些时候有一定道理。比如假定现在上海是一片空白，如果我能够预见上海将来是一千万人口的大都市，我首先做的事情就是为这一千万人口大都市做基础设施。比你人口聚集之后，人们已经在那盖房子，你再做基础设施好得多。

我想强调借助于模拟而制定的规划，最重要的作用不是你的规划，你的产业规划所规定某些地区是金融业，某个地区是信息业，某个地区是物流业，不是这样的。这个非常次要。

重要的是他可以提前告诉你这个城市的大致产业结构是这样的，你可以比较早的对这个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事业作出规划，作出提前投入。在这个上面的发展是相对比较灵活的，比较刚性的骨架上加上有弹性的肉。你最操心就是借助于这样一种规划，对城市硬的骨架作出提前投入，这样做反而会事半功倍。我讲到这，谢谢大家。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本文为作者2014年5月29日在天则所主办的「2014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与制度创新论坛」的主题演讲修订稿 ]

# 乌克兰民主转型

## 乌克兰：民主对民族的困境

盛 洪

一．致辞

谢谢各位专家来参加我们这个会。天则所是一个研究经济学的研究机构，但是我们不局限于经济学，我们的视野经常会超越经济学，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关注。

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关注一些国际问题，尤其关注一些转型国家出现的一些变动，对它们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所以，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最近我们在关注乌克兰，因为大家知道乌克兰在发生一些动荡，甚至出现紧张，甚至是非常严重的对立，甚至有可能爆发战争。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关注。

首先一点，我们作为一个一般的观察者，我们了解得还是不多，所以首先还是请参会的专家，尤其是对乌克兰形势比较了解的专家能够为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二，我们确实要思考发生这样事情的原因，我想这个原因绝不是非常简单的非黑即白、天使与魔鬼、光明和黑暗的决斗，而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国际政治的问题，包括国内政治的问题，包括民族的问题，包括文化的问题，我觉得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对形势判断不能简单从事。

再一点就是我们在中国对外面发生这些事件怎么进行反思，这些事件对中国有什么教益，中国如果走向宪政民主，这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在我看来，其实如何走向宪政民主是更重要的。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宪政国家，不是搞了宪政就一定成功，它有很多具体的事件，有对很多问题恰当的处理，也会有很多危机，这些危机用什么制度安排去解决才能避免这些危机。这些危机一旦出现，很可能从整体上颠覆宪政结构。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的从外国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去汲取，乌克兰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观察机会，当然我们对乌克兰人民，我们是热爱他们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和平，能够和谐的解决他们的冲突，能够在和平的氛围下发展自己的经济，发展自己的社会。我就先讲这些，谢谢大家。

二．发言

感谢各位专家精彩的发言，我受益匪浅。我个人确实不太了解乌克兰，但是非常好奇，非常感兴趣。我个人跟乌克兰人最近距离接触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碰到过一个乌克兰人，他跟我谈的内容给我非常深的印象。他说乌克兰语跟俄语是不一样的，有几个字母、几个发音是不一样，所以是不同的民族。我当时马上想到的，是这绝不大于河北话和河南话发音的差距。其实以中国人角度来看，它们其实就是一种语言，甚至就是一个民族。而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按照什么标准划分？现在的标准是文化，文化最重要标志是语言，不同语言就是不同文化，尤其是拼音语言，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你到广东去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是为什么是一个国家的人呢？因为用的都是中文，这个方块字，发音不同，但是都是一个字，我们用文字交流都懂。法律是什么？法律是文字表达的，我们都能看懂同样的法律，这才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特点。

所以，这涉及到民主制度一个特别大的缺陷，大家知道布坎南研究公共选择理论，他有一个结论，我觉得他的这个结论非常正确，他说投票制度在异质文化中是失败的，比如两个不同的文化，文化的价值不同，他们对于某一个决策的决定，如果倾向于一种文化会对另一种文化有深深的伤害。比如刚才哪位讲的是季莫申科上台还是谁上台以后要禁俄语，这个伤害是非常深刻的，以至于另一批人不能接受。所以，这就不可能在投票制度中，能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异质文化中成功实现。其实这个结论应该说是现实，为什么呢？大家看西欧的版图。西欧版图其实就是单一民族国家结构，有些国家就是过渡型国家，比如比利时，比利时南部是法语，北部是荷兰语。在历史上我们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血腥事件，最终达成了均衡，就是这个样子。这证明了布坎南说的是对的。乌克兰是把这个事情极端化了，就是发音不同就是不同的民族，就打的死去活来，这是非常令人恐惧的。

但是，我们要反观中国，大家知道中国非常独特，中国说是一个国家，某种角度来讲是一个帝国的遗产。藏语、维语跟汉语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标准，就是不同的民族，不同民族按照民主制度的逻辑就是不同国家。刚才王老师讲这个问题确实令人担忧。现在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多民族的宪政民主国家，就是美国。但是，大家知道美国有很多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把印第安人几乎杀光，然后对印第安人进行同化教育，就是把他们从小送到白人学校学英文，忘掉他们本民族历史，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所有人，不管你来自哪里，都要说英文，英文是唯一官方语言，当然南方一些州是用西班牙语，但是作为美国整体来讲就是说一种语言，并不进行双语教育。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他们有一些保护少数人的制度安排，比如像参议院选举是按照州来分配名额，而不是按照人口。所以，美国相对来讲是比较成功，但是代价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反过来想中国，确实有这个问题，在民主转型的时候如何处理民族问题，我们要思考。当然，我也没有想好，我觉得有两点：第一，还要尽量建立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的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最后要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化，但是需要时间。第二，就是在宪政框架中必须要有保护少数民族的否决性条款。你要是没有的话，多数人投票，不许说藏语，他就完了。不能这样做，必须有保护少数民族的否定性条款，即少数民族可以否决对他们不利的法案，你才能让少数民族待在你这个政治共同体中，不然就不行，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还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缺陷。这就是民主制度在国内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但是对外未必是。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在世界的竞争格局中，是一个利益整体，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为了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就不见得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求民主价值。这就是美国不见得处处追求民主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有他自己的国家利益。这就是刚才张翔讲的是不是西方政治就有利于民主，未必，他就是为了本国利益。应该说在世界各个民族中，有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只不过现在不符合政治正确性，所以不被说出来。实际上在西方人，尤其在西欧人眼中斯拉夫人就是奴隶，他们出身就是不好，他们就是低贱的人，这是根深蒂固的观念，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包括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旧约》里面说了阿拉伯人是小老婆生的，以色列人是大老婆生的，这个在《圣经》里面是有的，所以这是根深蒂固的东西。

这就有一个悖论，近代有西方的侵略和奴役，也有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他们出现了英雄，赶走了西方势力，同时建立了独裁统治，这个独裁统治又压榨了本国人民，然后本国人民接受了西方价值观，推翻他们，但是在推翻他们的时候西方利用这一点来扩大自己利益。所以，独裁者和西方的扩张是互证合法性的，但都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点，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宪政框架。我非常惊讶地知道，就是刚才盛老师说的那个数字，乌克兰去年的GDP竟然还不及1990年，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是感到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乌克兰作为苏联的一部分时是计划经济，我们经济学家有一个假设，一旦计划经济垮台，那就是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不需要政府怎么去努力，也不需要政治家怎么样，其实老百姓只要有这个自由经济的权利，经济就会发展，乌克兰竟然不如1990年，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为什么？如果有个宪政框架，保护老百姓基本的经济自由的话，政治家怎么折腾都没有关系，我不认为政治家折腾就是社会的全部，你爱折腾不折腾，政治家只管公共事务，私人事务是你管不到的。包括埃及，他们推翻摩尔西的理由是说没有石油、没有吃的，我说难道这个总统要管你吃的、管你石油吗？这是很奇怪的事，他只是管公共领域的事情。所以我不理解乌克兰的宪政结构是什么？宪政结构是限制政府不侵犯私人领域的话，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再有一点，转型还是要渐进，转型如果过于激进的话可能会失败。像埃及那个例子我也看到了，其实美国一开始还是支持渐进性转型，结果它放弃了，我觉得很可惜美国放弃了这个主张。埃及人不接受渐进性转型，于是把穆巴拉克推翻了。其实对于很多激进的转型都会出现反复。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经验恰恰是中国自己的，大家其实知道我们在1911年就进行了民主共和的转型，后来为什么走到今天，是因为这个转型失败了。如果我们在政治上走的稍微慢一点，稳定一点，可能会更好。你如果走的很快，也许就会出问题。中国为什么走到今天？就是因为大家对民主政治有些失望，这是一点。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刚才张教授提的这个问题，就是精英的不成熟。我们也在想，一个社会确实要有非常成熟的精英群体，而他们思考问题，他们在遍读古今中外的有关文献，形成成熟的宪政思想，形成成熟的宪政框架，为这个社会提供这样的一些宪政框架和宪政资源。也许一旦出现机会，他们才能出来为这个社会服务。如果没有这样一群精英的话，他们就没有规则。美国可能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虽然美国有独立战争，但是英国的殖民者很早到了美国，而且他们有长期的文化积累，在英国殖民地时代也是长期积累，我们看到一批非常杰出的美国的国父们，像杰克逊、亚当斯、富兰克林这些人，为美国宪政框架做出重大贡献，在这之前他们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接受了欧洲来的很多有关宪政思想的资源，有清教的教育，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最后美国独立战争带来了机会，他们就能够发挥出更大作用，提出了一套宪政框架，使美国人民受益无穷。

所以，对于中国也是这样，对于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我们要花大量的精力放在古今中外的文献的阅读和思考上，为中国今后的宪政变革做准备。

谢谢大家。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3月6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乌克兰: 民主转型的启示」研讨会发言修订稿 ]

## 乌克兰政治危机和民主转型的思考

张 弘

首先感谢天则研究所给我这个交流的机会，我在中国社科院主要从事乌克兰政治和外交研究。根据今天会议题目《乌克兰民主转型的启示》，我今天打算分两个部分来谈谈我的一些研究心得。第一部分从民主化角度看的乌克兰危机。第二部分谈一下我对乌克兰民主转型的几点思考。

一、如何从民主化的角度看待乌克兰现在的危机

今年在乌克兰爆发的欧洲一体化危机是乌克兰社会各种潜性问题被意外因素引爆的，事件产生具有必然性和偶然性。

首先需要解决是如何定性这次危机？

目前国内学界有一下几种看法，比如地缘政治因素，认同因素，以及所谓的合法性危机或者是暴民政治骚乱这样一些定义。我认为，此次乌克兰危机是一次政治参与危机。政府在进行重大决策过程中缺乏与社会沟通，忽视了一些民众意愿。由于被排除在重大决策过程之外，他们选择通过街头示威和暴力活动来宣泄将对政策和总统的极度不满。

2、导致乌克兰危机的一些内部因素。

首先，乌克兰社会存在的认同差异是危机产生的社会因素。目前的乌克兰领土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历史并不很长。乌克兰在历史上曾先后被不同国家统治。西部的加利西亚和沃伦地区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长期在乌克兰西边，使得西部地区在文化、意识、宗教等等一些因素上更加接近欧洲。而东部地区在沙俄统治长期时期已经俄国化。上层社会的乌克兰人的俄罗斯化更为严重，他们把俄语作为母语，接受系统的俄语教育，把乌克兰语视为下层人民使用的方言土语。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历史认识导致独立后的乌克兰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不同的文化、宗教和历史认知导致西部地区居民有着明显的反俄情绪，东部居民则对俄罗斯抱有好感。东西部的文化认同差异性导致他们的国家认同也是矛盾和分裂的。

第二，缺乏成熟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是导致民主化进程波折不断危机的文化因素。独立后的乌克兰采取了双元首制的半总统制。半总统制的优点是分权均衡，可以避免出现新的专制和独裁。同时，这种制度安排还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需要一种成熟的政治文化来支撑其正常运行。均衡分权制下的任何一方都需遵守宪政民主制的权威，既要在制度框架下进行竞争，同时必须有妥协和合作的精神。

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作为整体以及体系的输入方面和输出方面都有强烈而明确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并对自己作为政治体系成员的权利、能力、责任及政治行为的效能具有积极的认识和较高的评价。参与型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是阿尔蒙德和维巴对民主政治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的一种分类框架，即将政治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狭隘型文化、顺从型文化和参与型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层面，没有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立，就没有民主政治的发展。参与型政治文化发挥着催生、支撑和保障民主政治的作用，乌克兰独立以后二十多年的实践效果却将半总统制的弊端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总统与议会多数党来自同一个阵营，那么国家机器得以运行平稳。如果来自不同阵营，则总统与政府之间就进程爆发争夺行政权的斗争，总统与议会之间则可能爆发立法和审批纠纷。议会之中的执政党与反对党也经常爆发激烈斗争，双方经常由于政策分歧而爆发肢体冲突。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引进和设立可以在短期内实现，但是如何运用好这种制度却需要参与型政治文化来支撑。由于苏联解体的突然性，乌克兰的政治转型也是一个被动式的突然性事件。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多元政治基础，新成立的政党和精英甚至没有看宪政民主的说明书，就匆忙上路。他们还未养成参与性政治文化习惯，将政治生活更多地被理解为“利益交换”和“零和游戏”。各种权力部门和政党一再最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愿意妥协，甚至还经常搞政治清算。尤先科、季莫申科在上台以后立即政治清算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亚努科维奇上台后就政治清算季莫申科。不断上演的政治零和游戏和清算不仅践踏了宪政民主制度，也降低民主制度的运行质量。

第三，精英行为失范是导致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着多元身份认同，不同认同可以和平共处，并不一定引发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但是，这些认同差异在乌克兰却放大为社会冲突和对抗。笔者认为，精英行为失范是乌克兰政治动荡的直接原因。精英将这些认同差异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挑起不同乌克兰社会的分裂和冲突。精英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不仅担负着领导民主化运动的主要责任，还肩负着教育和动员选民的工作。精英是否尊重民主价值和宪政民主制度将直接决定着民主制度的运行质量。乌克兰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爆发的社会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精英缺乏对民主宪政制度的尊重，过度的政治动员使得普通民众的示威活动越过法制框架，演化成为暴力骚乱。精英为了个人及其政党的利益，把认同差异放大化，作为其选举和动员选民的工具。国内政治议题不关注经济民生问题，而成为代表东西部地区利益的政党纷争。

3、影响乌克兰危机的外部因素：

首先，特殊的地缘这种环境是导致乌克兰民主化转型困难的外部因素。东中欧国家的社会转型，除了其自身的民主化诉求外，更重要的是欧盟的外部约束机制。在民主化和欧洲一体化这两个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中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波折和反复。乌克兰则恰恰是一个反面的典型案例，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已经成为其政治民主化的阻碍因素。大国在乌克兰的地缘政治竞争导致其民主化进程经常被周边大国关系干扰。

冷战结束以后，东西方并没有消失，西方依然是传统的以美国和欧盟为主的西方世界，东方则是选择了主权民主和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俄罗斯。俄罗斯在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后并没有被所谓的西方的国际政治体系接纳，继续孤立地作为一个“他者”存在。

乌克兰恰恰处在两个地缘政治板块的夹缝中间，需要在东西方地缘政治上做出一种方向选择。这种选择不是一种意识形态选择，而是国际政治体系的选择。西方集体把民主化作为手段来达到地缘政治目的，俄罗斯则以市场和能源为手段，希望把乌克兰留在其独联体大家庭里。俄罗斯和美欧在乌克兰的竞争直接导致乌克兰国内政治焦点偏离了民主化议题，变成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代理人斗争。大国把每一次政治危机都视作影响和争取乌克兰做出选择的机会。我们看到，美欧在这次乌克兰危机中一边倒地支持反对党，而无视在示威中的暴力行为，客观上鼓励了事态扩大化和最后失控。

其次，西方支持乌克兰亲西方政党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美欧希望借欧洲一体化来督促乌克兰政府主动完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加快政治民主化速度，消除腐败和权威主义政治色彩。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等原苏东国家都加入到民主化浪潮之中。他们虽然建立起了三权分立、多党制、直选代议制的宪政框架，但在制度细节和执行情况上距离西方正统民主还有些距离，其中还包含着一些权威主义政治色彩。美国和欧盟支持乌克兰亲西方政党在一定程度上意在推动民主化，借以推销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这是西方社会固有的意识形态本能在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无论危机向何发展，都是对乌克兰民主转型是一个重大的事件，甚至不亚于颜色革命对乌克兰社会的冲击。任何一种危机都是对精英的考验，同时对普通乌克兰大众来说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机会。

二、乌克兰民主转型的几点思考

下面我谈一下对乌克兰民主转型，和这次危机没太多直接关联，是我在乌克兰政治转型研究的一些思考。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选择了宪政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已经有20多年。宪政制度框架虽然搭建起来了，但是运行效果非常糟糕的。可以说，乌克兰民主转型是给了原苏东国一个失败的案例。

之所以存在导致这么多问题，我认为可以从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两个方面去分析。

1、影响民主转型的制度性因素

首先，宪政制度设计造成的民主固化困难。乌克兰在政治体制上实行的是半总统制。该政体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造成双权力中心的僵局。当总统和总理分属于不同政党，容易形成总统与政府争夺行政权的僵局，近而影响国家机器的运行效率。

其次，议会多数党没有组阁权。乌克兰1996年宪法规定，总理由总统提名，需经议会批准。议会多数党没有法定的提名权，只有批准权和罢免权。在乌兰宪法没有赋予议会多数党拥有组阁权。这种没有组阁权的制度导致乌克兰政党发育非常不充分。选民更愿意相信政治家个人，而不相信政党，政治家也经常变化党派，经常是今天属于这个党，明天就可能成立另外一个党。在乌克兰前三四次议会中，都存在着有大量的独立议员，总统利用个人影响力就可以获得批准内阁，总理不一定来自于议会大党。这种弱化政党作用的宪政制度设计导致乌克兰政治的制度化水平较低。

第三，在选举制度上也有一些问题。乌克兰实行的混合制选举制。议会席位一半来自单一选区，另一半来自比例选区。大量独立政治家不需要依靠政党，凭借其在单一选区的影响力就可以当选。议会中独立议员席一直比重较高，最高时曾经达到40%的比重。在乌克兰的比例制选举中也有一些问题，选民不投票给候选人个人，而是投票给政党（政党内部的候选人名单由各政党产生，选民没有选择权），然后根据各政党的得票率来分配议席。在乌克兰的比例制选举中，很多寡头通过直接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被列入政党比例代表名单。这种通过这种比例制进入议会的寡头议员，意在获得议员的司法豁免权，其政治立场摇摆不定，降低了政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2、精英行为与政治转型

精英作为民主宪政国家主要的行为体，在政治社会中的影响较大，也是导致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

首先精英热衷于街头政治。乌克兰搭建了三权分立的框架，大家大量旧制度的痕迹，使得法律存在很多空白地带，政党和精英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会选择性使用法律和规则。在司法和民主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在野的政治精英热衷于绕开司法制度和政治经济进行街头政治，街头政治是有很大的负效应，每次危机都爆发街头政治。

其次，精英结构也不稳定，乌克兰政治精英内部经常分化，季莫申科和尤先科颜色革命以后，没有多长时间就分化，精英之间合作是以利益为基础，而不是各政见和意识形态为基础，季莫申科是亲西方的，尤先科是亲西方的，但是颜色革命以后，因为利益分赃不均而分手。亚努科维奇是亲俄的，但是他有时与尤先科合作，打压季莫申科。有的时候又与季莫申科合作，削弱尤先科的权力。看见，乌克兰政治精英既没有意识形态原则，也没有稳定的权力结构。乌克兰独立20多年来经常爆发的政治危机更多的是精英利益纠纷，也使得我们这些研究乌克兰学者很困惑。

3、政治文化对乌克兰转轨的影响

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得以持续的文化基础。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乌克兰的政治转型，我们可以更容易理解从制度民主到秩序民主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政治生活得以持续，就意味着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运行良好，也就意味着政治生活在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三个方面均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因此，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也就构成了政治文化。 根据对乌克兰政治变迁历程的分析，笔者认为乌克兰在体系文化和过程文化方面的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

首先，乌克兰在体系文化上存在的分歧。

体系文化讲的是政权体系合法性，就是我们讨论国家性的文化，如果大多同人认同这个国家，这个政治体系就可以存在。对于处于社会转型的乌克兰，他们不仅需要建立一个制度形式，更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认同。从这个角度来讲，乌克兰一直没有解决国家性和民主化问题。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国家性发生了出现三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去苏联化。去苏联化也就是乌克兰化，是对沙俄和苏联时期矮化乌克兰文化历史的一种修正。乌克兰政府在文化教育体系坚持以乌克兰文化为主，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在全国体系乌克兰语教育。特别是尤先科执政以后，政府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去俄罗斯化运动，限制俄罗斯媒体在乌克兰全国的播放。在宗教领域，尤先科企图将乌克兰东政教脱离俄罗斯教区。对于历史上存在的30年代大饥荒问题，乌克兰认为是斯大林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屠杀，而俄罗斯认为是整个苏联社会的灾难。去俄罗斯化增加了族群矛盾，族群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分歧阻碍了统一的乌克兰国家性形成。使得乌克兰在转型中的认同日益复杂化，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种子。

其次是宪政民主制度与本土政治文化的矛盾。宪政民主是代议制民主制度，多元化的社会各种意见共同构建出政治参与型文化。而苏联时期实行的共产党体制下的垂直领导体系，无条件服从上级的臣属型政治文化。笔者认为，过程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运行中的合作文化。这里既有大众的政治过程文化，还有政治精英的政治过程文化。相对于大众的合作文化，精英政治合作文化在政治转型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和突出。而影响过程文化的主要是精英之间的关系，精英之间的信任水平直接决定着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模式。乌克兰独立以来，政治精英层面上的分分合合不断。除了政治理念的矛盾外，很大程度上是违约的成本较低。

参与型的过程文化是政治精英体系稳定的一个基础。民主转型政治体系稳定运行不仅取决于制度，还依赖于精英体系的稳定，精英之间是否合作，不仅取决于他们的立场，还依赖于他们过去的合作经历和政治信誉，而乌克兰这种过程文化是恰恰让我们看到很糟糕的环境，只有利益，没有政见。最后一点，在认同里面，我刚才提到三点，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体系文化和过程文化，在乌克兰政治转型中影响最大。

最后概括一下我的观点

从制度层面上，西方宪政民主制度过分分权的理念对于防止专制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乌克兰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副作用更大，民主化质量也受到严重限制。

从政治行为层面来讲，精英的稳定是民主化固化的主观条件，建立稳定的精英集团和良性的精英合作机制，对于实现政治转型和民主固化是实现民主转型和民主固化的主观条件。在精英合作过程中，乌克兰把政治议题扩大化、广泛化，使得精英达成妥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乌克兰面临多种社会转型任务的时候，政治议题的选择如果加以限制的话，有可能避免危机和避免分歧，容易达成妥协。

从历史文化层面看，我觉得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对于民主巩固的关注在乌克兰变得更加迫切和需要，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应该构建和宪政相匹配的政治文化，乌克兰政治变迁暴露出来的体系和过程文化的矛盾表明任何好的制度都 需要人来秩序，没有对制度尊重和没有对新制度的尊重和信任，也就无从谈起行为。

[ 张弘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副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3月6日天则经济研究所/新浪博客/中评网共同主办的新天论衡「乌克兰: 民主转型的启示」研讨会发言修订稿 ]

## 乌克兰启示录：转型难在哪里?

杨俊锋

近来乌克兰局势激烈变动，克里米亚脱俄入俄，加上俄国强力干预并与欧美激烈角力，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而且，乌克兰曾和中国一样实行共产主义体制、同属过社会主义阵营，并都与俄国毗邻、渊源甚深；同时又有不同的是，乌克兰早在20多年前脱苏独立，并宣布实行自由民主政制；但至今乌克兰政局却一直如翻烙饼般反复，转型步履蹒跚。这对正面临民主转型起步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而言，自然更值得关注。

　　颇富戏剧性的是，在乌克兰独立之初，许多乌克兰人天真地认为，一搞民主，幸福生活便随之而来；乌克兰能在不长时间内成为第二个加拿大，小麦成海、牛奶成河；甚至断言10年后居民生活可望接近英、法等国水平。

　　但现实却极其残酷。乌克兰进入后极权时代已20多年，但不仅政局反复震荡，而且经济也反而连续负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挣扎在贫困之中；4000多万人口，却有1400亿美元的外债（当然这一定程度上也由于政客利用民众追求眼前的物质实惠心理,为迎合大众而大肆举债）。而按理说，就经济增长而言，自由市场远优于计划体制，相比之下有些集权国家却反而维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相似地，原本苏联集权体制下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不仅未能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随着苏联体制解体而消失，独立后的乌克兰反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总之，乌克兰的转型不仅和不少国家如埃及、泰国一样非常艰难，而且被认为是非常失败。

　　可见，自由民主虽是人心所向，但转型成功却并不容易。这自然也再次成为各种支持集权主义的“左”派幸灾乐祸、否定自由民主的口实。因此，乌克兰局势不能看作单纯的国际时事，其中还蕴含着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即如何转型、转型的困难究竟在哪里？

　　一、严重的社会对立是转型的大碍

　　乌克兰转型困境的最重要根源，应归咎于国内严重的结构性和根本性的分化、对立。俄乌关系绝对是“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乌俄差不多可谓同文同种：乌本身就有不少俄罗斯族，而且多数乌克兰人和俄国人都同属斯拉夫人，乌语与俄语也极其相近；早在17世纪乌克兰人为抗击波兰便主动加入俄国，而克里米亚更原本即是俄国领土，只是在1954年为纪念乌克兰加入俄国三百年，才被苏联当局划给乌克兰……

　　但另一方面，民主自由更为成熟、经济更为发达的西方世界对乌克兰显然更具吸引力。而且，俄乌又积怨甚深。尤其是苏联时期残酷高压政策导致以欧洲粮仓闻名的乌克兰遭受严重饥荒，大批乌克兰人被饿死，这甚至被认为是苏联专门利用饥荒清洗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

　　更具体地讲，东乌克兰多俄罗斯族、讲俄语、信奉东正教，社会情绪亲俄；而以俄罗斯族为主的克里米亚，就更具有强烈的回归俄国倾向。但西乌克兰深受西欧影响，乌克兰族占绝对优势、大都信奉天主教、讲乌语，具有强烈的乌克兰民族意识和去俄归欧倾向。

　　上述因素就导致乌克兰国内形成了亲俄和亲欧群体的严重对立。而乌克兰极为敏感的地缘焦点地位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乌克兰恰位于欧盟和俄国的连接点，俄国将乌克兰视为固有势力范围，西方则支持反俄的反对派。而且，乌克兰政治家们在亲俄和去俄亲欧之间反复摇摆和过度投机，更加剧了国内认同的撕裂。

　　在这种严重的社会对立下，成功转型必不可少的基本社会共识和认同就很难达成，政局反复动荡也就不可避免。相似的是，泰国政局动荡则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对立。相比之下，像蒙古、韩国和日本等国，民族构成单一、不存在严重的族群对立，因此转型就较为顺利。

　　乌克兰的族群对立还造成新政治秩序和权威无法有效建立，这进而造成地方割据和贪污腐化的盛行；也阻碍了政党政治的正常发展，从而为政治操纵行为提供了空间，如总统利用其地位影响独立议员选举。

　　因此，在存在严重社会对立的情况下，转型不仅很难并还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和代价，其中还包括可能导致领土分裂。这对多民族、宗教，并存在着严重城乡差距的大国，就尤为如此。对此，显然不能简单地全看做是维护现有体制的借口或恐吓，而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真诚的担忧，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无疑是转型国家要认真对待的。

　　二、破除旧秩序与建立自由民主新秩序的双重任务

　　转型绝非打破专制秩序并宣布实行自由民主，便会万事大吉、水到渠成。即便是表面上建立起民主宪政体制的外壳，但使其真正落实却很难。

　　乌克兰独立后的严重贪腐和经济衰退，其实错不在自由民主本身，而是原集权体制的贻害。虽然乌克兰独立后宣称实行自由民主体制，但其政府机构一切如旧，机构臃肿、职责不清、效率低下、极不透明、办事程序繁琐；旧的官僚阶层基本上未被被触动，官僚们利用市场化为所欲为，对企业敲诈勒索使其更不堪重负。这是导致腐败严重和经济不断萎缩的重要根源。

　　同时，在清理原有集权贻害的同时，还要建立起新的权威和秩序。当旧有政治权威因丧失正当性而被打破后，就需要及时树立新的政治权威，因为没有政治权威就不可能形成社会秩序。自由民主的一个重要的隐含前提是，它同样需要一个正当、有限而又有效的政治权威。自由民主不仅也需要秩序，而且本身也是一种秩序，即自由民主秩序。

　　而乌克兰未能及时建立起新的正当、有效的权威，也是腐败盛行、社会混乱以及经济衰退的根源。自由市场不等于无政府主义，它有赖于一个有限但又有效的政府来提供基本的公共秩序和服务，及必要的基础设施。否则，经济发展不仅不会随着宣布实行市场经济而自动发生，并反而可能造成经济衰退。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有些集权国家反而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因为它固然压抑个人权利，但却可能会更为有效地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并会在一定限度内保障发展经济所必须的产权和经济自由。

　　乌克兰转型进程也说明，相比打破集权体制，如何设计和选择切实可行的具体自由民主体制却更为复杂。例如，在政体上，转型国家都面临议会制和总统制的选择问题。相比之下，议会内阁制更能保证行政权受制于民意、行政首脑更迭容易，因此不容易出现政治僵持；但缺点是政府不够稳定、效率可能相对低下。相对而言，总统制或半总统制下政府更为稳定、权力更为集中、效率也可能更高，但议会对总统的制约有限，而且总统除非因犯罪而被弹劾，否则便无法更换，因此容易导致个人独裁，也反而容易出现政治僵局——乌克兰当下的政局动荡，很大程度上即失之于此。

　　法治则既是重建权威和秩序的根本保障，也是其重要体现。而乌克兰表面上不缺法律，但却难以落实；有司法机关却缺乏独立、公正和权威，包括乌克兰宪法法院也仍缺乏超脱于政治的中立性。几乎每次大选，都会被指责为舞弊，但却无法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规范和解决；原本通常只是穷尽其他正当的途径之后最后的选择的街头抗议，在乌克兰却极为频繁、激烈。

　　类似情景对中国人而言自然再熟悉不过。例如，即便是声言毕生追求宪政的孙中山，在宋教仁遇刺后，在案件已初告侦破、司法程序启动之下，却仍坚拒法律解决的建议，决然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解决。因此，若一个国家树立起规则至上的普遍共识和自觉意识，转型就很难成功。

　　三、妥协精神对于成功转型至关重要

　　建立新的秩序、权威和法治，根本上依赖于整个社会达成基本的共识。而社会共识达成，固然取决于社会的对立和分化不能太过严重，但也同时离不开妥协精神。乌克兰转型困局的根源其即在于此。各政治集团之间往往互相清算，重复着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这也是为何表面上乌克兰建立民选、分权体制，但却无法有效运转的重要原因。

　　我不否认，街头抗议本身是自由民主的体现，民众也当然享有不服从的权利。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过度激烈和频繁的街头政治，却会反过来危及自由民主，同时其实也是自由民主尚欠成熟的标志，并也说明这个国家缺乏基本的政治共识和法治。

　　事实上，自由民主政治是一种妥协的政治。它不仅取决于制度的设计,还取决于民众尤其是精英的妥协精神。根本上，妥协是基于理解和宽容的心态，寻求对话协商、求同存异、互让共容、互利共赢的更高境界和智慧。但凡善于妥协的民族和时代，往往少有大的震荡和苦难，并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英国自由民主的建立和发展，不是因为杀掉国王，而是搞君主立宪。美国独立后，十三个州（state）其实是各自独立的国家；但他们却并未像中国历史上那样，一个强大的州武力统一，而是通过讨价还价后的巧妙妥协，订立联合的国际条约即宪法，成一个新的国家。而法国大革命杀的人头滚滚，但带来的却更多是恐怖和倒退；巴沙尔断然拒绝调停，并要铁腕镇压到底，使叙利亚至今仍深陷内战泥潭。

　　这种缺乏妥协的文化，当然非乌克兰所独有，而是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痼疾。中国自古以来，相互让步、达成妥协的情形，就极为少见（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清室和平退位）；相反更多的是不达不目的誓不罢休决绝，总希望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消灭对方。即便主张“和为贵”、“中庸”的孔孟，也动辄称论敌为“小人”、“禽兽”；若大权在握，则更可能直接肉体消灭——对此，连苏轼也认为诛杀用言论“疑众”的少正卯，是动用公权法外尽诛异己的“无罪而罚”。而在当代，残酷无情、斗争到底的绝对思维，更曾被革命文化高度宣扬，而妥协则被视为软弱无能、不够彻底的代名词，被批倒批臭。这样的惨痛代价和血泪教训，举不胜举且并不久远。

　　小结

　　自由民主当然不能妖魔化，但却既非万能药，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抓就灵”。而像中国这艘巨船，要调整航向，自然就更为不易。

　　阐明这些道理，并非反对自由民主，而是意在提醒人们充分认识到成功转型的艰巨和复杂，以做好必要的心理与学理准备；反之，轻率盲目的乐观，一旦在转型过程中遭遇困难和挫折，就很容易适得其反，产生严重、普遍怀疑和否定自由民主的逆反心理，反而阻碍转型成功。

（本文系作者在新浪网、中评网主办的《新天论衡：乌克兰民主转型的启示》研讨会上的发言修订而来；FT中文网2014年3月19日头版头条首发，发表时略有删改；此为原文）

## 政治道德和民主共识是转型成功的重要因素

王从圣

听了好多专家的发言，很受启发。下面我直接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民主转型之前的自由化阶段不宜过长，且民主选举不必自下而上慢慢推行

“乌克兰:民主转型的启示”，这个题目很好，因为不必局限于当前的乌克兰危机。最近昆明发生了死了29人的301惨案。很多人由此也谈论更广泛的一些问题，如国家的统一和分裂问题。我就从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开始谈。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呢？有很多研究民主转型的学者发现：其中的一个关键涉及转型的顺序和步骤问题。国内关心民主转型的很多人也在谈论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顺序问题，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一般认为是先自由化，然后再民主化。很多年以来，在中国人们多强调民主的渐进发展，强调先在基层搞选举实验。比如前些年搞的村民自治。他们认为民主需要学习，要培养，先从村级开始，村自治，乡选举，再县选举，这样慢慢向上发展。而苏联解体的教训恰恰告诉我们这个顺序是危险的。

苏联解体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呢？自由化时间太长了。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到1991年苏联解体，在这六年多漫长的时间当中，各个加盟共和国中各民族的独立的情感逐渐发酵，逐渐成熟。六年时间的自由化使得民族分离的情绪已经酝酿完成，不可逆转了。大家知道，在任何一个国家公然倡导分裂都是违法的，刚开始是不敢谈的。但有了六年的时间，从小范围谈，到大范围谈，再到公开谈。到最后1991年的时候，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每个政治家，如果不谈分裂，不谈独立，你就不能说话了。如果你再谈在苏联之下的统一，你就没有政治前途了。

具体到乌克兰，在1991年总统选举的同时也进行关于从苏联独立的全民公决。参加竞选的六个总统候选人全都主张独立，全国更有超过90%的选民支持独立。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政党自由酝酿到这时候，国家分裂谁也挡不住了，除非进行一场残酷的内战，如俄罗斯后来在车臣进行的那样。

对照中国，如果按有人建议的那样自下而上逐步放开选举，比如到新疆喀什、和田这一级，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对多数，一旦酝酿的时间足够长而得不到适当控制，则民族分裂的舆情就可能占有支配地位，即便达不到分裂国家的程度，造成兄弟民族之间的仇杀是极有可能的。

我们要理解：就民主而言，主要地体现为选举，其对公民经济文化素质的要求是很低的。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就能进行很好的选举。英国美国在二三百年前搞民主选举的时候，其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条件都比今天的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中国都差远了，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民主转型之前的自由化时间，即真正放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的时间不必太长。时间太长反而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其他后果。那么，这个时间多长合适呢？原则上讲，够选举就行了。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阿根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从自由化开始到第一次大选，时间间隔最长的才1年8个月，最短的只有4个月。再具体一点说，时间足够组建一二个建设性的反对党（联盟），能够在民主宪政规则之下达成共识，且势均力敌就可以了。注意：我在这里强调共识，强调建设性。

所以，选举反而是一步到位，从最高层开始更合理。因为这样可以首先形成一个主导性的中央政府，两三个主导性的全国性政党。有了中央政府，就有可能产生全国性的法律，再结合全国性的政党。这样就可以有效阻止分裂倾向，极端倾向。否则的话，如果从下往上酝酿，这个思路就错了，非常危险。

很多国家，甚至包括像印度这样民主制度很成熟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都有一个弊端，就是政党竞选的时候容易结合宗教、民族、部族、种姓。候选人通过这种方法来吸引支持者。这种方式弊害甚多，比如非洲小国的卢旺达，民主选举激发了两个民族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矛盾，不到一百天就互相屠杀了八十万人之多，让人痛心疾首。

在埃及，法律禁止以宗教为基础组党竞选。在加纳，参加竞选的政党必须在全国大多数省都有创始成员和主要党员干部。这都是相当有效的经验，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二、民主转型成功需要一批深明大义的政治家，需要政党之间的高度共识

很明显乌克兰的民主转型出了问题。问题在哪里呢？我们不妨做一个对照。我不知道大家有几个人注意到我们的邻国蒙古？蒙古这个国家很落后，但是它1991年改革以后，在民主上非常成功。在自由之家的评价上，政治性自由评为一等，公民自由评为二等。对照一下中国在那两项一个是第七等，一个是第六等，即一个是最差，一个是倒数第二差。蒙古与乌克兰差不多同时进行民主转型，为什么一个成功，另外一个失败？蒙古这么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怎么能搞民主呢？这是西方很多转型理论都不会看好的。

这里我谈民主转型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政治家的政治道德问题。在当今谈道德，很多人会不以为然。三权分立也好，民主也好，很多制度是以人的自私作为出发点来设计的。但是我必须强调：成功的民主政治、宪法政治，一定要有相当成熟的，有很高尚人格的，有着胸怀民族国家大义的一批伟大政治家才能培育出来。人们不可想象，假使美国没有富兰克林、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等一批真正伟大的人，美国的民主制度会成功。几乎是同时代，如果拿破仑与华盛顿换一下国家，或许美国就会失败而法国就会成功。

在乌克兰非常不幸，我跟邢老师看法不一样，他认为库奇马不错，我却认为库奇马坏透了。他前面的克拉夫丘克很好，克拉夫丘克好在哪里？这涉及如何评价政治家这个问题。我认为：在民主制度下，评价政治家就是看这个人是不是贪权，会不会在法定任期届满时让出他的权力。这对民主制度尤其重要。尤其在民主转型的头一二十年，政治家的表现非常重要。那时候民主太脆弱了，就像刚学步的幼儿一样，晃晃悠悠，稍有不慎就会摔倒。而一旦摔倒，少说需要一二十年，是缓不过来的。为什么说克拉夫丘克不错呢？他1991年当选总统，到1993年就有很多人反对他。他就主动安排提前选举，在选举中让人民决定自己的去留。在1994年的总统大选中，他输给了库奇马。输了就输了，没有搞别的。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呢？会打击反对派，会搞阴谋，搞假选举，办法很多，反正是不让出总统宝座。但克拉夫丘克没有，所以他很了不起。想想看，那时乌克兰刚刚民主化不久。那次总统选举，国内国际都评价说是一个自由公正的选举，没有问题。

反而库奇马很成问题，他任总统十年时间，刚才有人提到他两届干满了。但是，他在任期间搞的事情相当可疑。他把批评他，揭露官场腐败的记者贡加泽暗杀掉了，尸身分离，抛尸荒野，死的很惨，不明不白。库奇马的一个贴身卫士提供给社会党领袖莫罗兹大约100多小时的录音，里面表明库奇马指使他的办公厅主任等人将贡加泽弄死了。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使乌克兰整个政治气氛非常诡谲了。这种气氛让人感觉很不安、很躁动。政治家之间，党派之间，就很难有互信，共识就很难达成。

2004年橙色革命就是乌克兰长期处于这样的气氛之下酝酿起来的。在那之前，乌克兰政治已经很腐败了，库奇马的总理拉扎连科腐败，库奇马的女婿用超低廉的价格收购国有企业等等。库奇马自己曾尝试着让支持者启动修改宪法以便自己能继续留任，但没有成功。之后他支持政府总理亚努科维奇。也就是总统加总理通过他们控制的政府体系给竞争对手尤先科制造种种障碍。选举的时候作弊。他们操控的选举委员会在组织选举、计票的时候也作弊。

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事，选举一旦搞不好就容易出现广场革命这种事情。亚努科维奇在那次选举中，在很多地区都普遍地存在大规模的舞弊现象。后来橙色革命把他赶跑了。这样造成一个非常恶劣的局面，就是用广场革命去推翻权力、夺取权力的办法。这就形成了非常麻烦的恶习。

如果从具体的操作层面讲，必须在正式选举之前把选举程序设计得尽可能公正，不能太仓促的搞选举。当然执政的一方垄断这一过程，不让反对派参与就很麻烦，一开始就陷入困境，那就离广场革命不远了。如果选举程序，选举过程搞不好，导致以后的广场革命一旦形成习惯，非常麻烦，一乱就是好几年、好几十年都扭转不过来。

刚才说蒙古，蒙古在1991、1992年的时候，那么穷的国家，但是他的政治精英之间非常遵守规则。执政党、多数党与反对党之间配合很好。比如说选举，有一方执政了，就把反对党邀请过来加入政府，或进行其他的互动。对一些关键性的法律，双方坦诚地进行商谈。这样党派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关系。

很多人仅仅注意民主是多党之间的竞争，甚至反对关系。这很不够。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党派之间竞争合作的关系。现在在乌克兰、泰国等很多国家，光重视竞争了，而且竞争过分了。没有党派之间的共识或者合作的层面，民主是不能运行良好的。党派之间没有起码共识是很难办的。一味地只想着搞垮对方自己上台执政，这是不行的。

三、民主转型中的稳定、折中、裁决因素

我学习宪法，思考民主转型也有二十几年了。我一直在苦苦寻找在民主转型纠葛当中，在难分难解的党派斗争之外的稳定因素。也就是在激烈的党派斗争当中，非常混乱的时候，在这个国家有没有这样一个中间的力量，稳定的力量，能起到某种缓冲、协调、裁决的作用？我认为这对民主非常重要。在英国西班牙，我看到的，起这一作用的是国王。这是我对民主制度下君主作用情有独钟的原因。在国家危机时刻，英国国王把两三个党派领袖叫到白金汉宫谈半天就解决问题。这在英国可不是一次两次了。英国国王绝对没有白花纳税人的钱。化解一次这样的国家危机，英王一百年的开销都值了。

在这一点上乌克兰也表现得非常不好。我讲两个，一个是选举委员会，一个是宪法法院。在橙色革命之前，选举委员会应是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操控的。选举委员会在统计结果的时候公开造假。这个事情就没法办了，所以搞出来了橙色革命。

乌克兰的宪法法院也很麻烦。宪法法院应当是很公平的。但乌克兰就差太远了。宪法法院有一个很恶劣的判决，让人觉得它干脆是不可信的。它做一个什么判决呢？就是在库奇马十年任期，也就是两届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库奇马鼓捣议会改变选举规则。乌克兰总统原来是全民直选，现在他们要改成由议会选举。大家都怀疑库奇马你要干什么？怀疑他是不是还想接着干，想干第三届第四届。而就这个时候宪法法院做出一个判决，认为库奇马可以第三次担任总统。这个国家没有可信的了！这个很麻烦。这个判决完全让老百姓感觉，也让政党领袖觉得，你的判决完全不公了，站不住脚了。

此外宪法法院的组织结构也有问题。宪法法院由18个人组成，我觉得人太多了，至少跟美国最高法院（9人）相比人太多了。恐怕也不见得是好事。而且乌克兰宪法法院法官的任期到65岁强制退休。作为法官来讲，65岁退休年龄太小了。法官年龄大一点，他的资历，他的威望可能更高一点。在美国八十几岁的最高法院法官仍然能很好地承担审判职责。所以乌克兰宪法法院的分量严重不足。作为中间力量，作为国家的稳定力量，它的分量不足。而且又缺乏独立性，缺乏公正。所以，我理解在这个国家稳定的力量、中间的力量、裁决的力量完全失去了调和党派冲突的作用。

四、人民的共识和民主精神

最后我简单谈一点人民的共识和民主精神。乌克兰人民缺乏民主共识和民主精神。政治家之间、政治党派之间的乱斗加剧了民众的分裂。正如刚才几个老师说的，这几个领袖把握的不好，没有一个很好的政治眼光。政治领袖诱导人民要么是面向欧盟，朝西的乌克兰，要么是面向俄罗斯，朝东的乌克兰。实际上乌克兰就是乌克兰人的乌克兰！要牢牢把握自己利益所在。实际上在我看来，要是政治家足够有智慧的话，乌克兰完全可以利用那个地理位置，两边都得好处。我认为一个很好的政治家，能做到这一点。从欧洲他能得到好处，在俄罗斯也能得到好处。但是乌克兰都没有做好，库奇马有这个尝试，但是做得也不大理想。

民众也缺乏民主共识、民主精神。什么民主共识，民主精神呢？宽容、忍耐、对政治对手的生存、尊严的充分考量和照顾。在我看来，人民既然通过自己的选票选上一个总统，如亚努科维奇，你得让人干满五年，不能随便通过广场革命给轰下去。这个事情过分了。美国占领华尔街，也没有把一个在职总统轰下来，在美国轰总统成功的也就尼克松这一次。尼克松是通过弹劾程序轰下去的。而且是尼克松一看不行自己辞职不干了，不是通过广场革命轰下去。形成广场革命这样的先例，这很恶劣！

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2月21日，在相关国家的斡旋之下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签署初步协议，内容包括24小时内恢复2004年的宪法版本，也就是削减总统权力，让总理和议会成为权力重心。并在今年12月大选。同时10天内组建一个联合政府。

结果第二天就变了。22日，亚努科维奇被议会罢免其职务。议会同时宣布提前于同年5月25日举行总统大选。反对派就那么急？就差半年就等不了？

当我看着俄罗斯军队进入克里米亚，当我看着克里米亚在进行全民公决，90%以上的选民支持加入俄罗斯，我的心在悲苦之中。我对乌克兰人民此刻的无奈和悲凉感同身受。然而，有什么办法呢？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此反复无常，不讲信义的民族，难道这不是上帝恰当的惩罚吗？

库奇马、尤先科、亚努科维奇、季莫申科、克利钦科和卢岑科，这些乌克兰的历史罪人！

[ 王从圣 法律学者。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3月6日天则经济研究所/新浪博客/中评网共同主办的新天论衡「乌克兰: 民主转型的启示」研讨会发言修订稿 ]

## 乌克兰：成熟的宪政民主文化尚未自我生成

王 焱

我不大了解乌克兰的情况，今天听了很多专家介绍乌克兰的情况，这种前宪政民主的国家转型是一个比较复杂、艰难的事，而且包括中东这些国家转型都不是那么顺利，还是苏东转型时期，东欧一些国家的转型算是比较顺利的。讲乌克兰的，我听下来有几个，一个是乌克兰转型的宪政制度设计有些问题，在美国也有，总统的预算议会通不过，政府就关门了多少天。

当然，一方面是美国这种制度，政府关门虽然是很多天，但是社会也是井然有序，没有什么问题。要是换一个发展中国家可能天下大乱了。但是，转型这种宪政制度设计非常重要，特别是转型国家面临着一个两难悖论，一方面要从原来的高度集权国家、威权国家，转为一个宪政民主国家，需要分权制衡。另一方面，转型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个就陷入了矛盾。包括当下的中国，比如反贪反腐，或者一定程度的集权，会导致集权化倾向，不利于宪政制度。

我记得有一个欧洲政治学家说过，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是需要一些条件的，有很多是自由民主政府提供不了的，需要有强人、需要有强势的政府之手。比如说反贪、打黑，以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反贪打黑，一个宪政民主政府转型初期很可能是一个软弱的政府，一个软弱的政府完成不了这些任务，而且弄不好很可能就西西里化、黑社会化。对于这个矛盾值得思考，就是宪政转型的集权和分权制衡的关系，还有宪政制度的设计。

第二，转型需要一个成熟的上升阶级，就是政治精英阶层，或者是需要政治家，需要有政治权威的、能够高瞻远瞩的、具有战略眼光的，而不是鼠目寸光、鼻子尖下面的利益、因个人利益而放弃了长远利益的。这个从乌克兰可以看到，尤先科、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都是很难称之为有宏大战略眼光的政治家，而且我看外电报道都是很贪腐的政客，所以很难完成自己肩负的政治问题。

第三，就是刚才那位先生讲的政治文化问题，乌克兰是介于东欧和俄罗斯之间，很难自我生成一种成熟的宪政民主文化。还有历史问题，前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大饥荒，消灭富农，现在乌克兰独立出来要反思前苏联时代的种种问题，所以有去俄国化的过程。所以由于乌克兰转型比较仓促，很多历史问题没有达成共识，要追究前苏联责任，想要跟俄罗斯切割的、拥抱欧盟的种种问题得不到共识，我觉得这对中国也是一个启示，现在三翻四复的政府潮流，也造成政治观点的冲突。

最近两年发现很多以前比较熟的人，现在变得政治观点对立起来了。转型之前应该对抗美援朝问题、对苏外交一边倒问题、饥荒问题、反右派的一连串问题，还有人说冲突在每个人内心世界里面引起了一场内战，可能说的严重了一点。不过你要转型，就是对当下和近期历史的价值判断问题，也有取得共识的问题。这些都不是过去的历史问题，实际上在转型期间，历史问题很可能就变成政治分裂的由头或者契机。

要我想，我觉得乌克兰转型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地缘政治要素，我们近代中国可以看到，很多搞政治的人会不自觉的用地缘政治方法去思考他的政治战略。但是，挺奇怪的，地缘政治学有英国学派、法国学派，却没有中国人的声音，甚至我看到很多都是批判的。还有人把这个说成和纳粹有关系、变成地理关系学了。

地缘政治是很重要的，从乌克兰就可以看到，他东部靠近俄罗斯，受俄罗斯影响大，西部是靠近波兰和欧盟，所以他就在东西方之间被撕裂了。我就想起当初南斯拉夫的铁托，巴尔干半岛原来也没有一个叫南斯拉夫的革命，铁托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把一些小国在二战后串联起来，成为一个国家。但是铁托一死，就爆发种族之间的战争血流成河。说明成熟的政治家，或者政治上成熟的政治精英阶层非常重要。有了这些，就可能把这些分散的力量凝聚到一起，缺乏这个，就像乌克兰的现状，把这个国家撕裂了，而且当初铁托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阵营之间，他也是拒绝倒向哪一边的，他是不结盟运动发起人之一。所以，后来他到晚年，毛泽东邀请铁托来访，铁托不肯来，铁托说当时社会主义论战的时候，你们批判了我，你们批判错了，现在要来，应该是你毛泽东先到南斯拉夫访问我，当时晚年的毛泽东那个时候已经根本走不动了。后来毛死了，华国锋先去了南斯拉夫，之后铁托才到了中国。毛晚年说铁托元帅像钢铁一样坚强，等于是在东西方的博弈能力上，使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最大化，铁托比毛高明一点。

可以说现在乌克兰的政治家就是被地缘因素撕裂了，而且要说欧盟可能是乌克兰西部的人愿意拥抱的，但是乌克兰现在处于经济危机之中，所以当初欧盟经济援助只是给1.5亿美元，而俄罗斯可以给150亿美元。

张弘：

危机爆发以后，欧盟态度180度的转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

王焱：

总而言之，它的东部是工业区，刚才有位专家讲到了，主要工业产值是东部提供的，西部是农业区，而且是俄罗斯天然气管道通过乌克兰到欧洲，俄罗斯总是抱怨乌克兰人偷了天然气管道的气不给钱。这说明乌克兰在经济上还不能自立，在政治上、外交上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那样表现，也很难。所以，现在首先是地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他才能谈得到怎么能够顺利的完成乌克兰转型。

[ 王焱 《公共论丛》、《读书》、《社会学家茶座》杂志主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3年3月6日天则经济研究所/新浪博客/中评网共同主办的新天论衡「乌克兰: 民主转型的启示」研讨会发言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本人审阅，转载务必注明 ]

## 观察乌克兰，要关注软性影响因素

孔寒冰

对于乌克兰现在事态，我真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从事的教学和科研主要集中在是中东欧，不包括乌克兰。但是，我承担了一个国家基金重点项目，题目是“原苏联东欧地区社会发展现状”。我将这种现状定义为苏东剧变之后这个地区二十多年的发展。乌克兰是其中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今天来参加座谈主要是听听各位专家讲乌克兰，期待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我是几年前去过乌克兰，从白俄罗斯到的乌克兰，先后去了基辅、敖德萨、辛菲罗波尔、塞瓦斯托波尔和雅尔塔。去这些地方之前，我满怀希望，准备在雅尔塔多住些日子。但是，去了之后，我看见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不要说和西方国家相比，就是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相比，差别都比较大。

在过去20多年，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的街头政治很发达。这种街头政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在中东欧其他国家也时不时地有，但都没有像乌克兰折腾这样凶的。所以，乌克兰最近发生的事不是偶然的，以前都有过。

如果从思考这个角度，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讲民主化，民主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苏联解体变成15个国家，东欧剧变以后变化13个，加在一起就是28个国家。我们在从事这个项目研究过程中，也曾经想过能不能并并类，说俄罗斯这边找几类，东欧找几类。后来发现在这个地区，没有用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在很多方面一致，都是各有特色。原来苏联东欧这28个国家从地理区位包括东亚、中亚、外高加索、波罗的海、东欧、中欧和东南欧，七个地理区域。它们千差万别。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讲的转型成功与否，他的民主化程度如何，就是这个标准是什么？你很难用一种标准去衡量它。

另外，我觉得乌克兰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关注民主化的过程的各种影响因素。这28个国家为什么千差万别？很多事情就现在看现在，可能有的时候都是表面的，或者看不全的，如果你把他放大到往远一点，往宽一点，可能很多问题就有答案了。比如，东欧这些国家，这些国家二战之前和苏联没有什么关系，要么是法西斯国家，要么是和英国接近的，没有和苏联结盟的；政治上没有苏联这样政体的，经济上要么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么是落后的农业工业国，没有和苏联一致的。这些之所以成为东欧，就是大国划分的结果。如果大国把捷克划到西边，那它绝对走不上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把希腊划到苏联，那么它也肯定是苏联阵营了。或许由于这种政治基因，现在这13个没有一个坚持过去的政治体制，也没有一个实行过去的经济体制，甚至没有一个和俄罗斯结盟，都要回到欧洲。所以，中东欧国家和乌克兰今天发生的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有很多历史的因素，文化或者文明的因素。在文化或文明的因素方面，原来的东欧国家还好说，比较复杂的就是现在的乌克兰。现在，人们似乎有这样的印象：乌克兰东边是一个文化，西边是一种文化。实际上可能还不是这样的。比如，在更多的方面，如宗教文化、种族上，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共同支撑着过去的俄国（苏联）。所以，当我们看今天的乌克兰发生这么多事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受西方的影响？这个说都好说，但是实际未必那么简单。

综合起来，像乌克兰这样的转型国家，它的民主化标准和影响因素在很多方面与原东欧国家完全不是一回事，乌克兰在历史上也没有属于过西方，尽管有一些影响。但是，东欧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如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二战期间是站在法西斯那边，其他国家是站在英国、法国那边。所以，今天乌克兰和西方关系，应当分析这种关系到底是在什么程度上？我觉得，我们在传媒看见的好多是一种误读，好象是乌克兰一半是亲西方的，一半是亲俄罗斯的。我不是研究乌克兰的，但是，我在游走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时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乌克兰不用说了，就是访问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和一些专家学者讨论的时候，这些学者都强调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还是不一样，哪怕这个字母，俄文是那样写的，白俄罗斯是这样写的。他们说：我们语言与俄罗斯的也不是一回事，我们有自己语言，有自己文化还是强调不同。至于说乌克兰这方面可能更突出了。所以，原来以为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是支撑过去的一个帝国，可它为什么拼命强调自己的不同？还是强调我和你不一样，就是这个背后的有哪些软性因素？我也理不出来头绪。但是，这么多年做这方面教书或者研究，特别是对原苏联东欧这个地区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都访问过了之后，我能感受到有这样的因素，但你让我用语言表现出来，尤其是用档案文件证明这个东西，我还真做不到。但是，这种无形的东西确确实实影响着对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认同。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就存在这种只可意会，但是没法说的纠结。我去年去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到克罗地亚就有类似的感觉。从塞尔维亚租车去克罗地亚，我特别是想去武科瓦尔，但塞尔维亚司机不愿意去那里。他说我这个是新车，那路不好，容易把我车弄坏了，最后带我去了塞尔维亚北部的伏伊伏丁那。后来想的很简单，南联邦解体时第一场战争就是在武科瓦尔那个地方打的，发生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这就是缺少民族认同感，在外面看他们是哥们儿，但是还是缺少内在联结这种东西。我想现在乌克兰这种情况看的很近实际上又很远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在表现就是街头政治一次又一次的，你方唱罢我登场。

[ 孔寒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3月6日天则经济研究所/新浪博客/中评网共同主办的新天论衡「乌克兰: 民主转型的启示」研讨会发言修订稿 ]

1.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通讯作者及地址：韦森，上海邯郸路220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433。Email: liweisen@fudan.edu.cn, weisen@online.sh.cn 。这篇长文原改自作者最近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文化与制序》（韦森，2003）第6、7章。笔者感谢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对本研究项目的资金支持。 [↑](#footnote-ref-0)
2. 西方当代著名哲学家曼海姆（K. Mannheim ，1960, p. 245）在其名著《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曾指出：“我们应当首先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同一术语或同一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不同境势中的人来使用时，所表示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可能正是因为这一原因，“institution”一词在中国学术各界翻译得很乱。在中国经济学界，大家一般不假思考地把它翻译为“制度”，而中国英语学界（如姚小平、顾曰国教授）和哲学界（特别是研究语言哲学的中国著名中青年哲学家如童世骏、陈嘉映教授等）一般把“institution”翻译为“建制”。另外值得注意地是，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三度讲演》中译本中，我国语言学界的张绍杰教授则将所有的“social institutions”全部翻译为“社会惯例”，而将所有的“convention”全部翻译为“规约”。华东师大哲学系的杨国荣（2002）教授则在他的《伦理与存在》中全部把“institution”翻译为“体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著名美国社会学家Talccot Parsons（1949：399－408）在其《社会行动的结构》的第10章中有一节专门谈到“institutions”的功用，并且再此书基本上是在中文的“制度”的涵义——即支配人们社会行动的规范性约束规则体系——使用这个概念的，但中译本的译者却将这个词在这里把它翻译成“定则”。这些均值得我们的深思。事实上，正如笔者最近在一些文论中一再指出的那样，三位诺奖得主哈耶克、科斯和诺思各人在使用“institution”一词时，所涵指的现实对象性也实际上是不同的。哈耶克倾向于把他的研究对象视作为一种“order”（秩序），科斯则把“institution”视作为一种“建制结构”（有点接近英文的“structural arrangement”或“configuration”），而诺思则把“institution”视作为一种“约束规则”—— 用诺思本人的话来说，“institutions are rules of game”。经过多年的反复揣摩，我觉得最能切近或精确界定西方文字中的“institution”一词的还是《牛津英语大词典》中的一种定义：“the established order by which anything is regulated”。把《牛津英语词典》中的这一定义直译成中文是：“业已建立起来的秩序，由此所有的事物均被调规着”。这一定义恰恰又与Hayek（1973, pp.44-46）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所主张的“行动的秩序”是建立在“规则系统”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洞识恰好不谋而合。到这里，也许读者能明白近几年我为什么一再坚持要把“institution”翻译为“制序”（即制度规则调节着的秩序）这一点了。 [↑](#footnote-ref-1)
3. 我们这里所说的社群主义，与西方当代政治哲学界和伦理学界的学者如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1982）、泰勒（Charles Taylor，1979，1989）、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1984）和瓦尔泽（Michael Walzer，1983）等学者所说的“社群主义”有联系，也有区别。在与罗尔斯（John Rawls）、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高德（David Gauthier）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论战中，桑德尔、泰勒尔、麦金太尔和瓦尔泽等社群主义者提出了两种社群主义：一是方法论的社群主义，一是规范性的社群主义。方法论的社群主义认为，个人主义的主要观点（如理性经济人的自由选择）是错误的。他们主张，要理解个人的行为，必须把个人置放在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背景中来考察。这也就是说，要理解个人及其行为，必须把个人放在社群和与他人的关系中来研究。而规范性社群主义者则认为，个人主义的主张导致伦理上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其中主要是个人主义不能导致一个真正的社群。他们还批评个人主义的主张导致忽视国家所维系的良善生活，如公正的收入分配等等。这种规范性的社群主义者也主张，社群本身就是具有诸多存在理由且不可或缺的公共物品。另外值得主义是，一些管理学家如美国哈佛大学的 George Lodge、Erra Vogal（1987）和剑桥大学Judge管理学院的Charles Hampden-Turner等（1993）学者也使用“社群主义”这个概念。他们还认为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诸社会是典型的社群主义社会。这些管理学家指出，社群主义文化价值观是非同于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他们认为，两者主要区别在于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不太注重商业的发展。希腊、智利、西班牙、印度以及以色列就是集体主义文化精神国家的主要例子。Hampden-Turner等学者还指出，东亚的社群主义文化观也区别国家主义（statism），因为国家主义认为政府能够并且必须命令和控制社会的经济活动，而东亚的社群主义文化观的实质在于主张企业、经济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去协调一致地运作。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George Lodge，Erra Vogal和Charles Hampden-Turner 等这些管理学家们所理解的社群主义与桑德尔、泰勒、麦金泰尔和瓦尔泽等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所理解的在西方社会内部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社群主义是有些区别的（尽管有相似之处）。另外，德国著名当代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 2000, 页47-74）也认为儒家思想与西方的社群主义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有着重大差异。因为，传统中国文化与其说是一种注重公共利益——像西方社群主义所主张的那样——的社群主义，倒不如说是一种建立在家族联系之上并只关注家庭利益的利己主义。这种家庭中心主义导致了中国人往往对公共事务缺乏关注（“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即“缺乏公共精神”。尽管如此，考虑到传统文化濡染中的中国人不强调“individuality”而强调“we-ness”，我们是可以把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视作为某种“社群主义”的，尽管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中国文化中家庭中心论的“社群主义”非同于桑德尔、泰勒、麦金泰尔和瓦尔泽等西方学者所理解的社群主义。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还将详细讨论这一点。 [↑](#footnote-ref-2)
4. 据英国学者Steven Lukes（1973，参中译本，页2-3）考证，“个人主义”这个词最早是由法语“individaulisme”的形式出现的。法国天主教思想家Joseph de Maistre于1820年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尽管“个人主义”是在十九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一个术语，但其精神在西方文化和社会历史中却源远流长。正如一个法国学者Élie Halévy（1934, p. 504）所言：“在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哲学。个人主义是罗马法和基督教伦理的共同品格。正是个人主义，使得其它方面迥异斐然的卢梭、康德和边沁哲学之间具有了相似性”。另外，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Bellah, *et al*, 1985， 参中译本，页214）等人也曾指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当然，我们这里必须注意到，哈耶克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曾经多次明确指出，以苏格兰—英国道德哲学家休谟（Dadid Hume）、弗格森（Adam Ferguson）、斯密（Adam Smith）到阿克顿（John Acton）勋爵所代表的英国个人主义是“真个人主义”，而以笛卡儿、伏尔泰、卢梭等法国思想家所代表的法国个人主义则是一种“伪个人主义”（参Hayek, 1949, pp.1-32）。 [↑](#footnote-ref-3)
5. 至少从十八世纪起，西方社会思想界就一直致力于将个人主义的“现代性”与中世纪欧洲假定存在的“公社制”加以对比。事实上，许多社会学家的思想都是在这类对比中形成的。滕尼斯（Ferdnand Tönnies, 1991）所提出的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Gesellschaf）的过渡、法国社会学家Émile Durkheim所说的从“机械社会”向“有机社会”转变、波普（Karl Popper，1962）所理解的从“有机社会”向“抽象社会”的过渡，以及Karl Polanyi （1957）所说的从中世纪的公社制向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变，均是与这种西方近现代社会中随着个人主义之“昭显”而获得的人的个性解放、个人独立、个人自主和个人自由密切相关。 [↑](#footnote-ref-4)
6. 这里我们必须意识到，尽管从西方文化的“两希”源头中均潜含着个人主义的“谜拟子”，但这决不能成为把西欧的多元文化全部归结为“个人主义”的文化的理由。一个特别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在古罗马帝国核心故址上承传下来的意大利文化，却与下面我们将要探讨的中国家庭中心主义文化观有很多相似之处。正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95，ch. 10）在《信任：社会美德与经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所发现的那样，在意大利南部（包括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以及意大利中部，与其说当地的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不如说它们是与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的社群主义，从而与传统中国文化极其相似。可能正是由于意大利文化的这一特征，使意大利人的经济组织与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的家族企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另外，与我们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相参照，当代意大利政府直接管理经营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国有经济在当代意大利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这些现象，似乎均与中国文化和意大利文化中相似某些东西有联系。另外，了解当代希腊人族群的人也会发现，希腊本土人和在世界各地的希腊人社群的家庭和家族观念也比讲英语族群中的人强得多。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猜测到，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精神，与其说主要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毋宁更有可能源于《圣经》的宗教精神和宗教改革运动。但细想一下，直接承传了《旧约》文化精神的当代以色列文化却为世人所公认具有“集体主义”文化精神。由此看来，西方诸文化是如此纷纭陆离和复杂多变，其渊源和演化路径又是这样地扑朔迷离。从这里我们也会意识到，文化的演化路径和社会机制，要比社会生活形式的演变路径复杂得多。 [↑](#footnote-ref-5)
7. 在谈到从“共同体”（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过渡时，滕尼斯（ Tönnies, 1991）曾指出，礼俗社会的特点是所有成员都毫无例外地属于同一群体；而在法理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扮演自己的角色，因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是契约关系（我对你有义务，你对我有义务，这一切都是由契约来界定的）。 [↑](#footnote-ref-6)
8. 从其宏大高深的思辨哲学高度，牟宗三先生也意识到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拟子在西方社会体制型构中的作用，不过他将西方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的文化拟子称作为西方社会的“个体性原则”（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中，牟先生说：“原子性原则（牟先生这里指由罗素提出的逻辑原子论，即“logical atomism”——引者注）不但在说明科学知识上重要，在其他方面，如在政治、社会方面，更显得重要。盖有此原则，才能讲自由、个体乃至人权。英美人在政治、社会方面也很自觉地意识到原子性原则之重要性，在这方面可以称之为**个体性原则**。英美人不只是重视现实的经济利益，否则他们无法领导当今的世界。个体性原则，一般人生活在自由之中，对之不自觉也不清楚，但他们的一般高级知识分子、哲学家都意识得很清楚”（牟宗三，1997a, 页9）。 [↑](#footnote-ref-7)
9. 由此看来，当代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定，只有在欧美个人主义文化的社会场景中方能适用。在传统中国文化和亚洲其它社群主义文化以及以色列等某些集体主义文化氛围中，经济学中的“理性人个人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假定”在很大程度上要打折扣。 [↑](#footnote-ref-8)
10. 美国当代汉学家郝大维（David L. Hall）和安乐哲（Roger T. Ames）曾非常深刻地指出，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如果一个人企图在社会财富中获取多于他自己的份额，这种行动总会使各种方式的互动无效，惟有这种互动才能导致共享意义（shared meanings）的交流。没有这种交流，个人就会被切断与供参与和交流的社群的联系，惟有这种社群才能促进文明。侵犯性的自主导致疏远。只有在一个人把社会看成是已经个体化了的、富有个体性的成员组成时，此人才可能促进我们经常在西方民主社会所看到的那种自主权”（Hall & Ames, 1988, p. 26）。其实在荀子在谈到“礼”的起源时，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与郝大维和安乐哲近似的观点：“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 • 礼论第十九》）。由此可以看出，由于不同的文化场景和文化的“精神性”，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个人利益的追求的冲突导致了“礼制”，而在近现代西方社会中，人们个人利益的追求冲突却导致了“法治”。导致东西方社会这两种不同体制后果的社会机制过程是怎样的？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从目前的认识层面来猜测，我觉得这至少与主流文化导向中是拟制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自然追求还是尊重或张扬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有关。 [↑](#footnote-ref-9)
11. 美国汉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西方个人主义与西方法律制度的内在联系。在《孔子哲学思微》中，郝大维和安乐哲（Hall & Ames, 1987, 参中译本页128）说：“作为外部决定力量的超越性的法，对极端的个人主义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个人主义需要法律，法律又强化了个人主义”。这一见解对理解西方社会体制在近现代的历史型构机制极其演化路径极为重要。 [↑](#footnote-ref-10)
12.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就洞察出了这一点。譬如，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1987，页259）就曾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就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在谈到中国文化中缺乏个人主义文化拟子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德区别。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按照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945）的见解，尽管个人主义在许多方面与利己主义基本一致，但个人主义并不就等于利己主义。事实上，费孝通先生也早就识出这一点。在1947年出版的《生育制度》中，费孝通（1947，页29）先生在谈到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以“己”为中心的文化观时指出，儒家传统中的“己”，并不就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他说：“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时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的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自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费孝通先生的这一辨识，是非常到位的。 [↑](#footnote-ref-11)
13. 台湾国立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专家曾炆煜曾在一篇题名《从个性发展的观点看中国人的性格》的论文中指出，即使在当代华人社会，中国人一般也顺从权威，通过压抑本能的食色之欲的冲动，通过遵守一种实践伦理，通过恪守“顺从”和“互惠”规范在内的难以把握的礼仪规矩，来与他人相处，从而学会避免“羞辱”的制裁。因此，他认为，典型的中国人常感到在心理上深受挫折，而后又带着这种挫折感重新开始自我控制和压抑的又一轮循环（转引自Metzger, 1977, 中译本，页20-21） [↑](#footnote-ref-12)
14. 值得注意的是，金耀基教授则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持相反见解。根据西方学者E. R. Hughes（1937）和陈荣捷（Chan, 1944）就整个儒家哲学就在于“个己的实现与社会秩序的创建”的看法，金耀基（2002，页157-161）认为，“个人是整个儒家人文主义的中心”。他还认为，尽管传统中国文化思想中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二重倾向，但作为中国主流文化思想的儒家则企图超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走了“第三条道路”，即“企图调和、结合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建立人间秩序的一个文化设计（cultural project）”。根据冯友兰（1967）先生所提出的中国是一个“以家为本位”的社会这一见解，金耀基又进一步认为，“儒家所走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建立一个家本位的社会”（同上，页163）。但是，金耀基教授认为儒家的这种“第三条道路”并不通。他认为，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家’这一站上出了问题，以致‘家之内’出现了个人淹没在家的群体之集体主义的倾向性；‘家之外’则出现了有个人而无他人的利己主义的倾向性”（同上，页168）。另外，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梁漱溟先生也提出了之中国社会既非“个人本位”，也非“社会本位”，而是“伦理本位”（即“关系本位”）的著名见解。譬如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1987，页93）说：“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把重点放在个人者，是谓个人本位；同在此关系上，放在社会者，是谓社会本位。诚然，中国之伦理只看见此一人与彼一人之相互关系，而忽视社会与个人相互间的关系。……这就是，不把重点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正如金耀基教授所言，梁漱溟的中国社会“关系本位说”，实为一卓见。我们把中国社会理解为一种（家族）社群主义社会，与梁漱溟先生的“关系本位说”，应该说是一个意思。 [↑](#footnote-ref-13)
15. 美国著名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Metzger）对把儒家精神与西方的个人主义进行比较做法似有些保留。他（Metzger，1977，参中译本，页15）说：“儒家自我确立和相互依赖的模式可以被拿来与西方个人主义进行粗略的比较。但我们不能无条件地用相互依赖、情感压抑、对进取行为的憎恶、缺乏自尊、缺乏合法抗争观念、家族主义、集体主义、权威主义、忠于特定对象论等等术语来描述儒家的人格模式”。 [↑](#footnote-ref-14)
16. 值得深思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精神中的这种“无我”或者说“独立自我”的匮乏和“个人自主性”的丧失甚至反映在中文中。许多西方学者如C. Hansen和Steven Lukes等曾发现，汉语结构本身就侧重强调部分——整体模式，以致于名词一般没有可数与不可数之分。这也导致中国人在解释事物时不必将世界描述为由个体所组成，而家族的行为既可以由家庭来解释，也可以由个人来解释（参翟学伟，2001，页28）。 [↑](#footnote-ref-15)
17.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曾在《菊花与刀》一书中提出，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而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一般西方人心目中，有一超越的上帝。日本人则没有死后生活的观念。因此，前者靠“笃信上帝”、“回避罪恶”和“澄明的良知”的内在强制力来行善，而后者则靠他人的评价、暗示、期待和赞许来行善（参Benedict, 1946, 中译本，也153-157）。从Ruth Benedict的“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两分法中，我们也可以体察出，西方文化的最深层伦理层面就潜含着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拟子（个人与上帝或超越道德实体的关系），而日本文化深层的伦理层面则潜含着社群主义的拟子（即在他人“在场”时，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制约中行善）。另外，由于中国人（尤其是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讲面子”，我们也可以把当代中国的社群主义文化视作为某种耻感文化。 [↑](#footnote-ref-16)
18. 据《论语·颜渊十二》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的“克己复礼”和“为仁由己”的教说，基本上型塑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精神，从而为这种“无我”、“克己”和中国人在社群中每个人无独立人格的文化精神性提供了拟子模板。 [↑](#footnote-ref-17)
19. 中国社会制度史中“政教合一”中的“政”，我们现在似可以把它理解为李泽厚（1998，见《论语今读》页277）先生所说的“礼制”为特色的“政治”。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政教合一”，从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序的理论分析视角来看也就是文化濡化与制序化围绕着“礼”这一“契合点”而发生的同构和“整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政教合一”的“教”，照李泽厚（1998，页7）看来，既包括文化、教育（teaching， education），也包括人生信仰（faith, religion）的型塑。按李泽厚的原话说，“正因为儒学的宗教性和哲学性是交融在一起的，儒学的宗教性不是以人格神的上帝来管辖人的心灵，而主要是通以伦理（人）——自然（天）秩序为根本支柱构成意识形态和政教体制，来管辖人的身心活动”。 [↑](#footnote-ref-18)
20. 《左传 • 隐公十一年》把“礼”定义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根本，以及《礼记 • 乐记》中的“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的思想，均表明了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礼”在世俗生活中的这种普遍作用。 [↑](#footnote-ref-19)
21. 当代儒家代表人之一梁漱溟先生也充分意识到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文化精神与社会制序的这种“同构”，这即是他所提出的中国“伦理本位社会”的理念。不过，梁漱溟先生是在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这种文化与社会制序之“同构”的。这实际上是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从事的“乡村建设”努力的动因之所在（参郑家栋，2001a, 页28）. [↑](#footnote-ref-20)
22. 郝大维和安乐哲（Hall & Ames, 1988, pp. 269-270）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礼的观念是非常宽泛的，包含了从交往的方式、手段到社会政治制度这其间的一切。它是中国文化的决定性的组织结构，并且规定了社会政治秩序。它是这一文化表达自身的语言。礼当然不纯粹是中国人的发明，但它作为治理社会的构造所具有的突出地位和普遍有效性，它对正规的法律制度的支配作用，却给中国的以礼特殊定义”。郝大维和安乐哲还认为：“礼是‘表演’，是身份和习俗，它们规范的形式影响关系”。 [↑](#footnote-ref-21)
23. 与郝大维、安乐哲和杜维明所见的这种以“礼”为纽带的儒家社群的观点相反，韦伯（Max Weber, 1978，参中译本，页271）认为，在传统中国，真正的“社群”（Gemeinde）并不存在。进而，韦伯认为，“中国的所有共同体行为（Gemeinschaftshandeln）都受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和制约”。韦伯还认为，造成这一社会结果的原因在于中国人之间的普遍不信任。他（Weber, 1978，参中译本，页266）说：“官方的独裁，因袭的不诚实，加之儒教只重视维护面子，结果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猜疑”。结合卜松山（Karl-Heinz Pohl, 2000, 页47-74）所认为传统中国文化是一种“缺乏公共精神”的只关注家庭利益的利己主义见解，可以看出，传统中国社会的社群，与韦伯眼中的西方中古时期的“Gemeinde”和滕尼斯眼中的“Gemeinschaft”，是有重大区别的。 [↑](#footnote-ref-22)
24. 孔子所主张的“克己复礼为仁”（“归仁”），就意味着自我克制以符合“礼制”，只是一个过程，一个路径，最终的目的还是达至“仁”的道德境界。儒家思想内部“礼”和“仁”的密不可分，使李泽厚（1998）先生把“礼”理解为“社会性道德”，而把“仁”理解为“宗教性道德”。这种分殊似不甚准确。“礼”作为文化与制序的“交汇体”（我们既可以把“礼”理解为“制序化了”的“文化”（institutionalized culture），又可以把“礼”理解为“文化了”的“制序”(culturalized institutions)），是一种社会实存，即“此在”，而“仁”作为一种伦理实体（这里指牟宗三（1968，页178-191）先生在《心体与性体》卷二第一章第六节“识仁篇”中谈到儒家“仁”的概念时所说的“仁体、仁理、仁道或仁心”），则是一种“亦超越亦内在”的东西（用康德和牟宗三的术语来说是“Transcendent”“Immanent”）。换句话说，“礼”发于“仁”又可以经由人的“克己”（修身）回归于“仁”，但“仁”却毕竟“超越”或精确地说“内在于”“礼”之中的。当然，方家们这里会发现，后句话里我所使用的“超越”和“内在”，可能有些匆草和勉强。并且这里也许毋庸赘言，康德和牟宗三哲学中的“Transcendent”、“Transcendental”和“Immanent”也可能是其最基本和最难理解的部分（参牟宗三（1997a）《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第四讲和郑家栋（2001b）教授最近所撰写的“‘超越’与‘内在超越’—— 牟宗三与康德哲学之间”的学术论文。 [↑](#footnote-ref-23)
25. 按照杜维明（Tu, 2001, 页141-142）教授的见解，早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87年），随着儒家箴规逐渐在中华帝国的中央官僚体制中取得了牢固地位，礼制在政府行为、社会关系的界定以及民事纠纷的协调方面也变得日益重要。随之，儒家的理念也在中华帝国的法律体系中获得了牢固的地位。这说明，早在汉代，中华帝国的法律已开始“儒家化”（即伦理化）了。著名美国汉学家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 1988, pp. 13-20）也大致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礼化”是从汉代开始的。董仲舒说：“何为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卷六 • 立元神第十九》）。从董仲舒这句话看，从汉代起，朝廷不仅“废除百家，独遵儒术”，而且把“礼”作为政治结构和社会秩序“建构”的轴心。 [↑](#footnote-ref-24)
26. 根据梁漱溟先生的中国社会的“关系本位说”，费孝通先生在著名的“差序格局”一文中，则对中国的这种网络结构进行了非常好的描述。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方社会是一种“团体格局”（这一见解值得怀疑），而中国社会则是由许多网略组成，且“每一个网络都有个‘己’作中心”。费孝通（1985）说：“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footnote-ref-25)
27. 儒家的伦理训规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的精神，也渗透受中华文明所覆盖的周遍国家的社会结构之中。据狄百瑞（de Bary, 1988, pp.27-27-38）考证，公元五、六世纪日本推古天皇（Suiko Tennộ）时代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基本上就是源自儒家经典的伦理规训。虽然它在原文中应用“kempộ”（宪法）一词，但它实际上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constitution”，而只是“示范的法律”或“基本的模式”。正如狄百瑞（de Bary, 1988, p. 27）所言：“该词很少有近代相关的法律内涵，它不是指法理体系的最终依据，而是一套调节政府行为的基础道德训条以及政治方针”。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的早期社会中也经历了一个来自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礼”的“拟子”的复制和繁衍过程。并且，其社会结构和法律结构也有一个历史上的“伦理化”（即“礼化”）的过程。 [↑](#footnote-ref-26)
28. 中国文化的这一“精神性”，最明显不过地从《大学·经文章》中如下一段话中表达出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非常清楚地反映出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即从自己的格物开始，经致知、诚心、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而达致平天下这样一种从个人的自我“工夫”外推而建构一种天地和谐的社会道德秩序。 [↑](#footnote-ref-27)
29. 这可以从孔子在《论语·为政》中的一句话反映出来：“导之于政，齐之于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于德，齐之于礼，有耻且格”。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所言的“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也包含这一意思。 [↑](#footnote-ref-28)
30. 狄百瑞（de Bary, 1988, p. 118）对这一见解持怀疑态度。他说：“有些观察家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说，儒家强调社群而非个人，以致它在现代世界中更符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在我看来，这一见解最多也只能一半是真理，并且忽略了真正的要点。既然[儒家]社群的模型是家庭，那么，根本的标准就始终为经济活动（包括资本主义活动）是否能为家庭或（加以引申）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价值而服务”。由此看来，也许是出于其对东方价值观的偏爱，狄百瑞教授似乎太偏重于“嫁接”儒家的传统精神性与现代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了。在东亚社会中儒家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契合（参马涛，2000），并不能否定儒家文化濡化中中国人心目的理想社会比较接近青年马克思所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和晚年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点。 [↑](#footnote-ref-29)
31. 狄百瑞（de Bary, 1988, p. 103）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也可以看作是古老的集体自我实现的观念在此时此地的返祖现象”。 [↑](#footnote-ref-30)
32. 与郝大维、安乐哲的判断和列文森、杜维明的这些见解相比，郑家栋（2001a，页460）的最近的看法较为持中。他说：“民国以降，礼作为仪式和典章的效用已不复存在，但作为调整人际关系和生活行为的社会习俗仍然在民间发生影响。而在195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后一个层面也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政治意识形态”。我觉得郑家栋的这一判断较为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儒家精神资源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中“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关系若何？二者有没有联系？有没有精神承传和继承性？换句话说，在中国当代“革命——共产（即共有财产）”的意识形态中，有没有儒家的精神成分？ [↑](#footnote-ref-31)
33. 也许有的读者（尤其是当代新儒家和“东方学者”）会感到笔者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第六章所提出的“习俗经济 → 惯例经济 → 制度化经济”这一人类社会制序演化的“三段论式”本身（参韦森，2001，页198-200），就是以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为参照系的，因而可能责怪笔者的理论进路本身就是“西方中心论”式的。然而，人类要从部落社会、宗法社会走向民主和法治社会，这应该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知识份子、政治家和普通人的共识，而决非纯粹是一个“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即使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和为在当代世界全球化进程中儒学的复兴而“不懈陈辞”、奔波弘道的杜维明（Tu,2001，参中译本，页82-83）教授也承认：“中国如果朝自己原来的方向发展，不会走向西方的民主、自由、科学、市场经济等，这也可以肯定。但从十九世纪西方进入后，中国原来的路向确实被打断了，从而不得不进行重大的重组。现在，在一百多年后再来进行反思，西方的因素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不可消解的因素”。 [↑](#footnote-ref-32)
34. 相反，梁漱溟先生在二十世纪所做“乡村建设”的实验，恰似表明了当代儒家逆这一历史潮流而从儒家教说来维系和“重构”传统中国的“伦理本位”社会结构的最后努力。（参郑家栋，2001a，页28，31，459）。与之相对照，当代儒家的另一位代表思想家牟宗三先生则采取了与梁漱溟完全不同的进路。牟先生更多地关注发掘儒家思想中积极的和创造性的东西（在牟氏哲学中由道德主体转变为知性主体即“内圣”），并从而在当代世界格局中使中国社会接引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外王）。譬如，在《政道与治道》一书中，牟宗三（1980，页24-25）先生提出：“政治的现代化，即得靠文化的力量，思想的自觉。所以，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自觉是很重要的，依此而发动的文化的力量，教育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现代化的道路”。 [↑](#footnote-ref-33)
35. 这里我们借用著名法国社会学家E. Durkheim（1902）的一个概念。在社会学中，“失范”意指社会秩序的失衡和道德规范的紊乱。 [↑](#footnote-ref-34)
36. 在思考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进程时，从传统文化遗产的角度比较一下中、日文化的差异，将会甚有意思。学界一般均认同，日本的传统文化是在传统中国文化的播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或者说早期日本文化受中国“天朝”文化的影响甚巨。论界也一般同意，当代日本的民主制度是日本二次大战战败后，在美军占领期间，由美国强行“注入的”或者说从“外部安装的”。然而，殊不知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皇权专制文化观念遗产有很大不同，在古代日本神道文化中早就潜含“民主”的因子。据狄百瑞（de Bary, 1988, pp. 33-34）考证，在解释日本起源的《古事记》（Kojiki）中，就可以发现一种“多元创世观”和“神道民主”。按照日本人最早的神话传说，人们相信各个地区的各种神祗在每年第十个月都会举行一次会议，每个神祗都居住在自己的小神龛之中，仿佛是在围绕着主神龛举行一次会议。因此，许多论者称这是日本早期“神道民主”的一个“范例”。到了明治天皇时期，在早期日本文化中的“神道民主”的文化“谜拟子”上又生发出所谓的“五条誓约”。以现在的观点看，明治的这“五条誓约”是充满着民主精神的。正是原初日本文化中的这种“神道民主”和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引进，使“日本人有能力迎接近代世界的挑战并且维持今天世界上最稳定的民主制度之一”（参de Bary, 1988, p.78-79）。.相比之下，在传统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主流意识中，似乎从来就没有生成 “民主”的“文化拟子”。确切地说，即使一些中国早期思想家（如孟子）曾萌生了民主的思想萌芽，但其“民主”的观念拟子也没有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的普遍意识中得以广泛复制和传播。 [↑](#footnote-ref-35)
37. 这里，我们自然会联想到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John Acton勋爵的那句名言：“权利意味着腐败，绝对的权利，绝对地腐败”（转引自林毓生，1988，页290-291）。当然，这却不能反过来就断定一个社会有政治民主机制就不会有腐败的市场经济。印度不是既有着英国殖民统治者所遗留给它的形式上颇现代的政治民主机制但同时又有一个腐败现象甚严重和普遍化的市场经济？同样，俄罗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也建构出了该社会内部的民主机制和私有产权制度，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目前俄罗斯内部的“nomenklatura”（即从改革中获取暴利的“大款”和“新贵”们），也把整个俄罗斯经济“腐败”得够可以得了。同样，也不能以印度和俄罗斯的反面例子来否定民主化的政治机制和刚性的产权结构这两个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的先决条件。因为，没有这两个先决条件，就不可能有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不单欧美现代化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近几十年的经济社会演变史已说明了这一点。当然，经济增长可能与市场中的腐败没有直接的负相关关系。但至少我们却不能由此就把腐败（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寻租”，即“rent-seeking”）视作为制序变迁的一种必要的成本（necessary cost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footnote-ref-36)
38.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白鲁恂（Lucian Pye, 2001）教授最近指出，尽管儒家本身并没有创造出民主的历史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的价值观与支持民主的制度不相兼容。从日本、台湾、南韩的历史发展经验中，白鲁恂（Pye, 2001，p. 182; 另参Pye & Pye, 1985）归纳到，“儒家未能自发创造民主的事实，绝不意味着它不能容纳民主，就象它已经容纳了资本主义那样。因此，尽管我们的分析的焦点是儒家在自然创生民主过程中的阻碍作用，我们最终的结论却是相当乐观的：儒家价值观可以融受民主体制的运作”。然而，对未来中国大陆的社会改革来说，白鲁恂教授的这一断言也许只有有限的参考意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1991）曾在《第三波》中说明了儒家思想与民主不相兼容，但他也并未排除儒教社会民主化的可能性。他说：“任何主要文化甚至包括儒教都有一些与民主相容的成分，就像清教和基督教中含有的明显不民主的成分一样。儒教民主（Confucian democracy）在也许是个矛盾的词语，但是，一个儒教社会中的民主则未必是”（Huntington, 1991, p. 310）。尽管我们可以接受白鲁恂和亨廷顿所认为的现代民主机制与儒家精神性是可兼容的理论洞识，但进一步的问题是：儒学的精神性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机制和民主理念的契合和关联之处是怎样的？从一个有着深厚儒家文化历史场景的行政控制经济的集权体制向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的民主体制过渡的路径又是怎样的？换句话说，从中国的有着深厚儒家文化历史场景的行政控制经济的集权体制向一个现代民主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儒家精神和传统中国文化遗产会起着一着一种什么样的作用？这些才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footnote-ref-37)